
金代官印集
景愛編
文物出版社

景愛 編





文物出版社

(京)新登字 056 號

封面設計　周小瑋

題　　簽　施　瀾

責任編輯　孫關根　趙福揚

金　代　官　印　集

景　愛　編

*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號

美通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1991 年 8 月第一版　199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　印張:18.5

ISBN　7-5010-0521-4/K・205　定價:38 元

《金代官印集》序

完顏部女真耕墾樹藝於白山黑水之間，太祖完顏旻肇國於按出虎水金源之地。國號大金，建元收國（公元一一一五年），定都會寧。迨太宗完顏晟，滅遼及北宋，與南宋形成南北並峙局面，延祚百一十九年。

金朝疆域，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族之境，北以蒲裕路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爲邊，西接西夏，南界淮水，地域遼闊。《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金「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爲州，或升城堡寨鎮爲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金壤地封疆如此之廣，設官如此之多，故於內地設猛安、謀克；於遼地踵遼官名；於漢地襲漢官之制。因此，各地不斷發現金代官印，是必然的事。

著録古代官印，在清朝以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證》、在民國以金毓黻先生的《東北古印鉤沈》諸家著述爲代表，收録官印雖多，但金代官印僅少。唯最近景愛同志所著《金代官印集》，則是專集録金代官印的著作。景愛同志曾受學於著名遼金史學者陳述教授，取得碩士學位，著作甚豐，爲積學鋭進之士。他廣匯博徵，得有印樣與無印樣而存有印文者共六百余件。雖然各地博物館和文物考古研究單位尚有一部分藏品未發表，各省志縣志中尚有一部分未輯出，但就目前所得來説，總算是絶大部分了。這在學術界中是非常可喜的收獲。

《金代官印集》是一部圖文并茂的資料性、學術性專著，其内容分爲印譜、印録和附録三部分。印譜收録有官印印樣五百五十四件，爲金朝一代現有官印印樣的總集成，按其所屬部、院、庫、司印，路、府、州、縣印，元帥府、諸軍官印，金末人民起義軍印、地方割據政權印的順序而編排的。印録是有關每件官印的記録，介紹了官印的發現或出土的時間、地點、印面尺寸、重量、印背、印側刻款，以及收藏單位和著録的書籍或文章等。附録《金代官印綜述》分四章。第一章爲金代官印之學術價值；第二章爲金代官印的使用與制造，闡明了金初從沿用遼、宋舊印到頒發新印的變化過程；第三章爲金代官印的形制特點，記録了官印本身的

內容。

金代官印的形制，是很有特點的。大率皆循遼、宋舊制。印材有金、玉、銀、銅。皇帝璽印多用金，普通官印多用銅。皇帝之璽稱寶，金世宗則詔作大金皇帝萬世之寶，系龍鈕；太子之寶，爲龜鈕；「詵王之印」爲駝鈕；一般官印爲長方形板狀鈕。鈕頂有的刻「上」字，有的印背刻「上」字，也有不刻「上」字的，刻「上」字便於使用。印體常作方形厚板狀，個別官印有呈階段式的，如承德發現的「元帥府印」、舒蘭出土的「中書門下之印」，均屬此式。書體多用九疊篆書，朱文，很少見到白文的。但是如「益都府酒務記」之類的官印也採用簡單篆書，可知九疊篆書意在防止仿制，并有顯示官府尊嚴的企圖。印面上的章法，有二字、四字、六字、八字不等，而八字以上者少見，有的官稱爲偶數者則配「之印」二字，有的官稱爲奇數者只配一「印」字，印面常分兩行，每行二字、三字、四字，結構勻稱。字款，則刻在印背或印側，有鑄印官府名稱與鑄印年月日以及印文，多刻漢文，也有少量刻女真文的。至於編號，有的納入印文，如「成字都統之印」，有的刻在印側，如鳳臺縣「都提控所之印」左側刻有「霸字號」等是，所以金代官印的形制特點是很清楚的。

金代官印，頗有益於金史研究：

金之兵制，猛安與謀克印，多見於東北三省與內蒙古等地。猛安，《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女真記事寫作萌眼，謀克，同書寫作毛毛可，皆爲同音异書。《金史》卷四十四《兵志》：「金之初年，諸部之民無它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佃漁射獵習爲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孛堇徵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爲號，猛安者千夫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從曰阿里喜。」可知寓兵於部落，「緩則射獵，急則出征」，部落組織與兵制爲一體之制，是中國北方民族史上固有特點。而其命名：如「河頭胡論河謀克印」側刻「納鄰河朮阿速猛安下」，即因納鄰河命名的；「熟伽泊猛安印」，即因熟伽這個湖泊命名的；「哥扎宋哥屯謀克印」，屯滿語爲島，即因島嶼而命名的；「拜因阿鄰謀克之印」，阿鄰，《金國語解》爲山，即因山而命名的。猛安、謀克多因山川、湖泊、島嶼命名，正說明了女真人當時居住的地理環境。《金史》卷一《本紀·世紀》：「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

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也説明了這種自然條件。「阿里合謀克印」印背刻「天眷七年三月少府監造」，「合懶烏主猛安印」爲貞祐二年造，證明自金初，歷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衛紹王、宣宗以迄哀宗，猛安、謀克制未絶。不僅延續，而且有加强趨勢。《金史》卷四十四兵制：「熙宗皇統五年，又罷遼東漢人、渤海猛安謀克承襲之制，浸移兵柄於其國人，乃分猛安謀克爲上中下三等，宗室爲上，餘次之。」就是證明。太宗天會十一年（公元一一三三年）更起女真國土人散居漢地，棋布星列，散居四方，所以西京路、中都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山東東路、山東西路、大名府路、南京路，均見猛安之名，因而今後淮河以北地區發現猛安、謀克印是可能的。

金之官制，分兩部分，女真人自景祖以迄熙宗，採用勃極烈制，《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部以專征伐，嶷然自爲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諳版勃極烈居守。諳版，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昃、迭之號，以爲陞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廢。」是勃極烈制未鑄印行使歟？抑未出土歟？尚有待時日及研究也。其次遼、漢官制，是金官制的主要部分，同書記：「漢官之制，自平州人不樂爲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吏以下。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於廣寧，尚踵遼南院之舊。天會四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頒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勳封食邑入銜，而後其制定。然大率皆循遼、宋之舊。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修其職。職有定位，員有常數，紀綱明，庶務舉，是以終金之世守而不敢變焉。」可知金初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至完顔亮只置尚書省，下轄六部。所以所録的「尚書禮部之印」、「尚書户部之印」、「行宫尚書户兵部之印」、「行尚書六部印」、「翰林侍讀學士之印」，就是實行這種官制的證明。地方官制則有路、府、州、縣制，如「蒲裕路印」、「沇州之印」、「海濱縣印」可資證明。

金代官印，也有益於金代歷史地理的考察，黑龍江省克東縣金城鄉古城，曾發現「蒲裕路印」，證實克東縣金城鄉古城爲蒲裕路治所。《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蒲與路，國初置萬户。海陵例罷萬户，乃改置節度使。承安三年，設節度副使。南至

上京六百七十里，東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北邊界火魯火疃謀克三千里。」「與」應作「裕」，轄境應當今克東縣以北黑龍江上游南北及外興安嶺以南之地。鷄東縣綜合鄉四排出土「胡里改路之印」，前書記：「胡里改路，國初置萬户，海陵例罷萬户，乃改置節度使。承安三年，置節度副使。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至邊界合里賓忒千户一千五百里。」胡里改路治所應在今依蘭，其轄境略當今黑龍江下游及混同江之地。嘉蔭縣文物部門徵集到「恤品河窩母艾謀克印」，背刻「大定十年六月」、「少府監造」，前書記：「恤品路，節度使。遼時，爲率賓府，置刺史。本率賓故地，太宗天會二年，以耶懶路都孛菫所居地瘠，遂遷于此。以海陵例罷萬户，置節度使，因名速頻路節度使。世宗大定十一年，以耶懶、速頻相去千里，既居速頻，然不可忘本，遂命名石土門親管猛安曰押懶猛安。承安三年，設節度副使。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東北至胡里改一千一百，西南至合懶一千二百，北至邊界斡可阿憐千户二千里。」恤品、速頻均爲同音異書，恤品河應爲綏芬河。恤品路治所當在今雙城子，其轄境當自烏蘇里江以迄於海。以上蒲裕路、胡里改路、恤品路三路依次東西相接，但均屬金上京路。

此外金末蒲鮮萬奴建立的大真、東夏政權，從延吉市發現的刻天泰九年款的「吏部主事之印」，延吉市城子山出土的刻天泰三年款的「南京路句當公事之印」，琿春縣三家子鄉斐優城附近出土的刻大同二年款的「尚書禮部之印」，依蘭演武基鄉幸福村出土刻大同四年款的「會州廣盈倉印」，證實這個政權也設有尚書和六部之制，還是較完備的，并實施猛安、謀克制。

耶律留哥，《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八年癸酉春，耶律留哥自立爲遼王，改元元統。」而鳳城發現的「克剌阿鄰猛安所之印」印側刻「天統三年四月日造」，可證非元統而爲天統，是金印可證《元史》之誤。

綜上所述，金代官印不僅豐富了金代文物寶庫，而且促進了金史研究，頗具學術價值，故喜而爲之序。

佟柱臣　記於京中困學齋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日

《金代官印集》凡例

一、本編是金代（公元一一一五年——一二三四年）官印之總集。内有傳世之官印及近年新出土之官印。囿于聞見，缺漏尚多，有待補遺。

二、本編共輯録金代官印五百五十四種。爲便于讀者查閲，以官印類别析爲十四卷。主要是金朝各級官府的印鑑。耶律留哥、蒲鮮萬奴、劉永昌、張致之政權，舊史例爲僭僞。其印鑑于金史研究價值甚高，故一并收入，别爲一卷，列于全集之後。

三、本編官印之印樣，有的爲原大，有的已縮小。每印之下均有説明文字，詳述其印面尺寸。請讀者注意，勿將縮印視爲原大。

四、依史書之記載，金代官印（包括帝后璽印）有金、玉、銀、銅之别。現在所見到的官印，均爲銅印，極個别爲銅鍍金印。故官印之質料，在説明中一律省略。鍍金者，均加注明。

五、史載，金代官印（包括帝后璽印）有龍紐、龜紐、駝紐。這類紐式的官印，至今没有見到。普通的官印均爲長方板狀紐，故在説明中紐式從略。

六、印集編畢，又收到官印若干。故列補遺一卷。

七、印樣之編號，與目録中之順號一一對應。讀者可以據目録檢索。

金代官印集目録

132 句當公事之印

133 句當公事之印

134 句當公事之印　五八

135 句當公事之印

136 句當公事之印

137 句當公事之印

138 句當公事之印　五九

139 句當公事之印

140 句當公事之印

141 句當公事日字号之印

142 句當公事遐字号之印　六〇

143 句當公事溪字号之印

144 句當公事威字号之印

145 句當公事龍字号之印

146 句當公事月字号印　六一

147 句當公事别字号之印

148 句當公事音字号之印

149 上京路句當公事裳字号之印

150 上京路句當公事雲字号之印　六二

151 宣差都提控印

152 宣差都提控印　六三

153 宣差都提控印

154 宣差總領之印　六四

155 宣差管□官印

156 宣差規措所印　六五

157 委差句當地字号之印

158 省差順字號印　六六

159 省差句當公事亭字印

160 省差句當公事之印　六七

161 行部差委句當公事土字号印

162 行元帥府委差之印　六八

163 山東東路按察司差委火字号印

164 西京差委金字号之印　六九

165 上京差委火字号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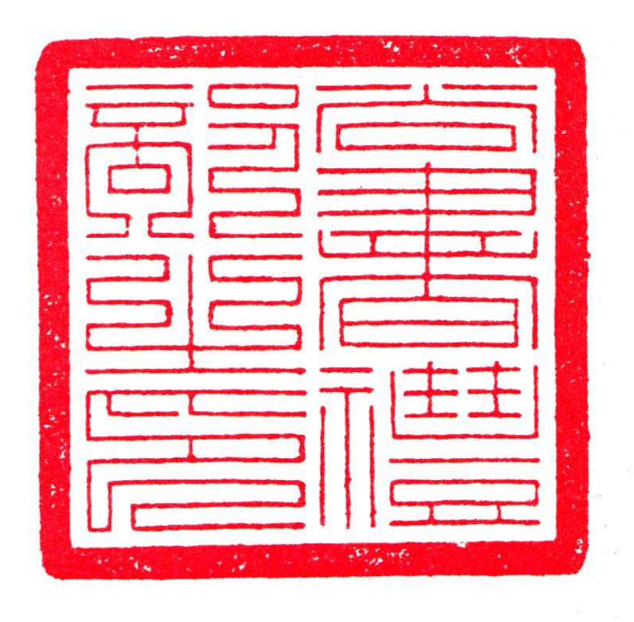
166 瑞州差委木字号之印

167 委差官印

卷九 都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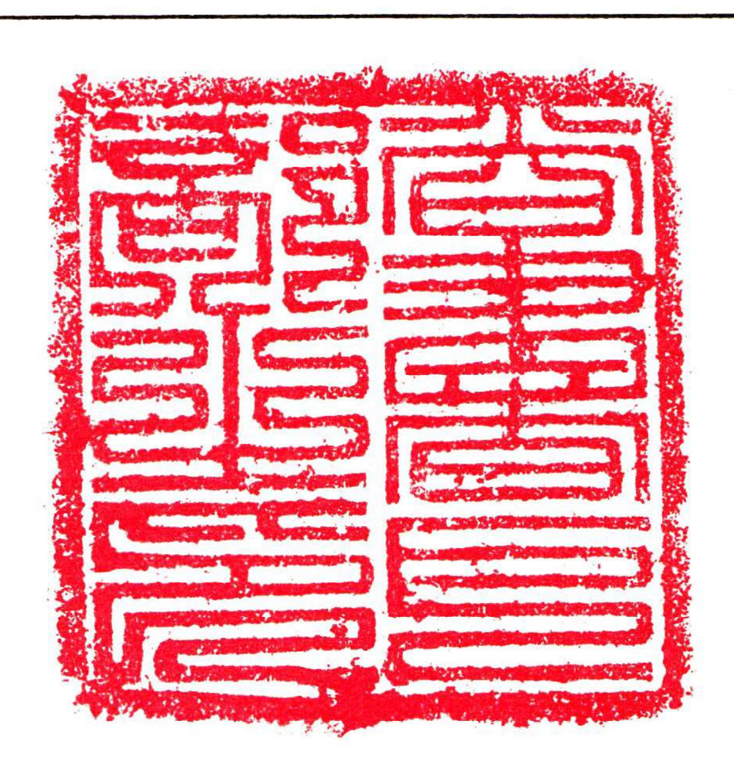
卷十　副統印 一六一

卷一　尚書省及所屬部院庫司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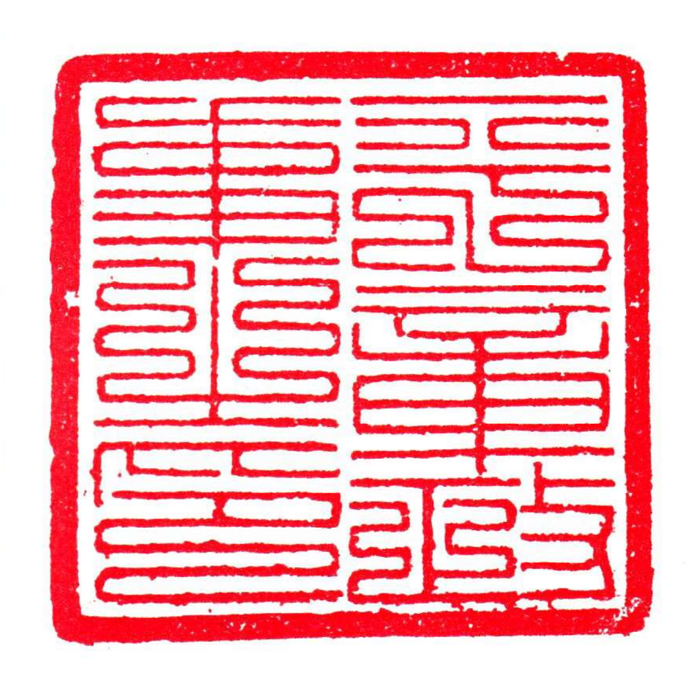
001　**尚書禮部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8×5.8厘米。背刻"泰和五年七月造"。見《意園古今官印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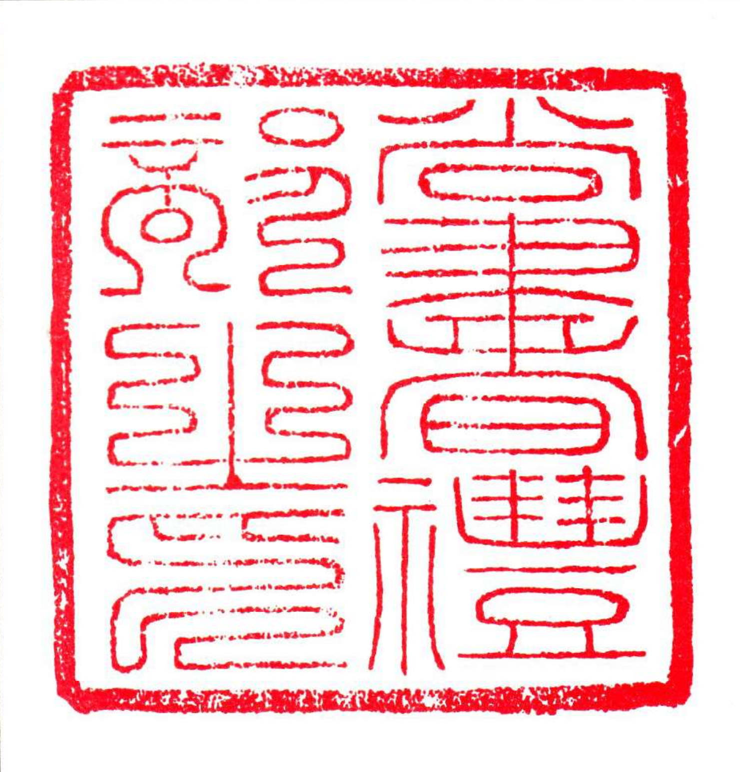
002　**尚書户部之印**

1985年夏出土于山西省河曲縣。7×7厘米。藏河曲縣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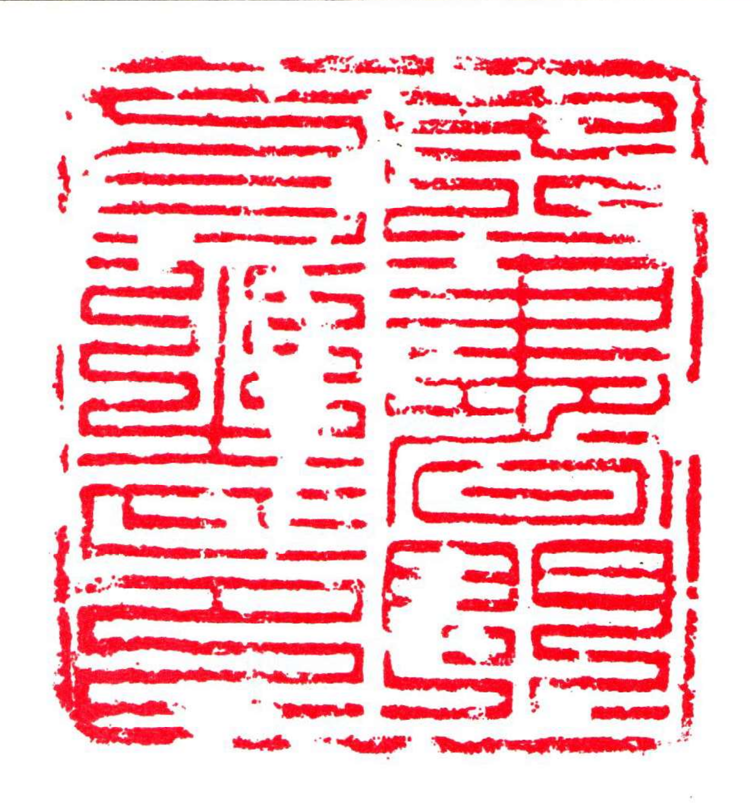
003　平章政事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3×6.4厘米。背刻“大定二十一年尚書禮部造”。見《意園古今官印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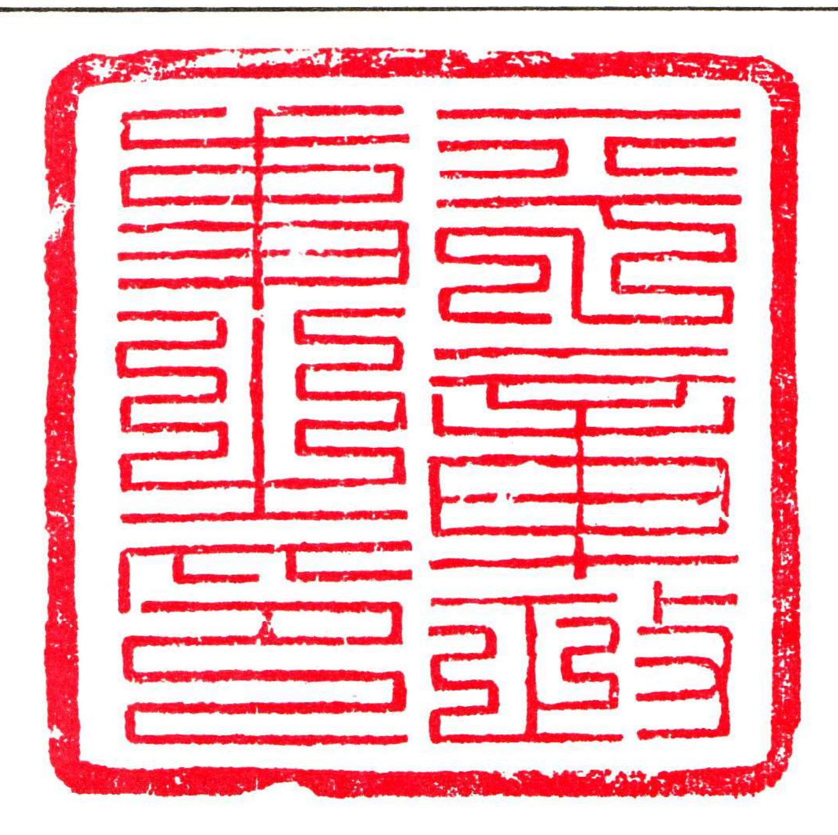
004　尚書禮部之印

鈐于泰和六年谷山寺牒碑。6.9×6.9厘米。見《金石索》、《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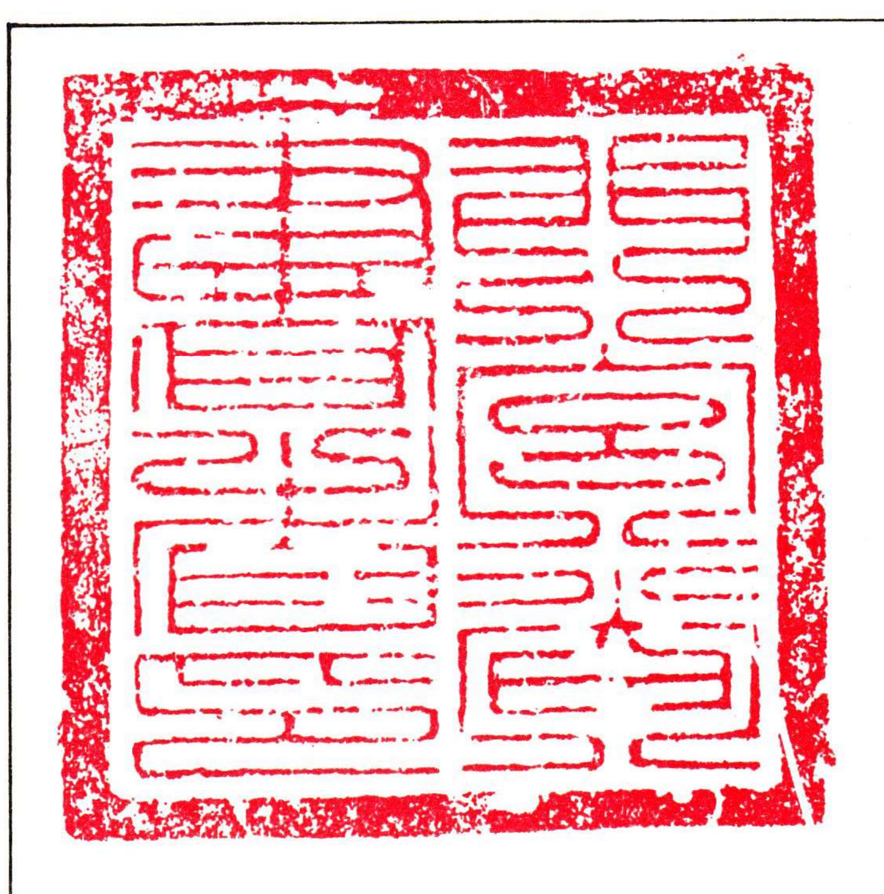
005　**中書門下之印**

1983年1月出土于吉林省舒蘭縣。7.5×7.1厘米。紐端刻“上”字。銅質鎏金。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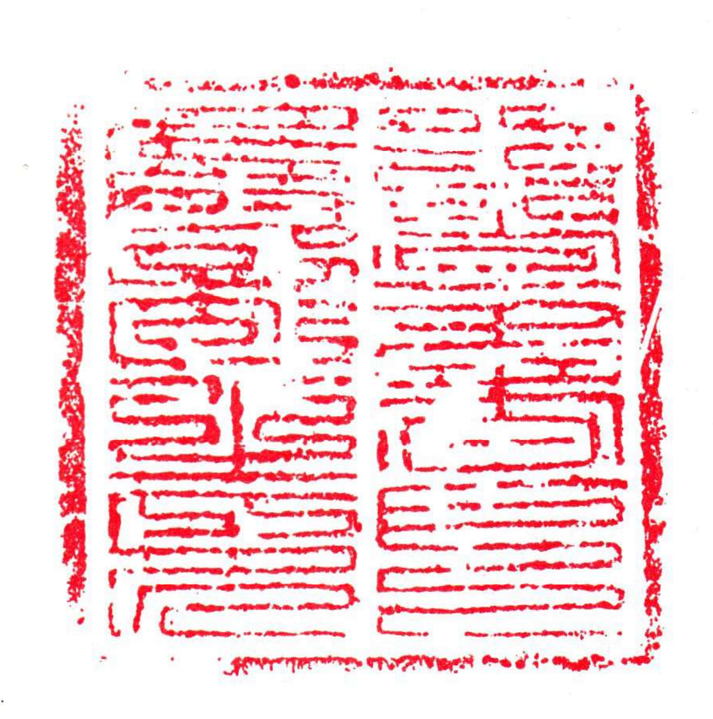
006　**平章政事之印**

鈐于山東省長清縣大定二十二年靈岩寺滌公開堂疏碑之末。8×8厘米。見《金石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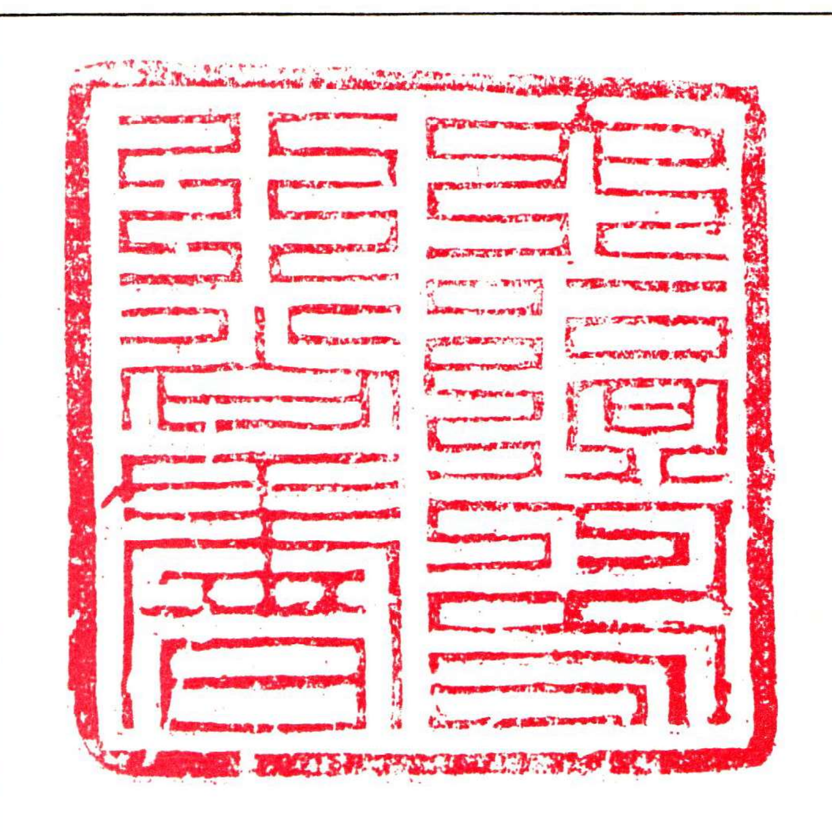
007　行宫尚書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8.2×8.2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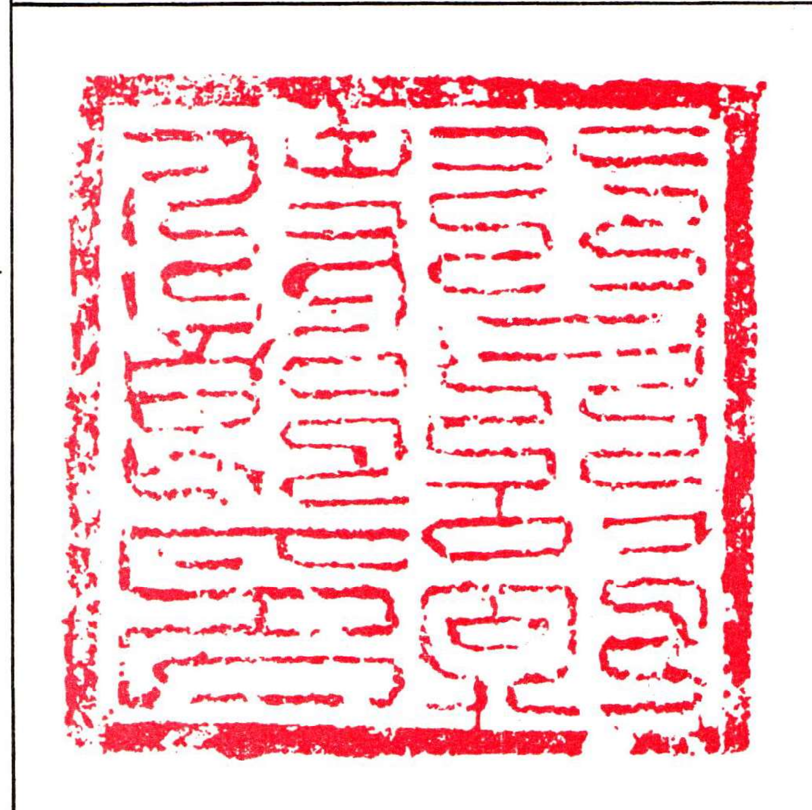
008　行宫尚書户兵部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5厘米。背刻“興定三年四月行宫禮部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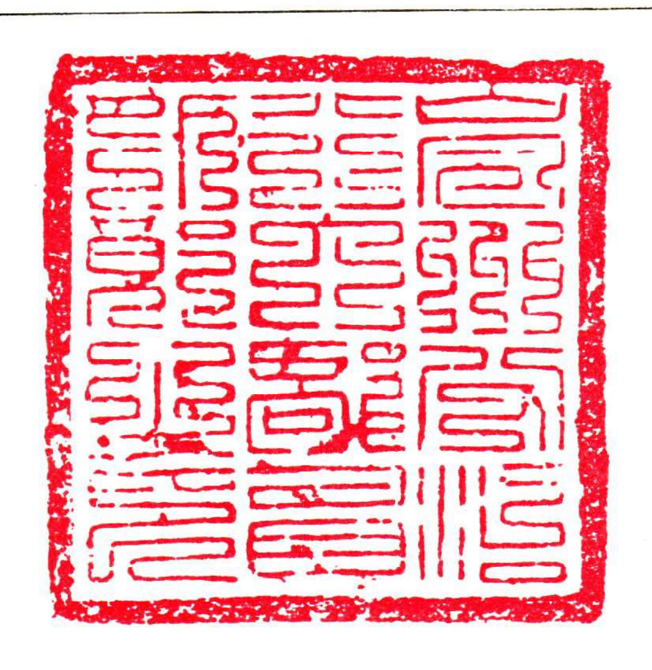
009　　行尚書六部印

1949年發現于遼寧省桓仁縣。7.5×7.5厘米。紐端刻“上”字。側刻“尚書印”。藏本溪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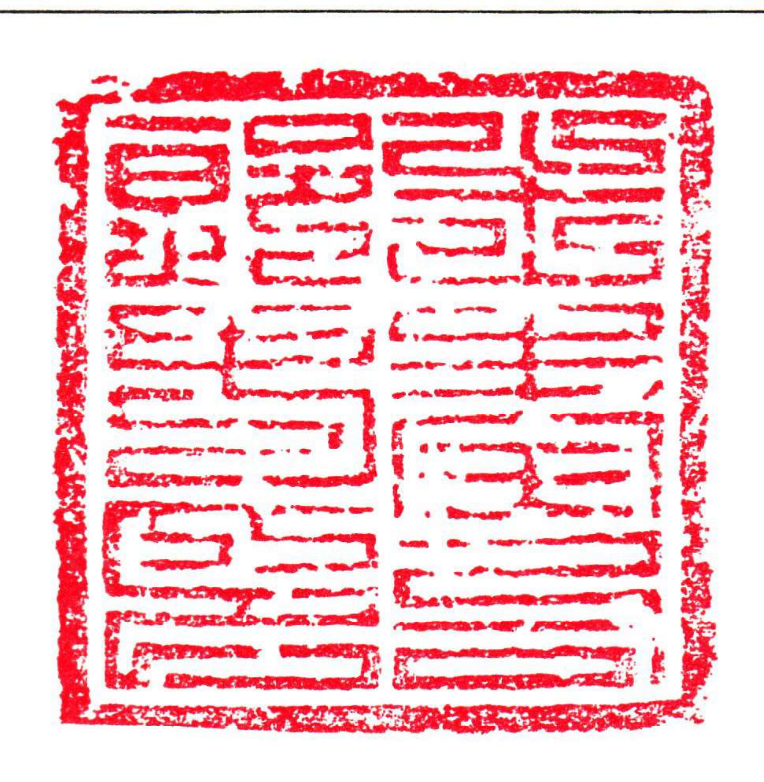
010　　行六部侍郎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2×4.4厘米。原藏日本人上野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011　　嵐州分治行六部員外郎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厘米。背刻"興定二年九月□日"、"嵐州行部造"。側刻"外郎印"。藏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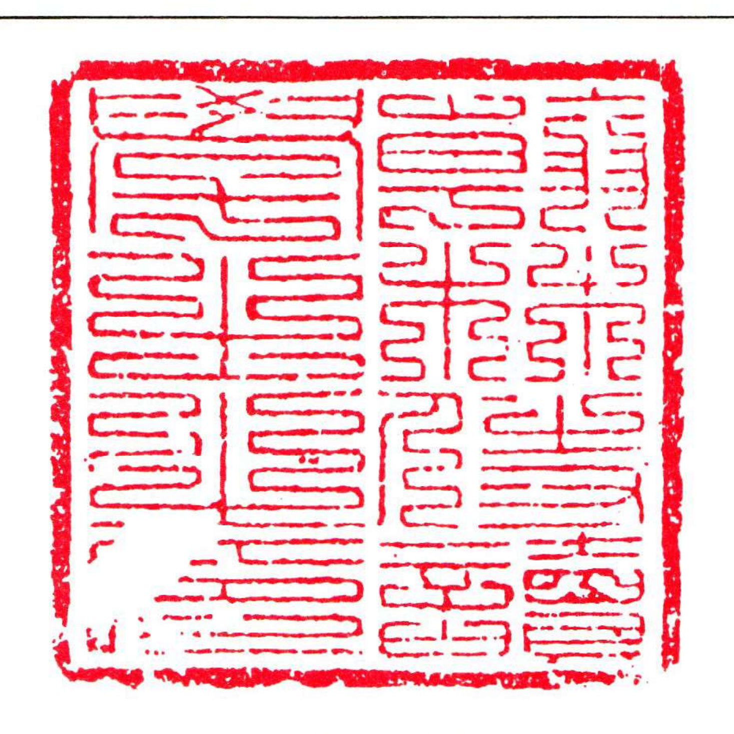
012　　主奏司郎中印

1965年6月出土于黑龍江省寧安縣。7×7厘米。側刻"主奏司郎中"。藏寧安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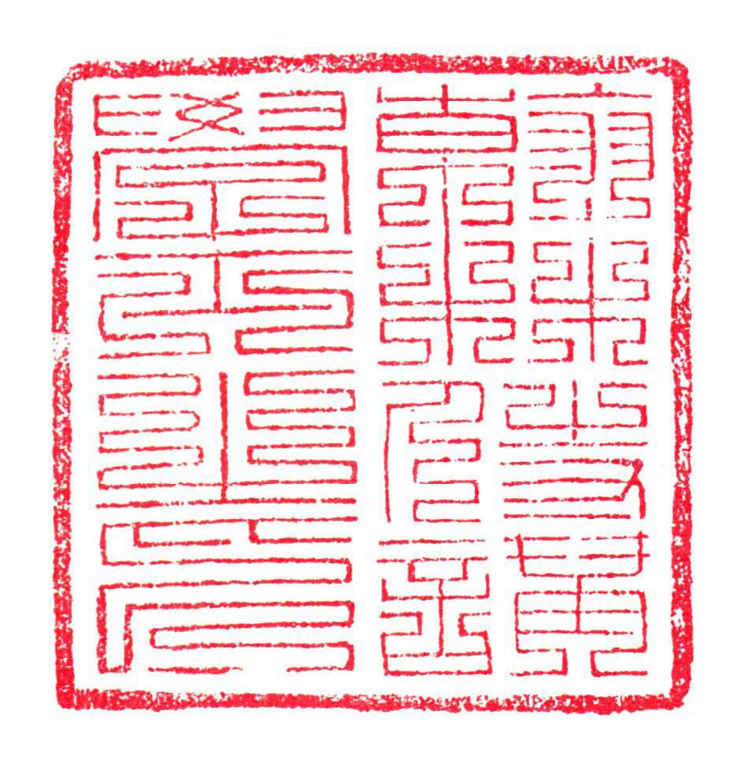
013　　行省都事之印

1974年出土于河北省豐寧縣。6.4×6.4厘米。藏豐寧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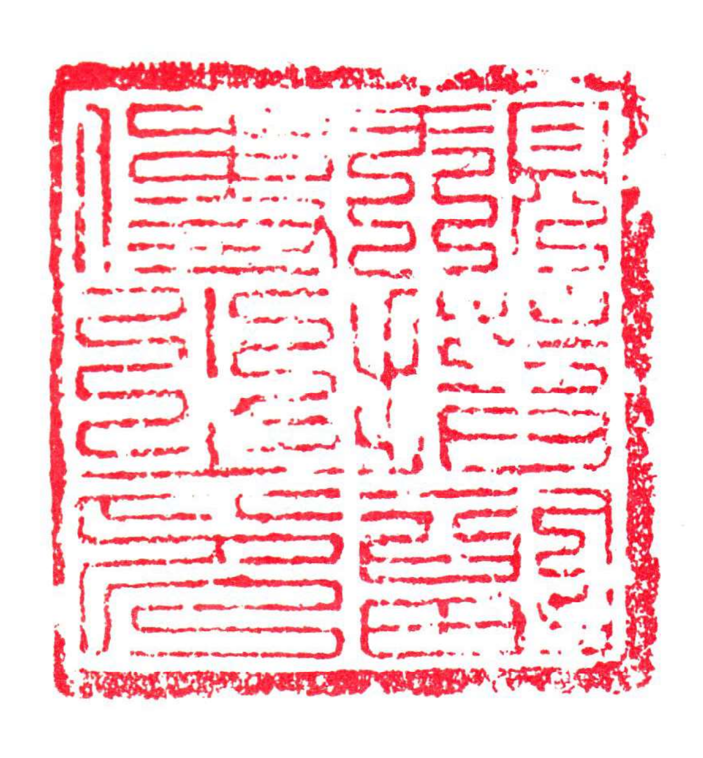
014　　翰林侍讀學士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7×6.7厘米。背刻“貞祐二年十一月”、“行宮禮部造”。側刻“翰林侍讀學士之印”。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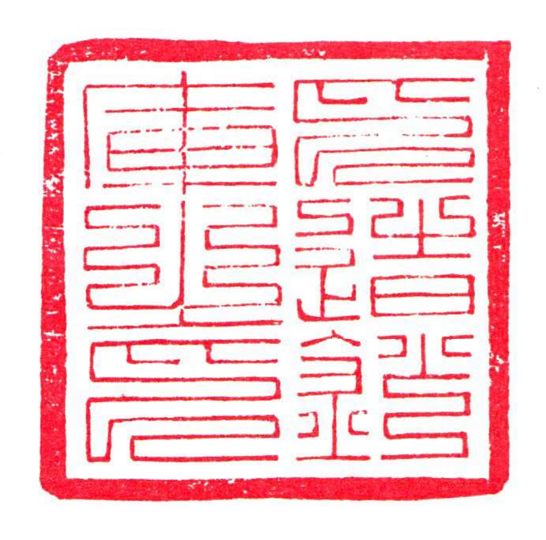
015　　翰林侍講學士之印

鈐于明昌六年沛寧普照寺照公開堂疏碑。7×6.8厘米。見《金石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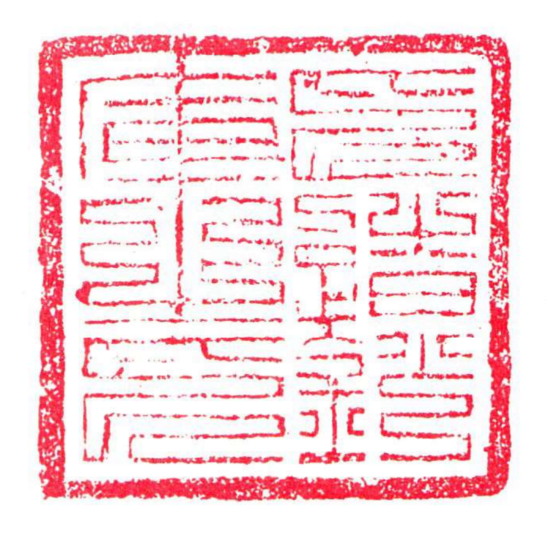
016　　規措副使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5厘米。背刻"天興元年四月行部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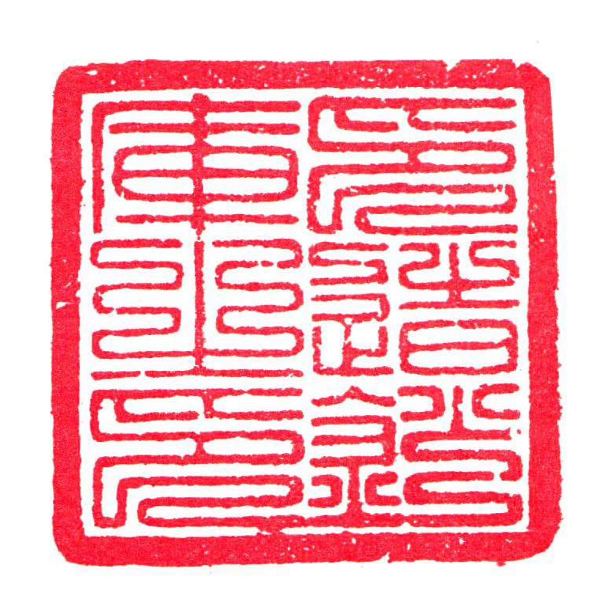
017　印造鈔庫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厘米。見《金石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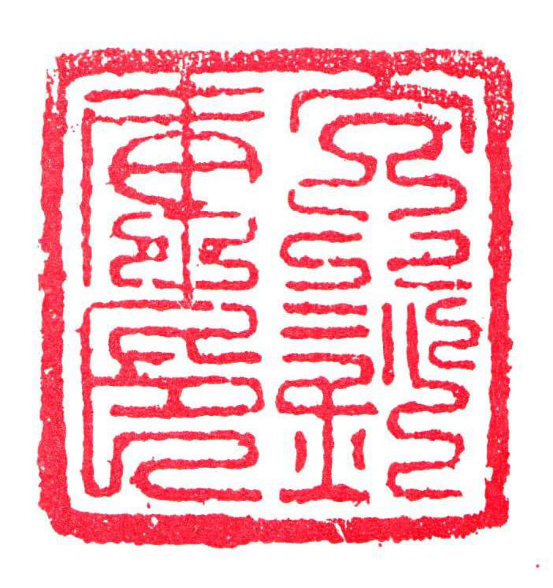
018　印造鈔庫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厘米。原藏曲阜孔氏。見《集古官印考證》、《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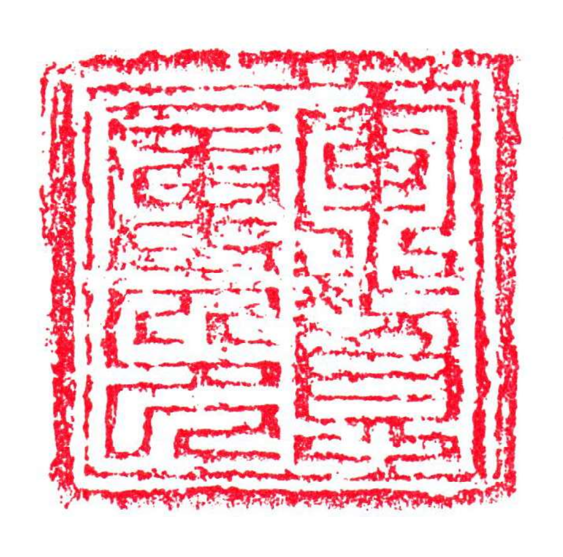
019　印造鈔庫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3×5.3厘米。背刻"大安二年八月"。見《意園古今官印勼》。



020　交鈔庫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3×5厘米。原藏大西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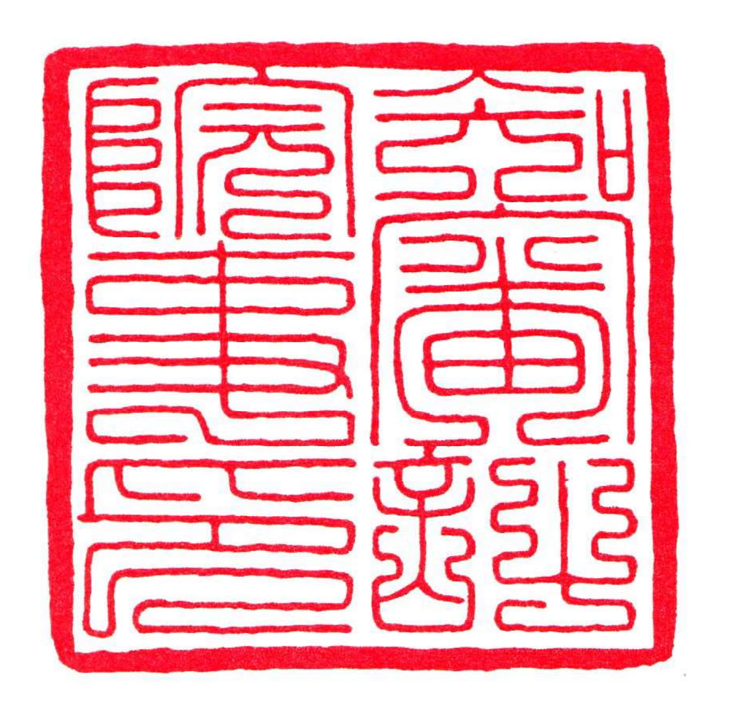
021　　軍資庫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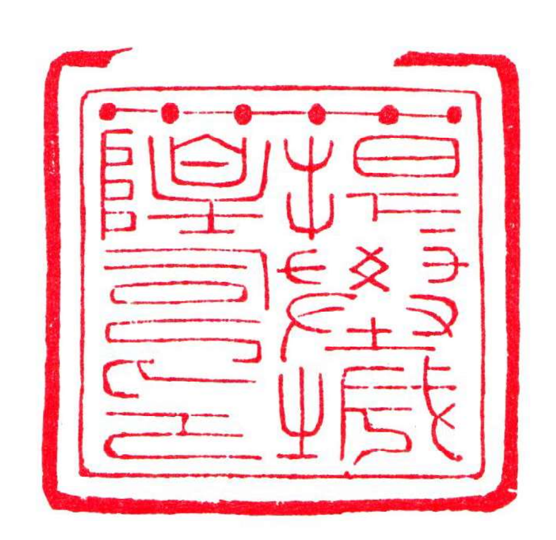
022　　堂厨公使酒庫之印

1982年9月出土于黑龍江省依蘭縣。5.9×5.9厘米。紐端刻有“上”字。側刻“堂厨公使酒庫之印”。藏依蘭縣文管所。



023　　知審計院事印

清末出土于遼寧省新賓縣。6.7×6.7厘米。背刻"大定五年閏五月禮部造"。側刻"知審計院事印"。見《東北古印鉤沈》。



024　　提舉城隍司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9×5.1厘米。見《金石索》。



025　　提舉城隍司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5.5厘米。原藏頤素齋。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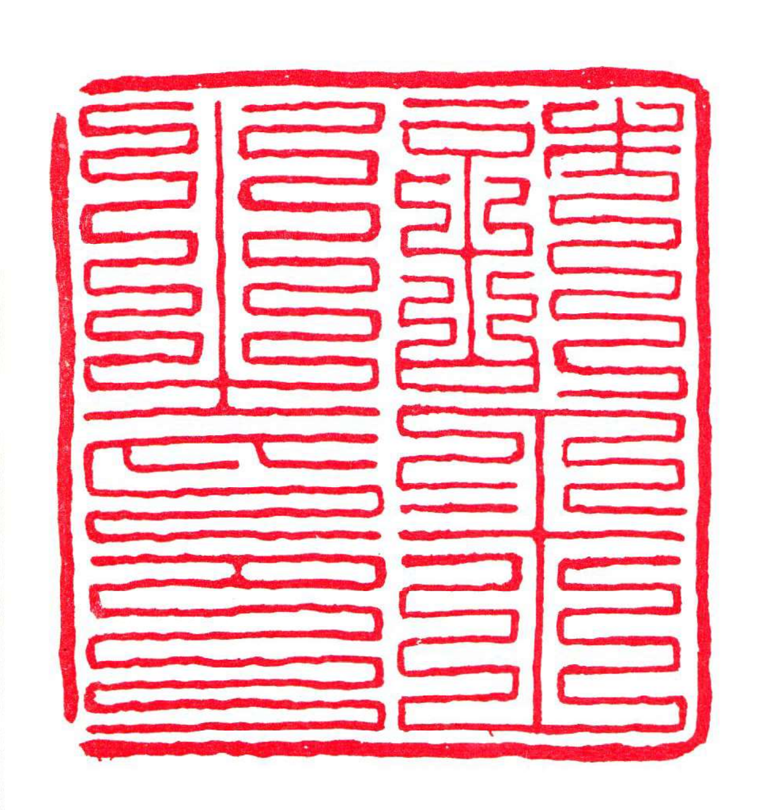
026　　東上閤門使印

1977年出土于遼寧省鳳城縣。8.5×8.5厘米。紐端刻“上”字。藏遼寧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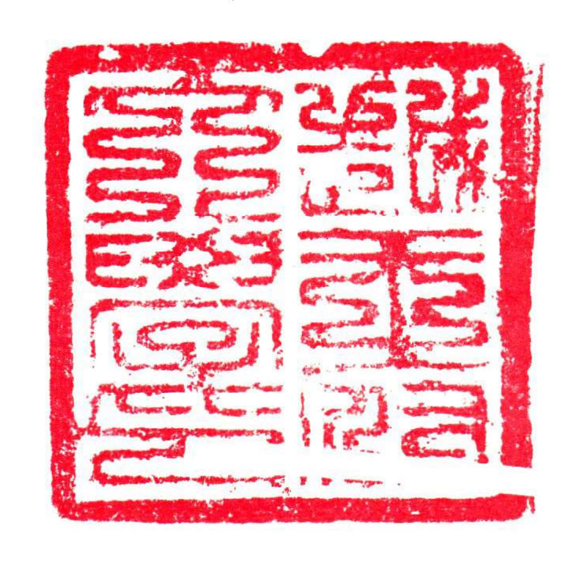
027　**御用后總領都提舉印**

1954年于河北省保定徵集。9.5×9.5厘米。紐端刻“上”字。藏河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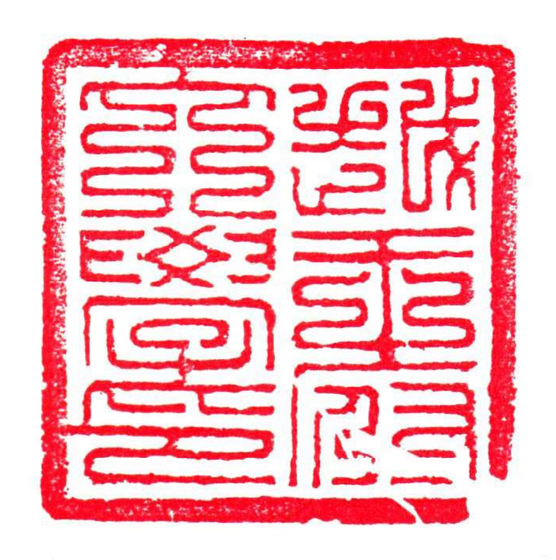
028　**詵王之印**

清宣統元年(1909年)出土于黑龍江省雙城縣(一說出金上京故城中)。7.2×6.9厘米。銅質鎏金。見《東北古印鉤沈》、《遼東文獻徵略》。



029　越王府文學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2×5.2厘米。背刻“大安二年九月禮部造”。側刻“越王府文學印”。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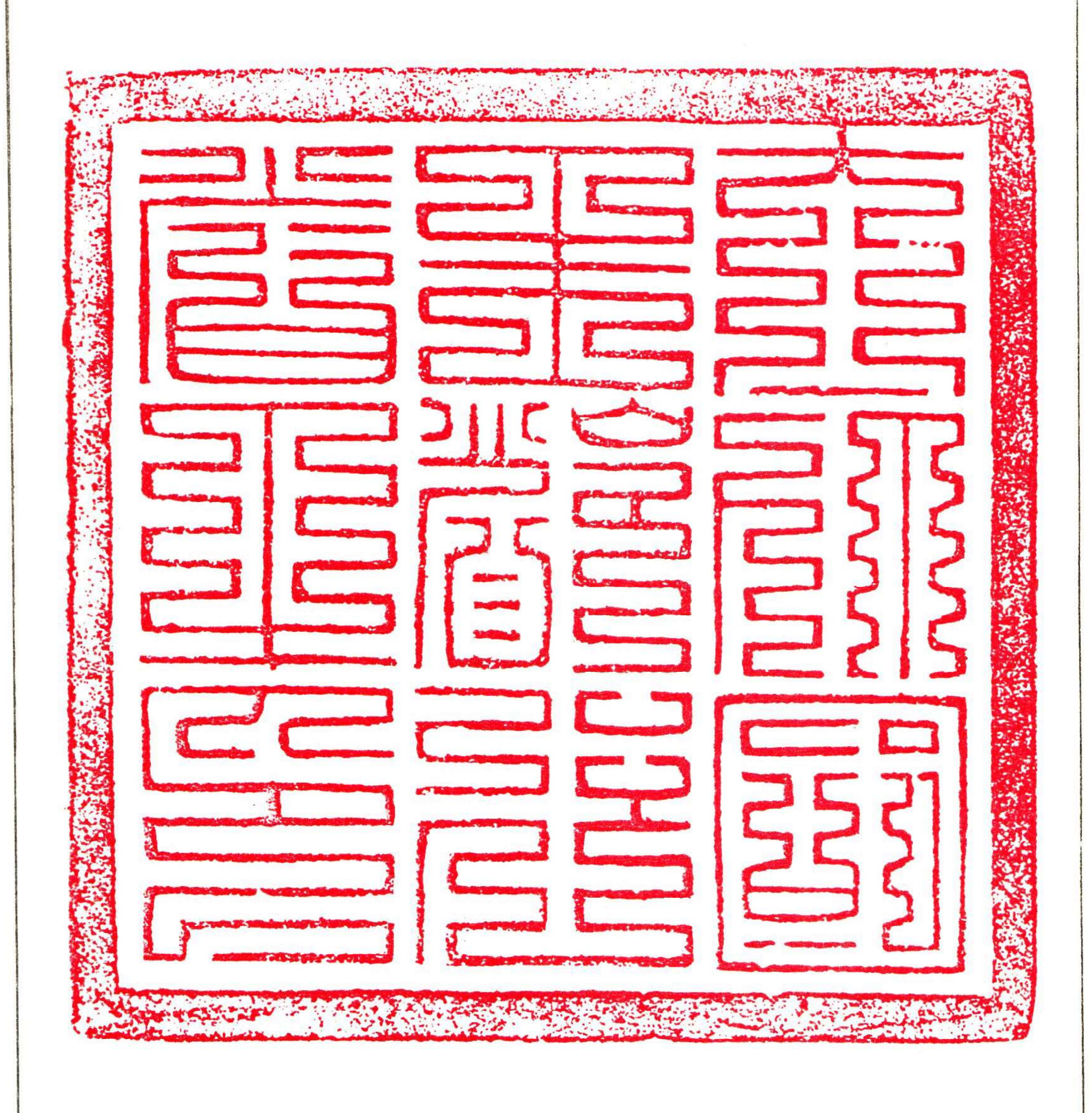
030　越王府文學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2×5.2厘米。背刻“大安二年九月禮部造”。側刻“越王府文學印”。藏上海博物館。



031　越王府文學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2×5.2厘米。背刻“大安二年九月禮部造”。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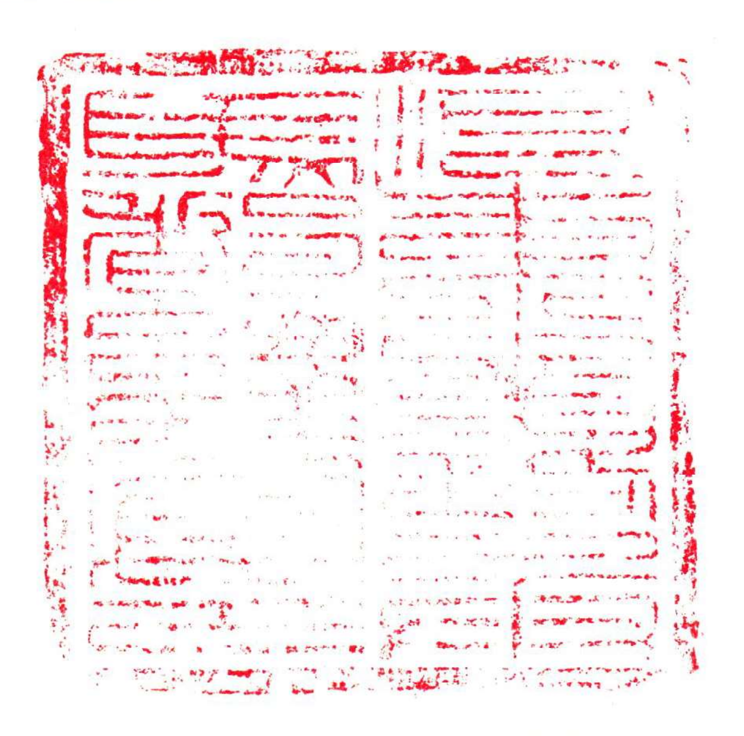


032　　太師國王都行省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13×13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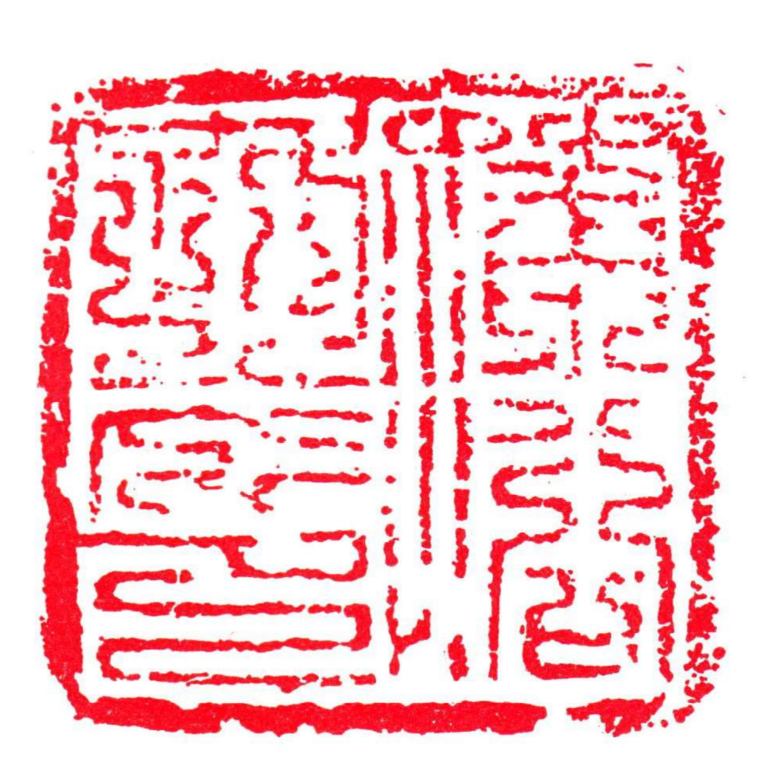
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卷二　地方州縣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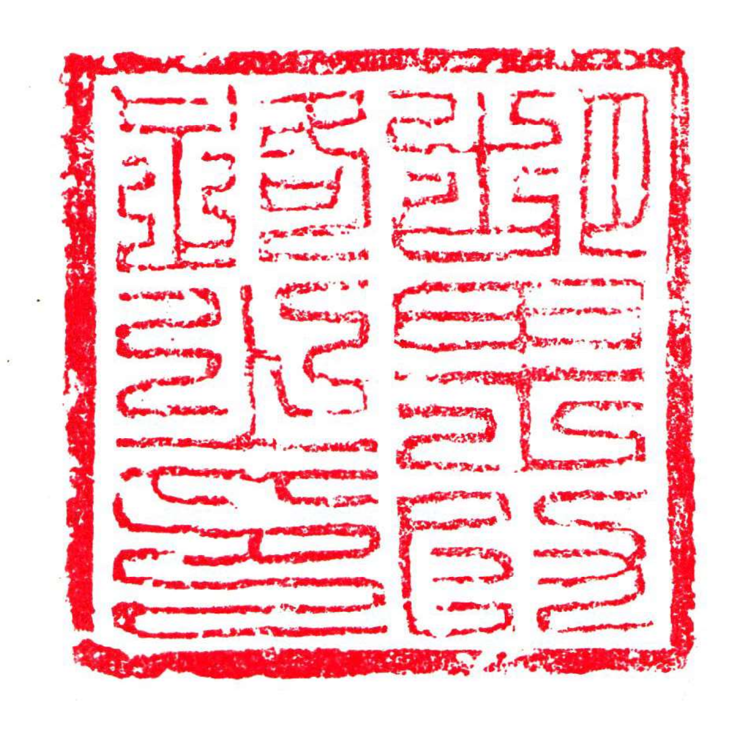
033　**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7厘米。背刻“大定十一年”。側刻“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印”。藏上海博物館。



034　**蒲裕路印**

1948年出土于黑龍江省克東縣。7.8×7.8厘米。原印下落不明。印樣存黑龍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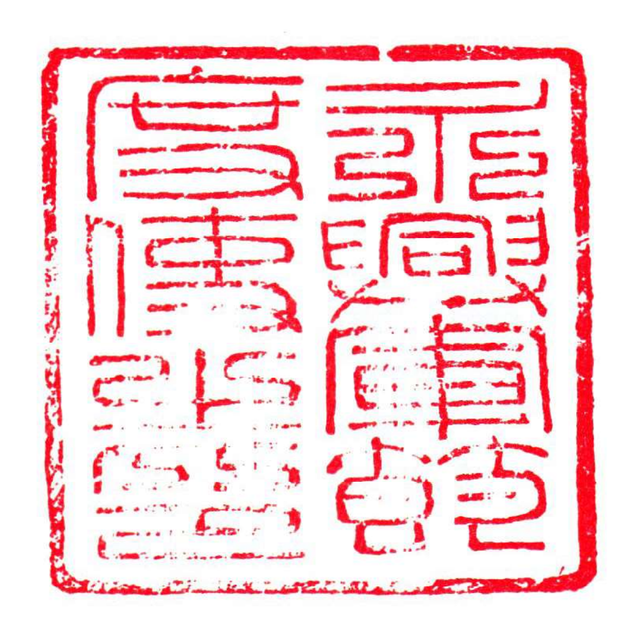
035　　**胡里改路之印**

1977年11月出土于黑龍江省鷄東縣。6.7×6.7厘米。背刻“貞祐五年二月”、“行六部造”。側刻“胡里改路之印”。藏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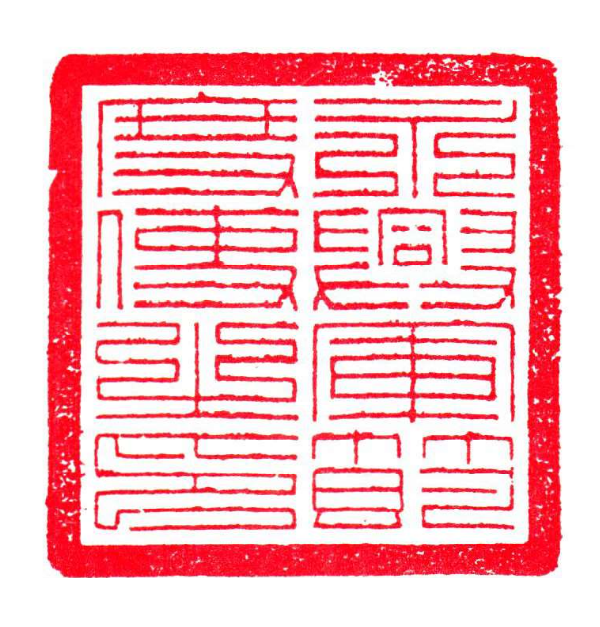
036　　**涿州節度使印**

1954于河北省保定徵集。10.5×10.2厘米。背刻“癸未年七月二十一日”、“規措所造”。側刻“涿州節度使印”。紐端刻“上”字。藏河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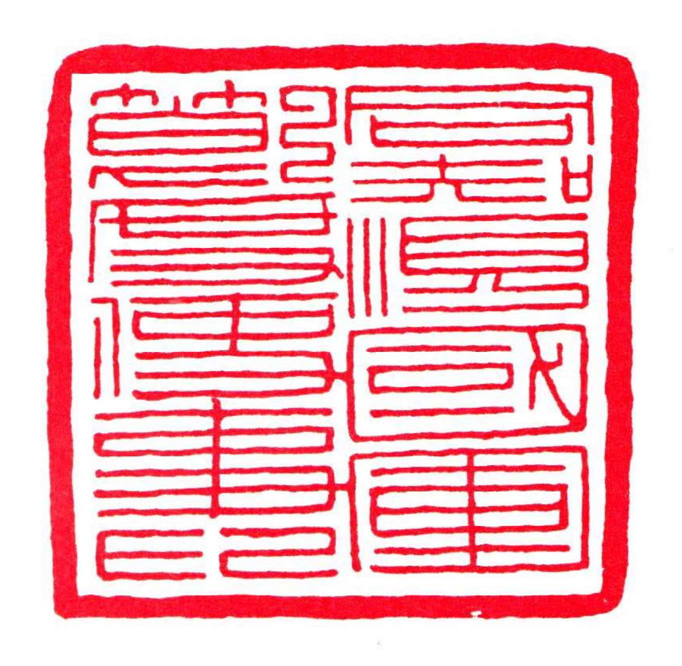
037　　永興軍節度使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8×5.8厘米。見《金石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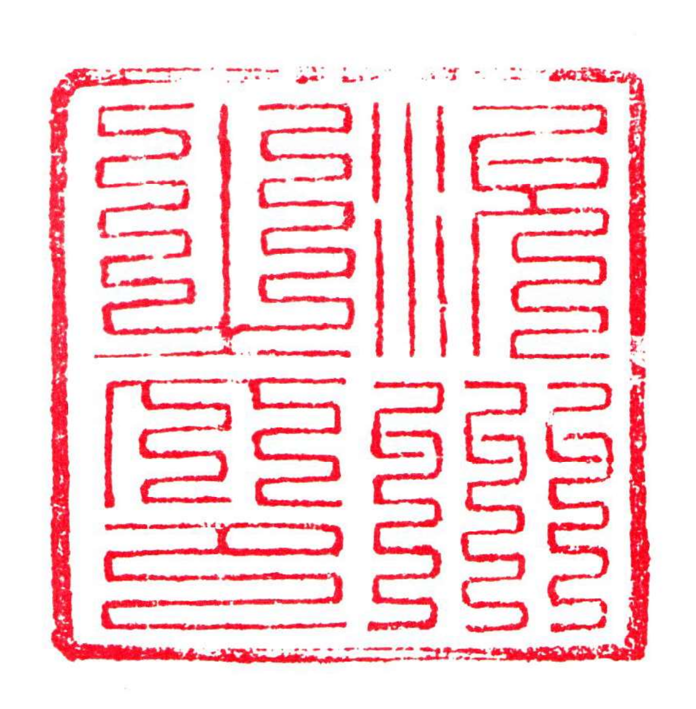
038　　永興軍節度使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6×5.5厘米。背刻"皇統二年總管府造"。見《意園古今官印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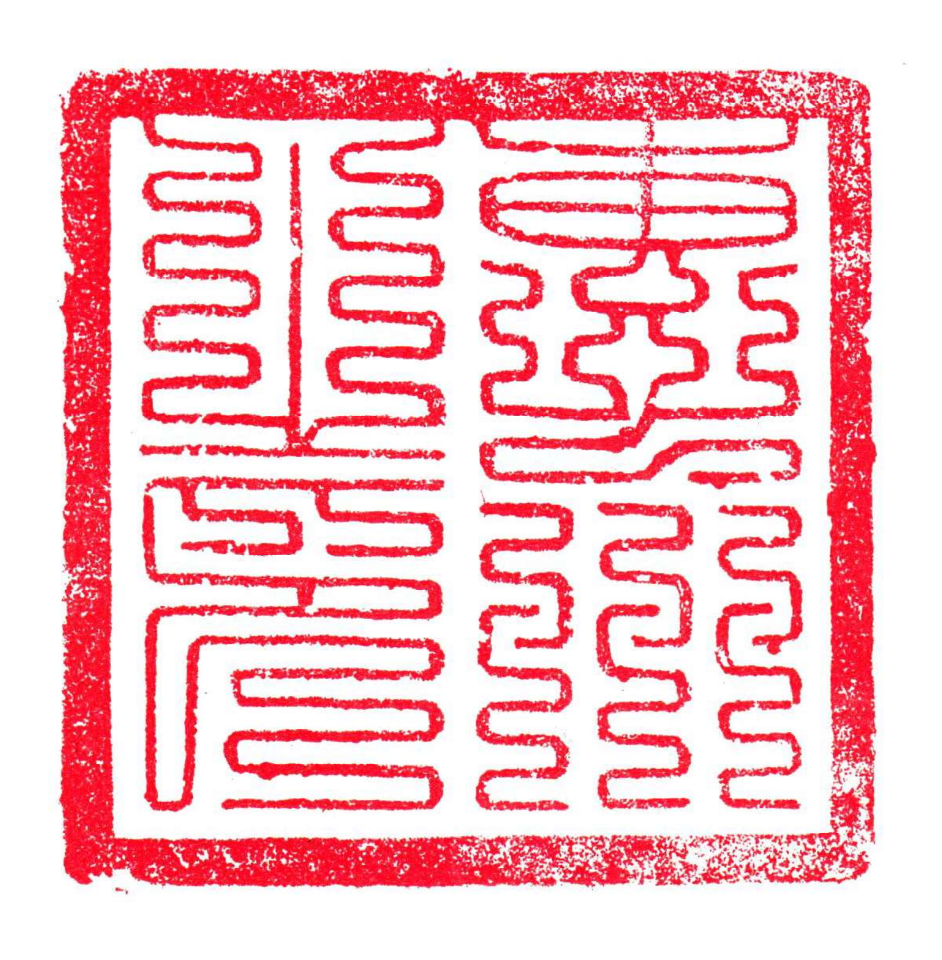
039　同知順國軍節度使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2×6.2厘米。見《滿洲金石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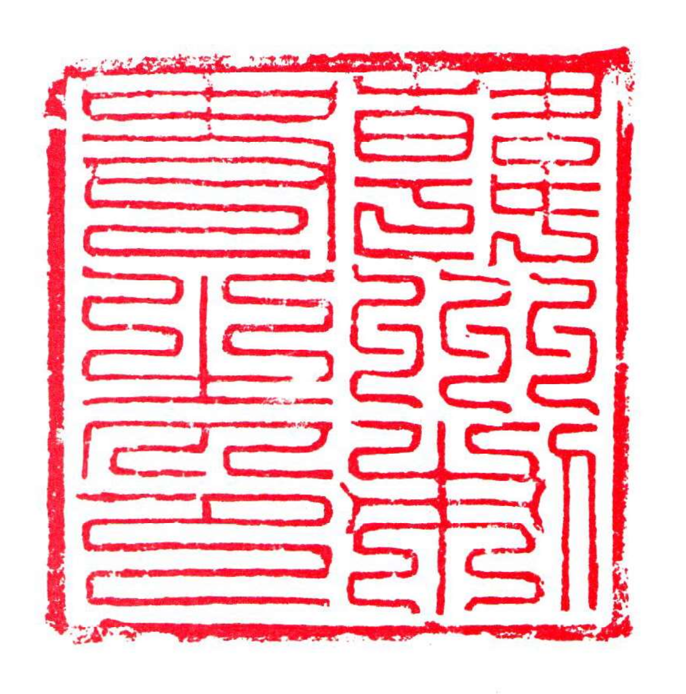
040　沇州之印

鈐于大定二十年滕村佛堂給碑。6.9×6.9厘米。見《金石索》、《隋唐以來官印集存附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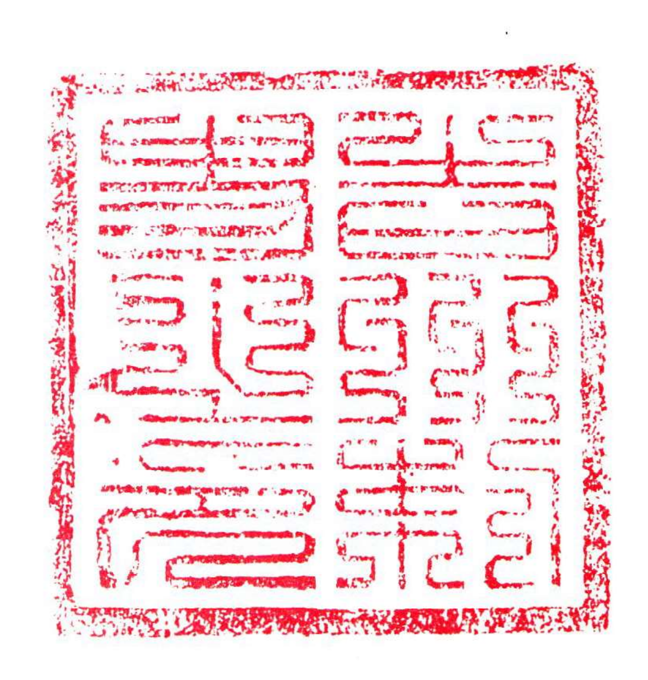
041　**惠州之印**

解放後河北省平泉縣出土。8.8×8.8厘米。背刻“惠州之印”。藏平泉縣文管所。



042　　韓州刺史之印

解放後吉林省九臺縣出土。6.3×6.2厘米。背刻"大定二年"。藏吉林省博物館。



043　　吉州刺史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厘米。原藏觀古閣。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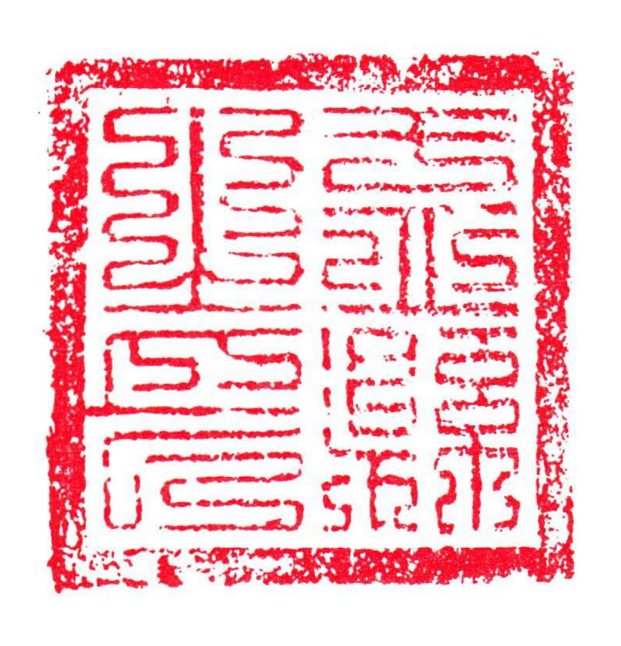
044　　**坊州同知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1×5.1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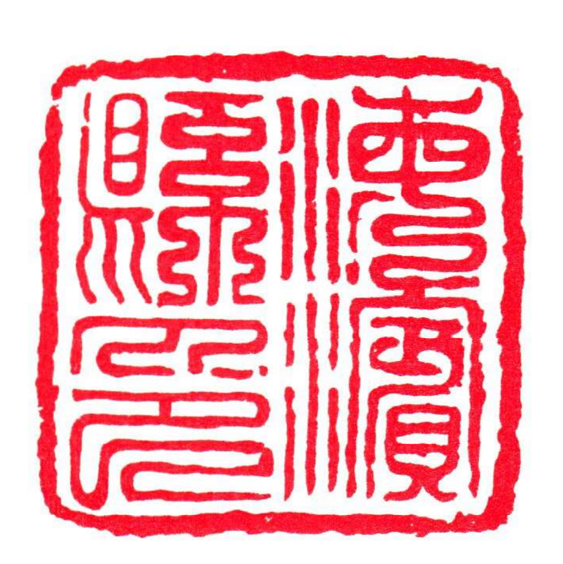
045　　**盂縣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7×5.6厘米。見《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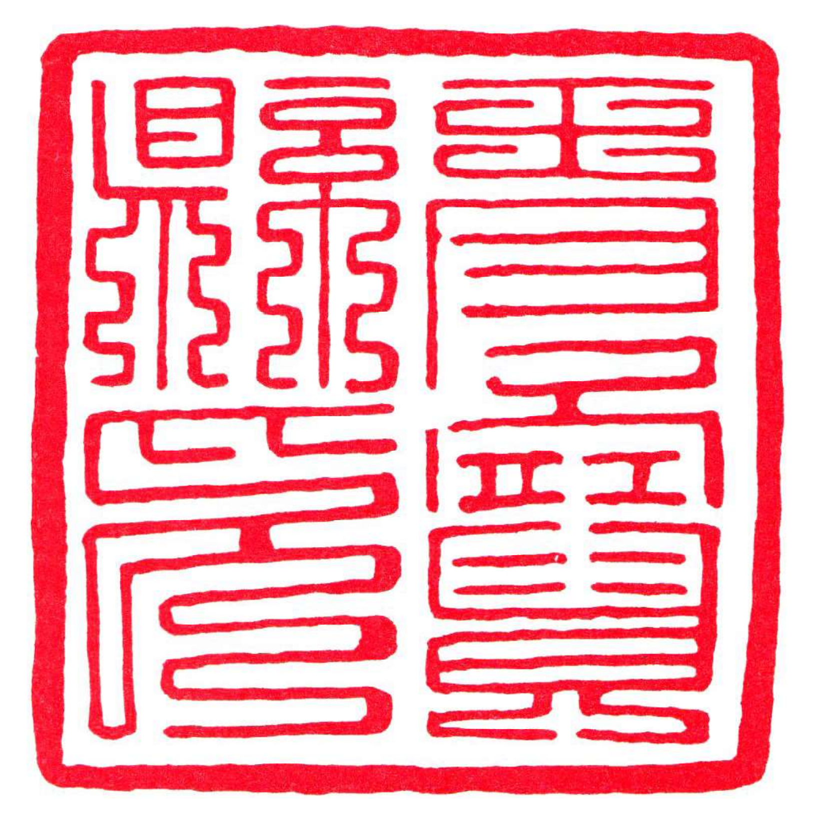
046　　**盂縣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7×5.6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047　　**海濱縣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25×5.25厘米。背刻“泰和二年四月”。側刻“海濱縣印”。藏遼寧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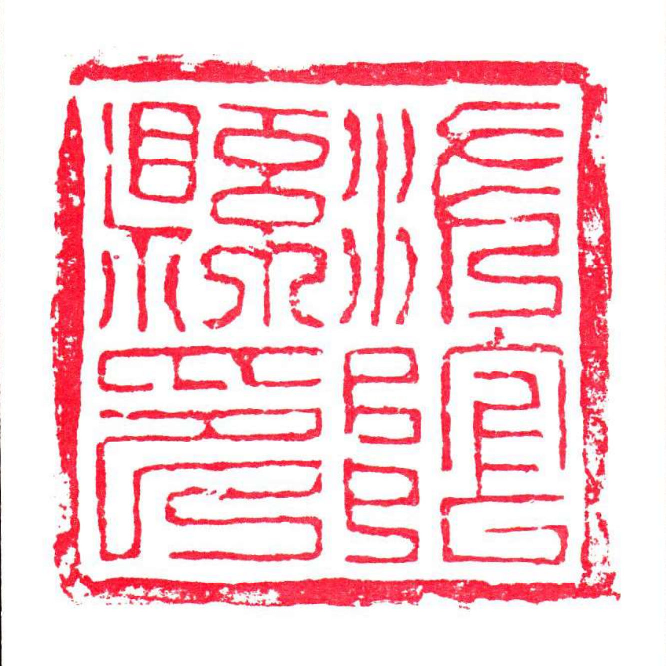
048　　青寨縣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8×8厘米。背刻"泰和五年"。見《滿洲金石志》。



049　　利涉縣印

1970年6月出土于吉林省扶餘縣。5.3×5.3厘米。背刻"正隆二年正月"、"内少府監造"。側刻"利涉縣"。紐端刻"上"字。見《扶餘縣文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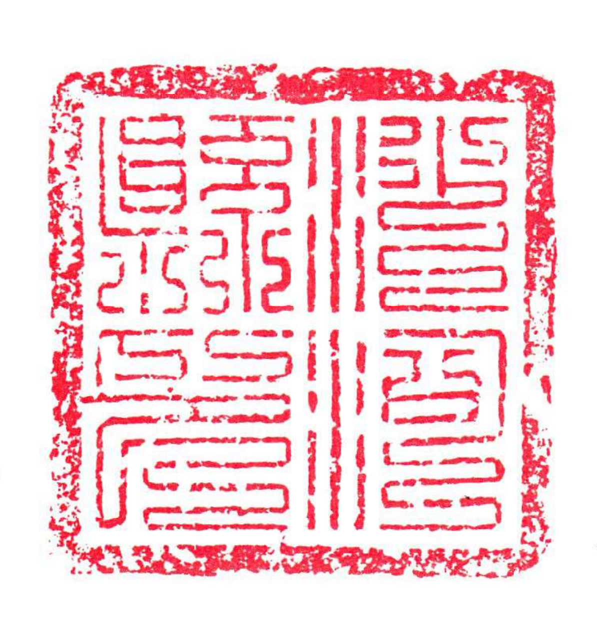


050　　**汝陰縣印**

1974年出土于安徽省鳳臺縣。6×6厘米。側刻“壬辰年三月□日造”、“汝陰縣印”。藏阜陽地區博物館。

051　　**東勝縣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9×4.9厘米。背刻“興定四年正月”、“行宫禮部造”。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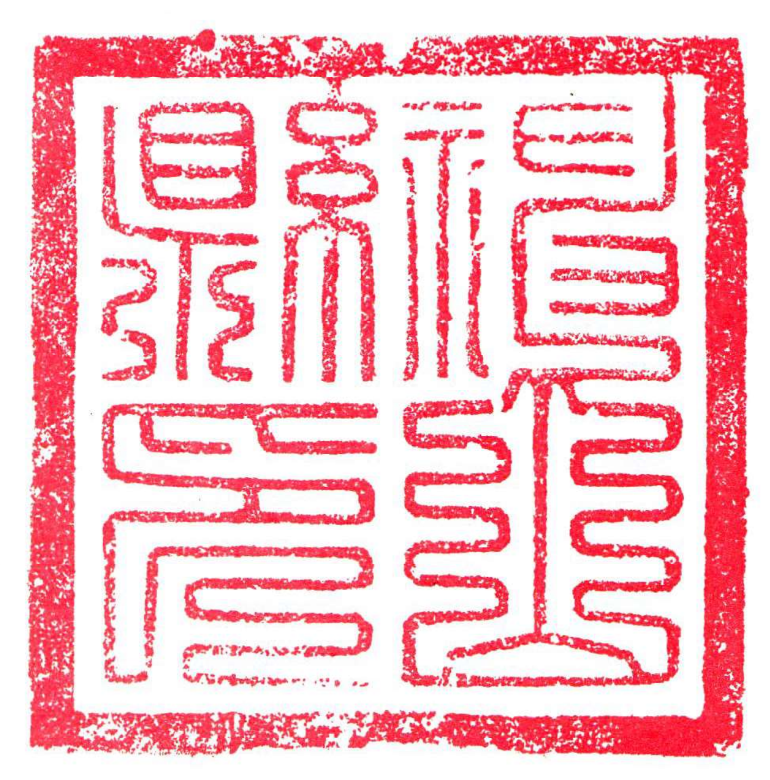
052　　**沙河縣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5.5厘米。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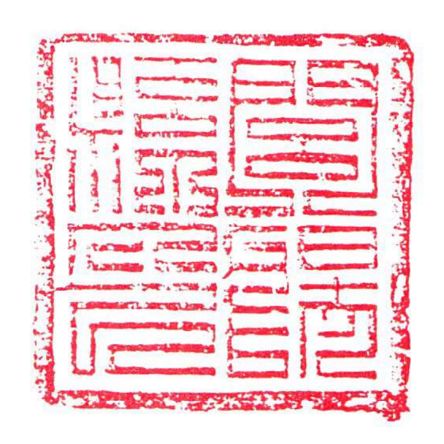
053　　**靈丘縣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5.5厘米。背刻“貞祐五年中都路經略司造”。藏吉林大學。



054　神山縣印

解放後河北省平泉縣出土。7.7×7.7厘米。背刻“神山縣印”。紐端刻“上”字。藏平泉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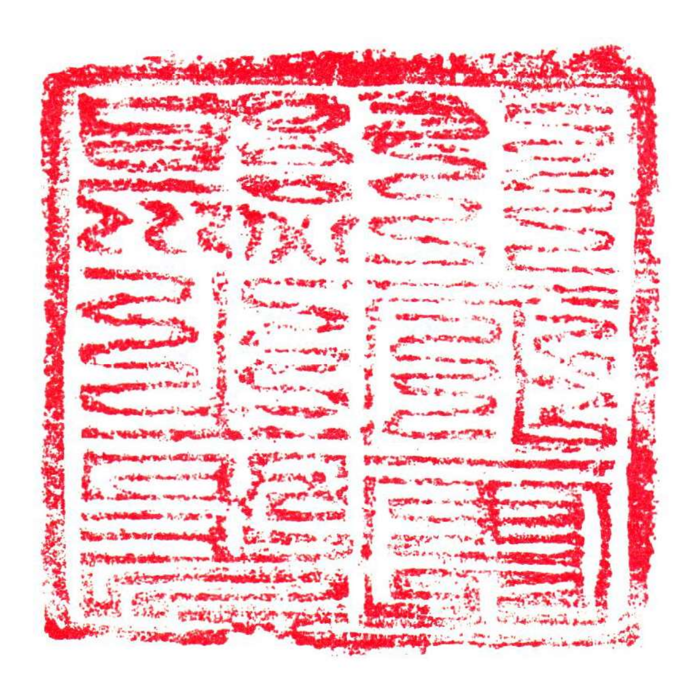
055　閭陽縣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9×6.9厘米。背刻“閭陽”二字。藏遼寧省博物館。



056　　和衆縣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6×5.6厘米。藏遼寧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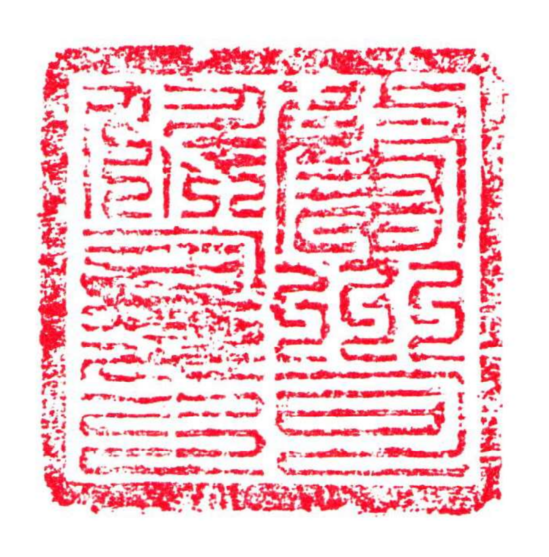
057　　行永安縣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3×6.5厘米。原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范葉萍。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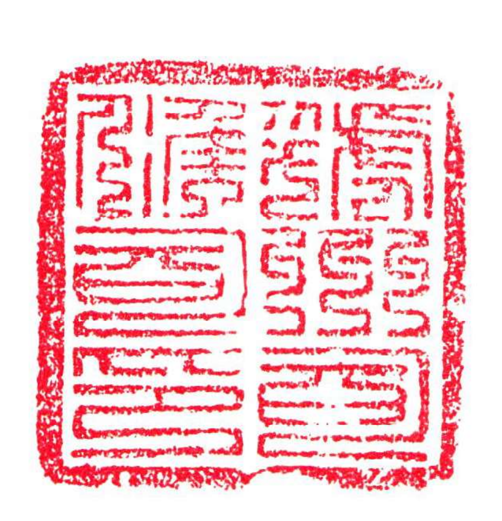
058　　公府收支局印

1973年出土于河南省延津縣。5.5×5.5厘米。藏河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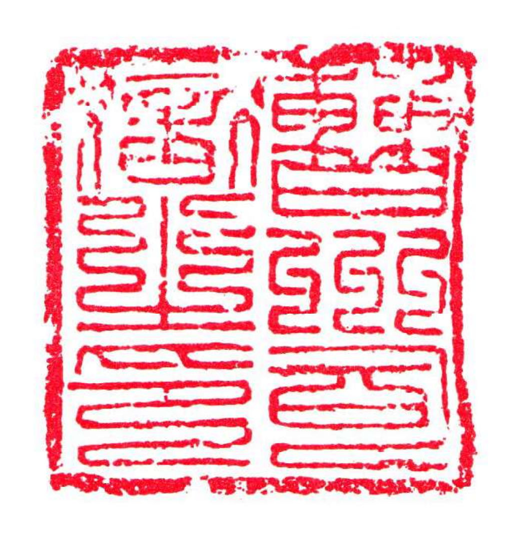
059　　肇州司候司印

1976年11月出土于黑龍江省東寧縣。5×5厘米。背刻“泰和四年十月”、“禮部造”。側刻“肇州司候司印”。藏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060　　虢州司候司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5×4.5厘米。背刻“正大十年”。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061　　曹州司獄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8×4.8厘米。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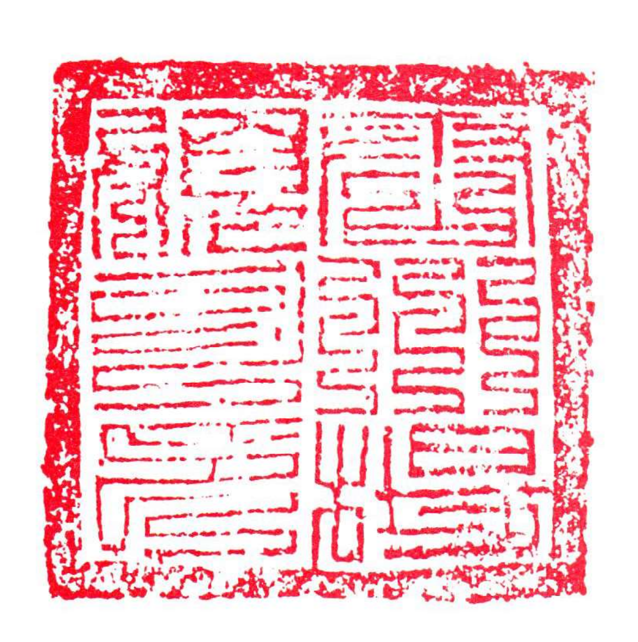
062　　易縣尉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8×4.8厘米。背刻“泰和七年十二月”、“禮部造”。側刻“易縣尉印”。藏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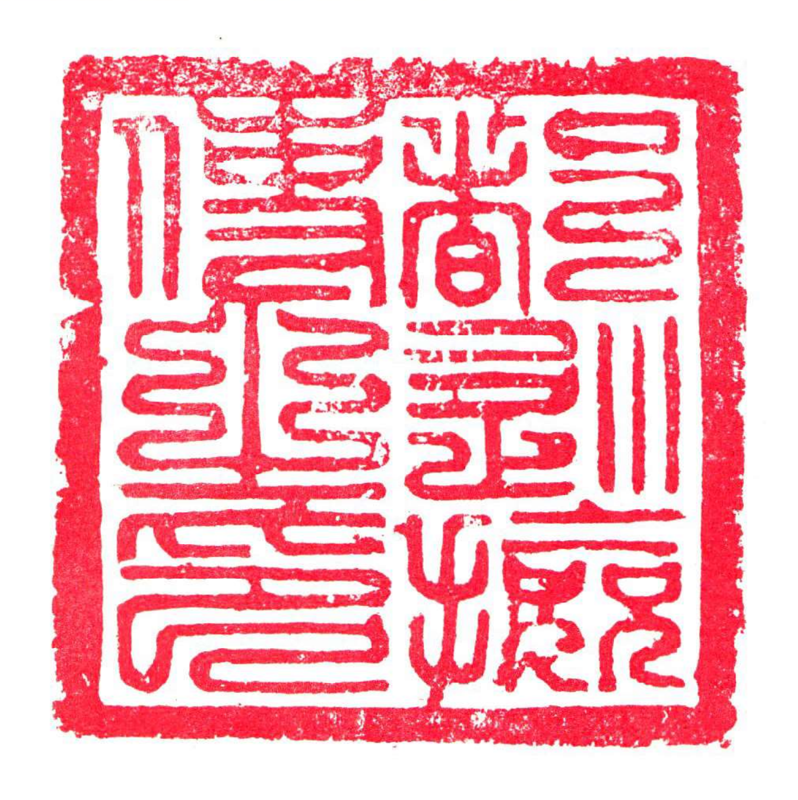
063　　開邊寨簿尉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5×4.5厘米。紐端刻“上”字。藏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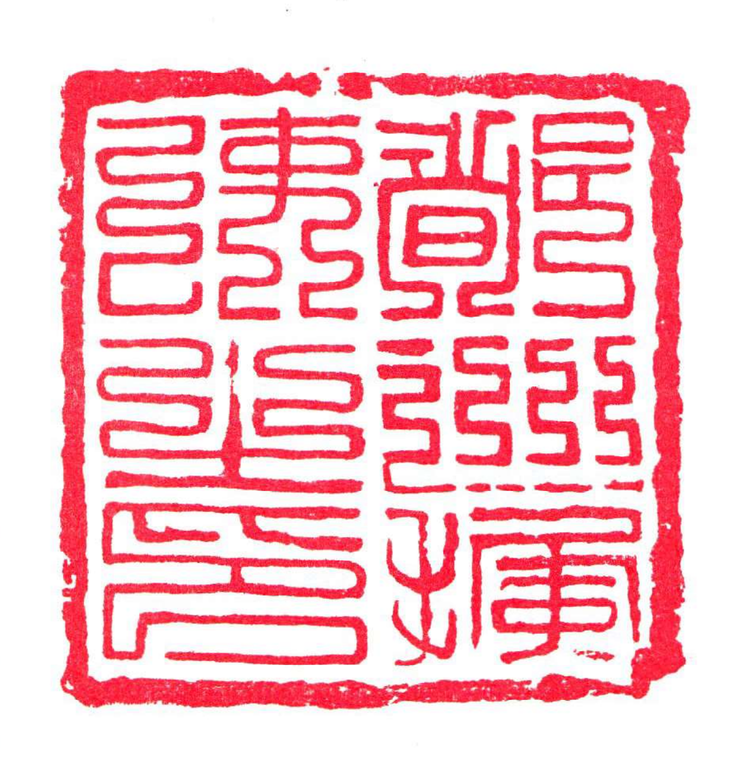
064　　雲州提領司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7×5.7厘米。見《集古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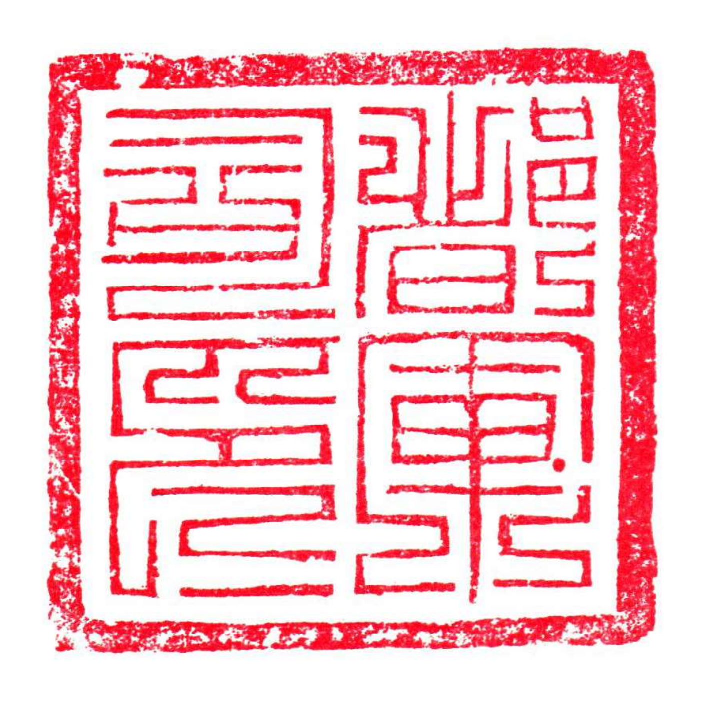
065　　都巡檢使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4×7.4厘米。藏河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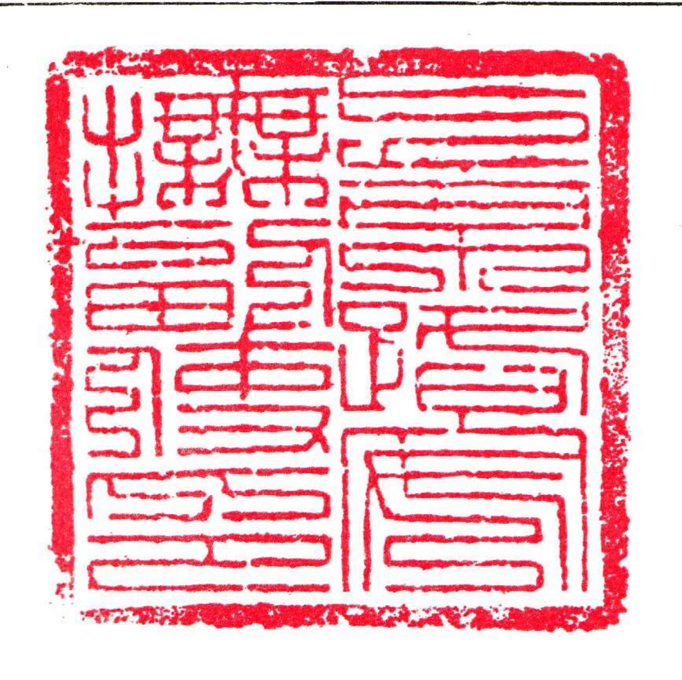
066　　都巡檢使之印

民國間出土于原熱河省。6.8×6.7厘米。原藏湯玉麟處。見《東北古印鉤沈》。



067　**都軍司印**

近年遼寧省凌源縣出土。6.4×6.5厘米。藏朝陽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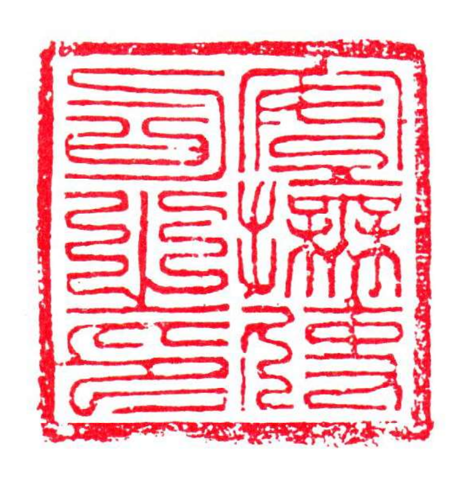
068　上京路安撫副使印

1952年發現于黑龍江省鷄西。6.2×6.2厘米。背刻"貞祐四年二月日"、"上京行六部造"。側刻"上京路安撫副使印"。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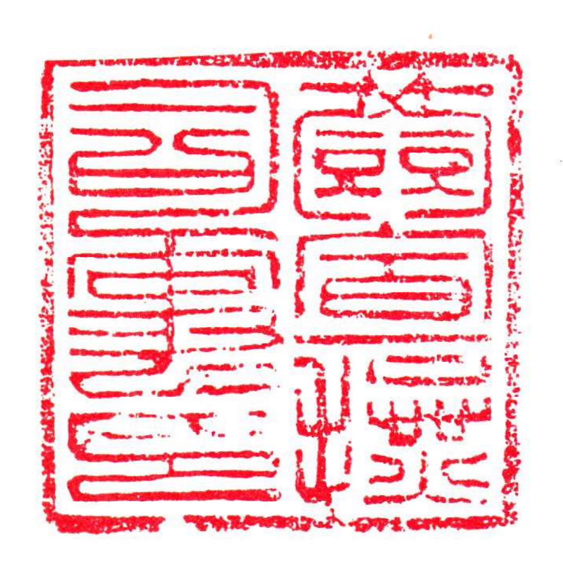
069　安撫副使之印

六十年代出土于西安市。6.2×6.2厘米。背刻"天興二年二月"、"安撫副使"。紐端刻"上"字。藏陝西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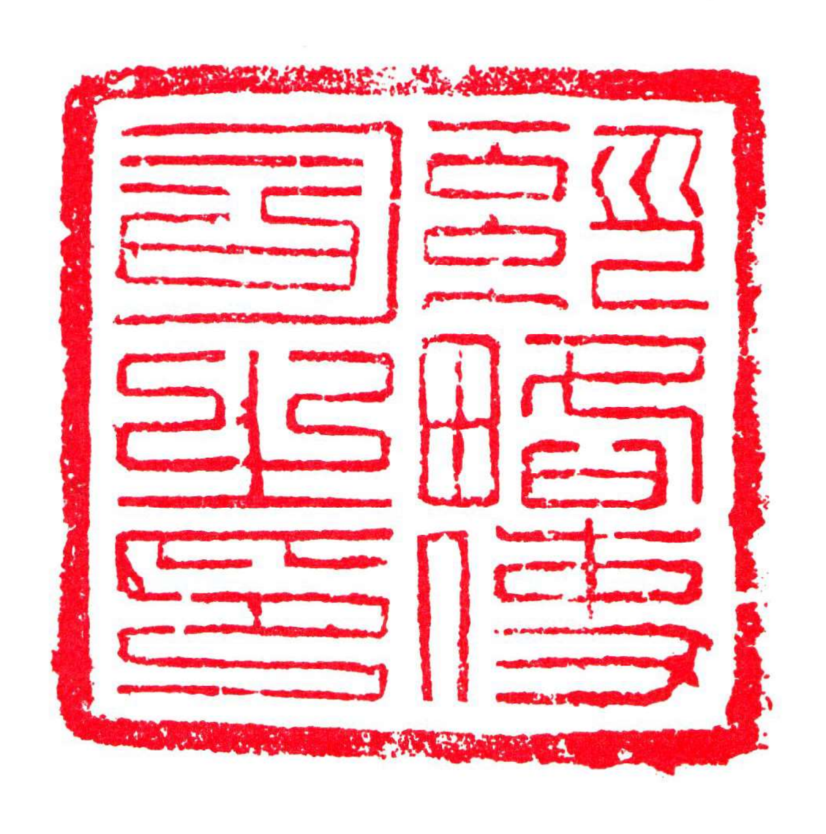
070　　安撫使司之印

吉林省琿春縣出土。出土時間不詳。7.22×7.42厘米。藏遼寧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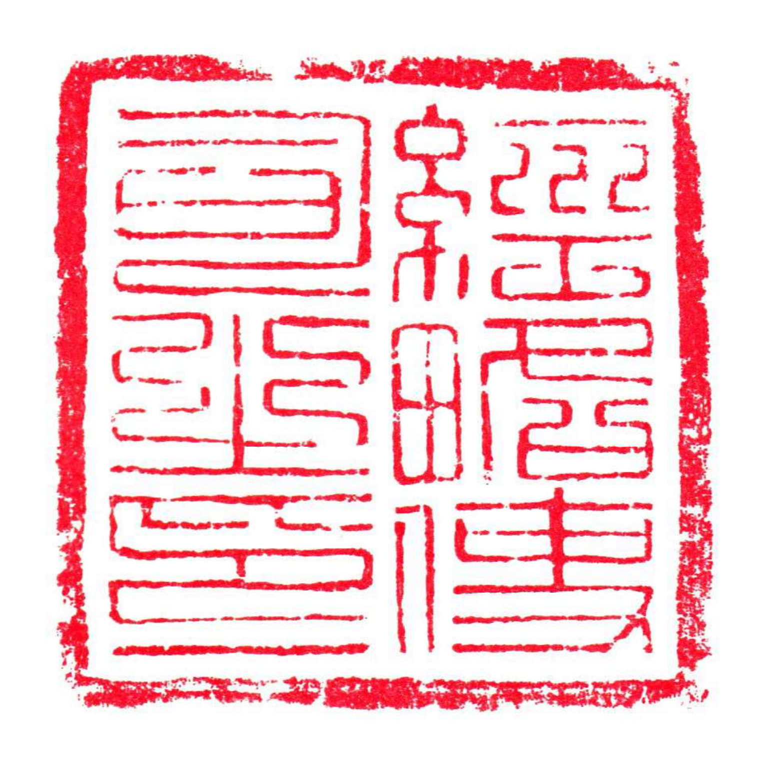
071　　簽宣撫司事印

清末或民初出土于河北省興隆縣。8.6×8.6厘米。紐端刻“上”字。藏興隆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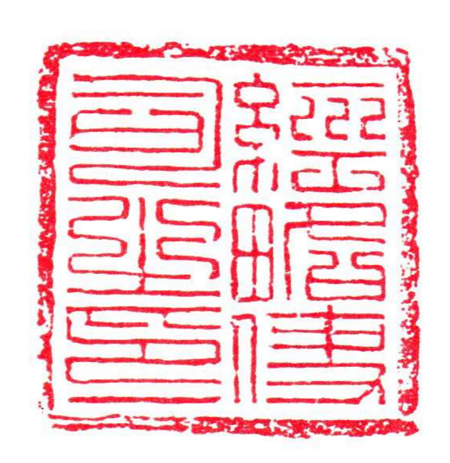
072　　經略使司之印

1973年5月出土于黑龍江省賓縣。6.2×6.2厘米。背刻“經略使司之印”。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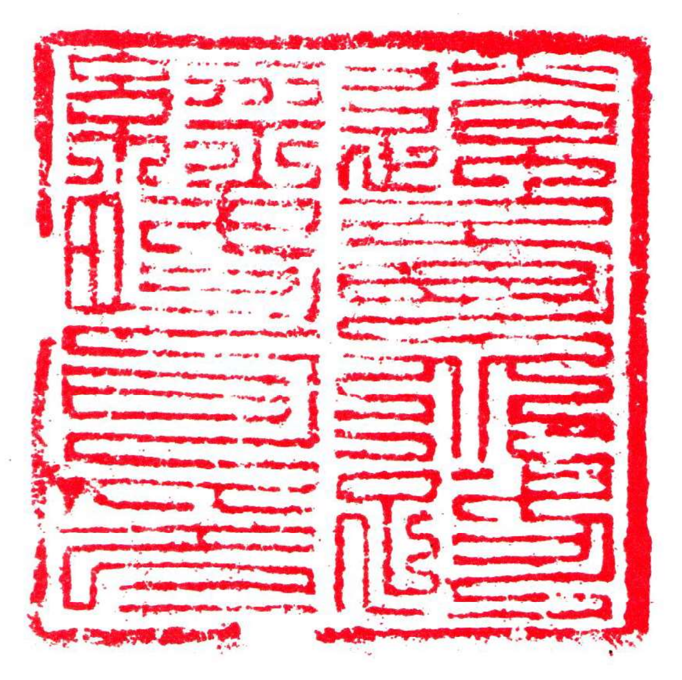
073　　經略使司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7厘米。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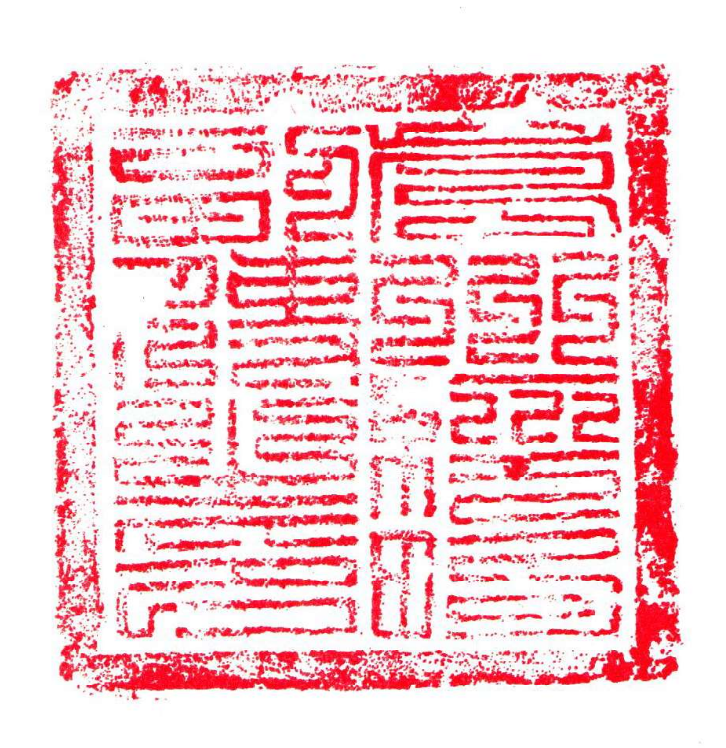
074　　經略使司之印

大連市出土。出土時間不詳。7.1×7.12厘米。藏遼寧省博物館。



075　　遼西北路經略司印

吉林省德惠縣出土。出土時間不詳。6.7×6.7厘米。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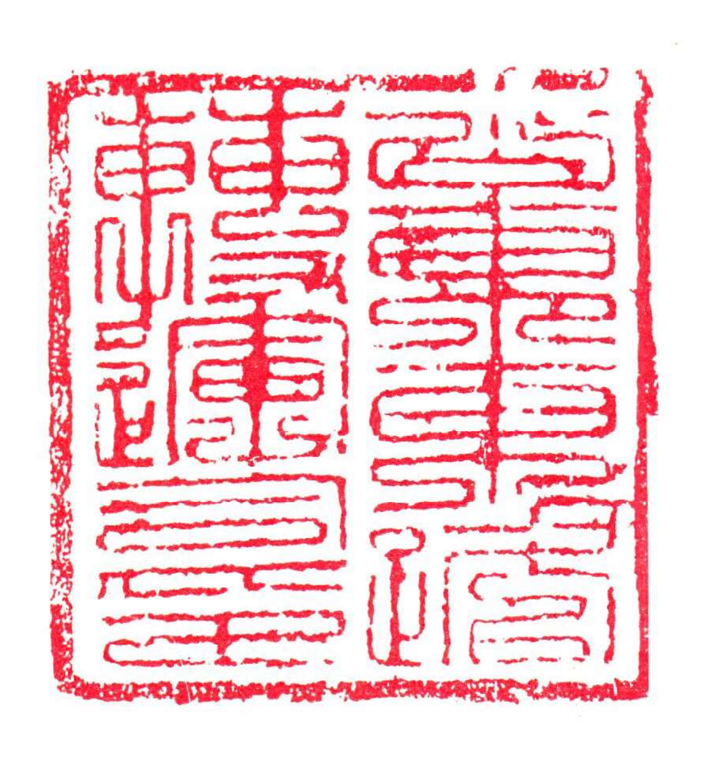
076　　嵐州經略副使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6.6厘米。背刻“貞祐四年”。藏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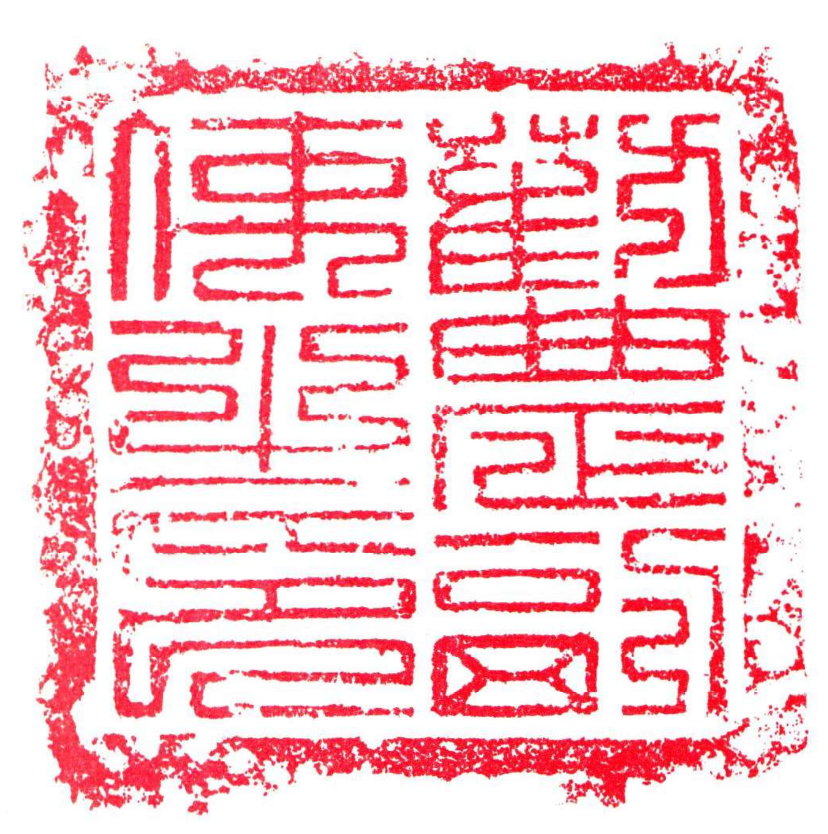
077　遼東路轉運司之印

1957年9月于哈爾濱市徵集。6.7×6.7厘米。背刻“大安元年九月”。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078　山東東路轉運司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7×6.5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079　　勸農副使之印

近年遼寧省鳳城縣出土。8×8厘米。藏丹東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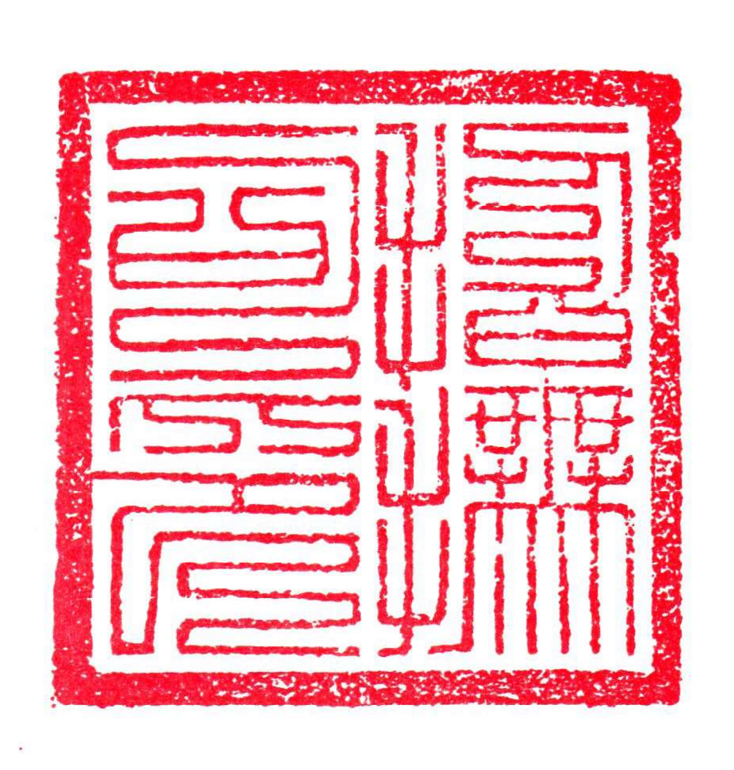
080　　上京隆安勸農副使印

1972年出土于吉林省扶餘縣。6.6×6.6厘米。側刻"上京隆安勸農副使印"。見《扶餘縣文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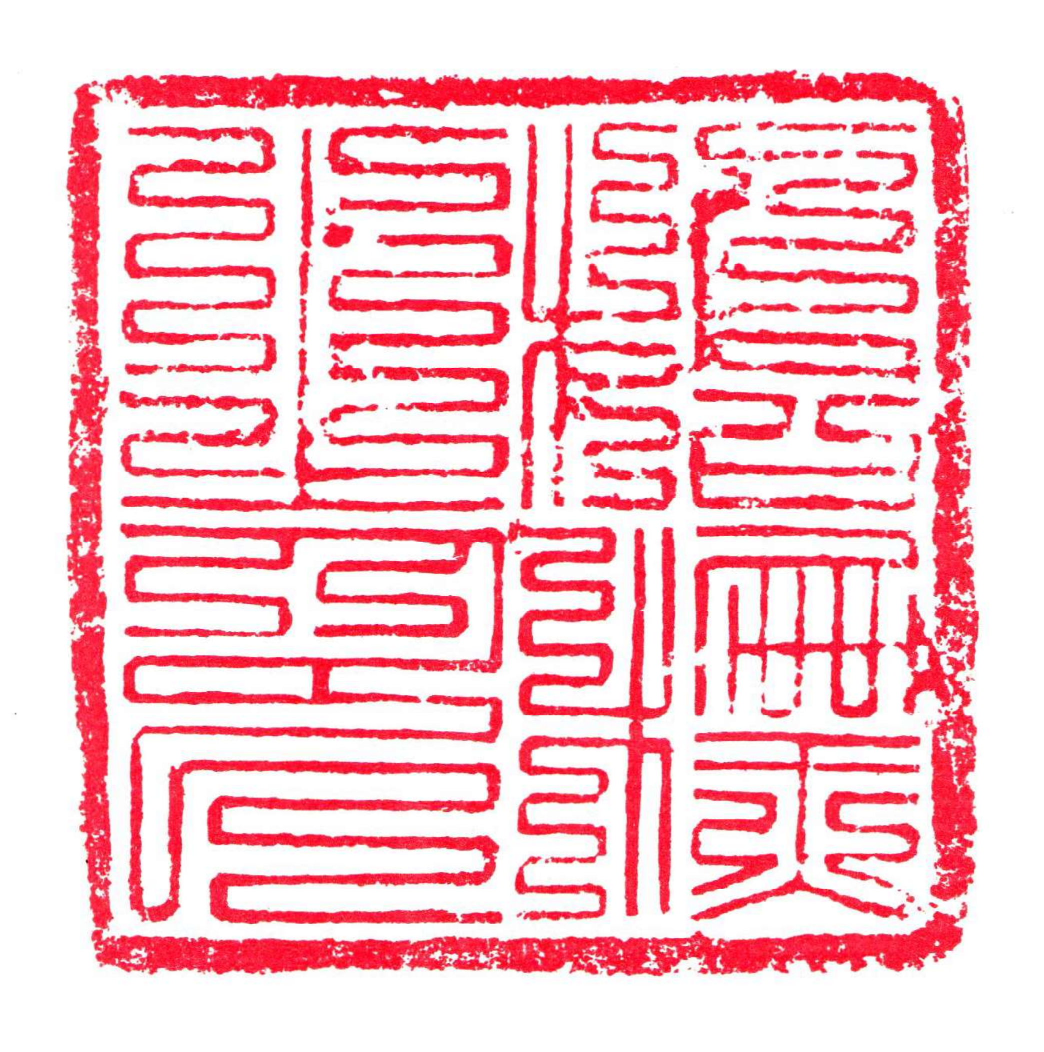
081　**會州勸農之印**

1957年出土于吉林省農安縣。5.55×5.55厘米。背刻“承安四年九月”、“禮部造”。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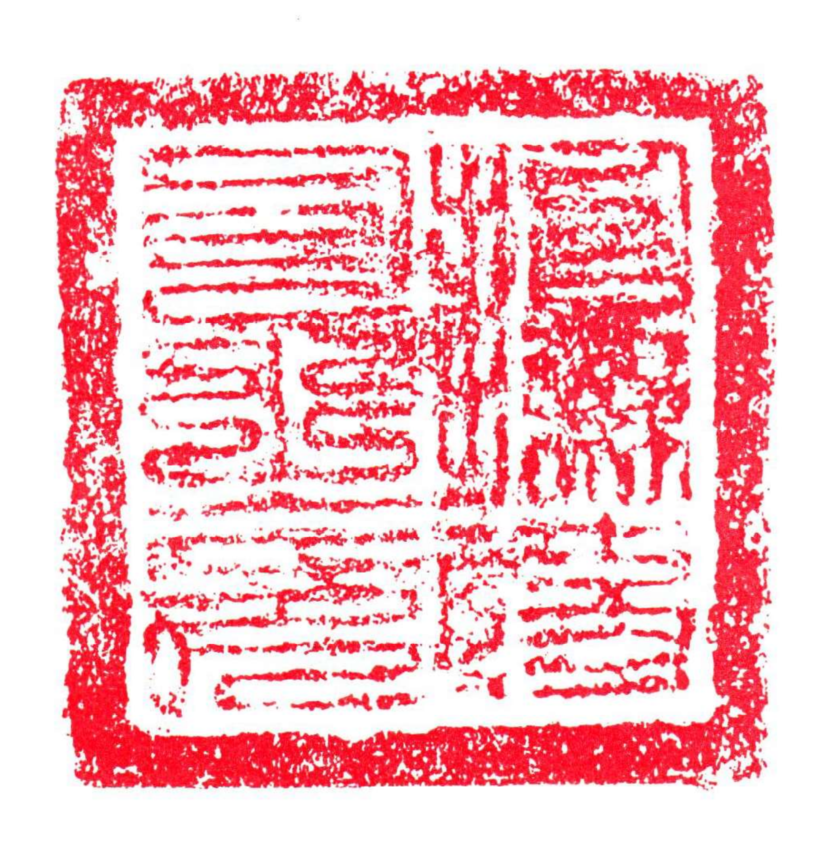
082　**招撫司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2×7.2厘米。背刻“正大六年七月”、“行宫禮部造”。側刻“招撫司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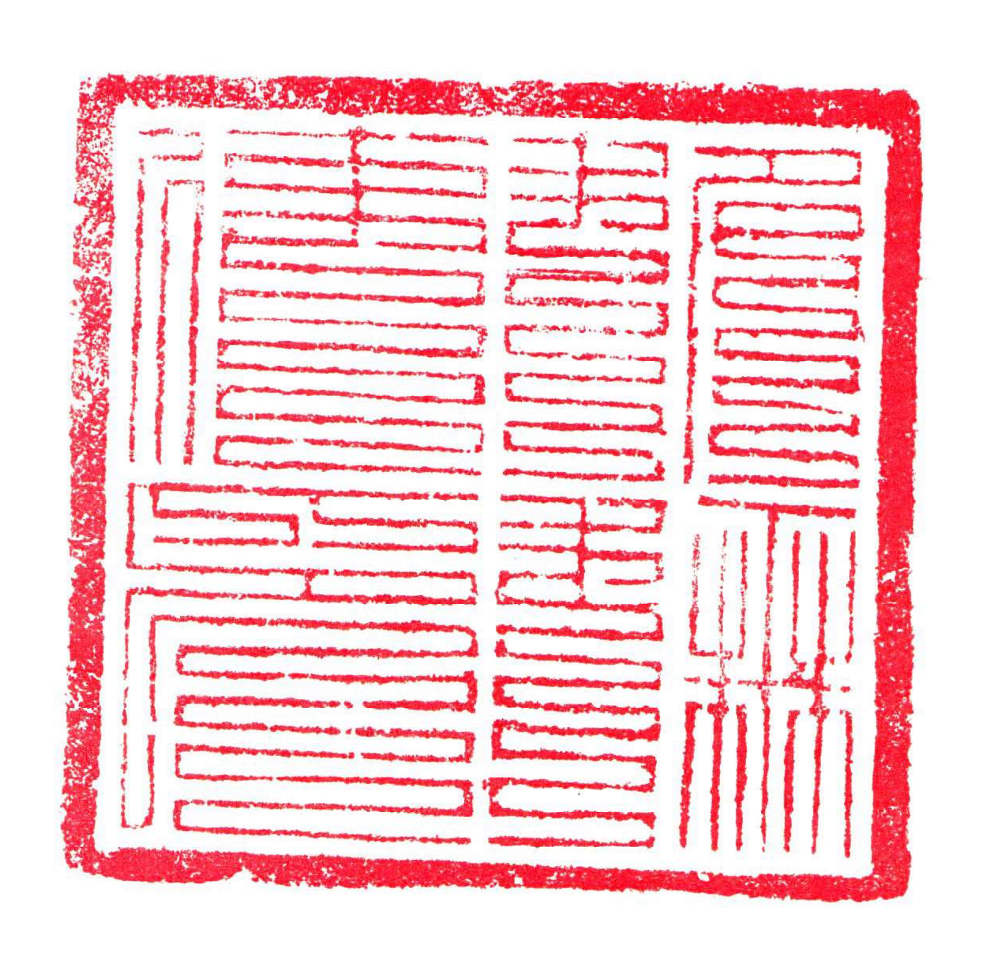
083　　**招撫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9.7×9.7厘米。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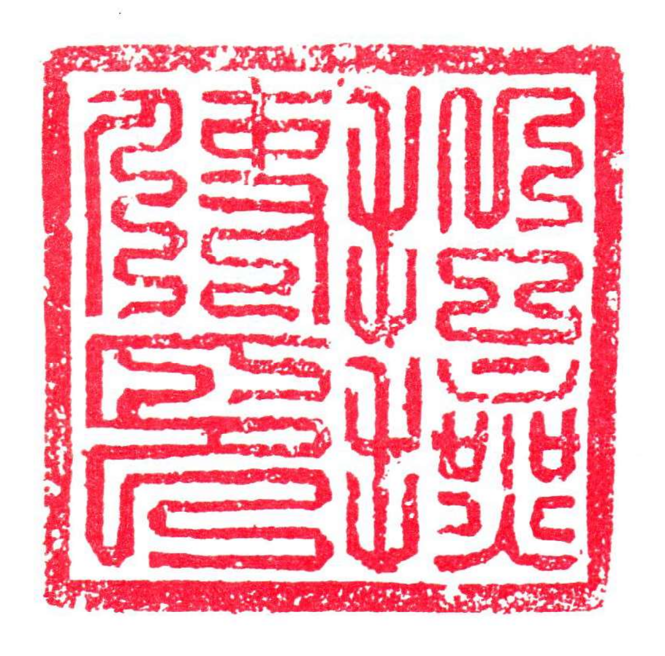
084　　招撫使司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5×7.5厘米。原藏頤素齋。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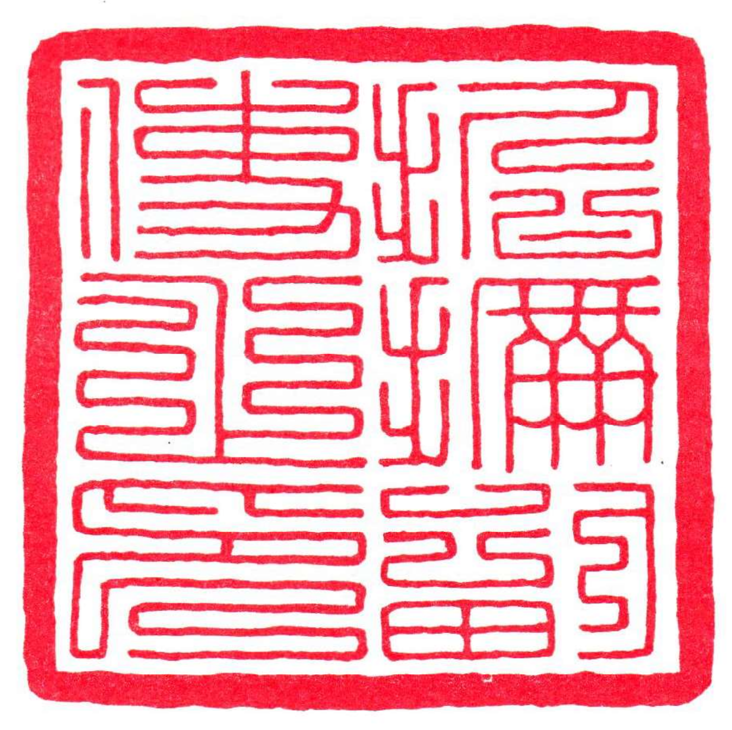
085　　**招撫使印**

1973年于山東省冠縣徵集。9.1×8.7厘米。背刻“上”字。藏聊城地區文化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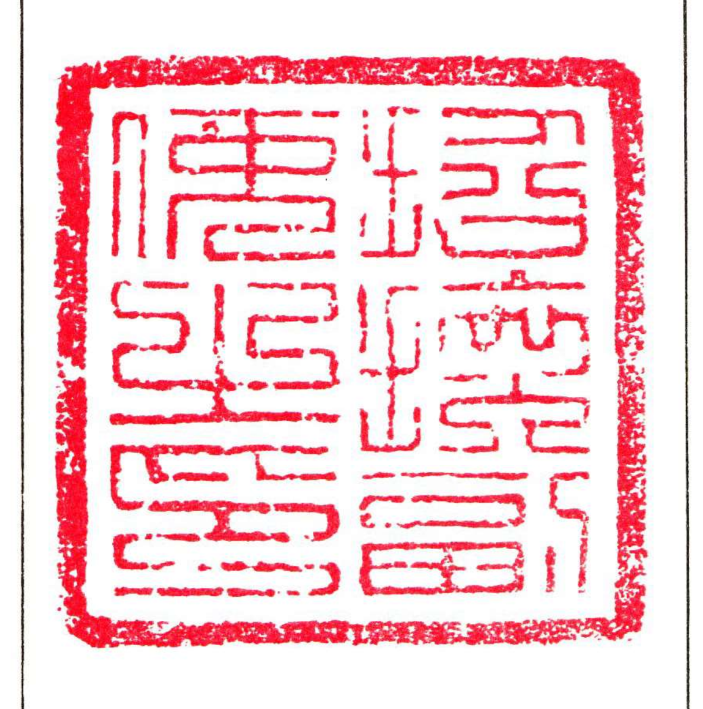
086　招撫使印

遼寧省興城縣出土。出土時間不詳。6×6厘米。藏遼寧省博物館。



087　招撫副使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3×7.3厘米。背刻"天興元年總部造"。側刻"招撫副使"。見《滿洲金石志》。



088　　**招撫副使之印**

1963年發現于黑龍江省佳木斯。6.5×6.5厘米。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089　　**招撫副使之印**

1979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洛陽。7.2×7.2厘米。側刻“天興二年”、“總部造”、“招撫副使”。紐端刻“上”字。藏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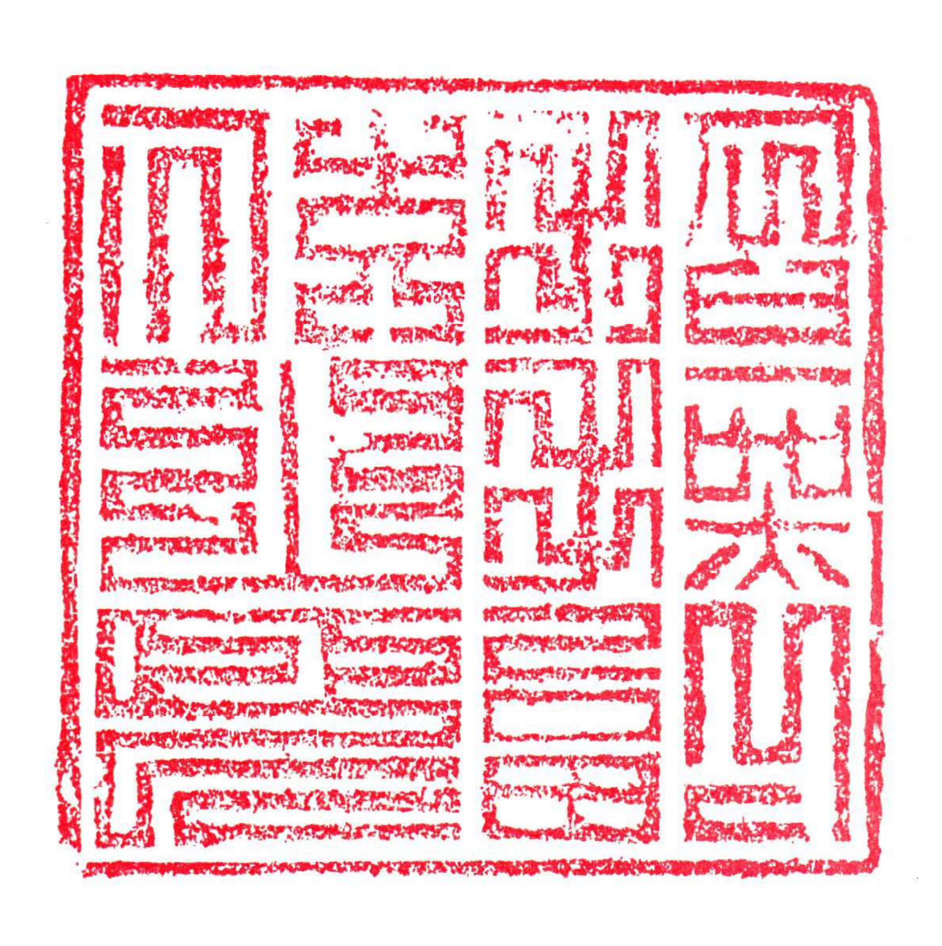
090　　**招撫副使之印**

1978年7月出土于河南省臨汝縣。7.1×7.1厘米。背刻“天興二年”、“□部造”。側刻“招撫副使”。藏河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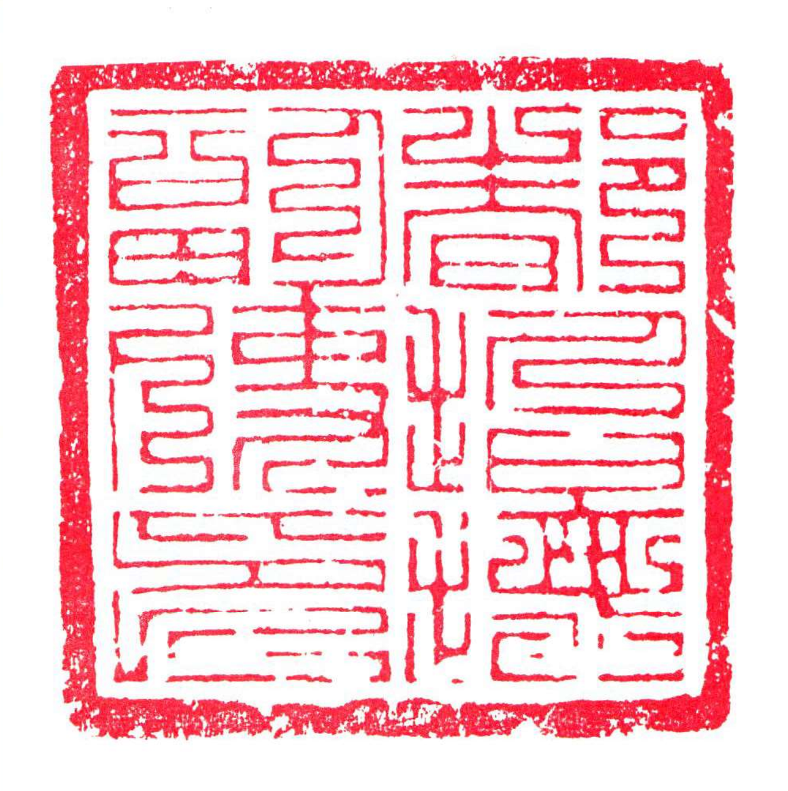
091　　**招撫副使之印**

1972年出土于河南省澠池縣。7.1×7.1厘米。背刻“天興二年”、“□部造”。側刻“招撫副使印”。藏河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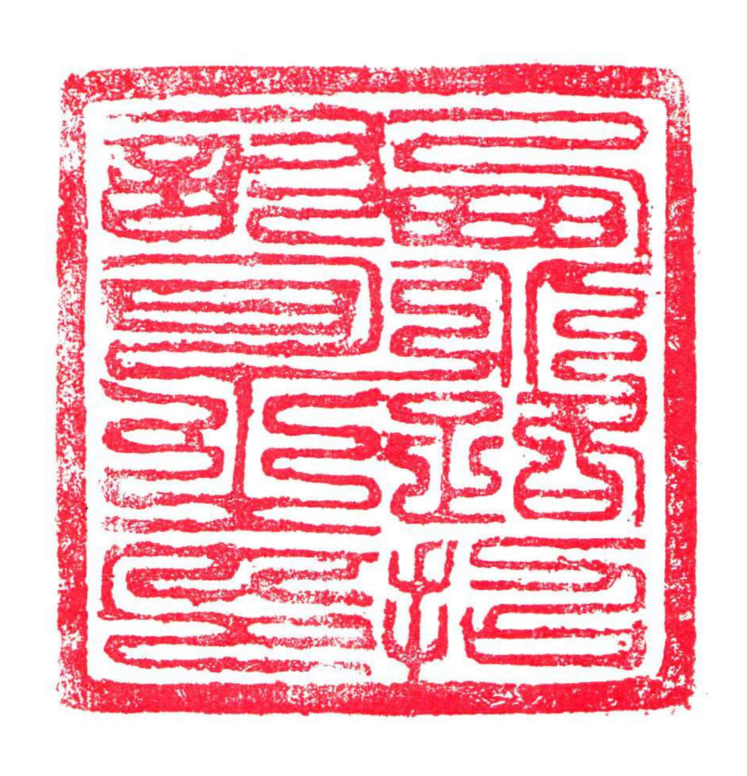
092　**招撫副使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8.5×8.8厘米。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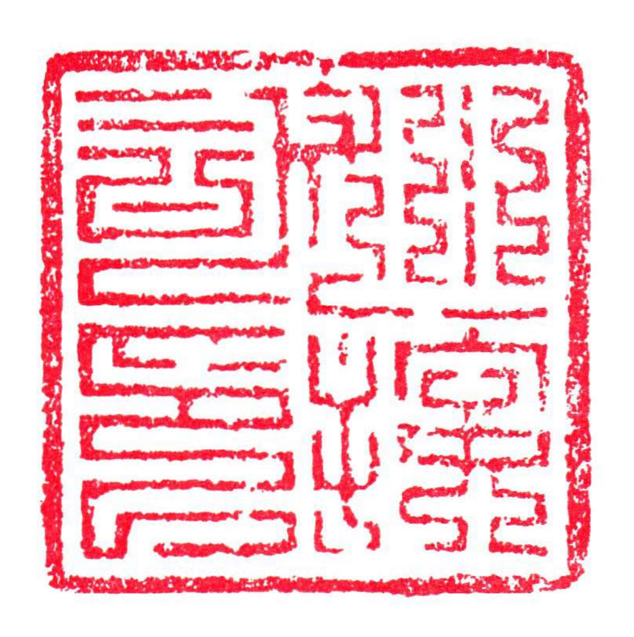
093　　都招撫副使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3×7.3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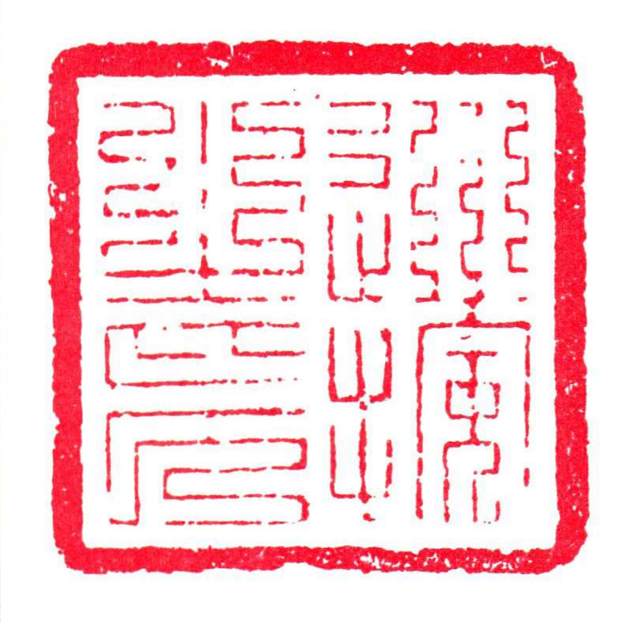
094　　西北路招討司之印

1980年春出土于内蒙古科左中旗7×7厘米。背刻"正隆元年九月"、"内少府監造"。紐端刻"上"字。藏内蒙古自治區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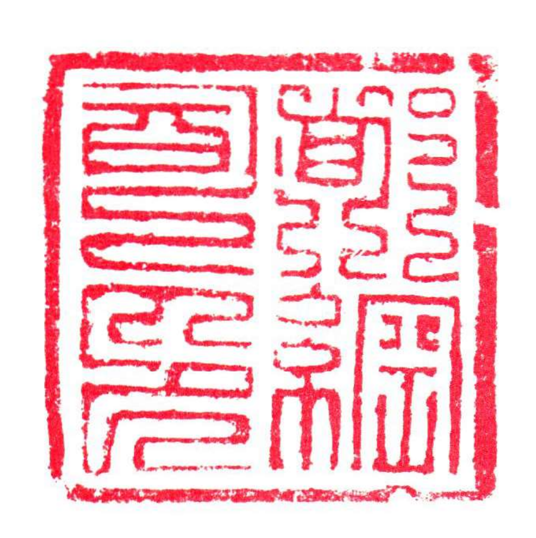
095　　巡按司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9×5.9厘米。原藏大西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096　　巡按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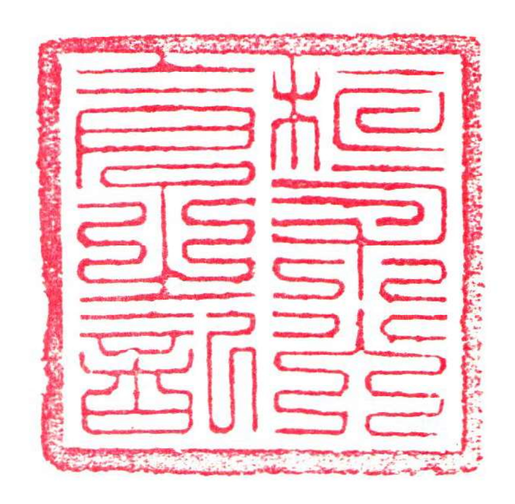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7×5.7厘米。原藏頤素齋。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097　　都綱司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9×4.9厘米。背刻"癸巳年月日行尚書省造"。側刻"都綱司印"。藏吉林省博物館。

卷四　諸記



098　　**桓术火倉之記**

1976年出土于黑龍江省海林縣。4.8×4.8厘米。背刻“泰和元年正月”、“禮部造”。側刻“桓术火倉之記”。紐端刻“上”字。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099　　**棣州倉草場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5×7.5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00　草場之記

1985年出土于遼寧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5.8×5.9厘米。藏該縣博物館。



101　規運柴炭監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3×4.3厘米。背刻“正大二年五月行宫禮部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102　水柴税務之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1×4.1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03　益都府酒務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1×5.1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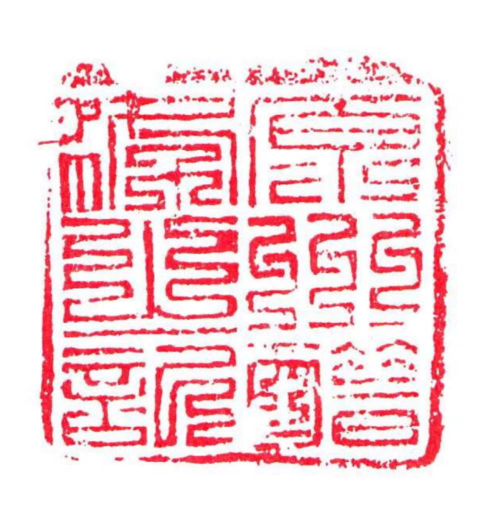
104　　寧海州酒務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3×4.3厘米。側刻“寧海州酒務記”。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05　　瑞州商酒務記

清宣統間出土于遼寧省錦縣。4.4×4.3厘米。背刻“泰和七年正月禮部造”、“瑞州商酒務記”。原藏錦縣潘昶。見《東北古印鈎沈》。



106　　原州醋務之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3×4.3厘米。原藏觀古閣。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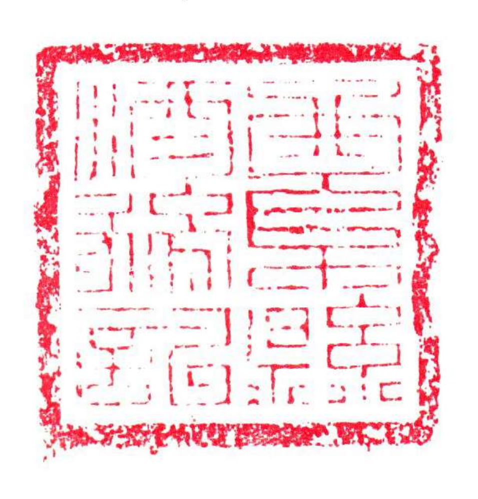
107　　遂城縣酒務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4厘米。背刻“泰和四年十月禮部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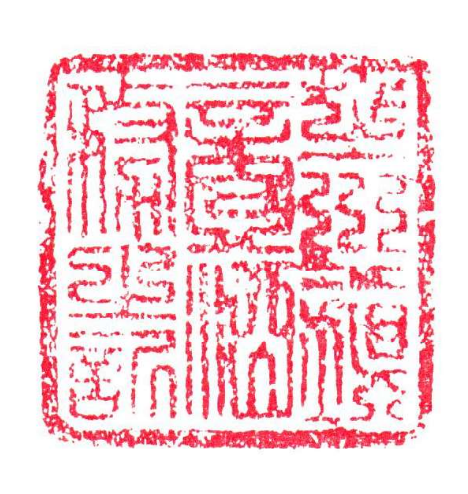
108　　廣武縣酒務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3.9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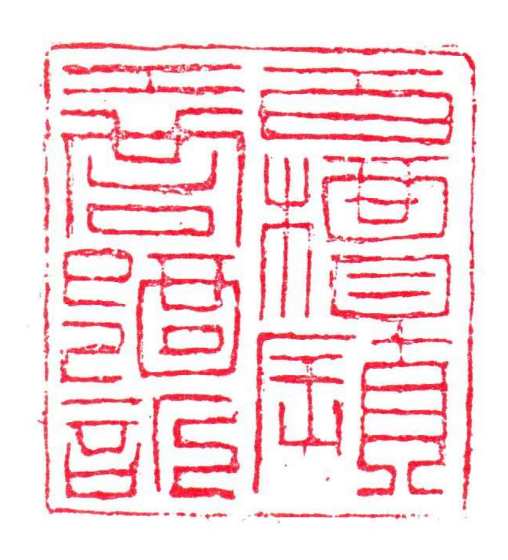
109　　曲阜縣酒務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3×4.3厘米。見《山左金石志》、《集古官印考證》、《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10　　芝川鎮商酒務之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2×4.2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11　　白檀鎮商酒記

近年遼寧省朝陽市出土。5×4.6厘米。藏朝陽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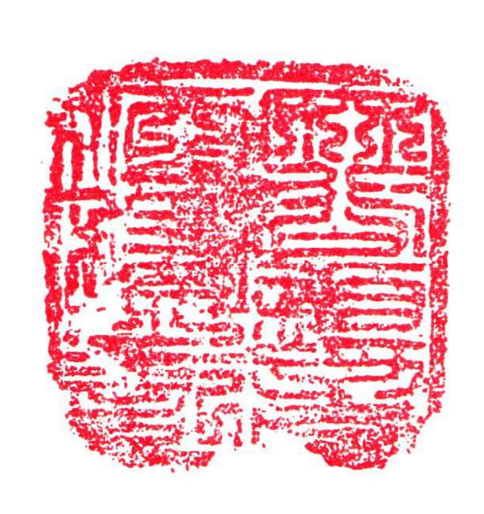
112　東鎮商酒之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8×5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13　張倉鎮商酒鹽場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3×4.3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14　麻谷鎮商酒務之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5×4.5厘米。背刻"正隆二年五月"、"内少府監造"。藏河南省新安縣文化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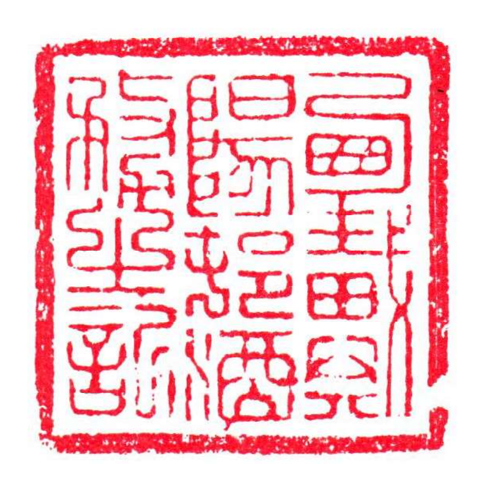
115　亳城郭酒務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5×4.5厘米。原藏海豐吴氏雙虞壺齋。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16　　**姜郇商酒務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2×4.2厘米。背刻“泰和六年七月”、“禮部造”。側刻“姜郇商酒務記”。紐端刻“上”字。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17　　**西戴陽郇酒務之記**

清代出土于山東省任城縣。4.5×4.5厘米。見《金石索》、《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18　　**沙河店商酒務之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5×4.5厘米。背刻“貞祐三年行部造”、“沙河店商酒務之記”。藏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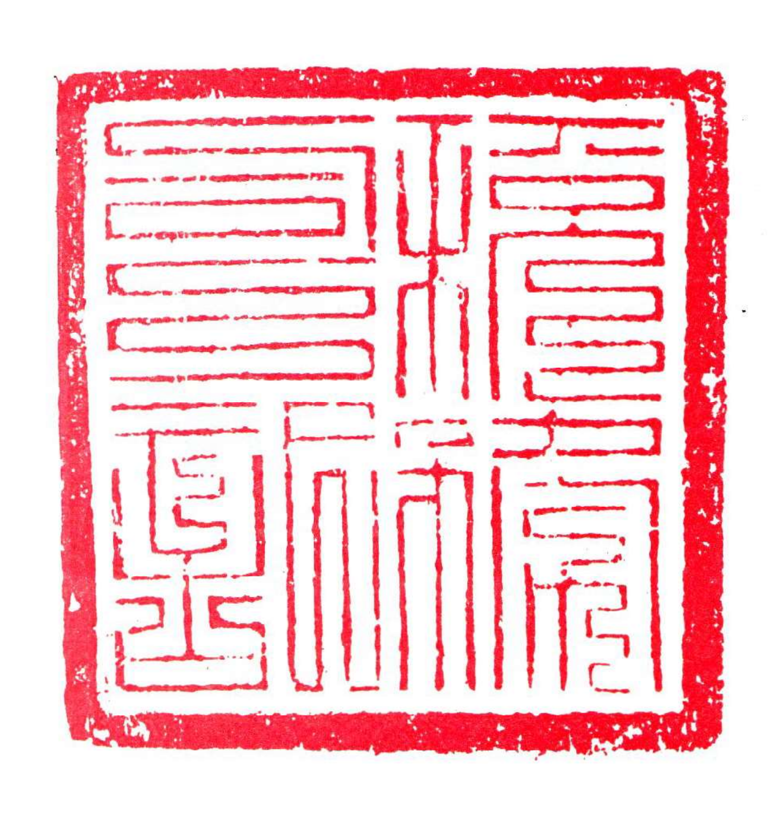
119　　**龍華上社商酒務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5×4.5厘米。背刻“貞祐四年五月本路軍司造”。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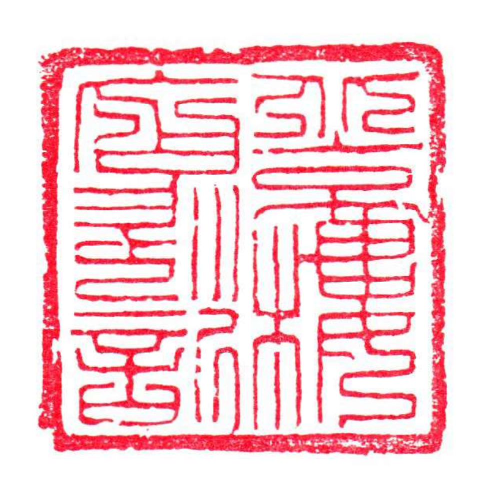
120　　**臨渙縣稅務記**

1975年10月于安徽省蒙城縣徵集。4.4×4.4厘米。背刻“正大三年六”、“行宮禮部造”。側刻“臨渙縣稅務記”。藏阜陽地區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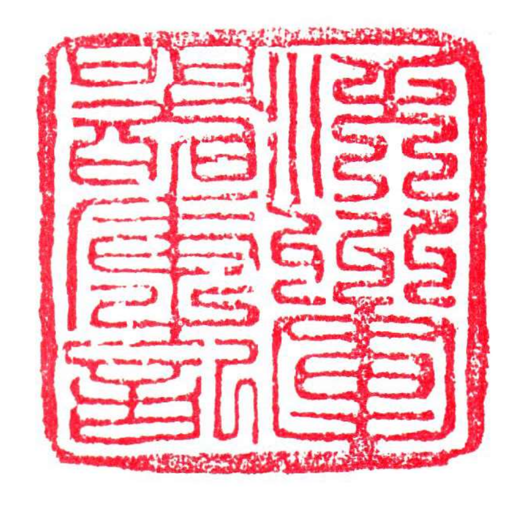
121　　**稅務司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3×7.1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22　北京樓店巡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4×4.4厘米。背刻“正隆五年十月”、“内少府監造”。側刻“北京樓店巡”。藏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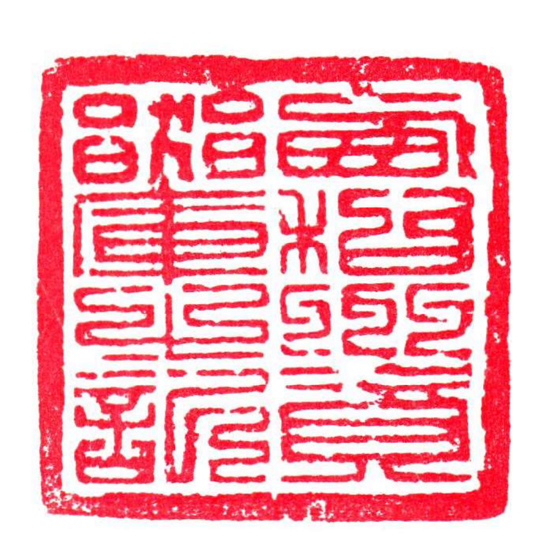
123　沃州軍器庫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8×4.8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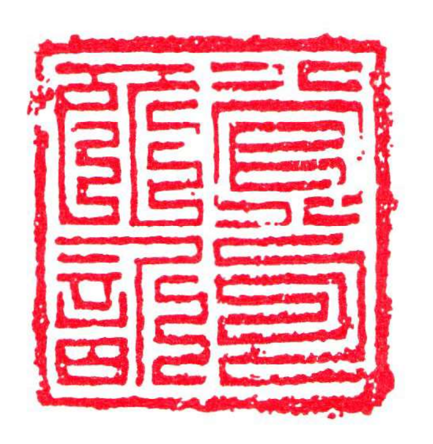
124　登州軍器庫記

1981年出土于山東省黄縣。5×5厘米。藏黄縣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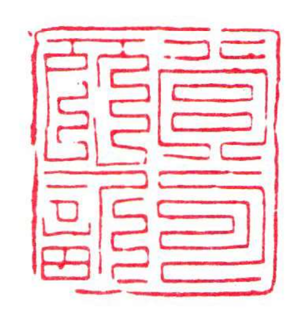
125　西和州資器庫之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厘米。背刻“泰和六年十一月陝西西路”。藏吉林大學。



126　**管勾所記**

1978年夏出土于遼寧省建平縣。4.9×4.6厘米。紐端刻“上”字。藏建平縣文管所。



127　**管勾所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9×4.6厘米。藏遼寧省博物館。



128　**□司□記**

1981年4月出土于遼寧省建平縣。5.1×4.9厘米。藏建平縣文管所。

卷五

句當公事印宣差印應辦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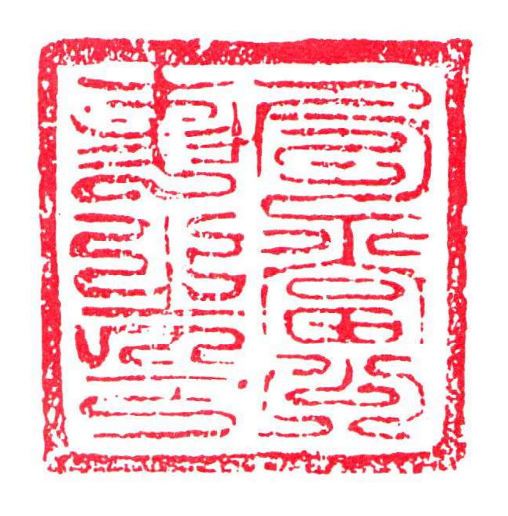
129　**句當公事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2×6.2厘米。背刻“貞祐四年七月禮部造”。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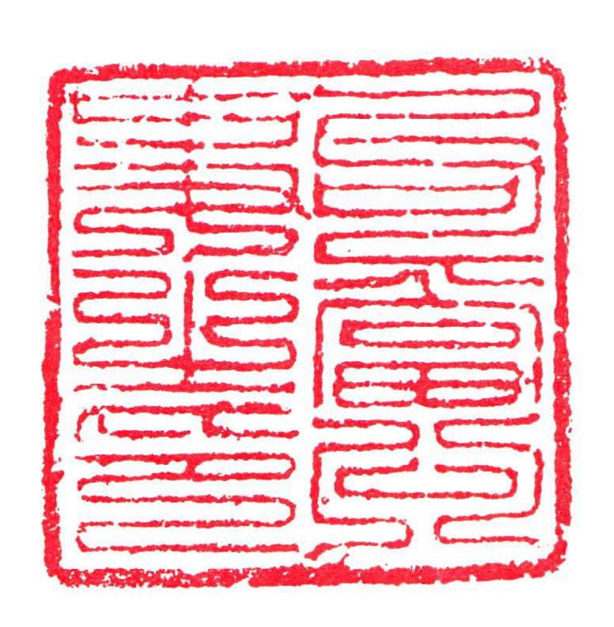
130　　句當公事之印

1980年4月出土于陝西省武功縣。6×6厘米。背刻“興定三年二月日河中行部造”、“句當公事之印”。左上角刻一“上”字。藏陝西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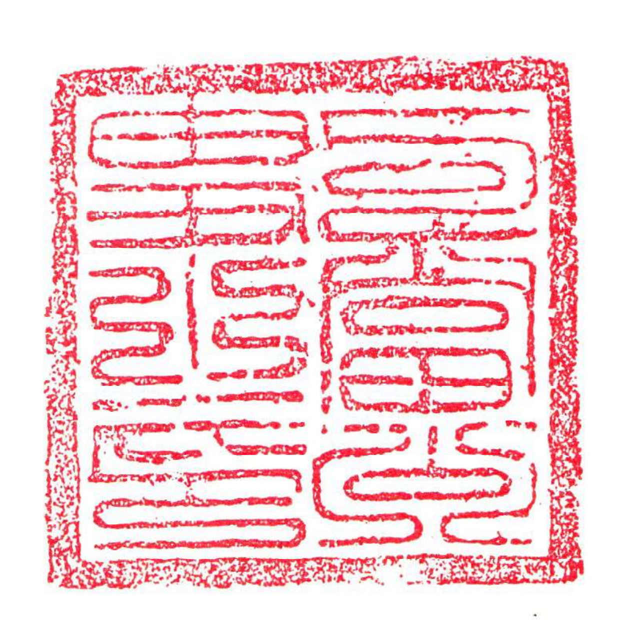
131　　句當公事之印

1962年出土于吉林省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5.9×5.9厘米。背刻“句當公事印”。側刻“南京行部造”。紐端刻“上”字。見該縣《文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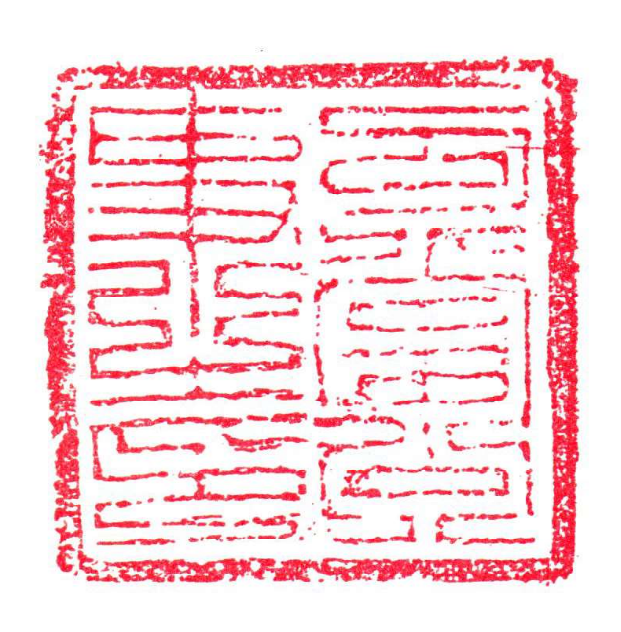
132　　句當公事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7×5.7厘米。背刻“正隆四年少府監造”。原藏頤素齋。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33　　句當公事之印

1977年8月出土于黑龍江省龍江縣。5.7×5.7厘米。



135　句當公事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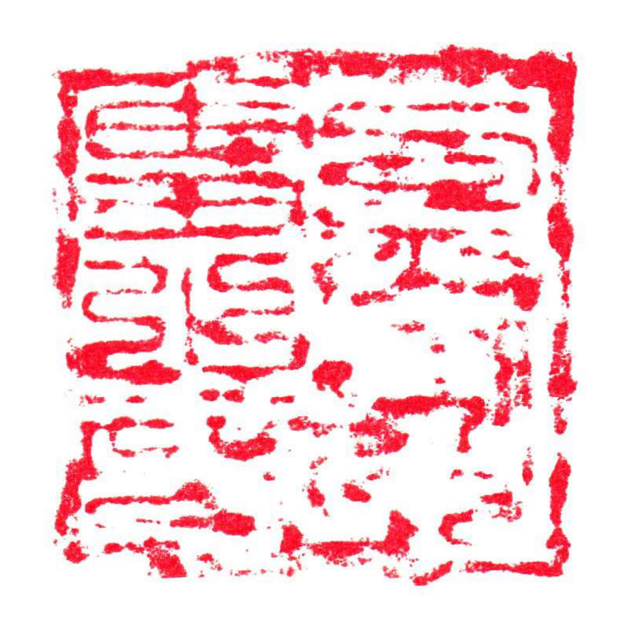
解放後出土于吉林省琿春縣。5.8×5.8厘米。背刻“句當公事”。藏吉林省博物館。





134　句當公事之印

1976年1月出土于黑龍江省寧安縣。5.7×5.7厘米。藏寧安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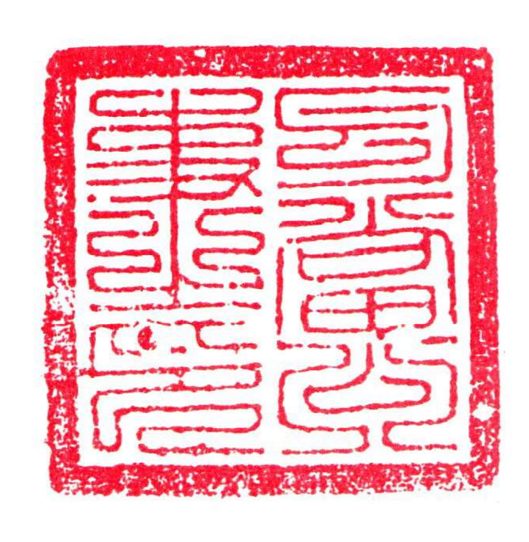
137　句當公事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5.5厘米。藏吉林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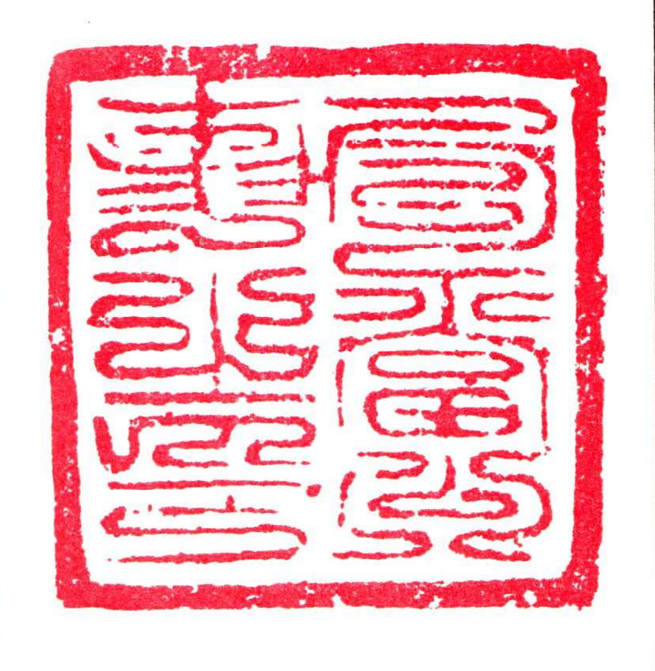
136　句當公事之印

1973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區寧城縣。5.6×5.6厘米。側刻“句當印”。鈕端刻“上”字。藏赤峰市博物館。



138　　**句當公事之印**

1970年出土于遼寧省莊河縣。6.2×6.2厘米。印背左上方刻一"上"字。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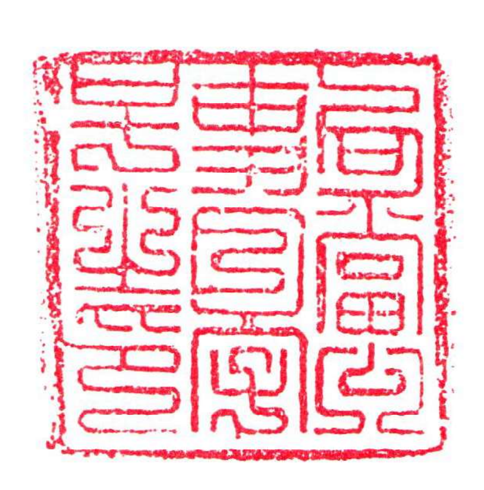
139　　**句當公事之印**

近年吉林省扶餘縣出土。6×6厘米。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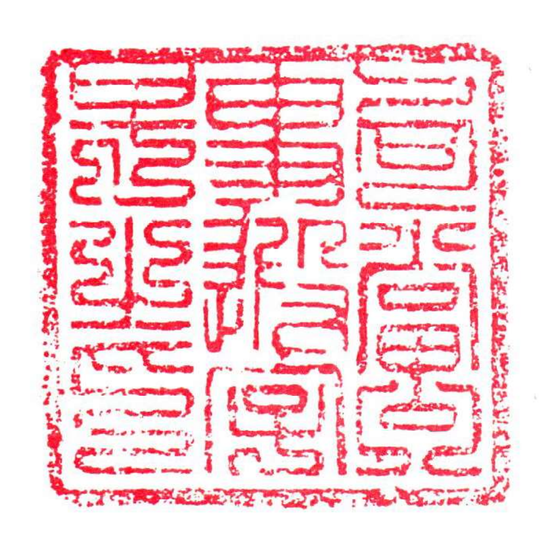
140　　**句當公事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8×5.8厘米。藏遼寧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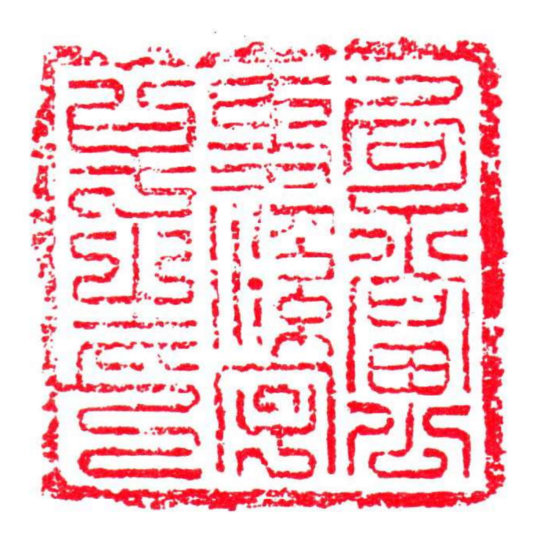
141　　**句當公事日字号之印**

1971年出土于內蒙古自治區涼城縣。背刻"大安三年三月"、"禮部造"。側刻"句當公事日字号之印"。紐端刻"上"字。藏內蒙古自治區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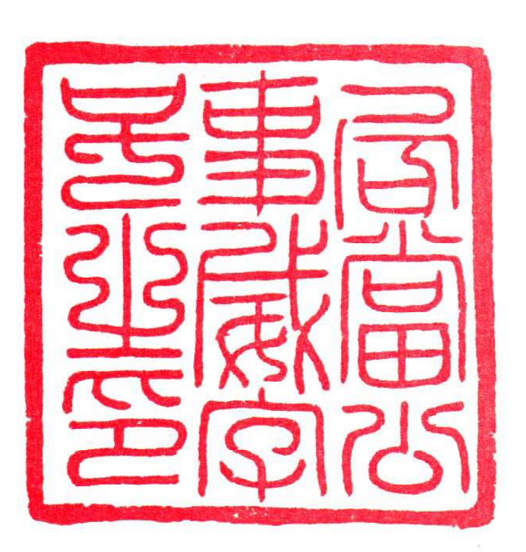
142　　**句當公事遐字号之印**

1963年9月出土于黑龍江省綏化縣。5×5厘米。背刻“大安三年四月”、“禮部造”。側刻“句當公事遐字号印”。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143　　**句當公事溪字号之印**

1972年4月出土于黑龍江省依蘭縣。5×5厘米。背刻“崇慶□年二月禮部造”。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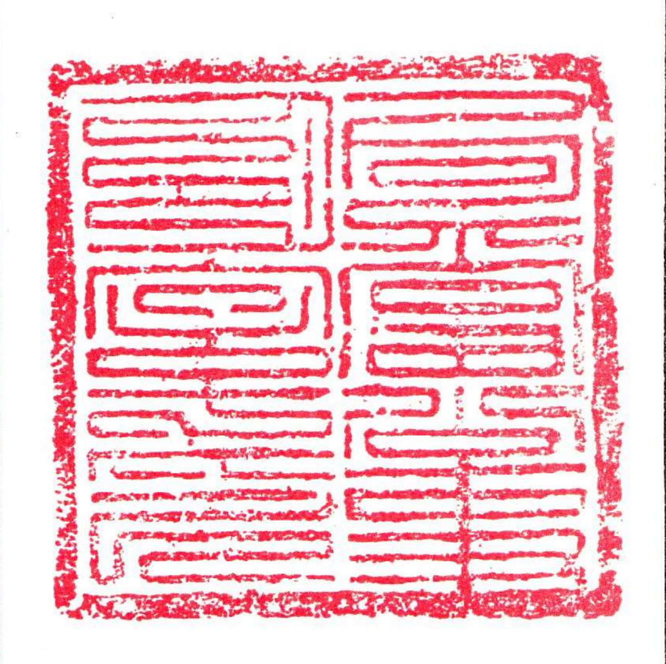
144　　**句當公事威字号之印**

民國四年(1915年)出土于吉林省琿春縣。5.1×5厘米。背刻“崇慶二年二月威字號印”。原藏琿春縣知事李善元處。見《東北古印鉤沈》。



145　　**句當公事龍字号之印**

1959年6月出土于黑龍江省阿城縣。5×5厘米。側刻“咸平應辦所”、“至寧元年八月初三日造”、“龍字号二”。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146　句當公事月字号印

1963年2月出土于黑龍江省龍江縣。6.2×6.2厘米。背刻"貞祐三年二月"、"上京行六部造"。側刻"句當月字印"。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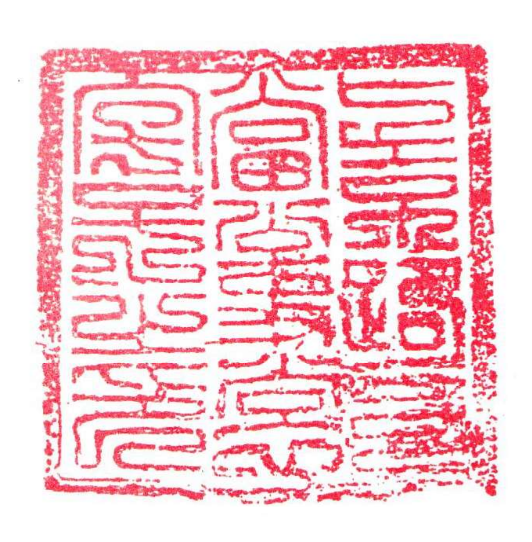
147　句當公事别字号之印

1976年出土于遼寧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5×5厘米。藏該縣博物館。



148　句當公事音字号之印

1976年出土于遼寧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5×5厘米。藏該縣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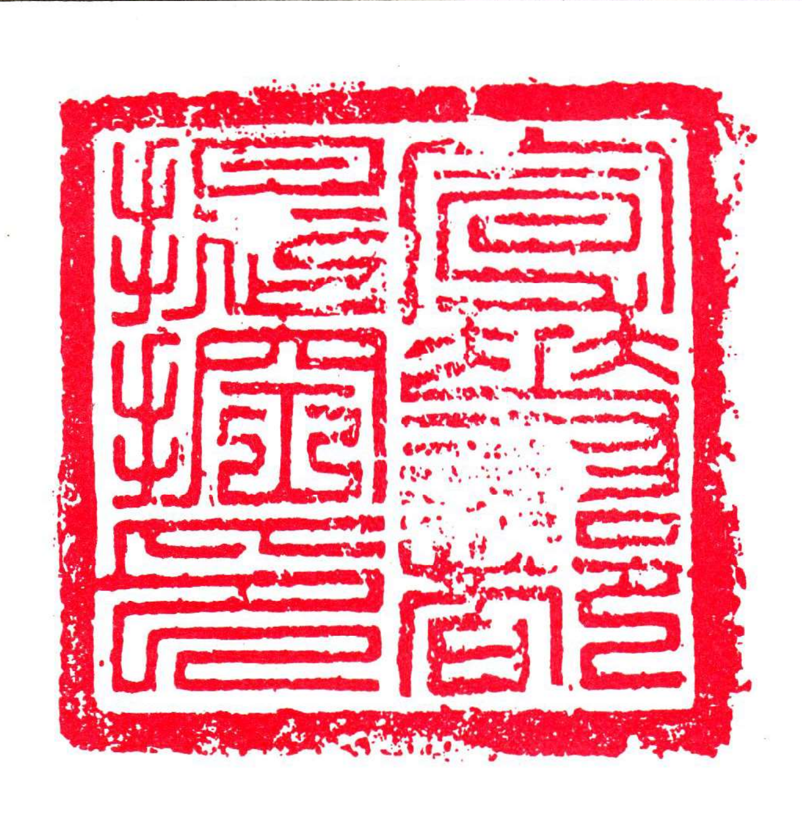
149　上京路句當公事裳字号之印

1972年4月出土于黑龍江省阿城縣。5×5厘米。背刻"貞祐三年九月日"、"上京行六部造"。側刻"裳字句當公事印"。藏該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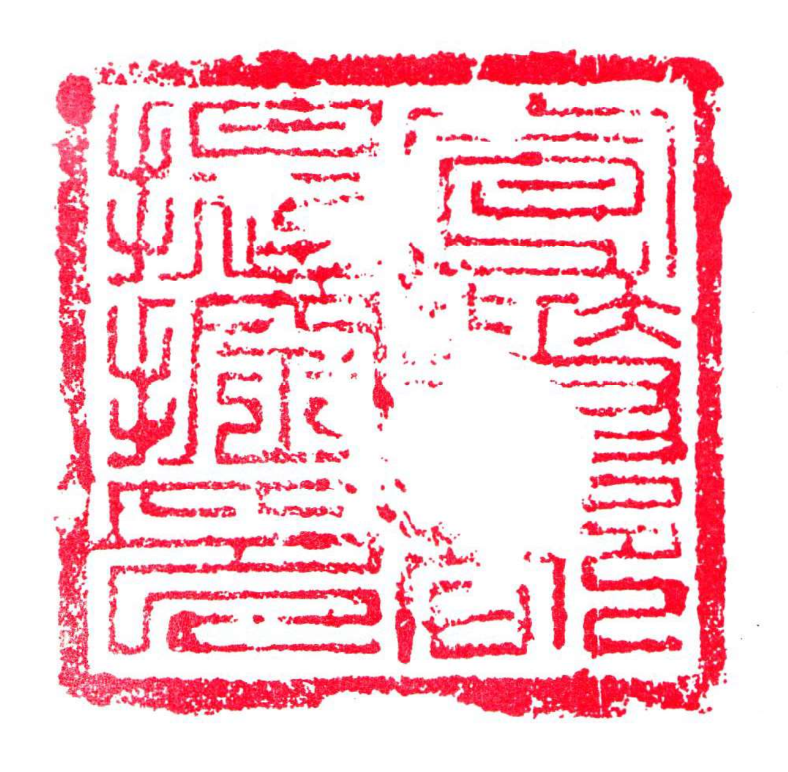
150　上京路句當公事雲字号之印

1973年5月出土于黑龍江省阿城縣。5×5厘米。背刻"上京行部造"、"句當公事雲字"。側刻"号之印"。藏該縣文管所。



151　宣差都提控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7厘米。見《集古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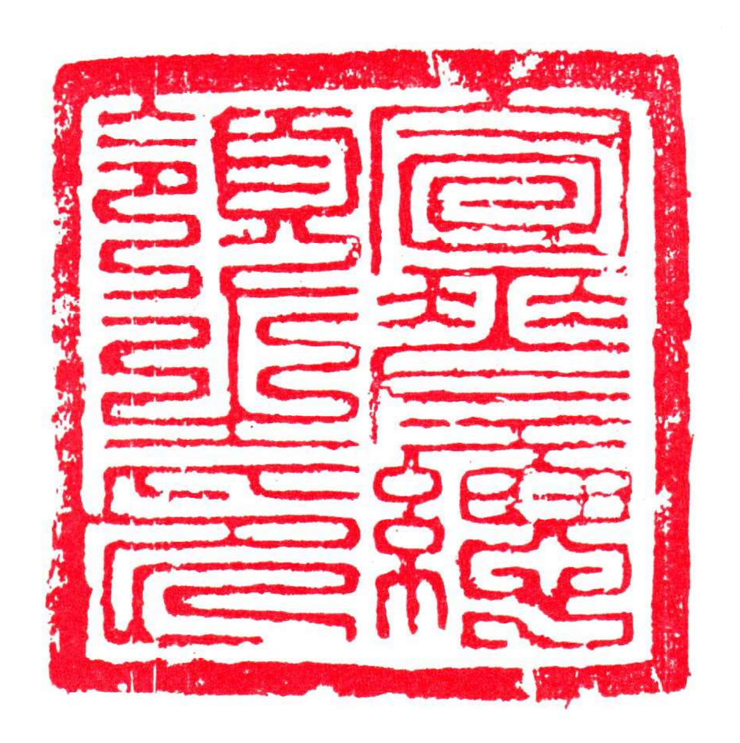
152　　宣差都提控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7厘米。背刻“□定三年十一月行宮禮部造”。原藏常熟瞿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53　　宣差都提控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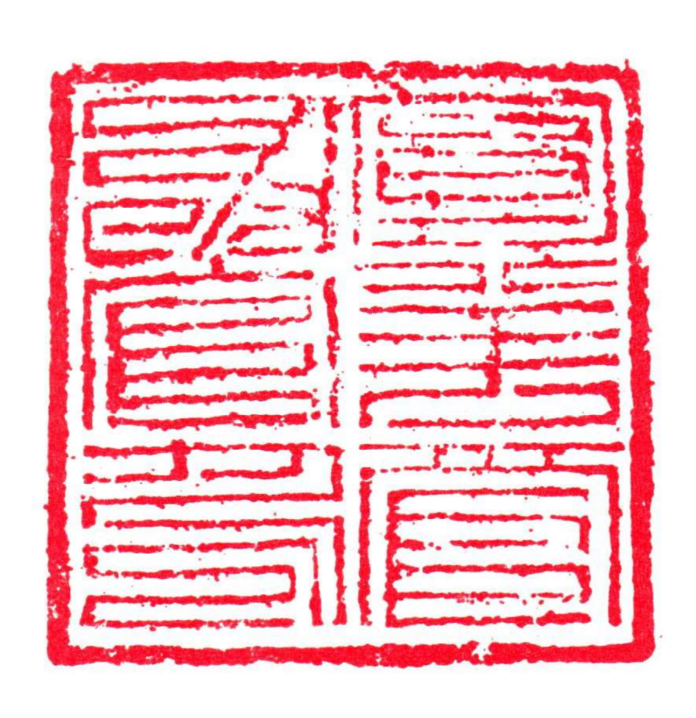
1975年5月出土于遼寧省法庫縣。7×7厘米。藏處不詳。



154　宣差總領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8×6.8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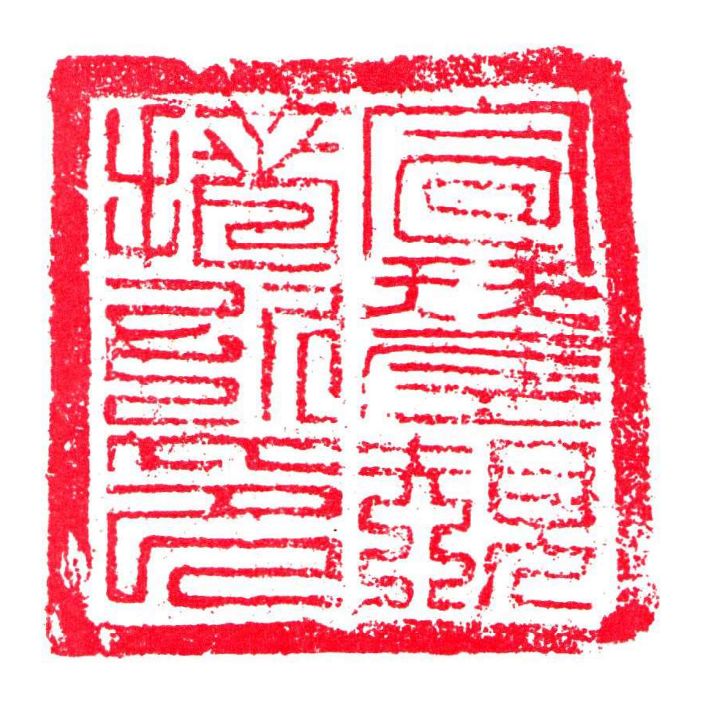
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55　宣差管□官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4×6.2厘米。

見《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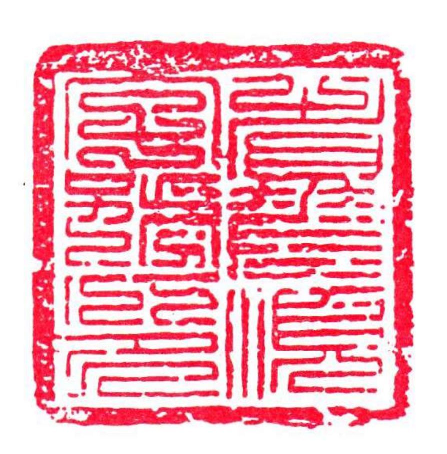
156　　宣差規措所印

七十年代出土于山西省河曲縣。6.5×6.5厘米。藏河曲縣博物館。



157　　委差句當地字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8×5.8厘米。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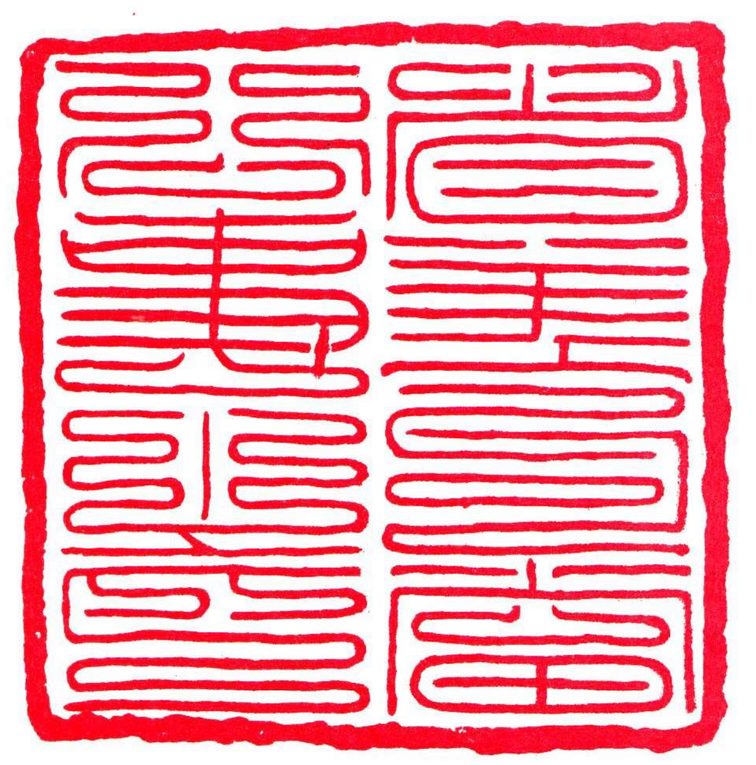
158　省差順字號印

1970年出土于河南省禹縣。5.5×5.5厘米。背刻"泰和八年十月"、"禮部造"。側刻"省差順字号印"。藏河南省博物館。



159　省差句當公事亨字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厘米。背刻"貞祐三年七月日"、"山東行部造"。側刻"省差句當公事亨字印"。原藏諸城劉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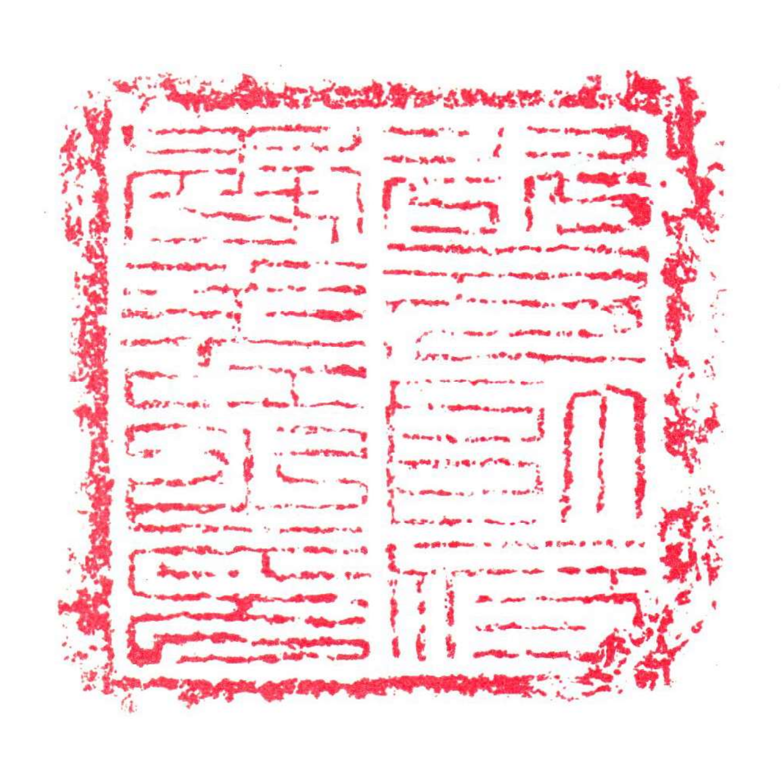
160　省差句當公事之印

民國間出土于遼西。7.8×7.5厘米。原藏義縣某氏。見《東北古印鉤沈》。



161　行部差委句當公事土字号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2×5.2厘米。背刻"貞祐三年九月"、"□路運司造"。側刻"委差土字号"。藏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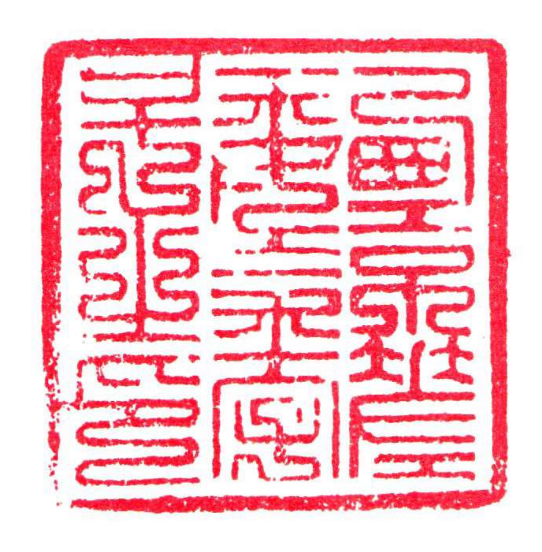
162　行元帥府委差之印

近年于山西省昔陽縣徵集。6.5×6.5厘米。藏昔陽縣文管所。



163　山東東路按察司差委火字号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厘米。背刻"大安元年八月禮部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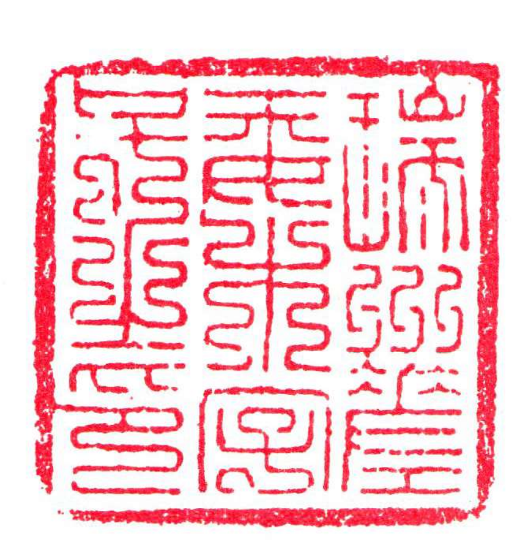
164　西京差委金字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背刻“大安元年七月禮部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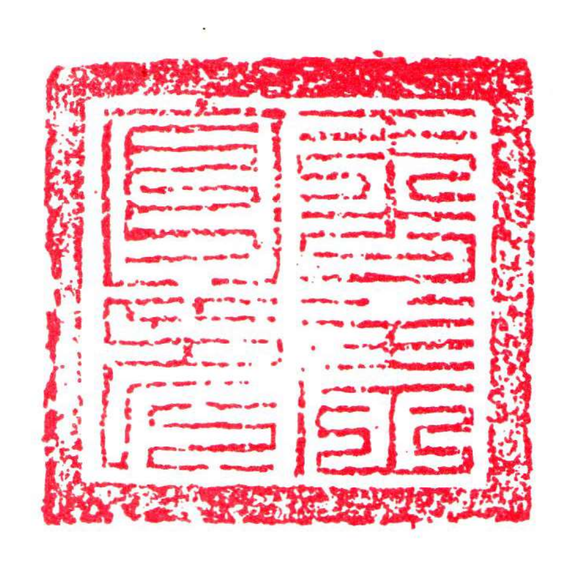
165　上京差委火字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背刻“大安四年禮部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166　瑞州差委木字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厘米。背刻“大安元年”。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167　委差官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9×5厘米。見《集古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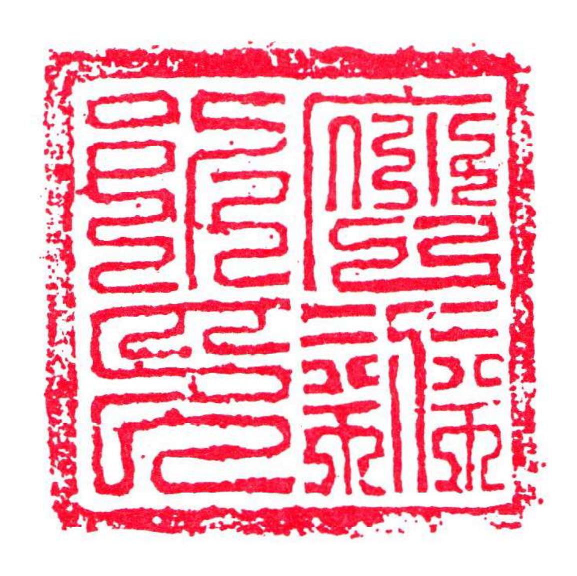
168　　承受差委吏字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3×5.3厘米。背刻“大安元年二月”、“禮部造”。側刻“承受差委吏字号之印”。藏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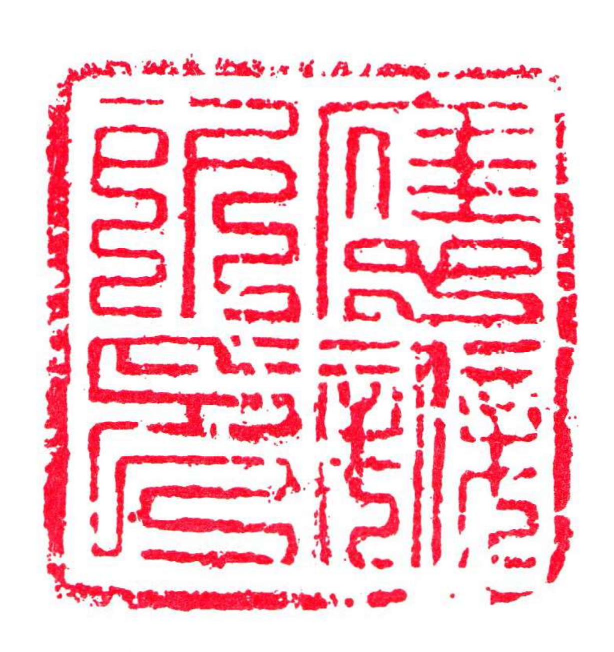
169　　應辦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9×7.9厘米。藏吉林大學。



170　　應辦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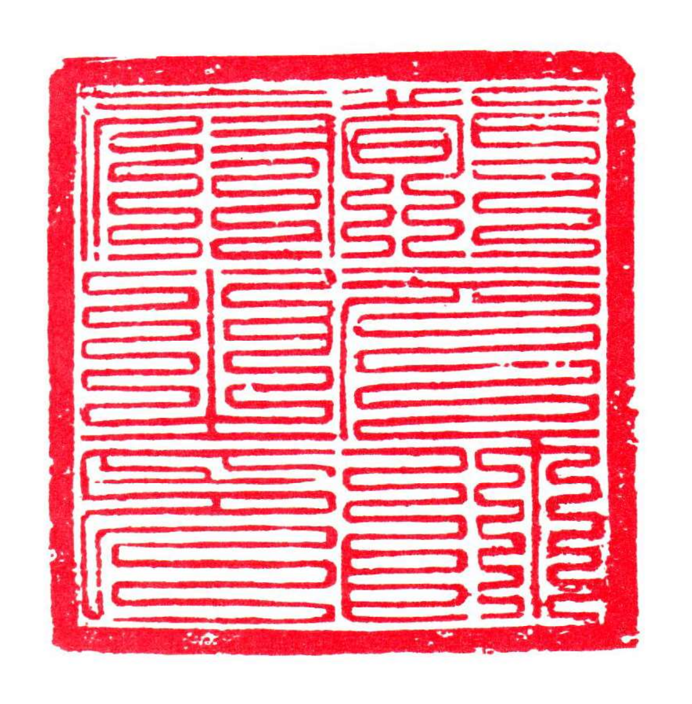
近年出土于吉林省德惠縣。6.1×6.1厘米。藏處不詳。



171　　應辦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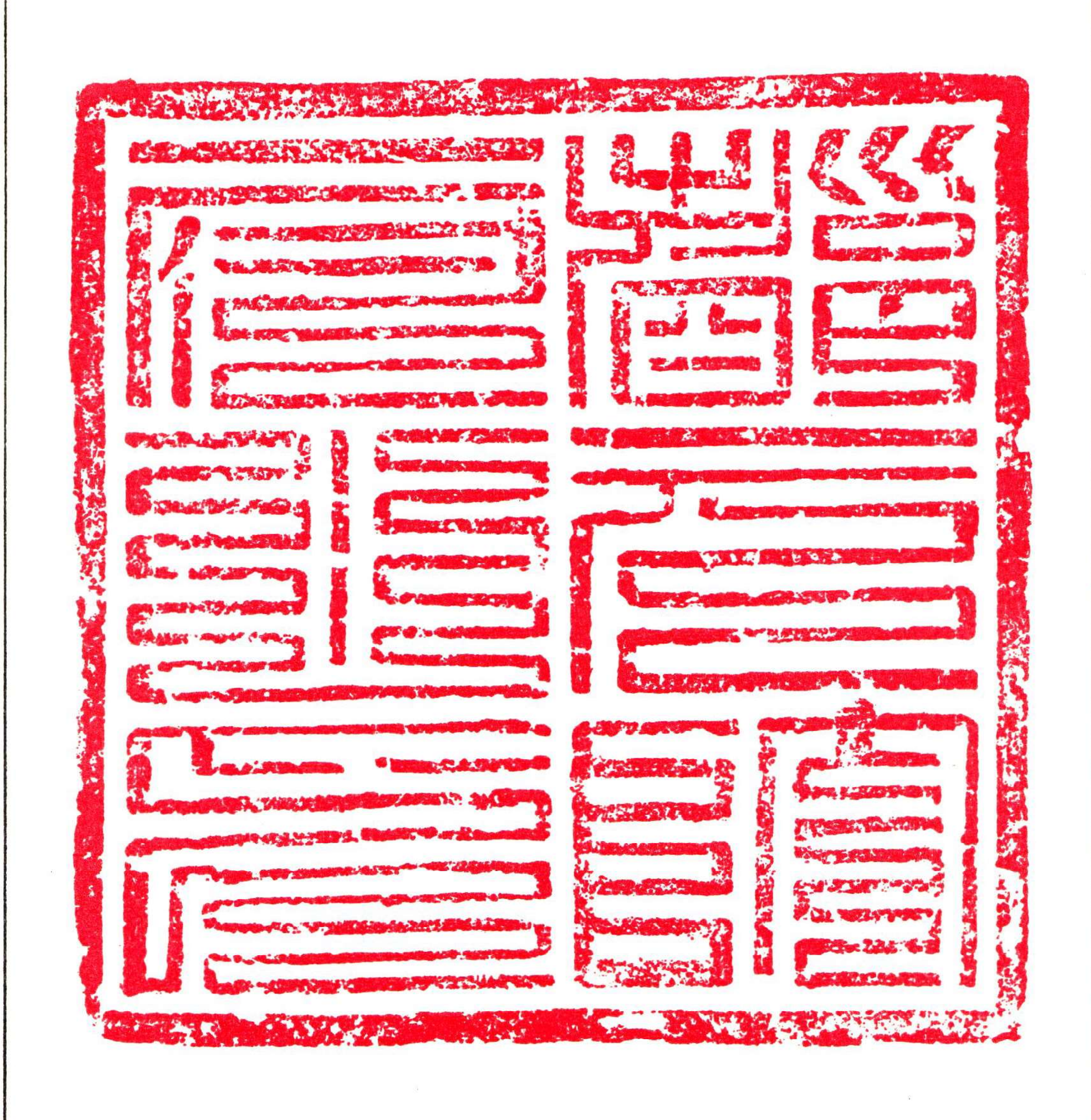
解放後于長春徵集。5.8×5.8厘米。藏吉林省博物館。

卷六　元帥府印諸乣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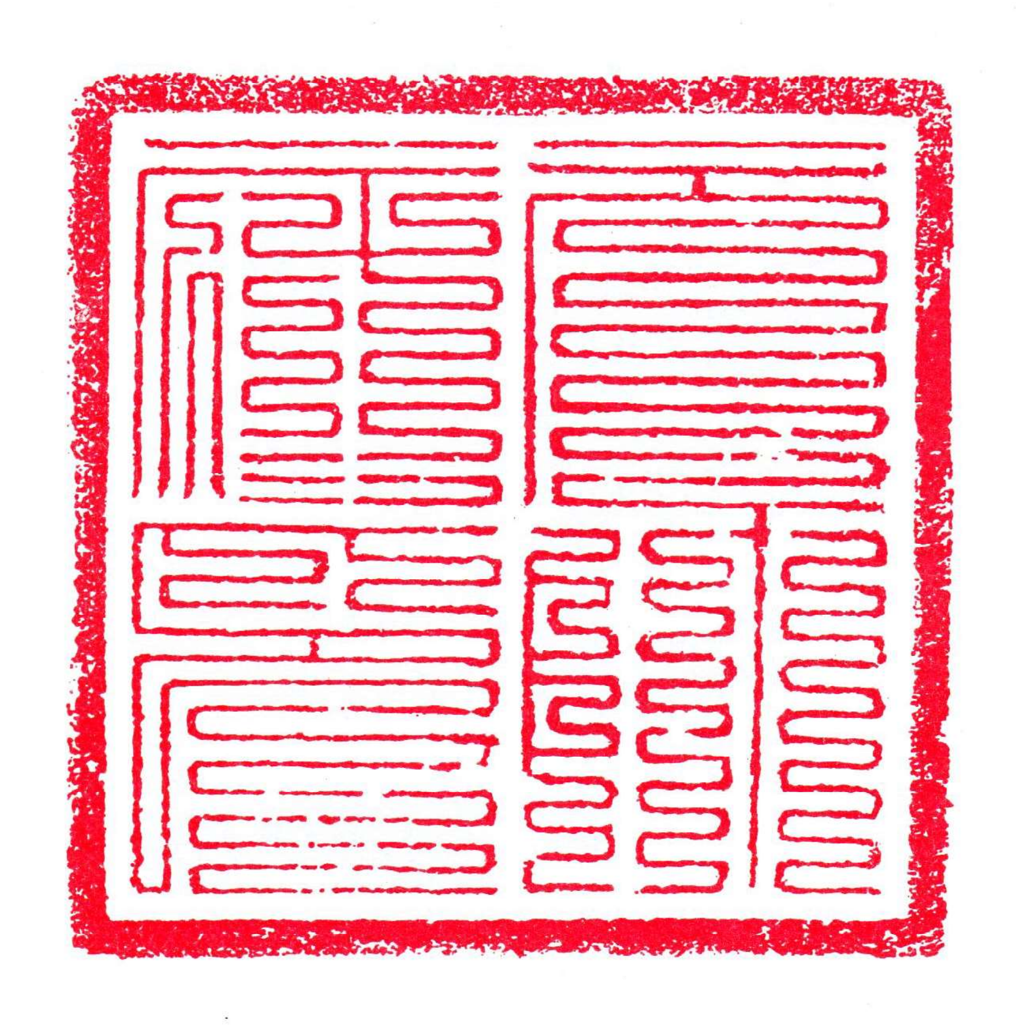
172　**都元帥府之印**

1954年于河北省保定徵集。13×12厘米。背刻“甲申年九月日”,“規措所造”。側刻“都元帥府之印”。紐端刻“上”字。藏河北省博物館。



173　　都元帥府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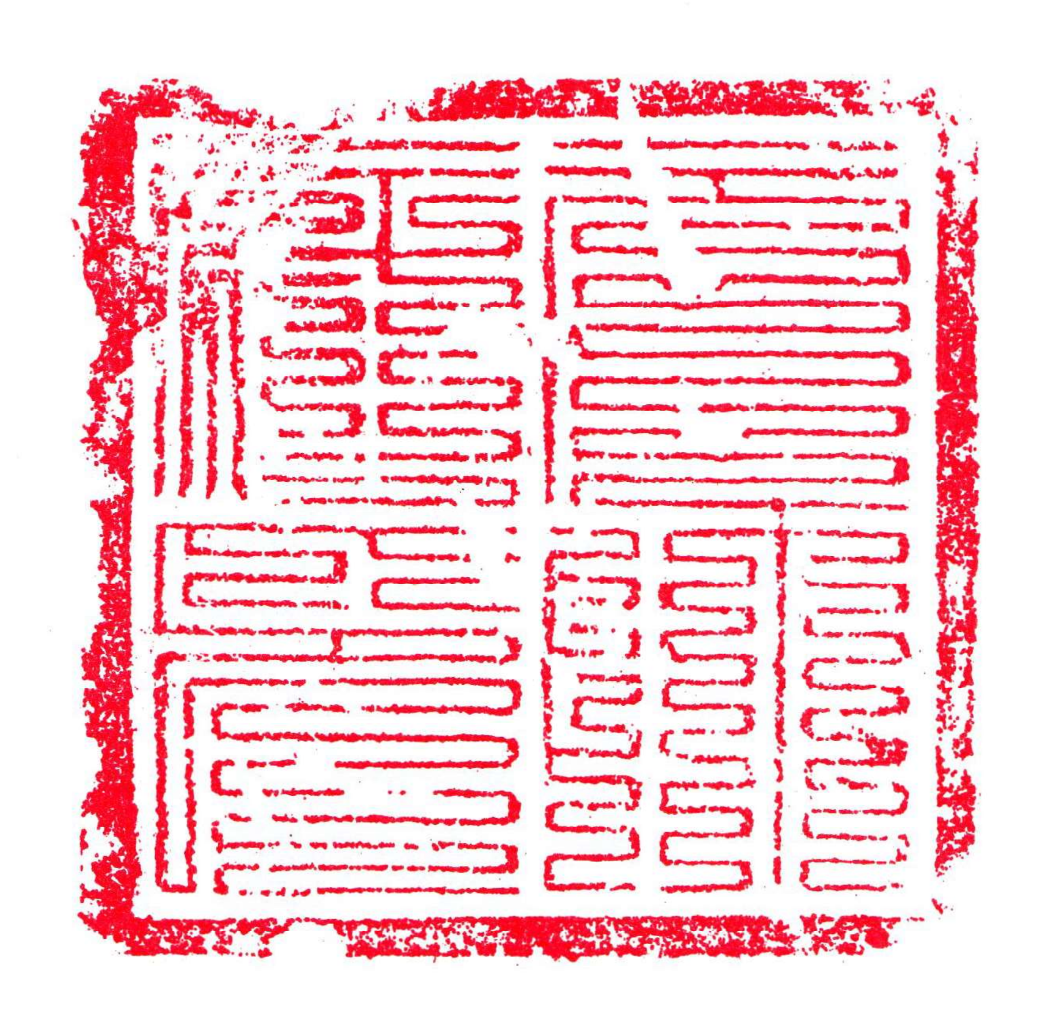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12.7×12.7厘米。藏吉林大學。



174　　元帥府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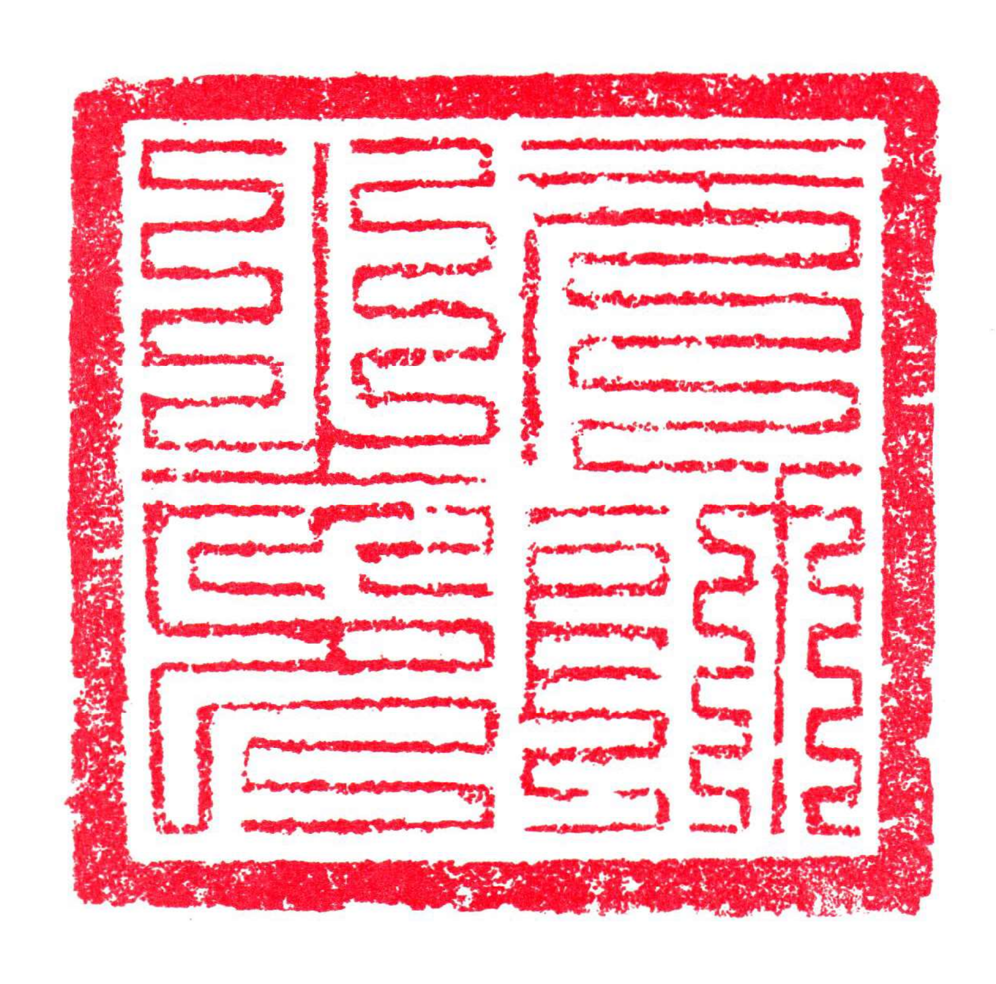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9.3×9.4厘米。

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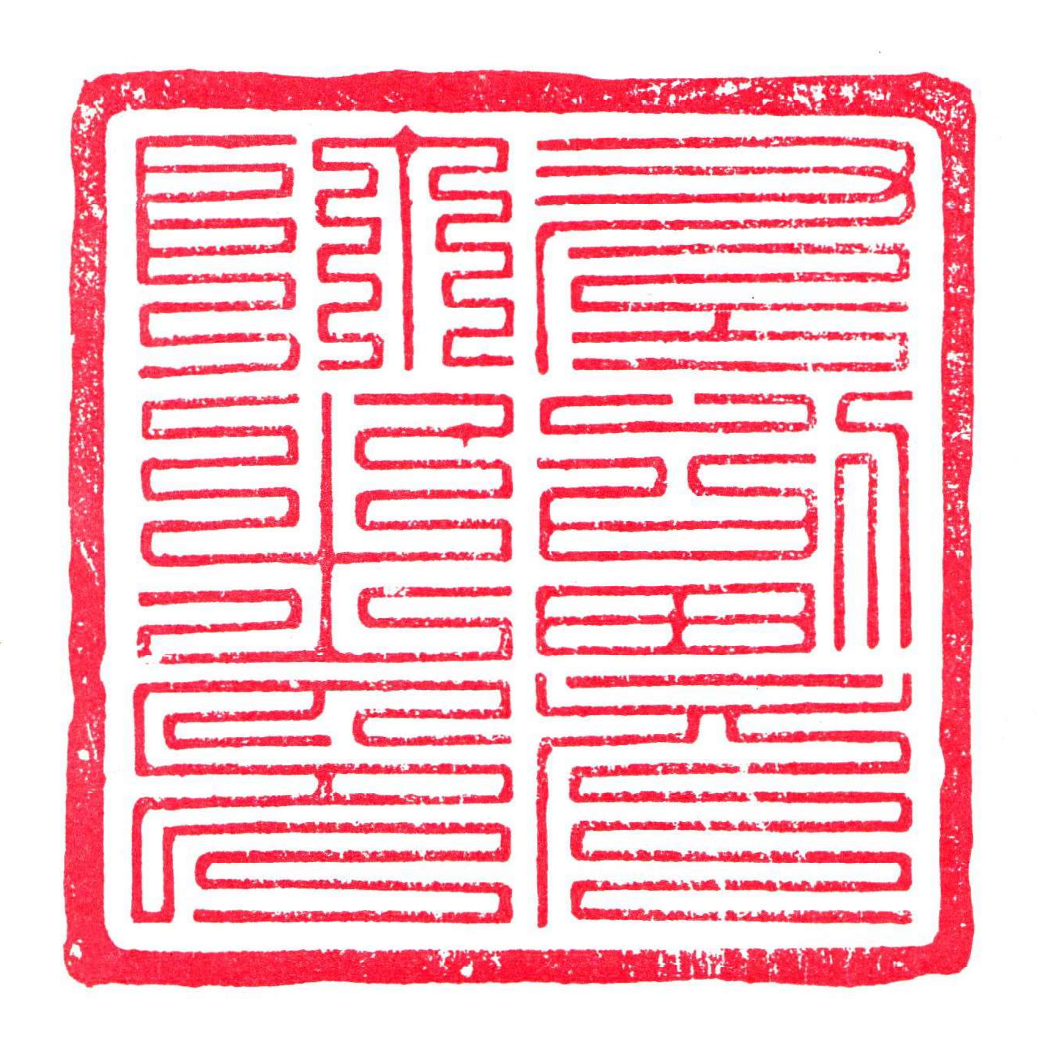
175　**元帥府印**

1964年出土于河北省承德縣。9.4×9.4厘米。紐端刻“上”字。藏河北省博物館。



176　**元帥之印**

1982年發現于山東省陽穀縣。9×9厘米。背刻“元帥之印”。紐端刻“上”字。藏聊城地區文化局。



177　**左副元帥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9.7×9.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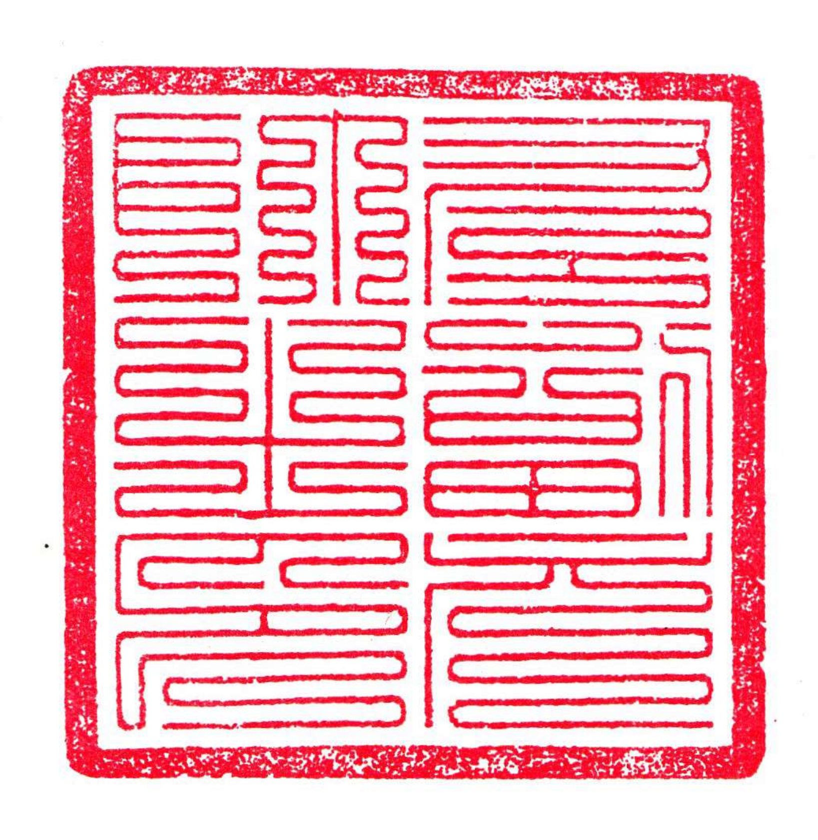
見《金石索》。



178　**左副元帥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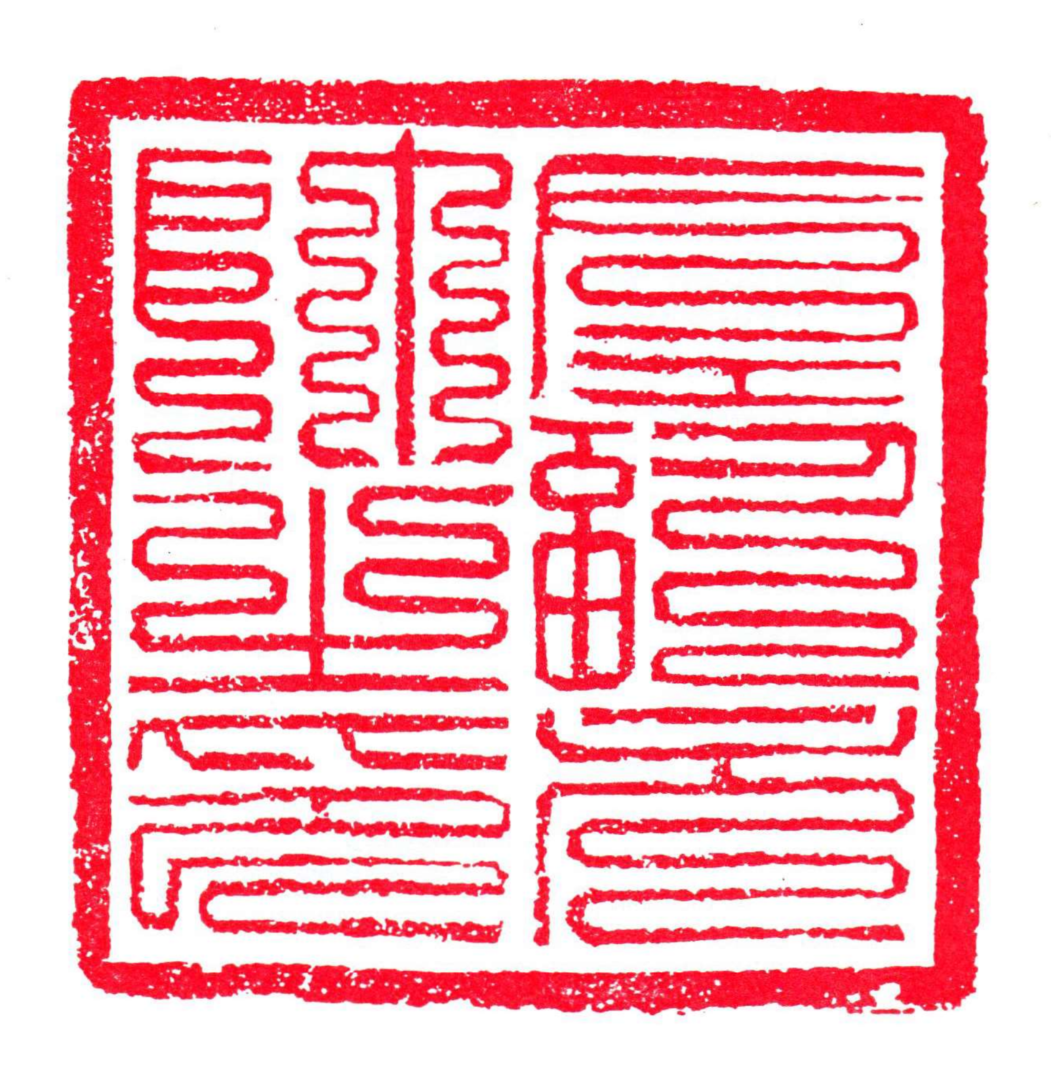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10×10厘米。

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79　　**左副元帥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6×7.5厘米。背刻“天會元年正月行宮禮部造”。見《意園古今官印勼》。按: 天會應爲天興之誤。



180　　左副元帥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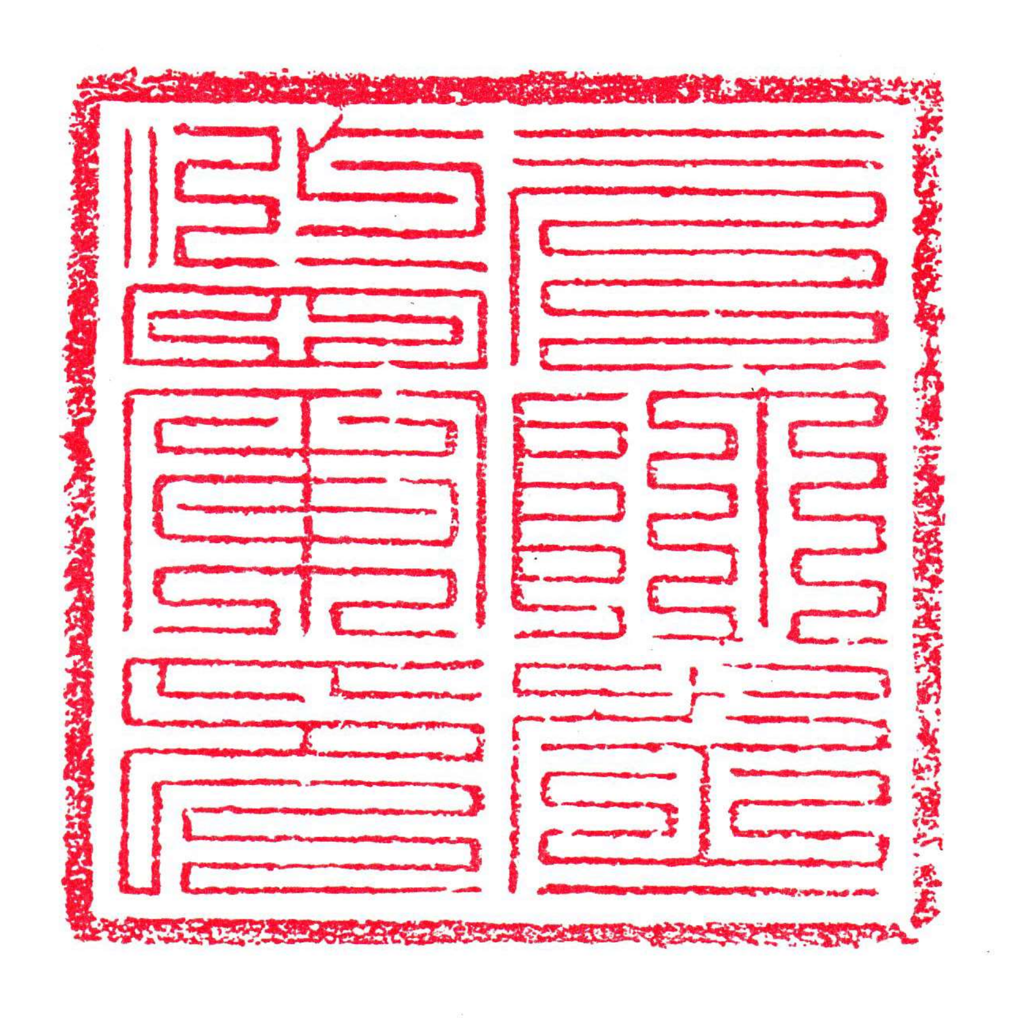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10×10厘米。

藏上海博物館。



181　　元帥左監軍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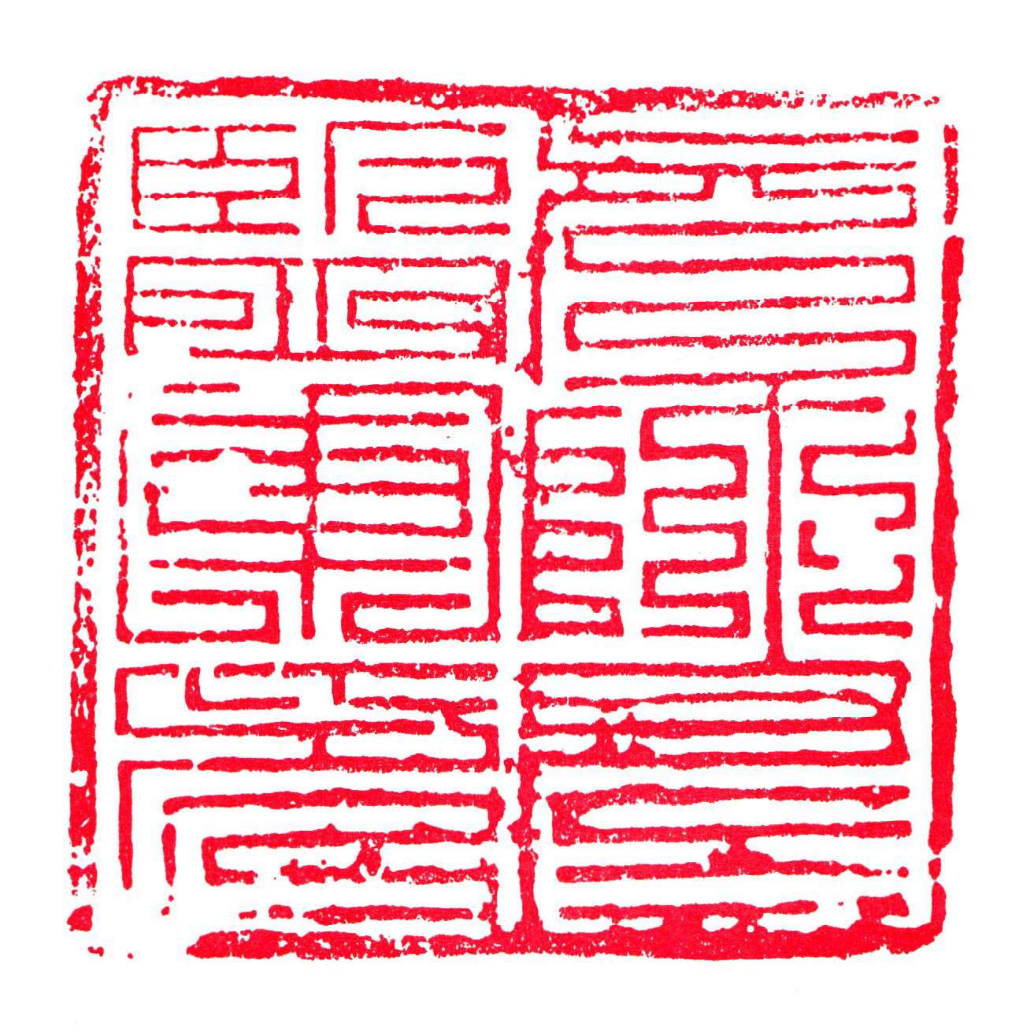
1954年于河北省保定徵集。10×10厘米。紐端刻"上"字。藏河北省博物館。



182　　元帥左監軍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9.2×9.2厘米。

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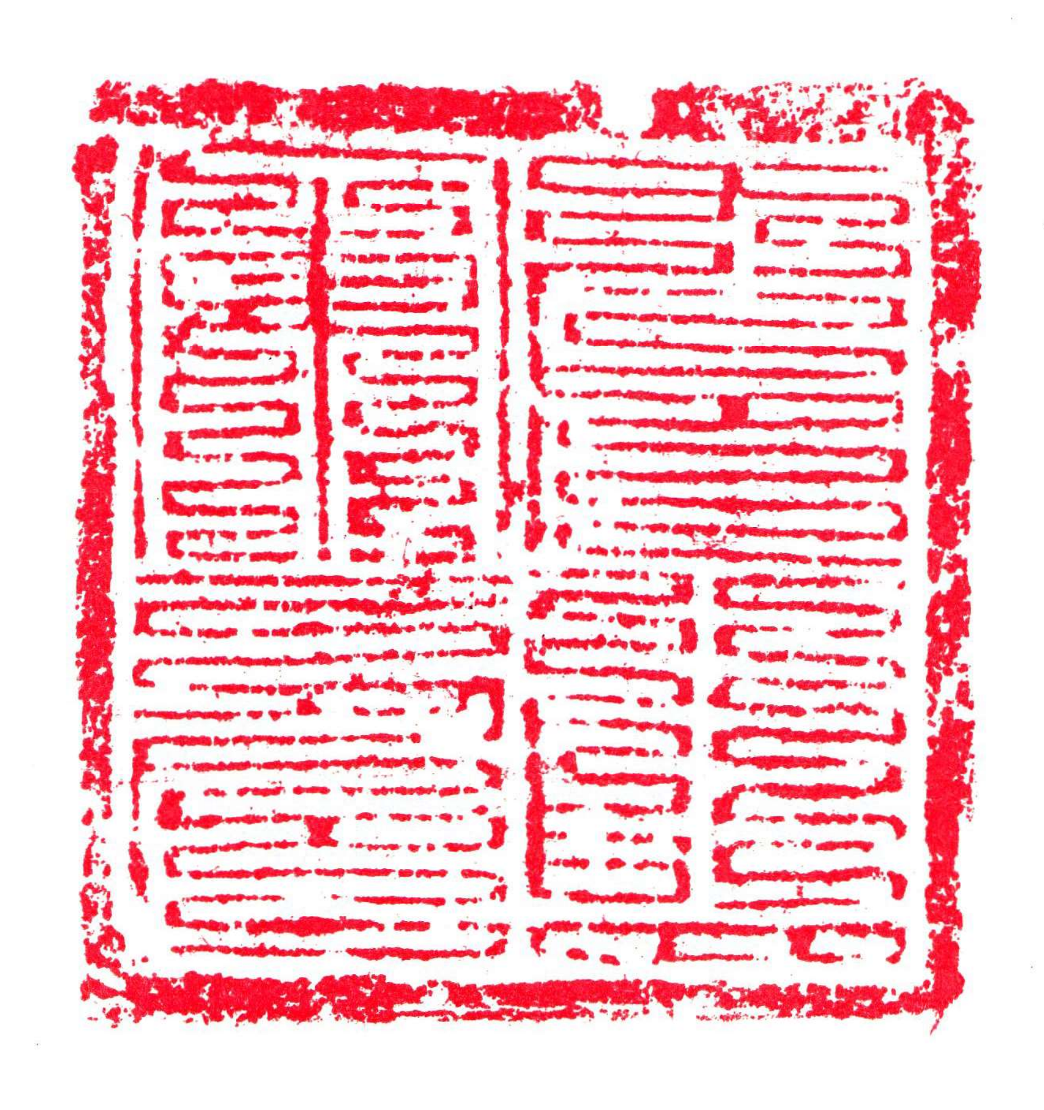
183　　元帥左監軍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9.5×9.5厘米。原藏廬江劉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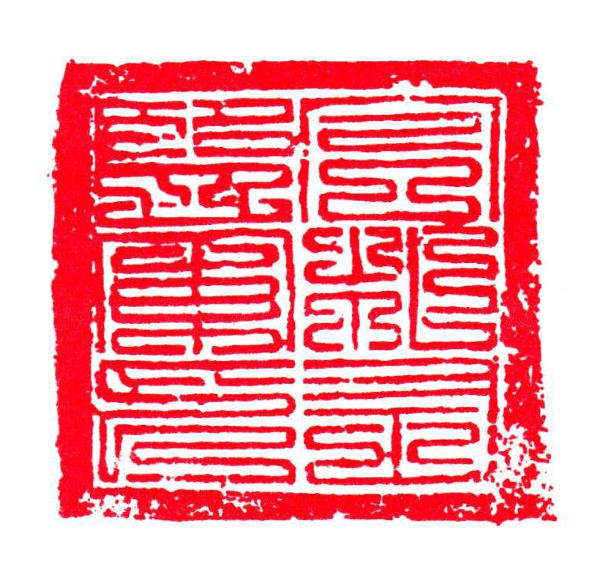
184　元帥左監軍印

1984年春出土于山西省大同。8.2×8.2厘米。紐端刻“上”字。印背刻“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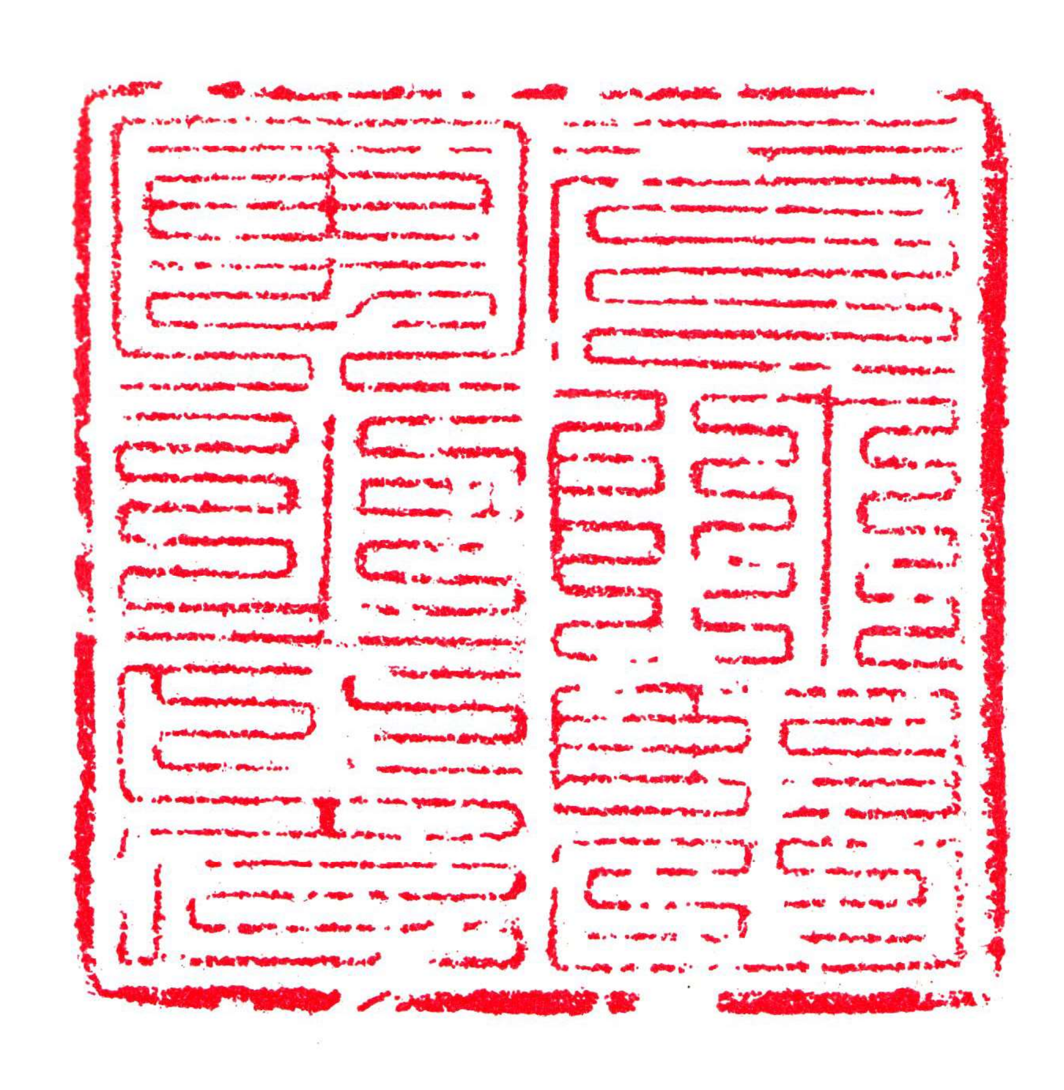
185　　左監軍印

1965年出土于海河中。9.5×9.5厘米。藏河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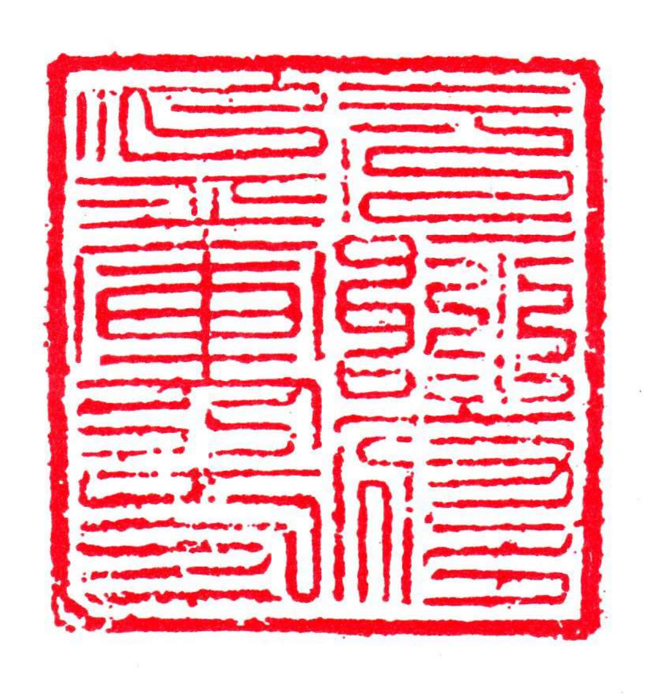
186　　合札左監軍印

1954年于河北省保定徵集。9.8×9.8厘米。背刻“甲申年閏八月日”、“規措所造”。側刻“合札監軍印”。紐端刻“上”字。藏河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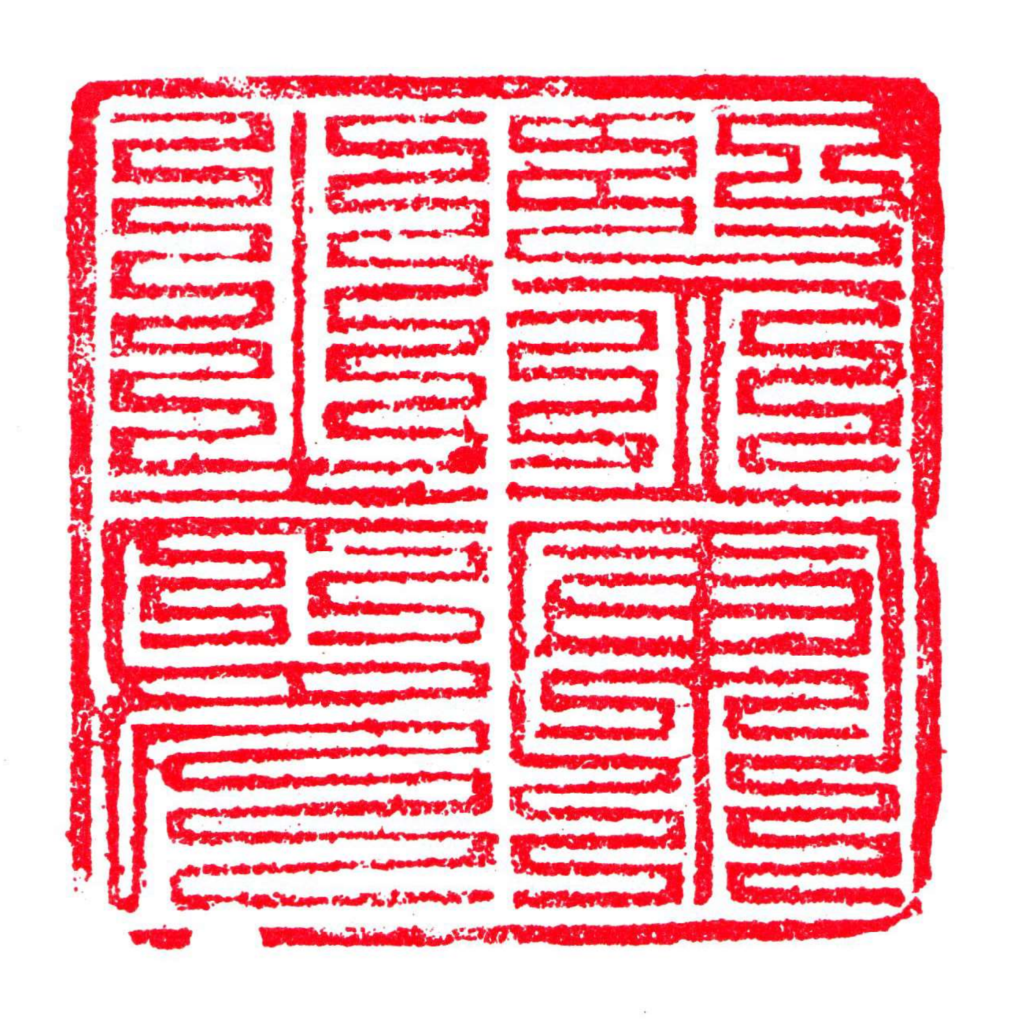
187　　元帥監軍之印

1966年出土于河北省承德。10×10厘米。背刻"元帥監軍之印"。紐端刻"上"字。藏河北省博物館。



188　　元帥府監軍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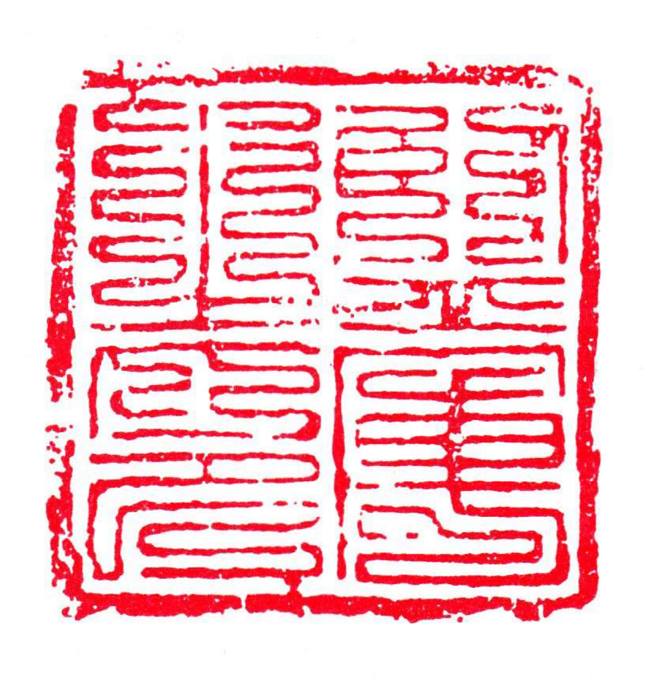
1954年于河北省保定徵集。9.8×9.8厘米。藏河北省博物館。



189　　監軍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9.3×9.3厘米。

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190　監軍之印

解放後從廢品中所得。7.8×7.8厘米。藏河南省文物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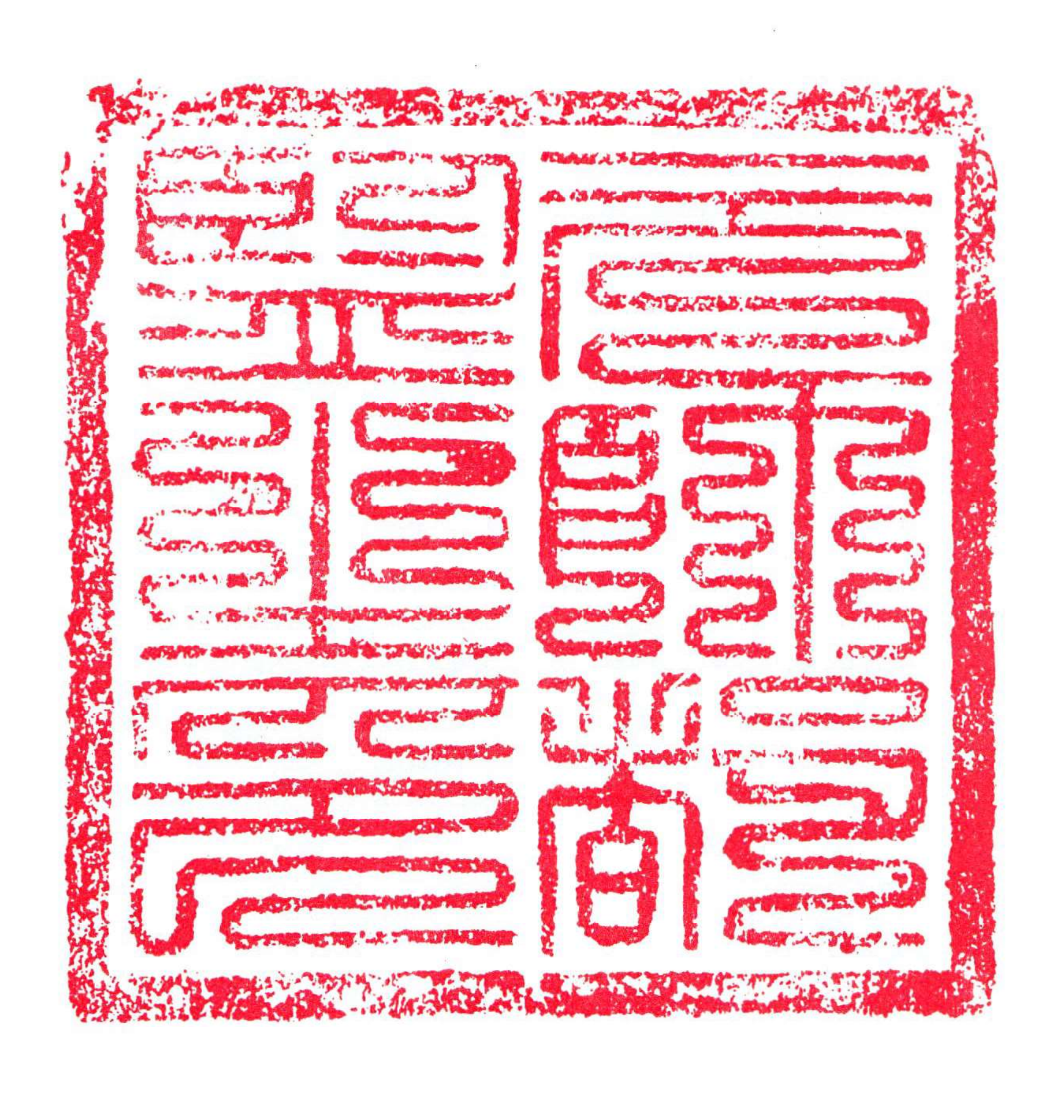
191　元帥府左參謀之印

1957年出土于河北省隆化縣。10×10厘米。背刻“元帥府監軍之印”。紐端刻“上”字。藏河北省博物館。



192　元帥左都監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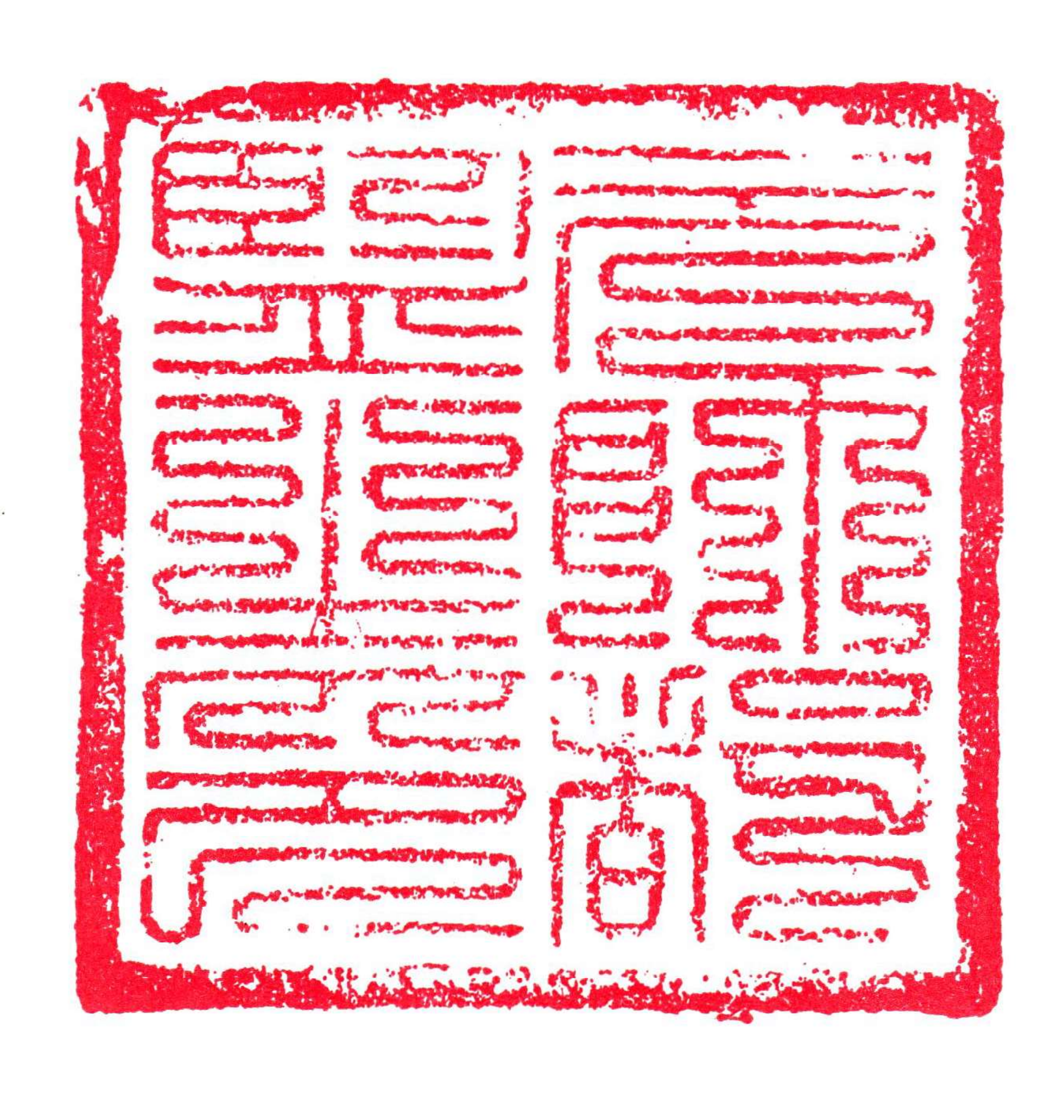
1954年于河北省保定徵集。9×9厘米。紐端刻"上"字。藏河北省博物館。



193　　元帥都監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9.9×10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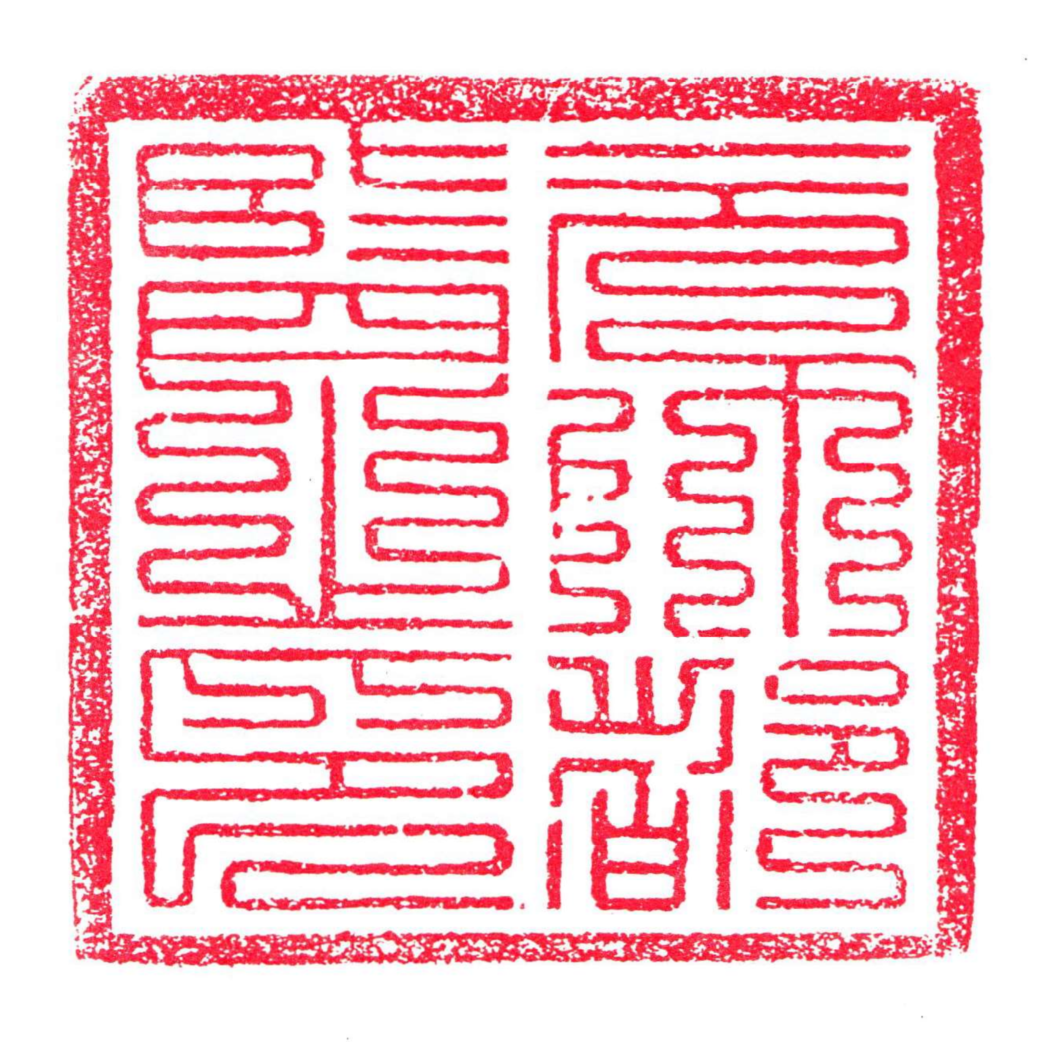
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補遺》。



194　元帥都監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9.9×9.9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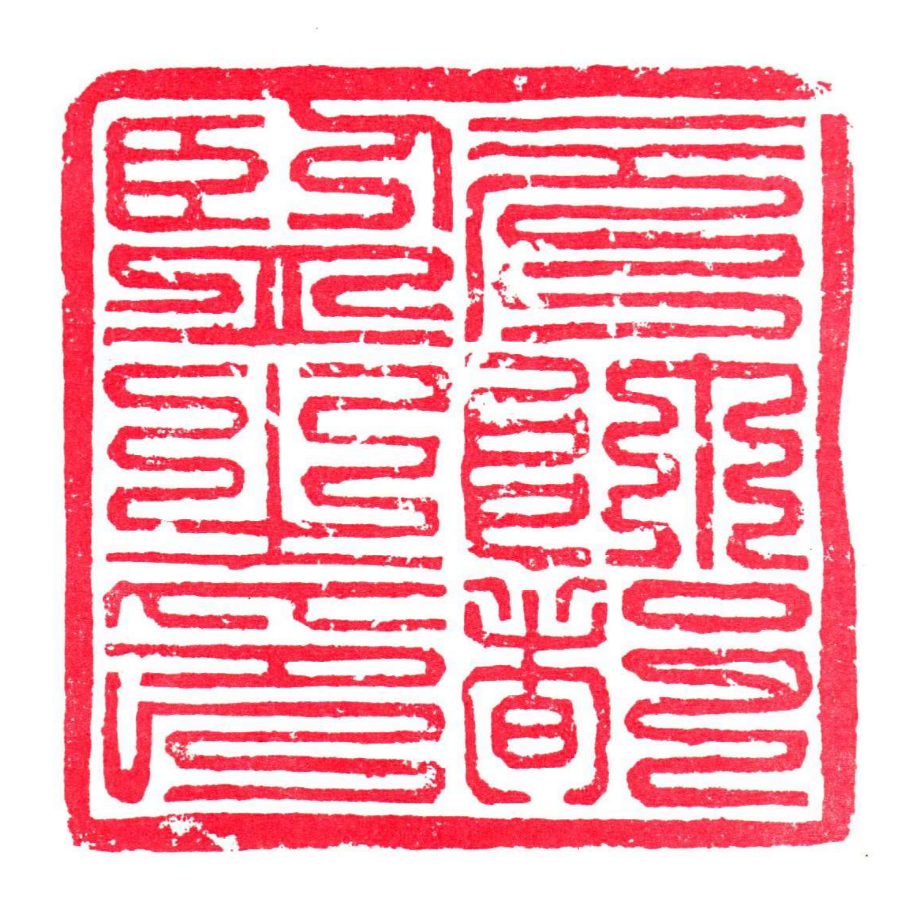
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195　　元帥都監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9.5×9.8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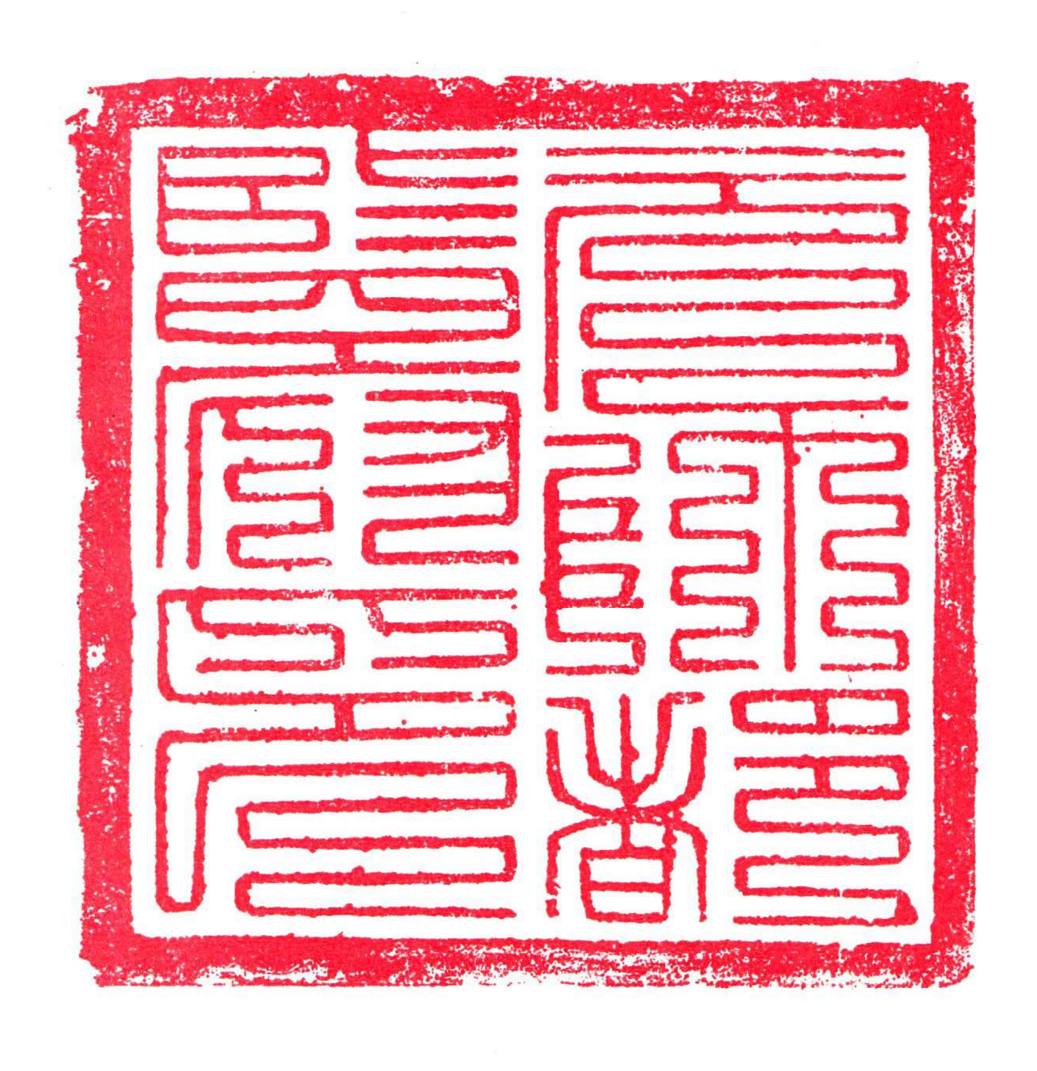
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96　　元帥都監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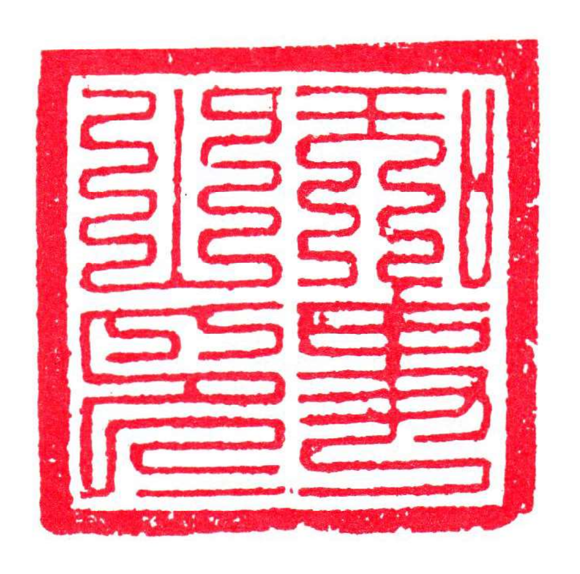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8.5×8.5厘米.

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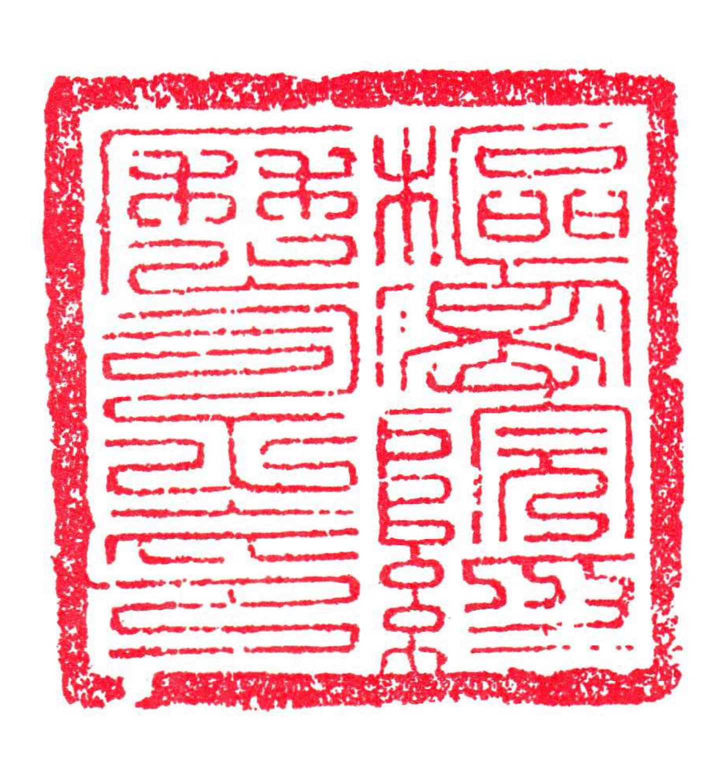
197　**元帥都監府印**

解放後遼寧省朝陽出土。9.7×9.7厘米。藏朝陽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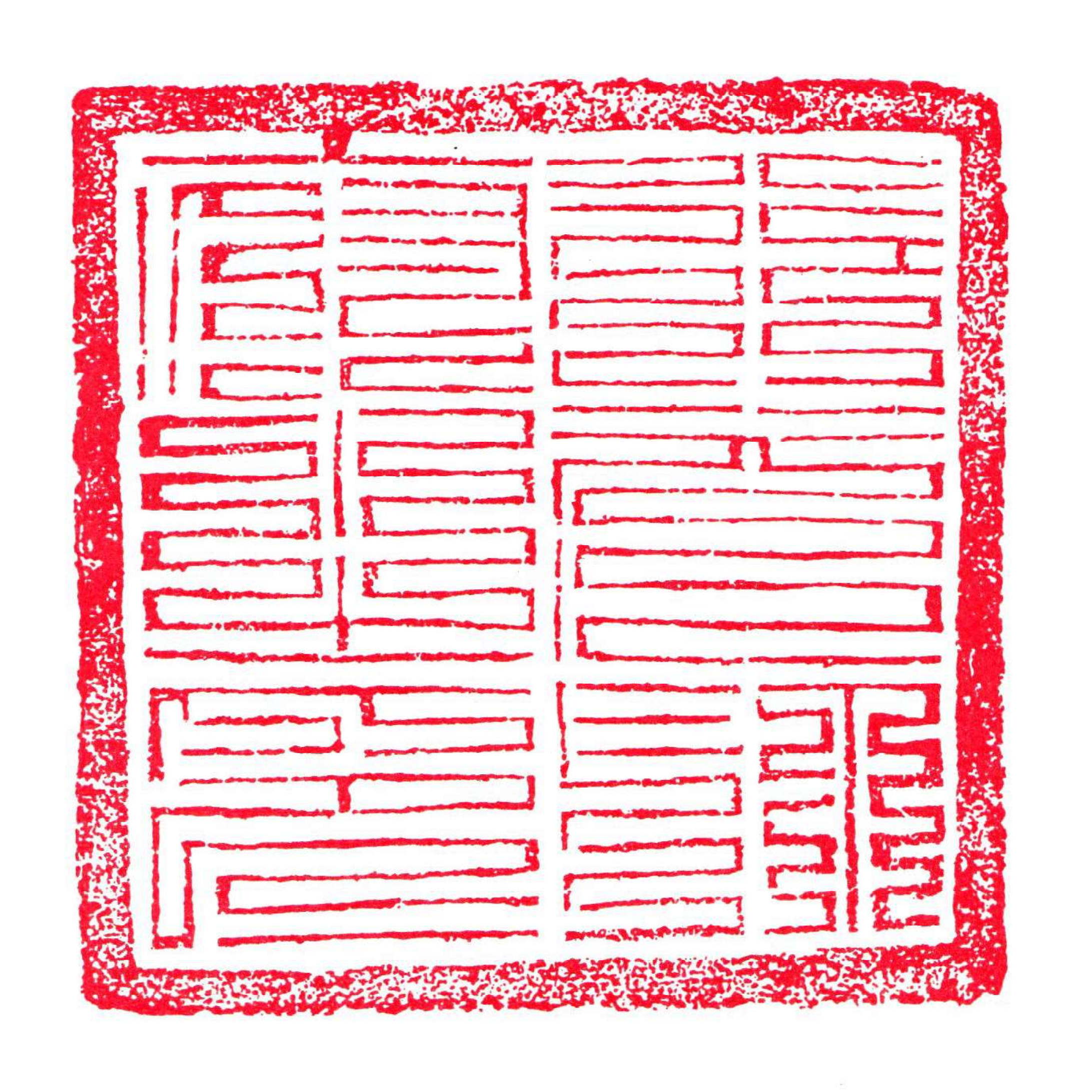
198 知事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3×5.3厘米。背刻“天興元年”、“行部造”。紐端刻“上”字。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199 樞密院經歷司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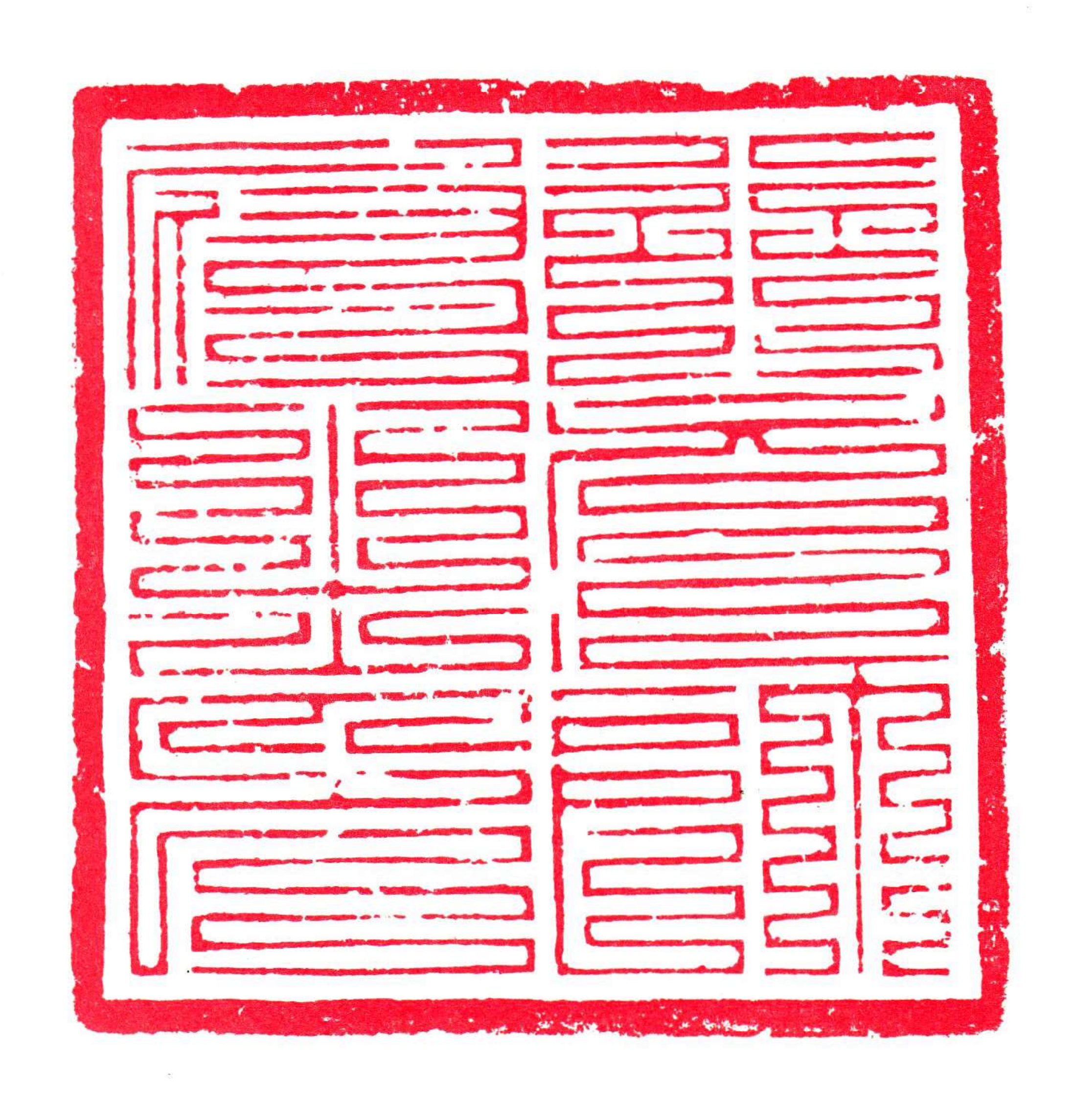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8×6.8厘米。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200　　行元帥府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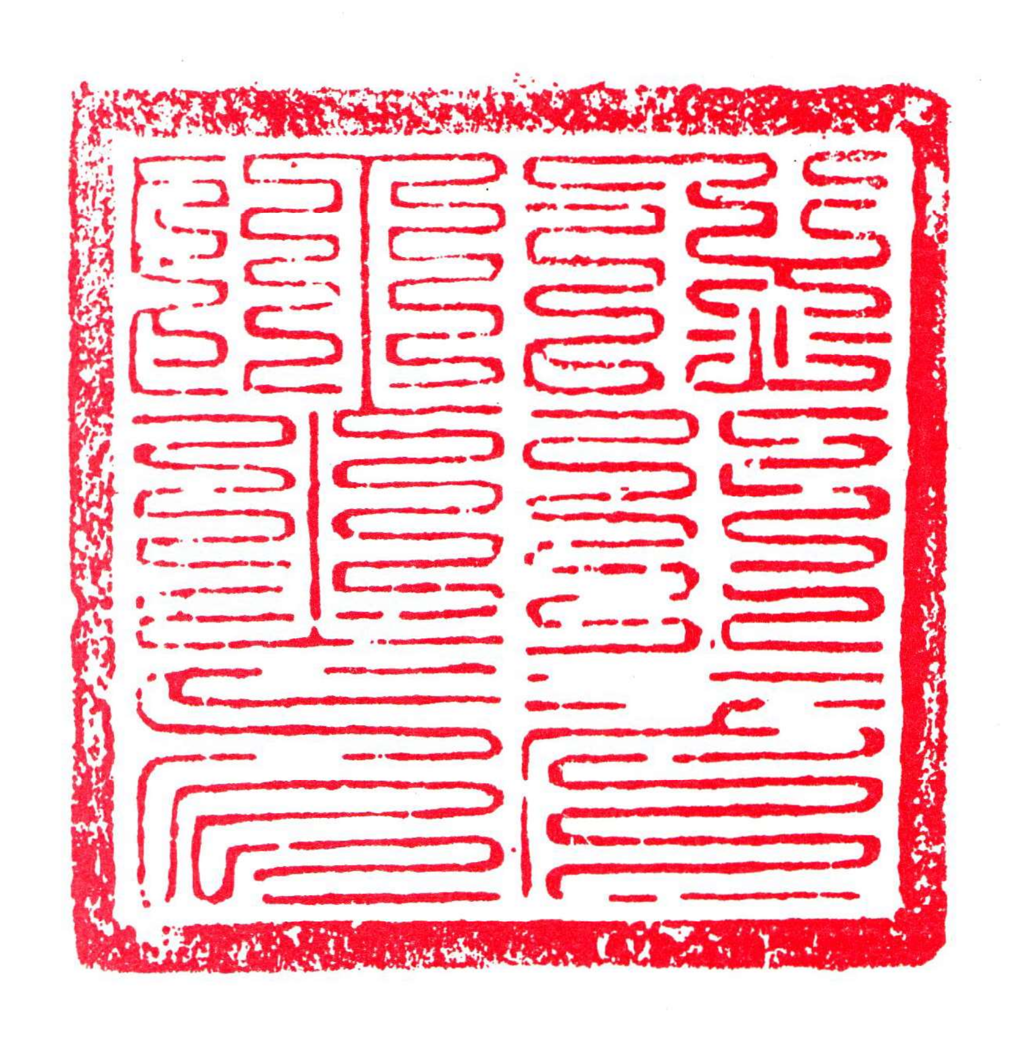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9.9×9.9厘米。

藏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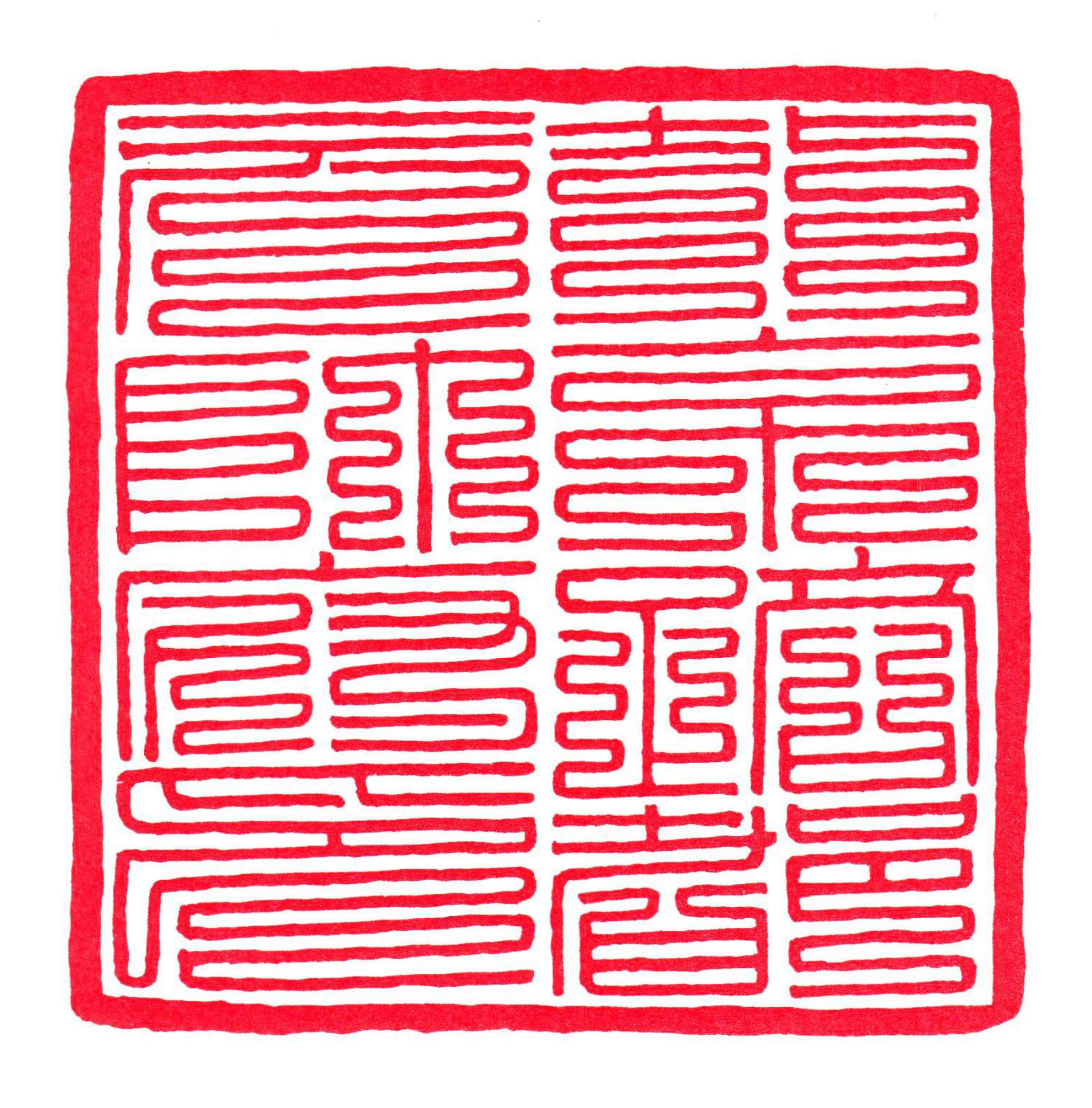
201　　行元帥府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10.4×10.2厘米。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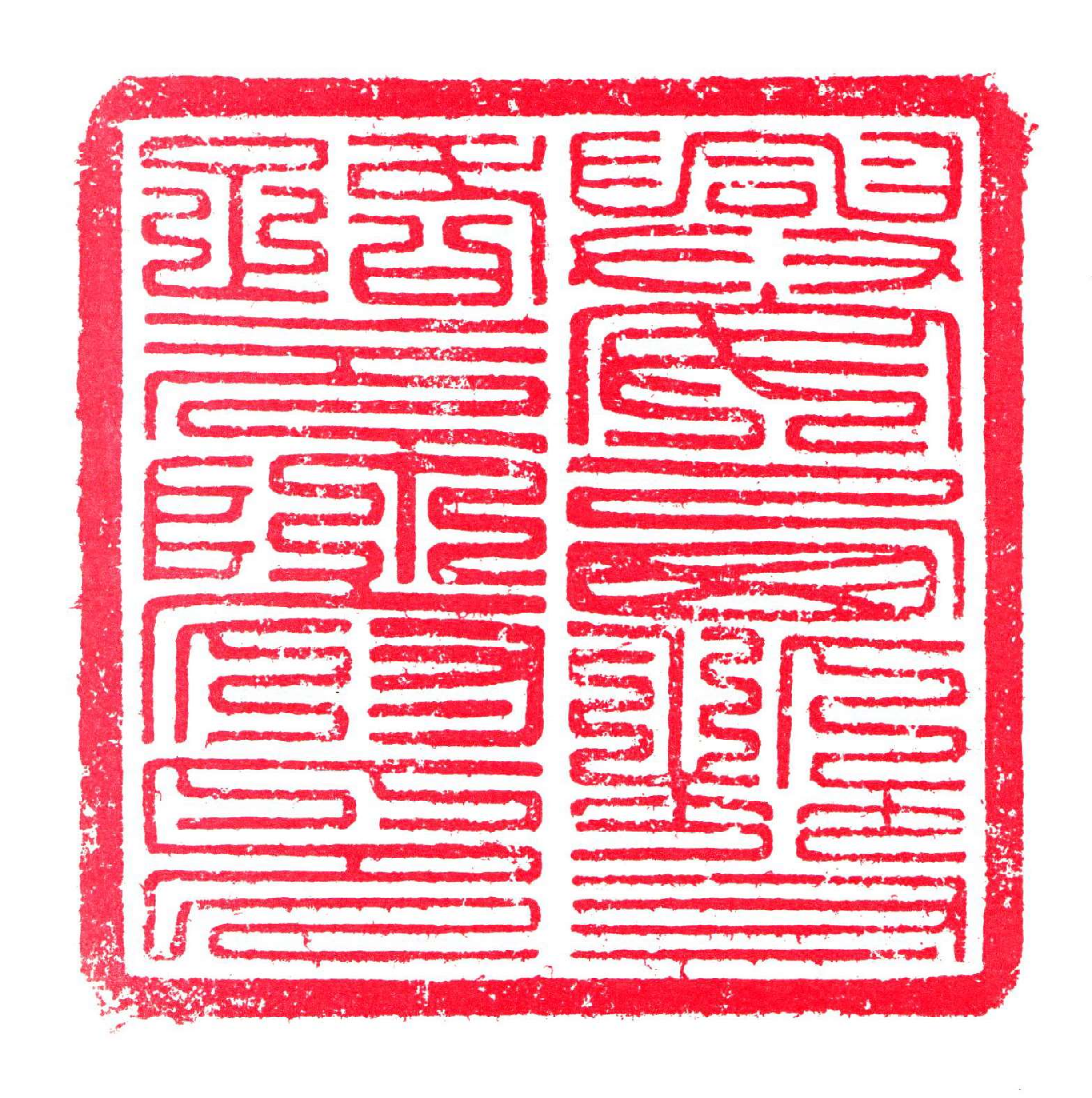
202　　征行元帥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9.4×9.4厘米。原藏廬江劉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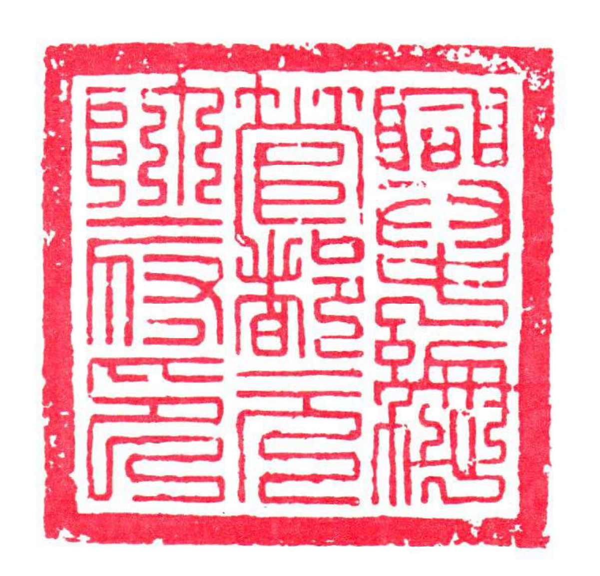
203　　北京路都元帥府印

民國間出土于黑龍江省綏化縣。11.3×11.3厘米。背刻“北京路都元帥府印”、“己卯年七月日鑄”。見《滿洲金石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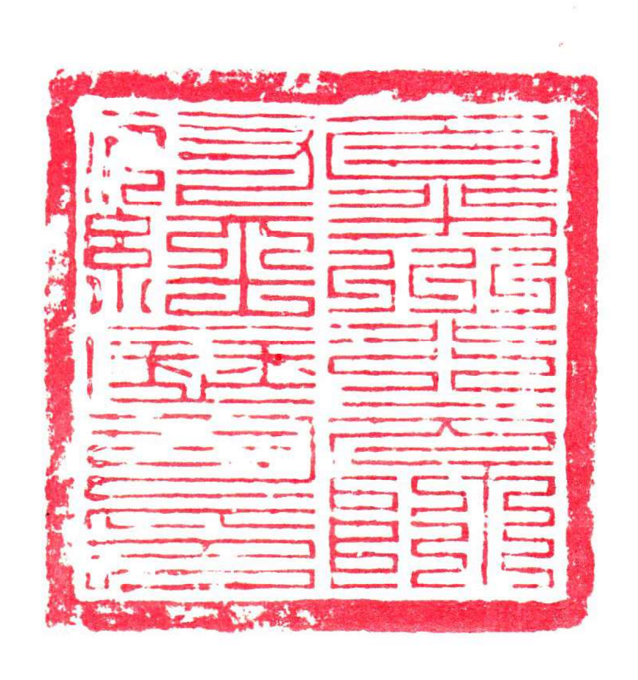
204　　興安西北等路元帥府印

1972年夏出土于河北省隆化縣。11.3×11.3厘米。背刻"興安西北等路元帥府印"。藏河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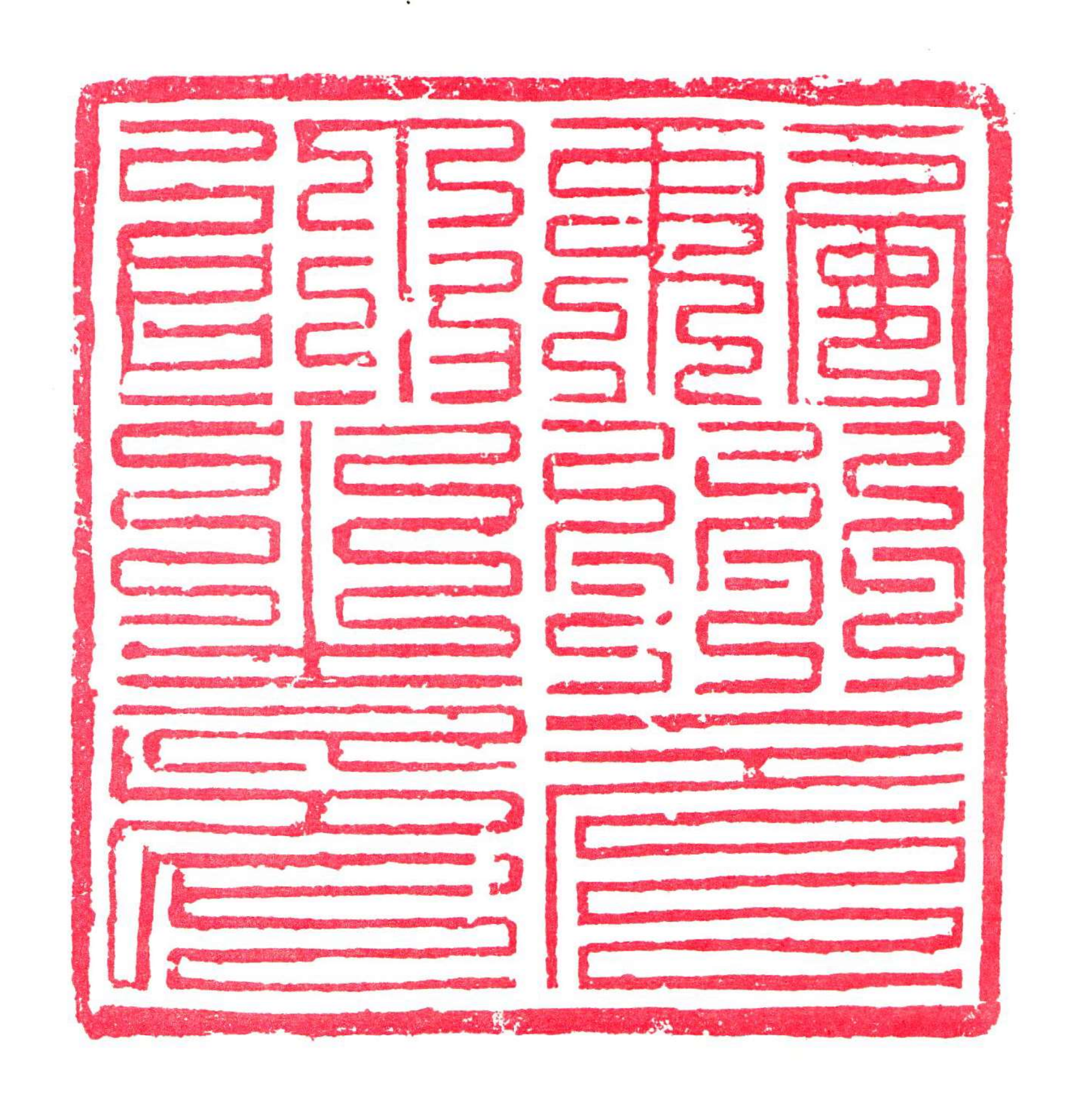
205　　興中總管都元帥府印

1954年于河北省保定徵集。10×10厘米。背刻“規措所造”、“乙酉年十一初一”。側刻“興中總管都元帥府印”。紐端刻“上”字。藏河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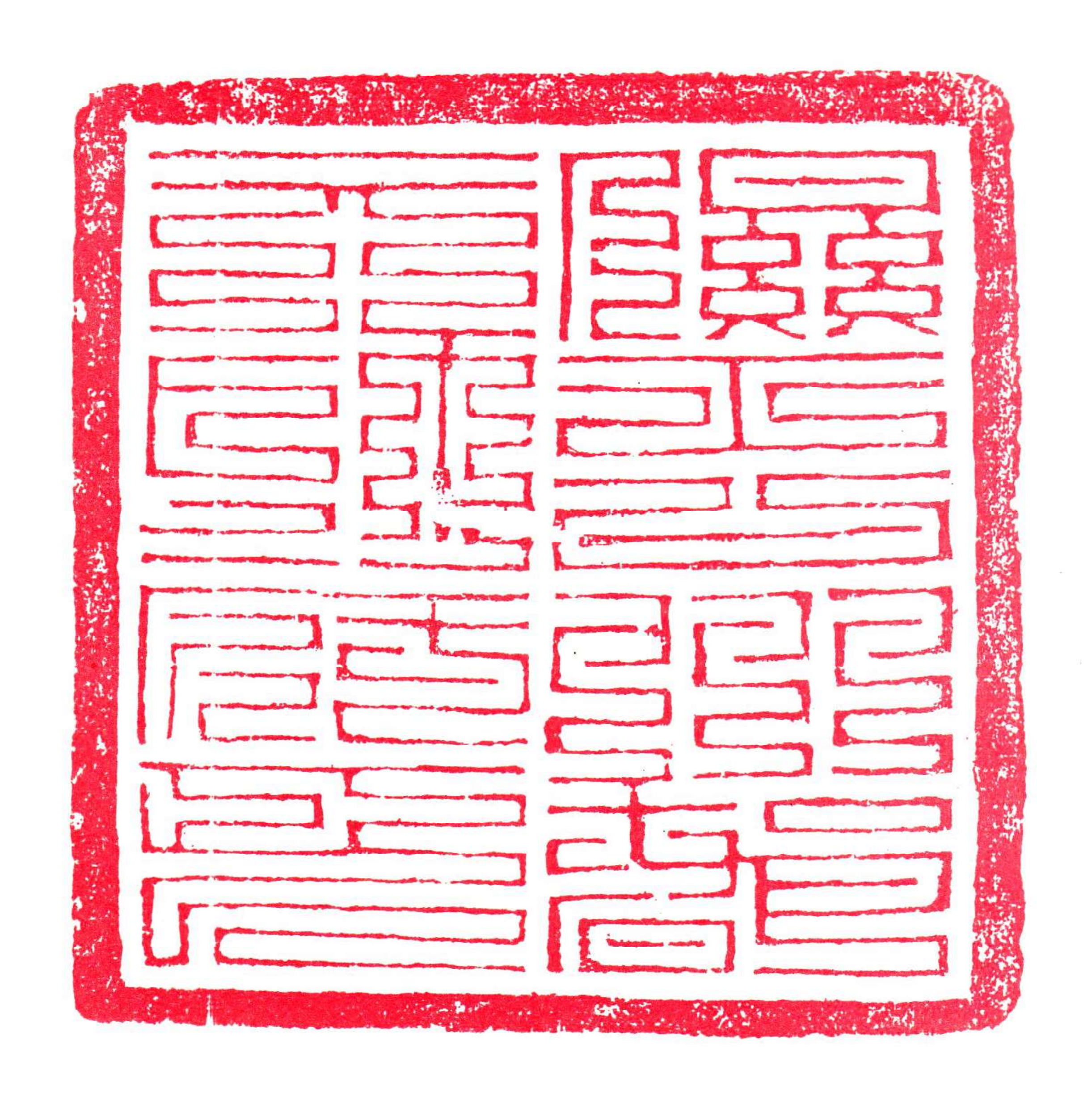
206　　阜州行元帥府經歷司印

近年于山西省昔陽縣徵集。6×6厘米。藏昔陽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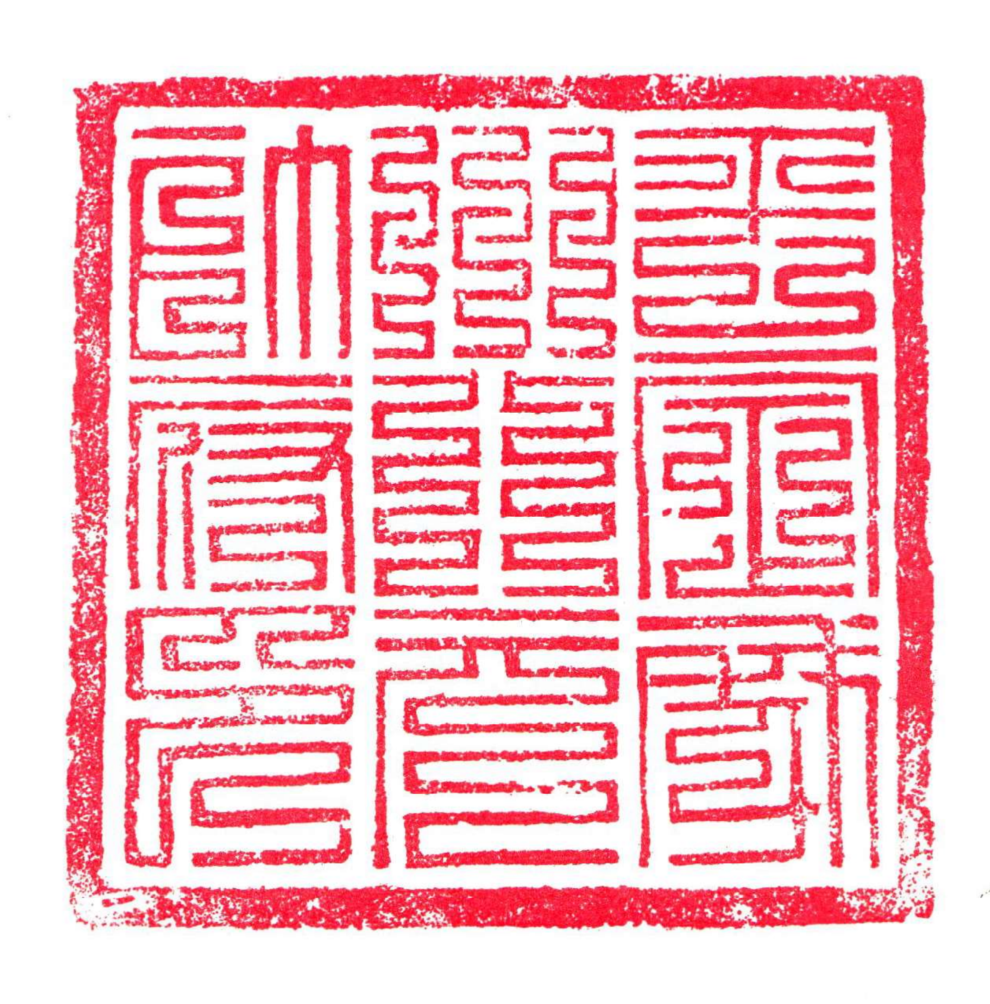
207　　絳州元帥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10.2×10.4厘米。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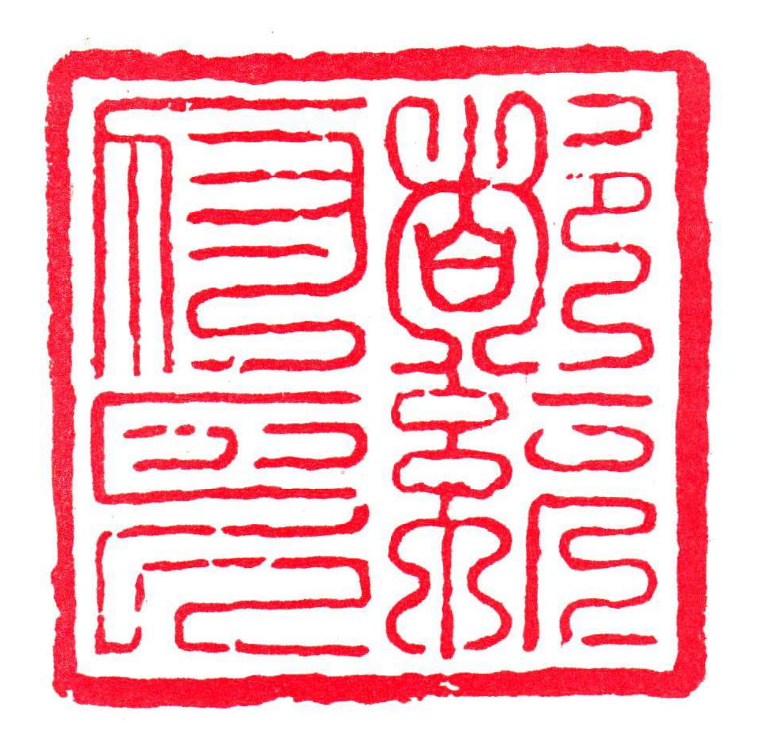
208　**隰吉州都元帥府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11.3×11.3厘米。藏上海博物館。



209　　平定威州行元帥府印

解放後遼寧省朝陽出土。9.1×9.1厘米。藏朝陽市博物館。



210　　都統府印

民國間出土于内蒙古大寧城。7×7厘米。見《東北古印鉤沈》。



211　　山東東路統軍判官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3×6.3厘米。背刻"貞祐二年十月山東行部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212　西北路胡都仏詳穩之印

1980年春出土于内蒙古科左後旗。6.2×6.2厘米。背刻"正隆元年十一月"、"内少府監造"。側刻"西北路胡都仏詳穩印"。紐端刻"上"字。藏内蒙古考古研究所。



213　西北路霞歷仏麽胡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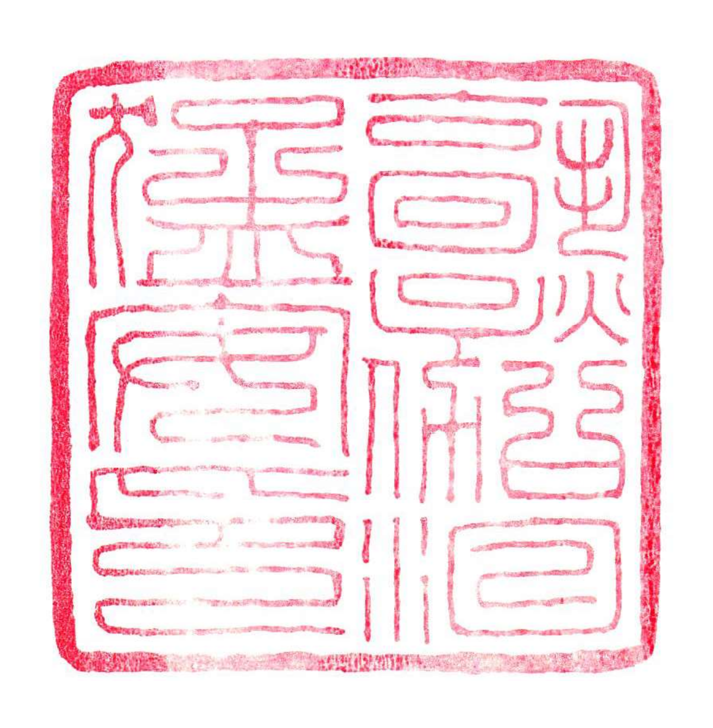
1980年出土于内蒙古科左中旗。4.6×4.6厘米。背刻"正隆元年九月"、"内少府監造"。側刻"西北路霞歷仏麽胡記"。紐端刻"上"字。藏内蒙古考古研究所。



214　西北路蘇母典仏麽胡記

1988年6月發現于内蒙古開魯縣。4.4×4.4厘米。背刻"正隆元年九月"、"内少府監造"。側刻"西北路蘇母典仏麽胡記"。藏哲里木盟博物館。

猛安謀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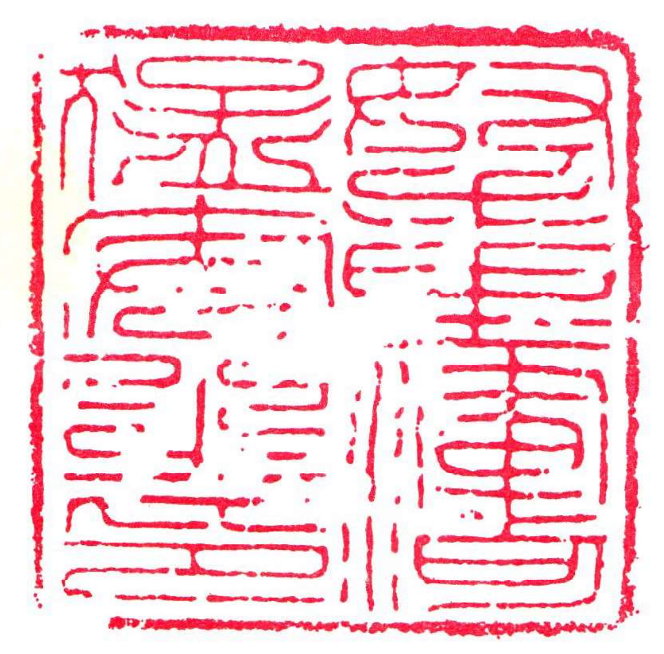
215　**熟伽泊猛安印**

清末出土于黑龍江省五常縣。6.5×6.4厘米。背刻“正隆元年十月”、“内少府監造”。側刻“熟伽泊猛安印”。見《東北古印鉤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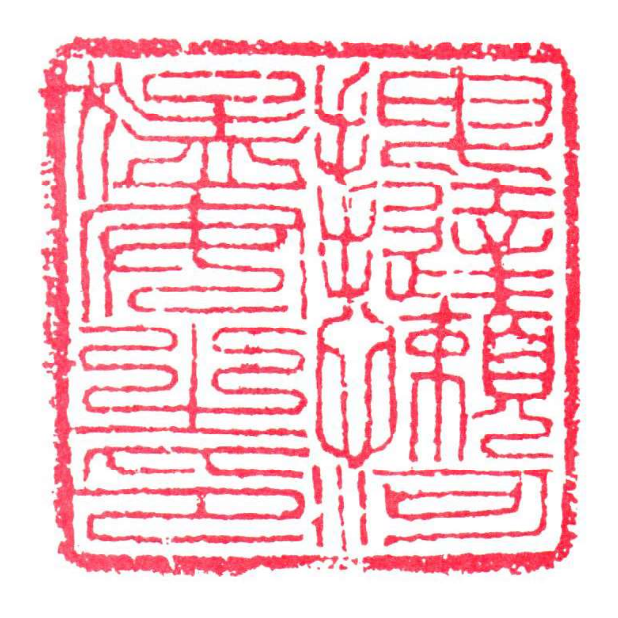
216　　**熟吉泊猛安印**

解放後吉林省九臺縣出土。6.4×6.4厘米。背刻“熟吉泊千戶印”、“貞祐二年”。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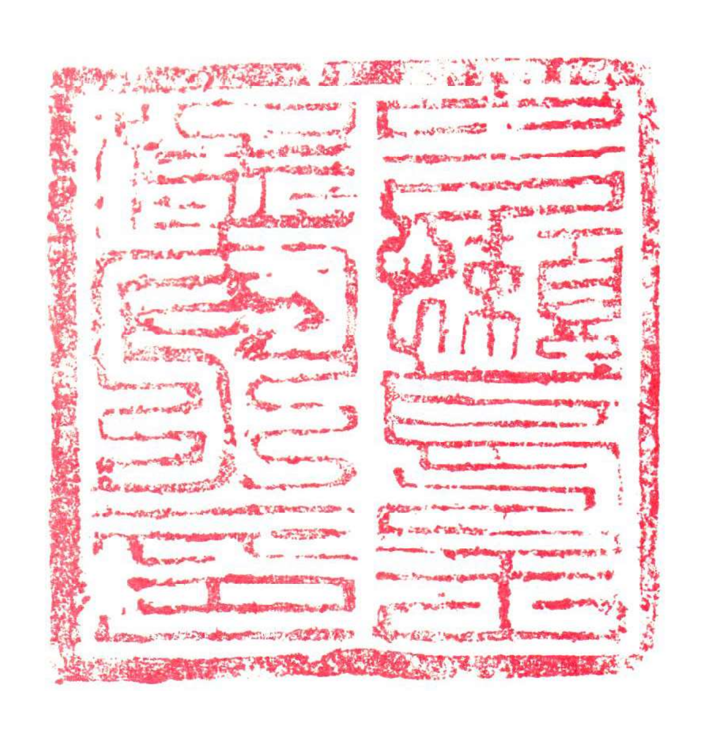
217　　**孥里渾河猛安之印**

解放後吉林省安圖縣出土。6.8×6.8厘米。背刻“正隆元年十一月内少府監造”。側刻“孥里渾河猛安印”。藏吉林省博物館。



218　**搜撻懶河猛安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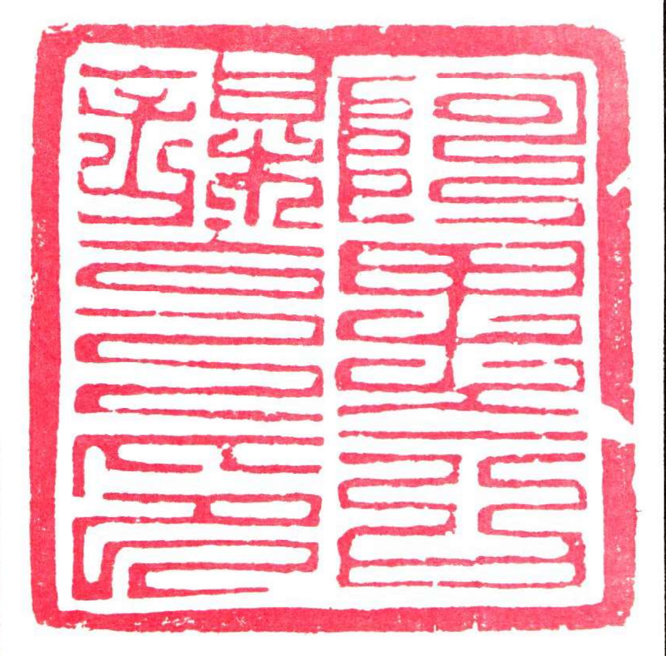
近年出土于吉林省九臺縣。6.5×6.5厘米。背刻“正隆元年十一月内少府監造”。側刻“搜撻懶河猛安印”。紐端刻“上”字。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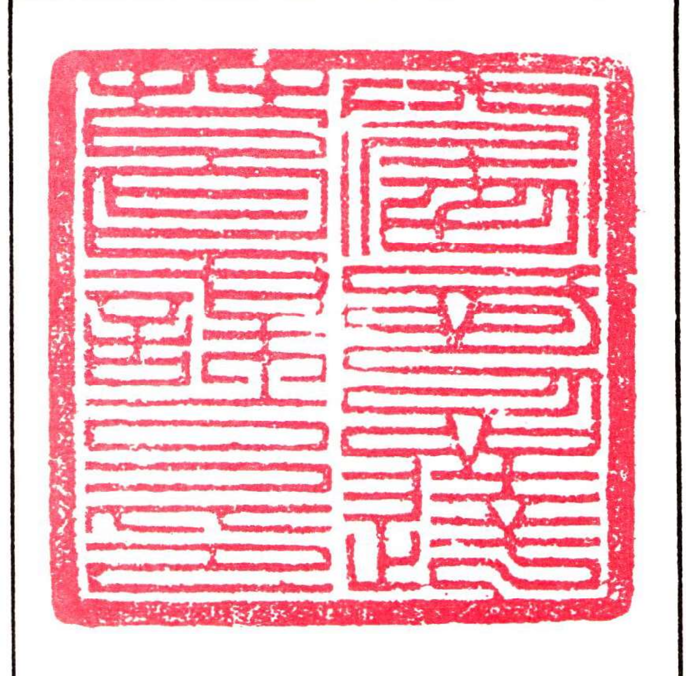
219　**合懶烏主猛安印**

解放後發現于長春市。6.5×6.5厘米。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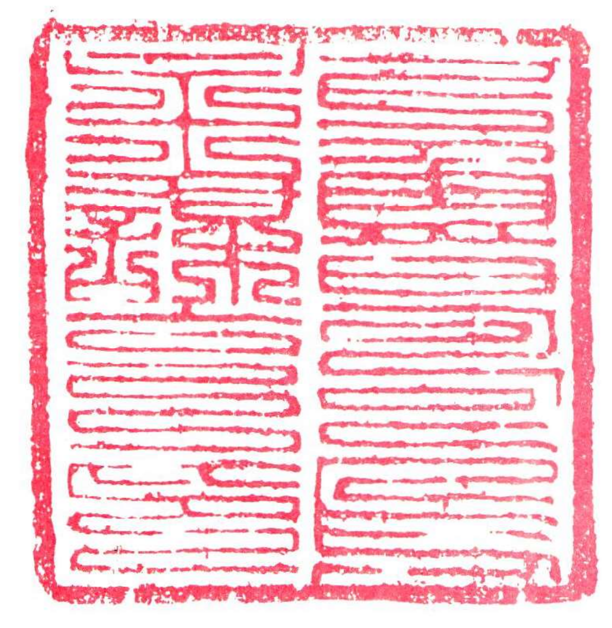
220　　**阿里合謀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5厘米。背刻“天眷七年三月少府監造”。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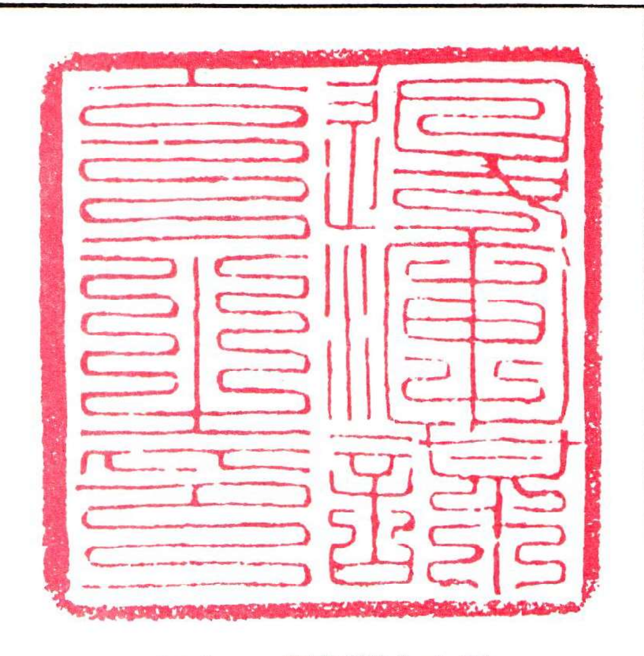
221　　**家式忍達葛謀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1×6.3厘米。背刻“正隆五年六月尚書禮部造”。見《意園古今官印匀》。



222　　**卜魯哥烏主謀克印**

1978年12月于吉林省扶餘縣徵集。6×6厘米。背刻“大定六年七月”、“少府監造”。側刻“卜魯哥烏主謀克印”、“□黑烏□□猛安下”。紐端刻“上”字。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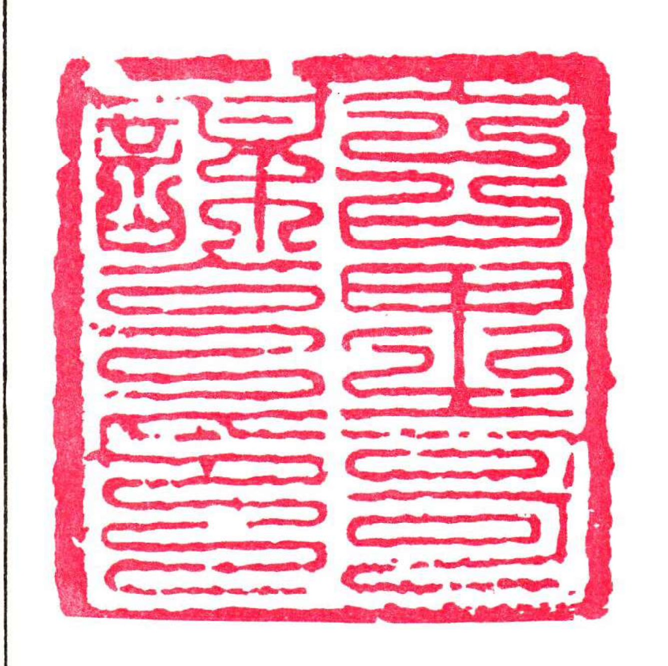
223　　**退渾謀克之印**

1982年出土于吉林省扶餘縣。6×6厘米。背刻“大定九年七月”、“少府監造”。側刻“退渾謀克之印”、“系必剌海都猛安下”。紐端刻“上”字。藏扶餘縣展覽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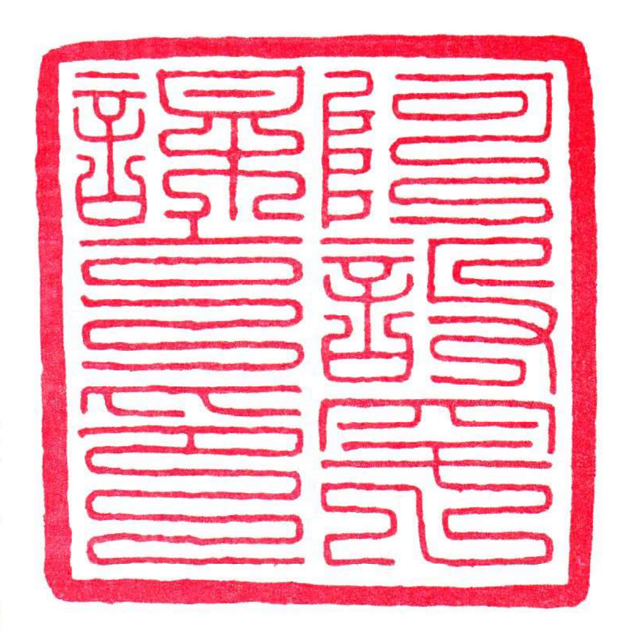
224　　**唵母思和拙謀克印**

解放後吉林省九臺縣出土。6×6厘米。背刻“大定九年七月”、“少府監造”。側刻“唵母思和拙謀克印”、“系宋闍江猛安下”。紐端刻“上”字。藏吉林省博物館。



225　　**合里哥謀克印**

民國間出土于吉林省西安縣(今遼源市)。6×6厘米。背刻“大定九年八月少府監造”。原藏西安縣政府。見《東北古印鉤沈》。



226　　**阿設罕謀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1厘米。側刻“大定九年九月”、“□鉢右猛案”。藏遼寧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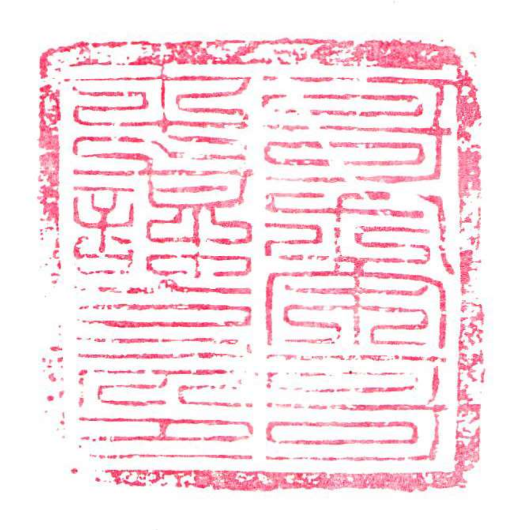
227　　**黃蠢謀克之印**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出土于朝鮮境内滿浦。6×6厘米。背刻“大定九年九月少府監造”、“系圖魯屋猛安下”。原藏輯安尹傳家(達夫)。見《東北古印鉤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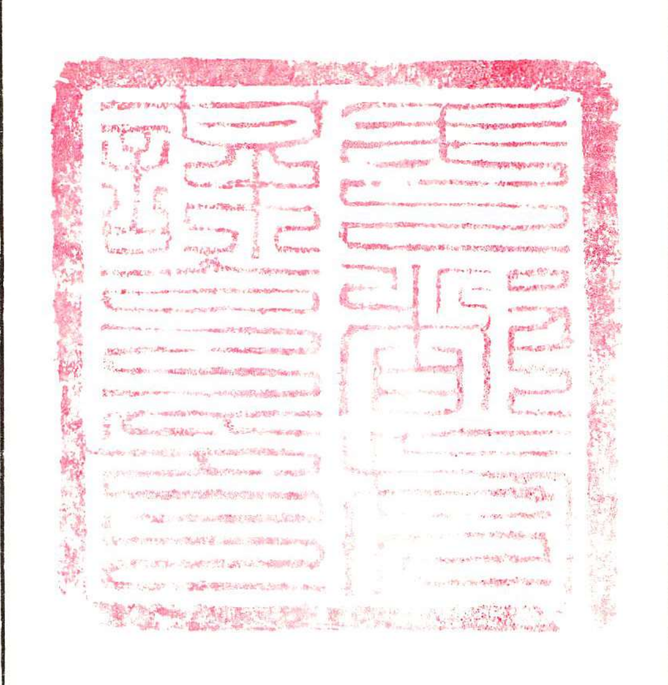
228　**多厇擱山謀克之印**

1957年出土于内蒙古奈曼旗。背刻“大定十年玉五月”、“少府監造”。側刻“多厇擱山謀克之印”。藏内蒙古自治區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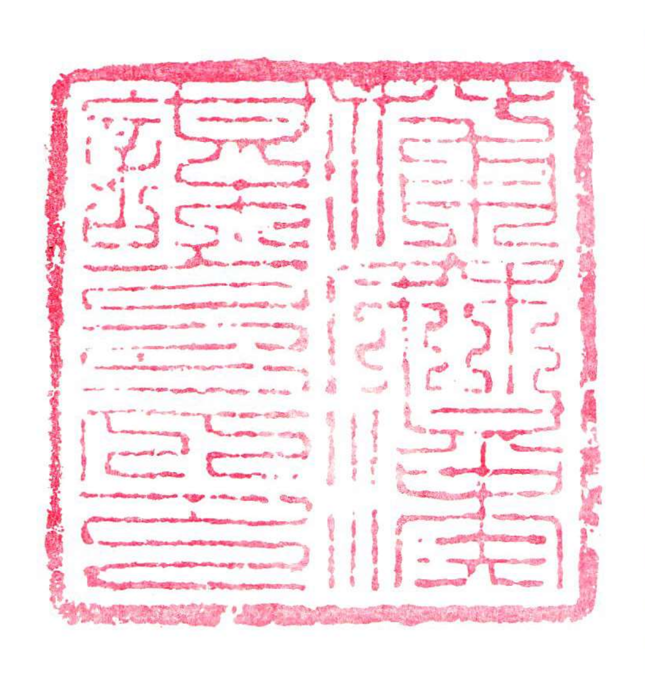
229　**哥扎宋哥屯謀克印**

1977年3月出土于黑龍江省依蘭縣。6.6×6.6厘米。背刻“大定十年五月”、“少府監造”。側刻“哥扎宋哥屯謀克印”、“系宋哥屯猛安下”。藏依蘭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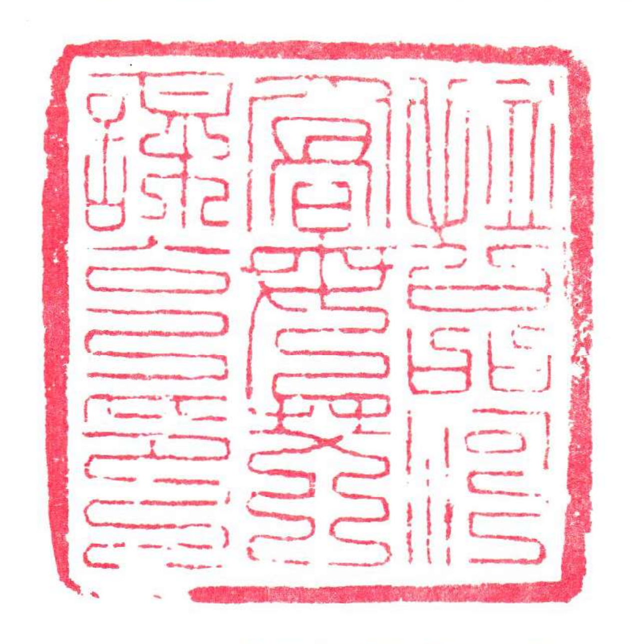
230　**毛都虎謀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1×6.1厘米。背刻“大定十年五月少府監造”。側刻“系胡魯失懶猛安下”、“毛都虎謀克印”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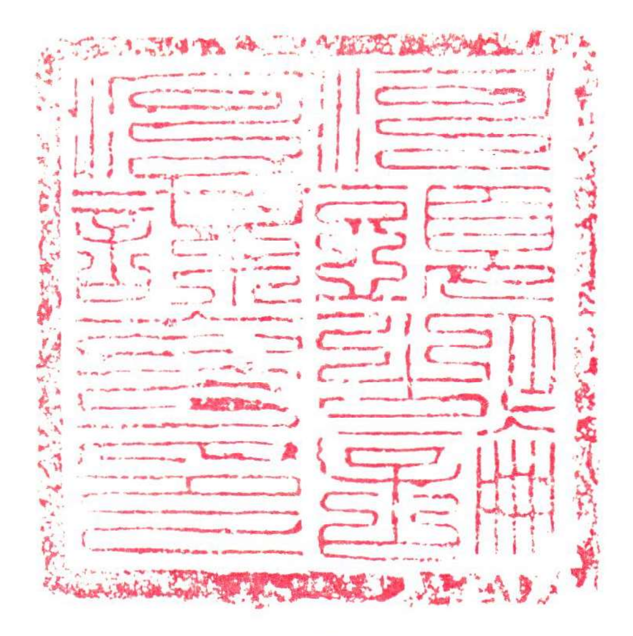
231　**蒲麻漢謀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厘米。背刻“大定十年五月少府監造”。側刻“蒲麻漢謀克印”、“系宋葛屯猛安下”。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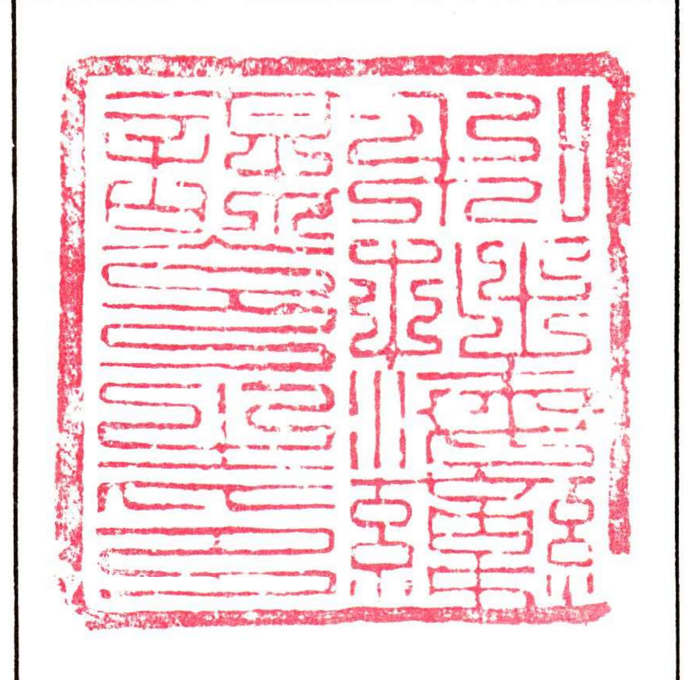
232　**恤品河窩母艾謀克印**

1973年1月于黑龍江省嘉蔭縣徵集。5.7×5.7厘米。背刻“大定十年六月”、“少府監造”。側刻“恤品河窩母艾謀克印”、“系重吉猛安下”。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233　**河頭胡論河謀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厘米。背刻“大定十六年四月禮部造”。側刻“納河術阿速猛安下”。又有女真字一行八字。見《藝林月刊》第五十三期。藏天津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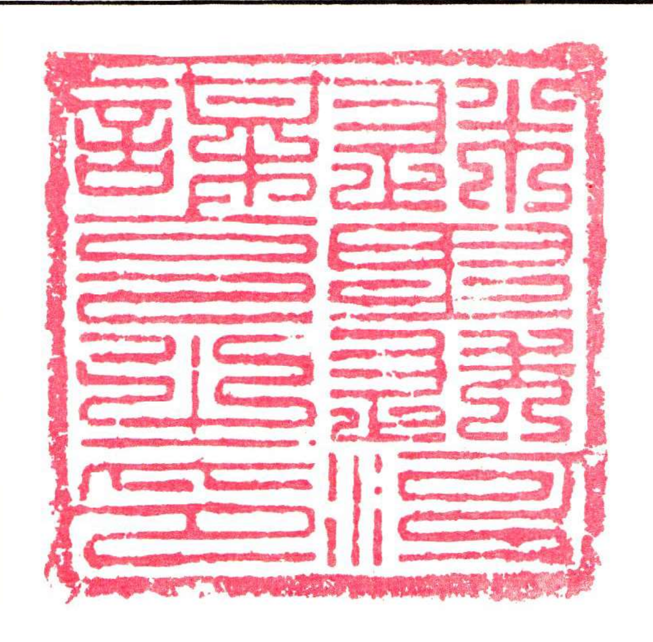
234　**和拙海欒謀克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1×6.1厘米。背刻“大定十八年禮部造”。側刻女真文一行十二字。藏天津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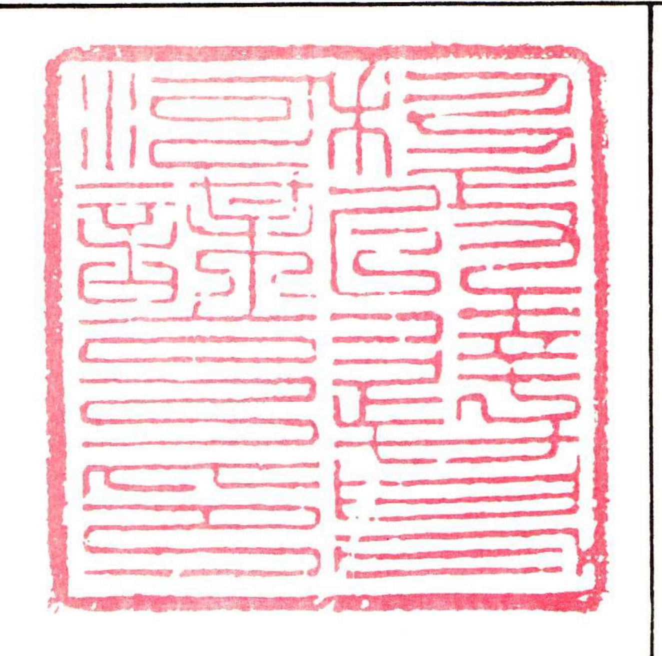
235　**夾混山謀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1×6.1厘米。背刻“定十八年十一月”、“禮部造”。側刻“夾混山謀克印”，又女真文一行七字。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236　　**迷里迭河謀克之印**

1986年出土于哈爾濱市郊。5.9×5.9厘米。背刻“定十九年五月”、“禮部造”。側刻“迷里迭河謀克印”，又女真文一行六字。紐端刻“上”字。藏哈爾濱市文管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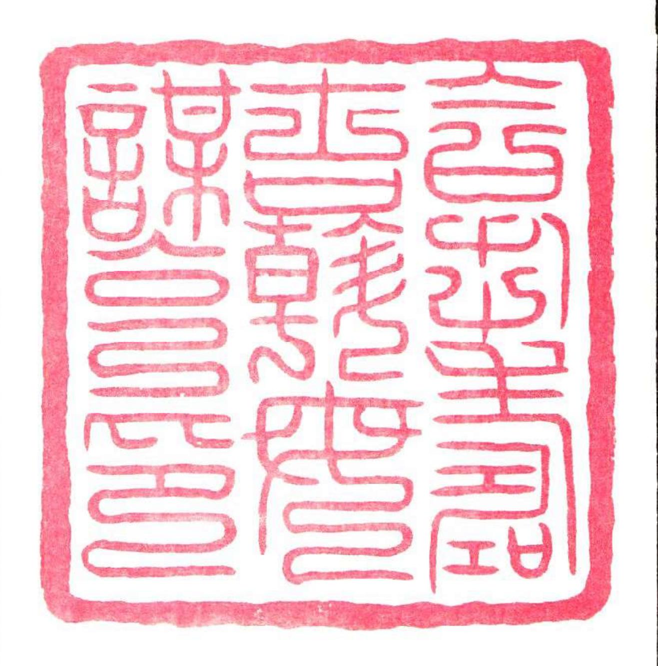
237　　**移改達葛河謀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厘米。背刻“定十九年八月”、“禮部造”。側刻“移改達葛河謀克印”，又女真文一行七字。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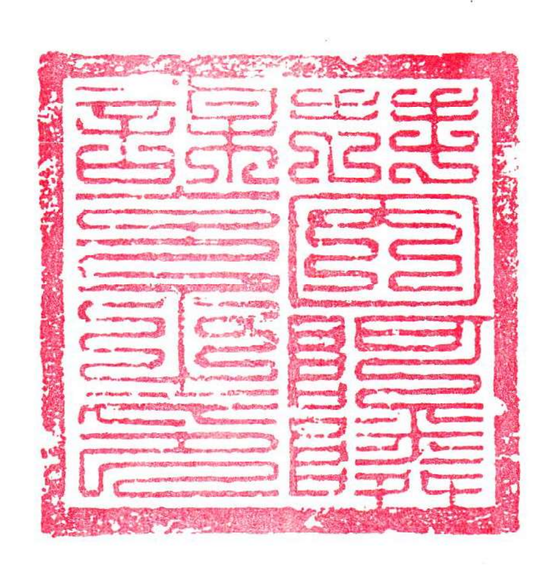
238　　**謀魯堅曷鑾謀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9×5.9厘米。背刻“定十九年九月”、“禮部造”。側刻不清。紐端刻上字。原藏觀古閣。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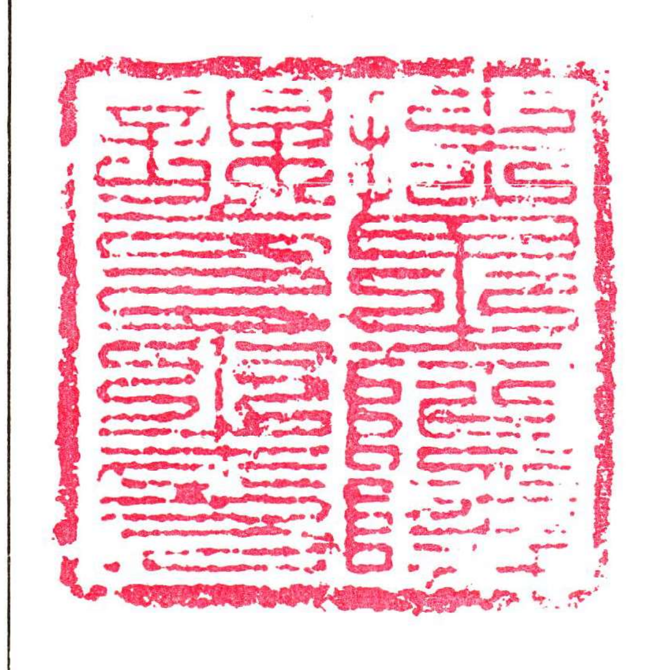
239　　**合札壽吉斡母謀克印**

民國間出土于遼寧省朝陽縣。6.2×6.1厘米。背刻“大定二十二年九月尚書禮部造”。原藏浙東陳鄴(巧笙)。見《東北古印鉤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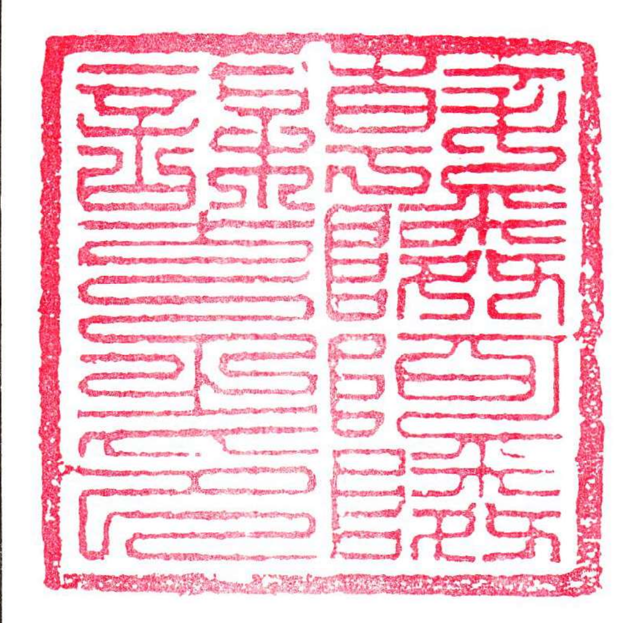
240 **拜因阿鄰謀克之印**

1977年8月發現于黑龍江省甘南縣。6×6厘米。背刻“承安五年閏二月”、“禮部造”。側刻“拜因阿鄰謀克之印”。藏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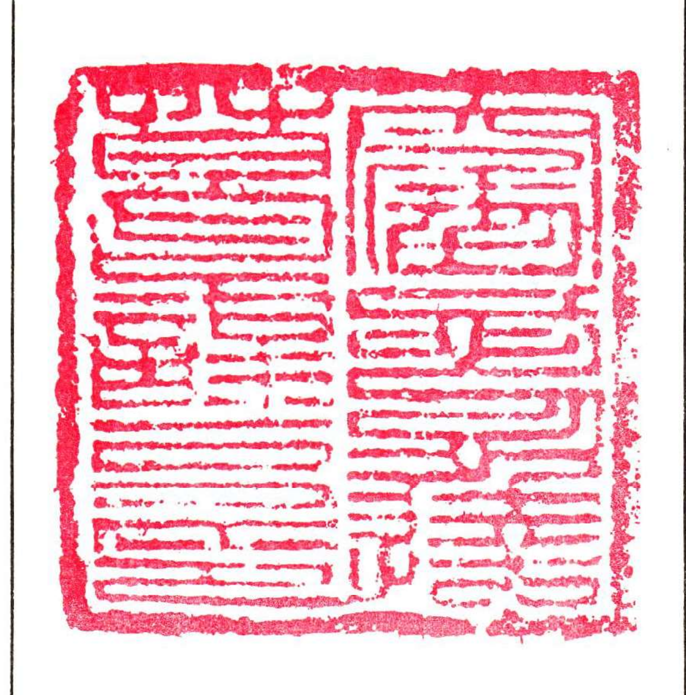
241 **掛里阿鄰謀克之印**

解放後吉林省磐石縣出土。6×6厘米。背刻“承安五年閏二月禮部造”。側刻“掛里阿鄰謀克之印”。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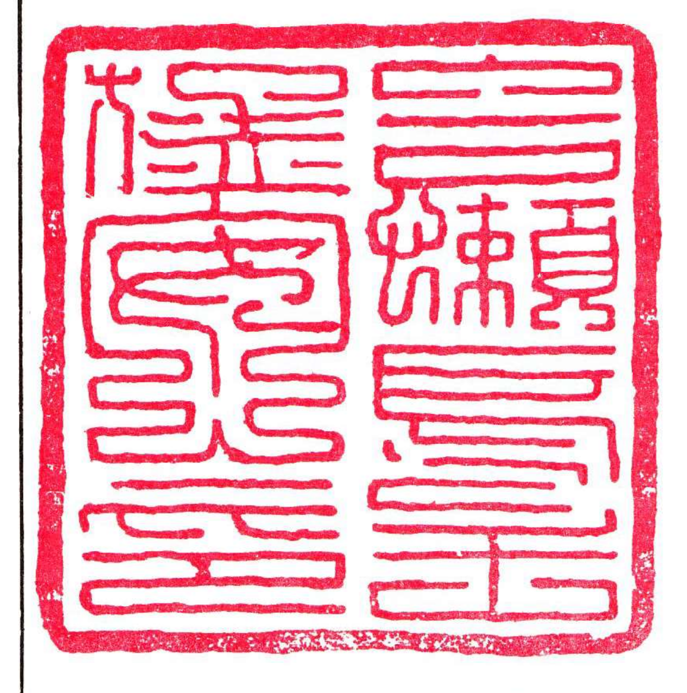
242 **斡鄰阿鄰謀克之印**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遼寧省岫岩縣出土。6×6厘米。背刻“大安二年四月”。見《東北古印鉤沈》。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243 **窟留義葛謀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4×6.4厘米。背刻“貞祐元年三月尚書禮部造”。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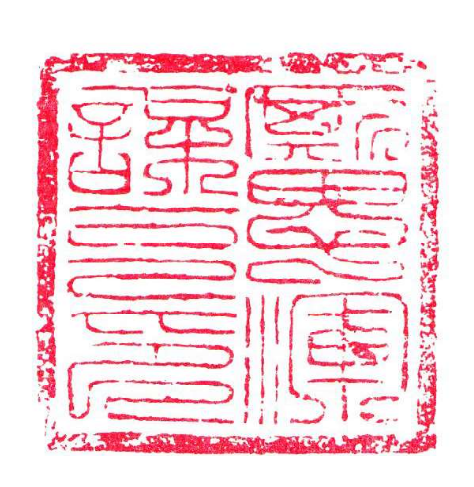
244　**合懶烏主猛安印**

民國間吉林省出土。6.5×6.5厘米。背刻“貞祐二年十二月造”。側刻“合懶烏主猛安”。原藏長春某氏。見《滿洲金石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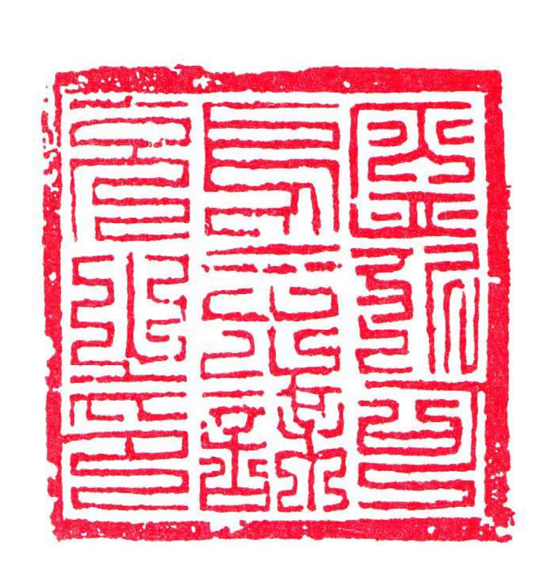
245　**惱温必罕合扎謀克印**

1982年8月出土于黑龍江省樺川縣。5.8×5.9厘米。背刻“貞祐三年四月日”、“上京行部造”。紐端刻“上”字。藏該縣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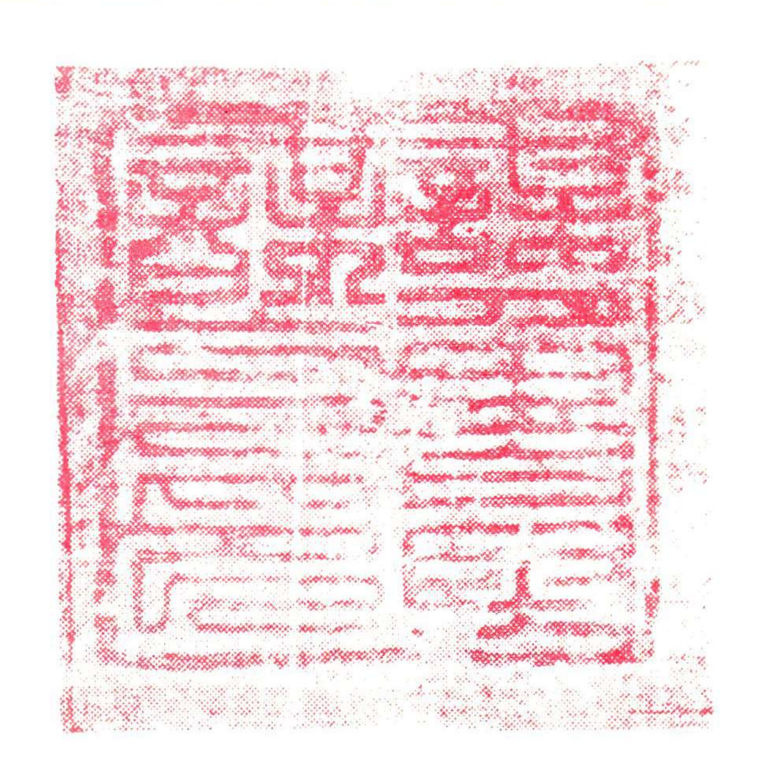
246　**斯思渾謀克印**

1984年秋出土于吉林省榆樹縣。5.8×5.8厘米。背刻“上京禮部造”、“貞祐四年三月日”、“上”。藏該縣文化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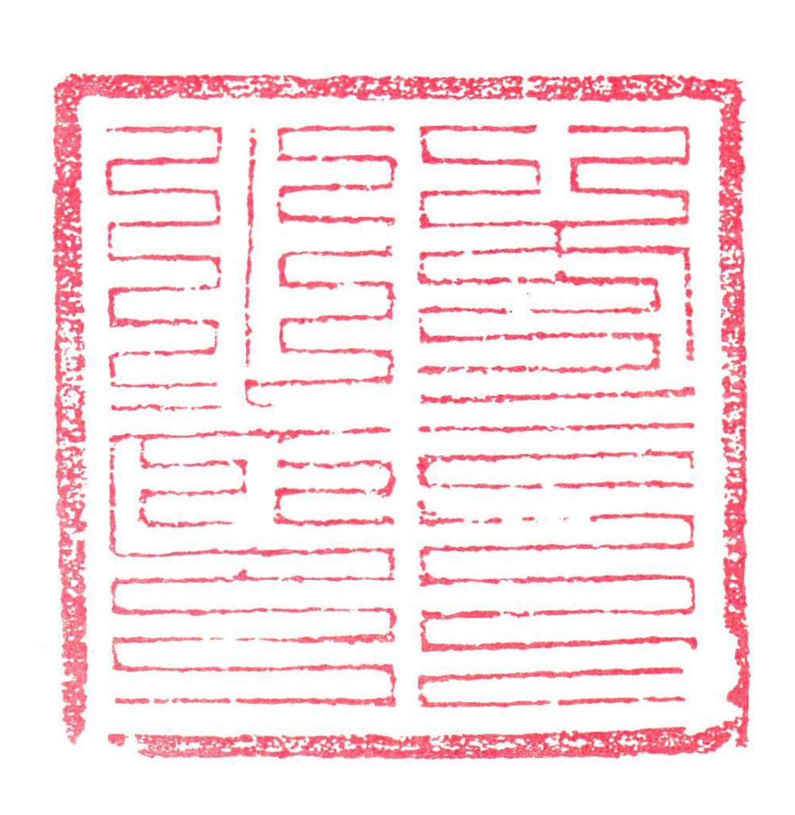
247　**盔烈可烏主謀克之印**

近年出土于吉林省德惠縣。5.8×5.8厘米。背刻“盔烈可烏主謀克之印”。紐端刻“上”字。藏該縣文化部門。



248　謀魯堅謀克印

1953年發現于黑龍江省遜克縣。6×6厘米。原印已佚。印樣存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49　千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3×7.4厘米。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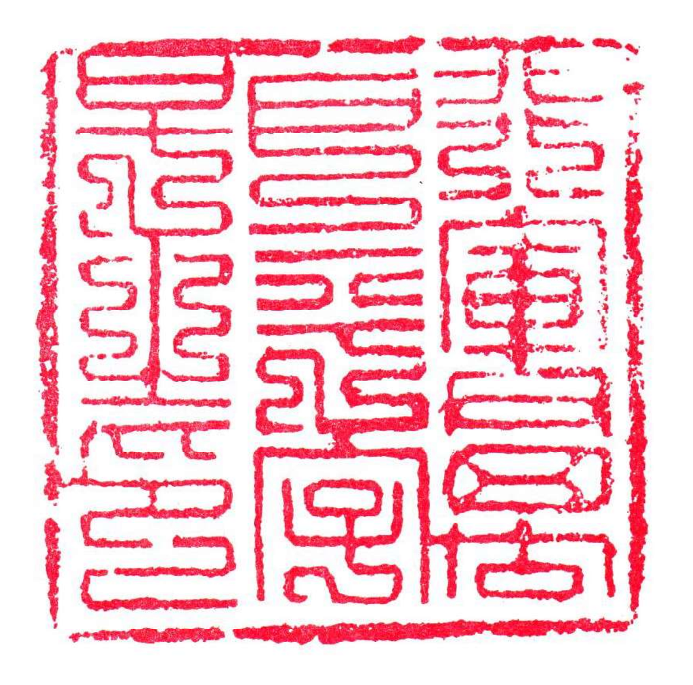
卷八　萬户印

250　**萬户之印**

1974年12月出土于安徽省鳳臺縣。7×7厘米。側刻"壬辰年四月日"、"萬户之印"、"湯字號"。藏阜陽地區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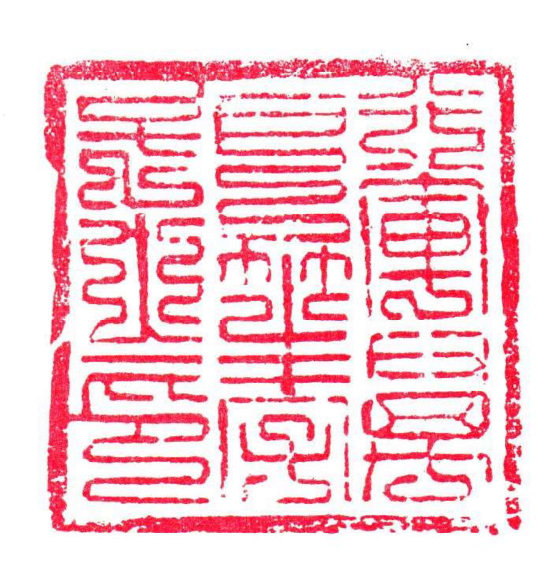
251　**萬户之印**

1980年7月出土于遼寧省復縣。6.3×6.3厘米。背刻"萬户"。紐端刻"上"字。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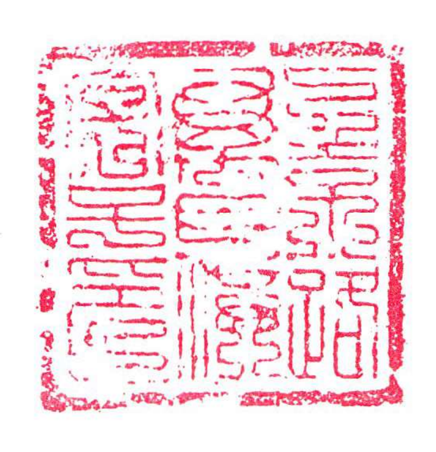
252　　行軍萬户平字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4×6.4厘米。背刻“崇慶元年二月禮部造”。側刻“行軍萬户平字号印”。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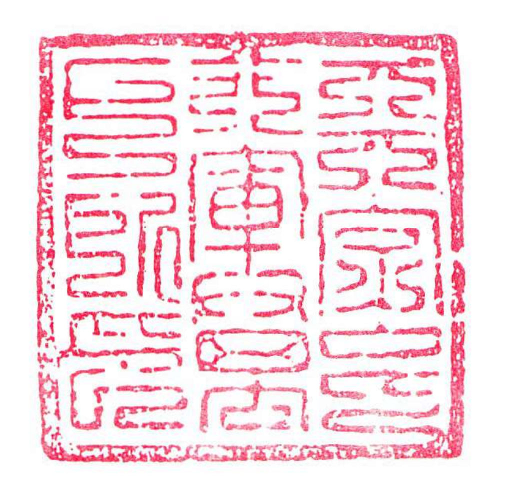
253　行軍萬户笙字号之印

1968年5月出土于黑龍江省阿城縣。6.5×6.5厘米。背刻“崇慶二年三月”、“禮部造”。側刻“行軍萬户笙字號印”。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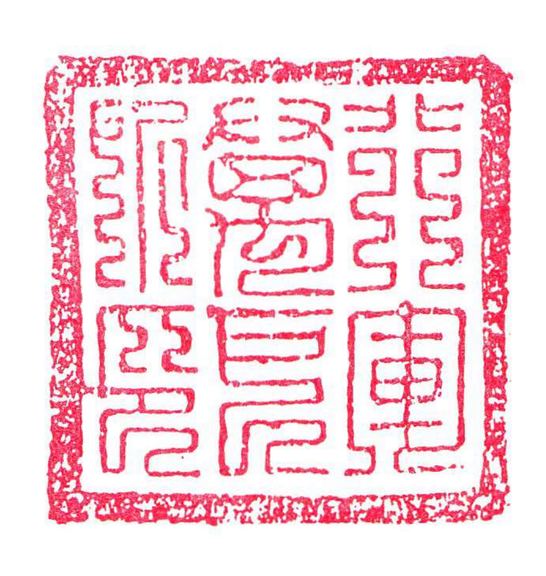
254　**上京路萬户洪字号印**

1985年發現于江蘇省武進縣。6.5×6.5厘米。背刻“貞祐二年四月日行部”、“上京路萬户洪字号印”。紐端刻“上”字。藏武進縣文化部門。



255　**天字号行軍萬户所印**

1969年出土于内蒙古喀喇沁旗。6.5×6.5厘米。側刻“貞祐二年九月日造”、“行軍萬户所印”。紐端刻“上”字。藏赤峰市博物館。



256　**行軍萬户所印**

1957年出土于吉林省汪清縣。6.3×6.3厘米。背刻“貞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造”。側刻“行軍萬户印”、“金字號”。藏吉林省博物館。



257　**行軍萬户所印**

1978年出土于遼寧省建平縣。6.3×6.3厘米。背刻“貞祐三年四月”、“廿八日平州造”。側刻“萬户所印”、“菜字号”。紐端刻“上”字。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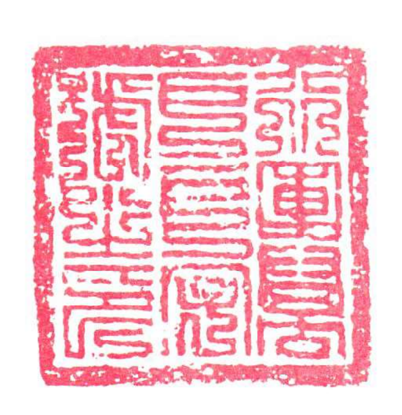
258　**忠孝軍閭字号萬户印**

1980年5月出土于山東省廣饒縣。6×6厘米。背刻"山東行部造"、"貞祐三年七月日"。側刻"忠孝軍閭字号印"。紐端刻"上"字。藏廣饒縣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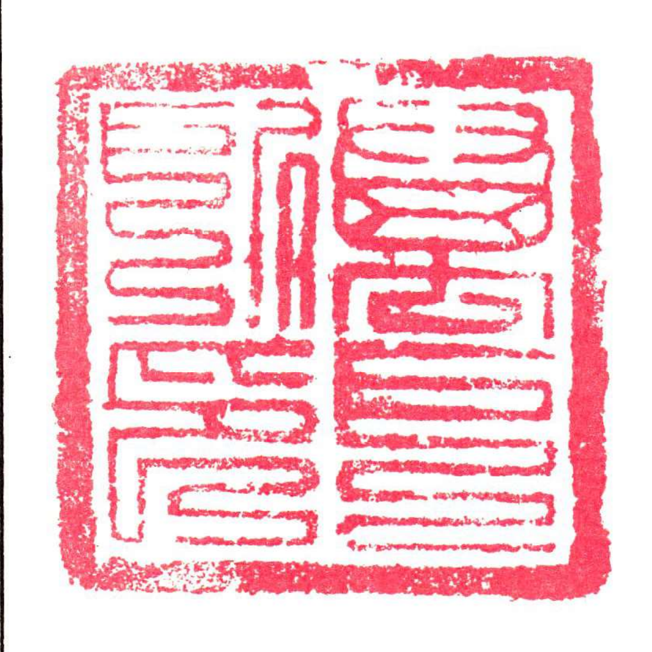
259　**行軍萬户資字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7×5.7厘米。背刻"貞祐五年四月造"。側刻"行軍萬户資字號"，藏河南舞陽縣文化館。



260　**行軍萬户户字號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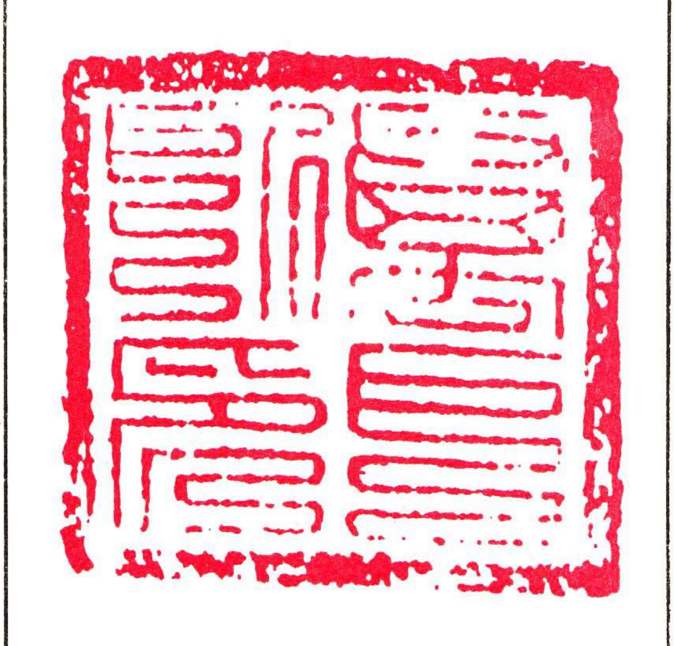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2×6.05厘米。藏遼寧省博物館。



261　**萬户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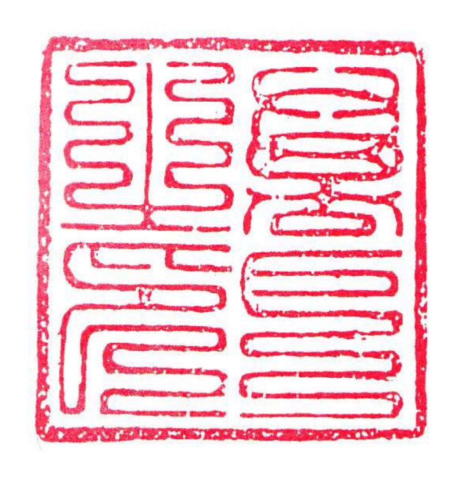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7×5.8厘米。背刻"貞祐五年中都路經略使司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藏旅順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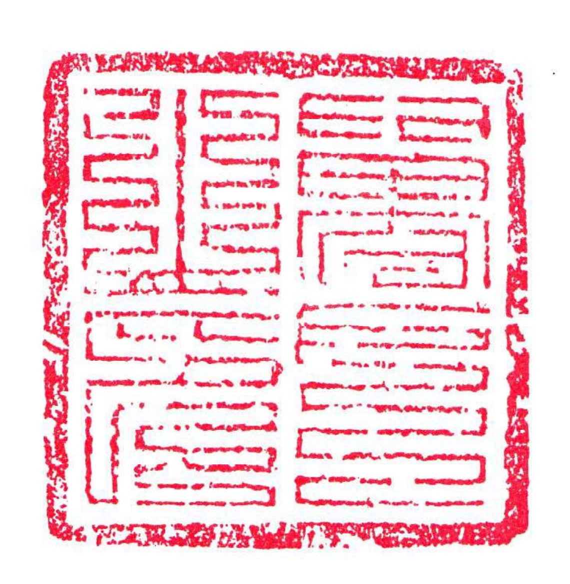
262　　**萬户所印**

1983年1月于河北省易縣徵集。6×6厘米。背刻“貞祐五年中都路經略司造”。藏易縣文化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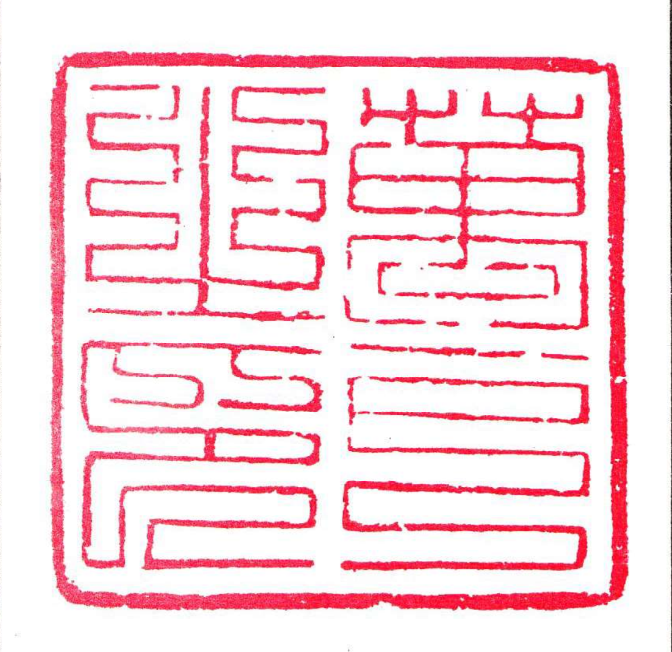
263　　**萬户之印**

1959年出土于内蒙古喀喇沁旗。6×6厘米。背刻“興定四年正月”、“單州行部造”。側刻“萬户印”。紐端刻“上”字。藏赤峰市博物館。



264　　**萬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2×5.2厘米。背刻“興定四年二月懷州行部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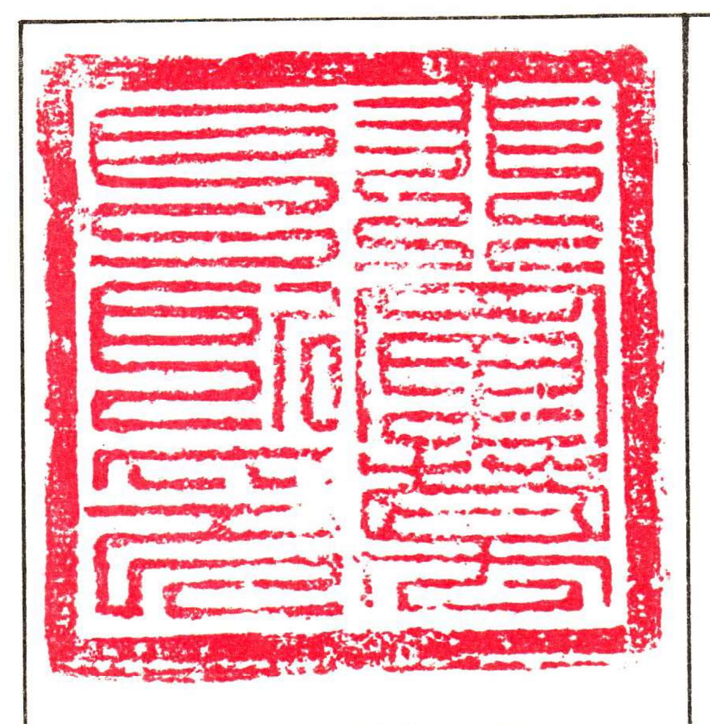
265　　**萬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9×6.1厘米。背刻“興定四年”。見《意園古今官印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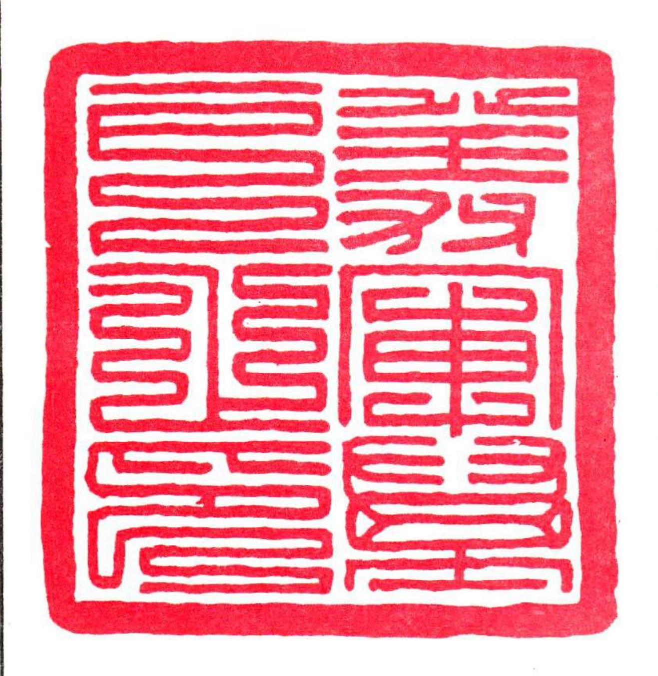
266　**義軍萬户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5.6厘米。背文已泐。側刻“正九正月造”、“義萬”。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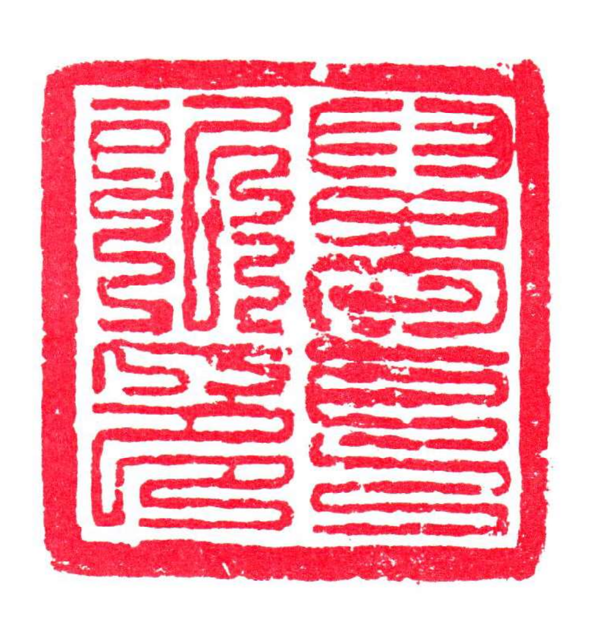
267　**行軍萬户所印**

近年出土于西安市。6.5×6.5厘米。背刻“開興元年三月”、“行宫禮部造”。側刻“萬户印”。紐端刻“上”字。藏陝西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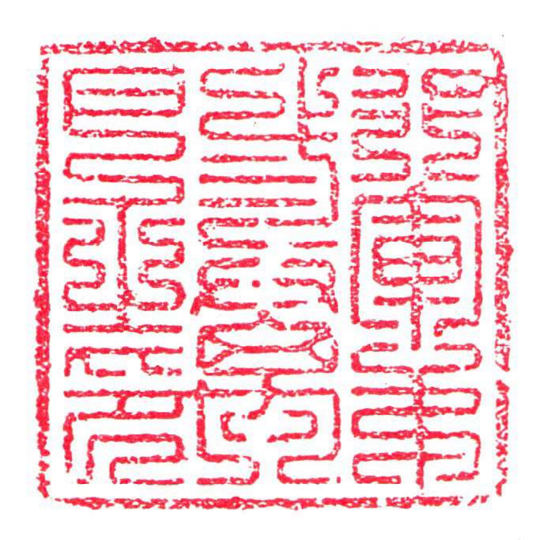
268　**義軍萬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4×6.2厘米。背刻“天興元年行部造”。見《滿洲金石志》。



269　**萬户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5.5厘米。背刻“恒山公府”、“天興元年造”。側刻“萬户印”。藏吉林大學。



270　行軍第三萬户之印

解放後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區巴林右旗。6.6×6.6厘米。背刻“行軍第三萬户之印”、“明昌七年十一月”。藏赤峰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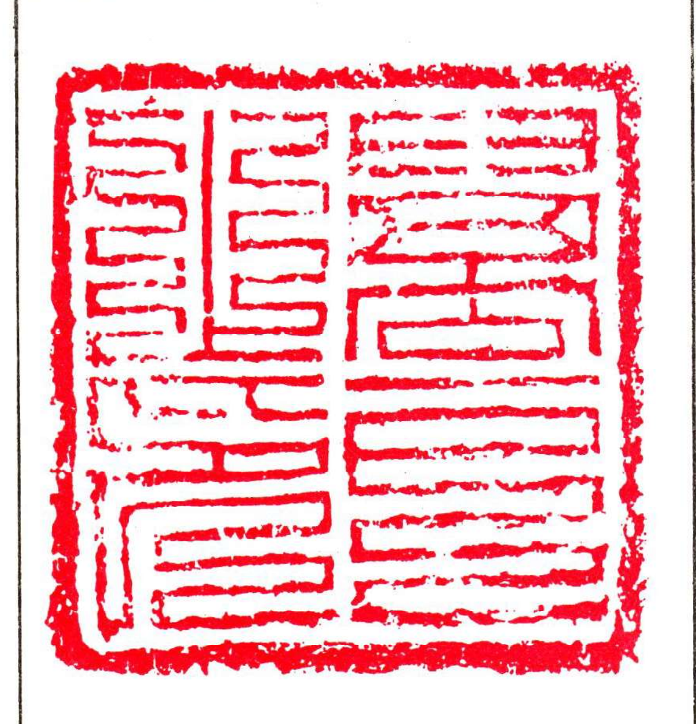
271　行軍萬户人字号之印

1978年冬出土于河南省永城縣。6.6×6.6厘米。背刻“大安三年四月”、“禮部造”。側刻“行軍萬户人字号之印”。紐端刻“上”字。藏永城縣文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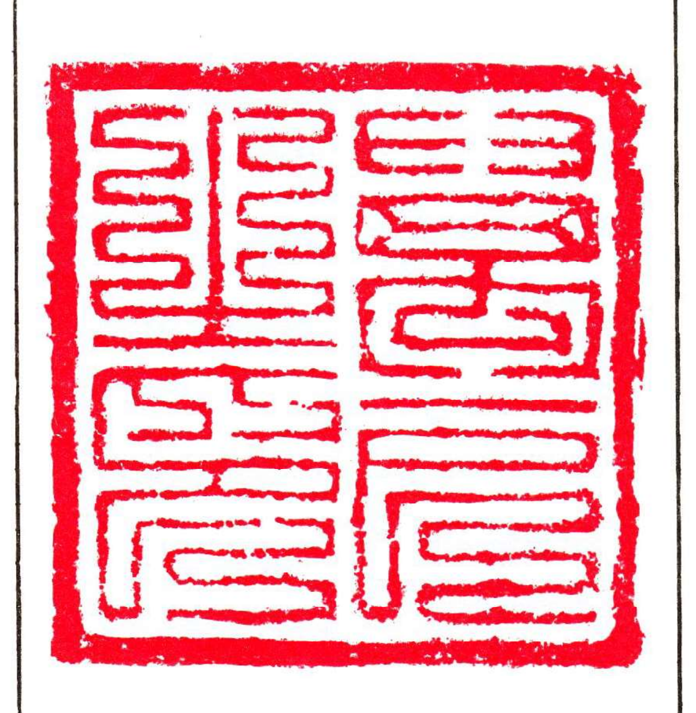
272　**萬户之印**

近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師縣。6×6厘米。紐端刻“上”字。藏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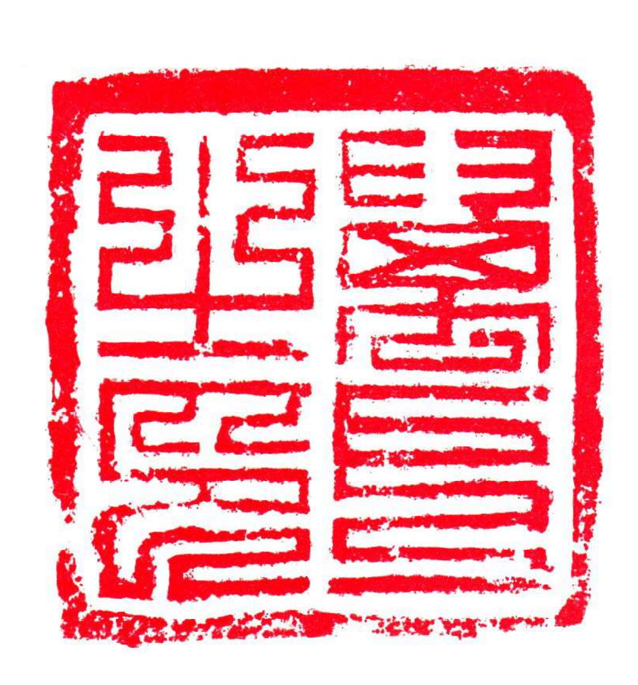
273　**萬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3厘米。印背刻字不清。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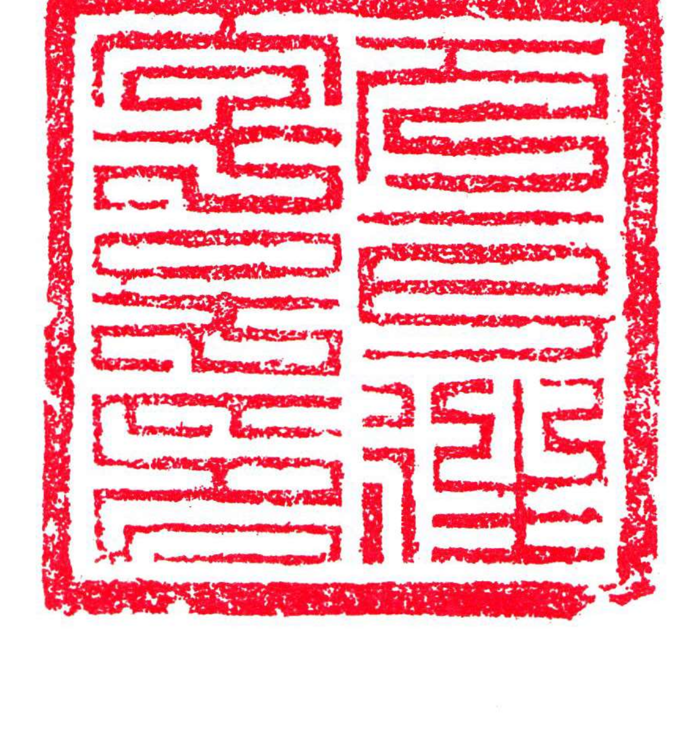
274　**萬户之印**

解放後遼寧省丹東出土。6.4×6.4厘米。藏丹東市文化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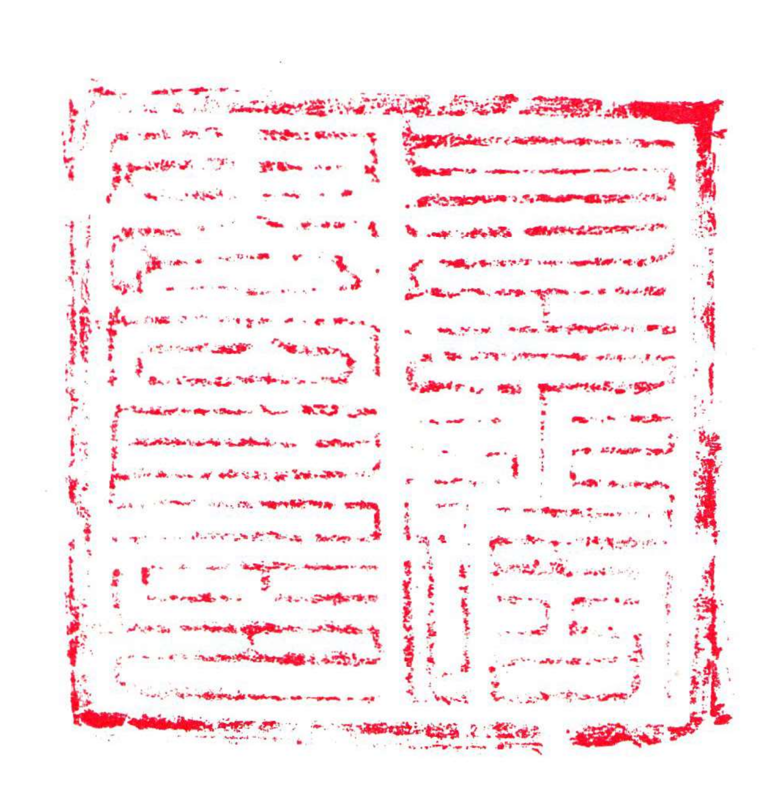
275　**萬户之印**

1985年夏出土于山西省河曲縣。6×6厘米。藏河曲縣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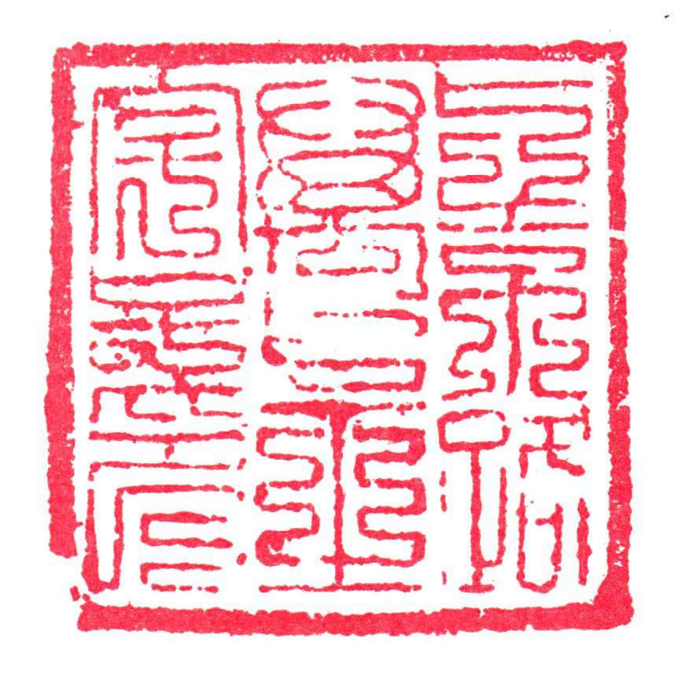
276　**萬户往字号印**

1964年發現于河北省平泉縣。6.5×6.5厘米。側刻"萬户往字号印"。紐端刻"上"字。藏河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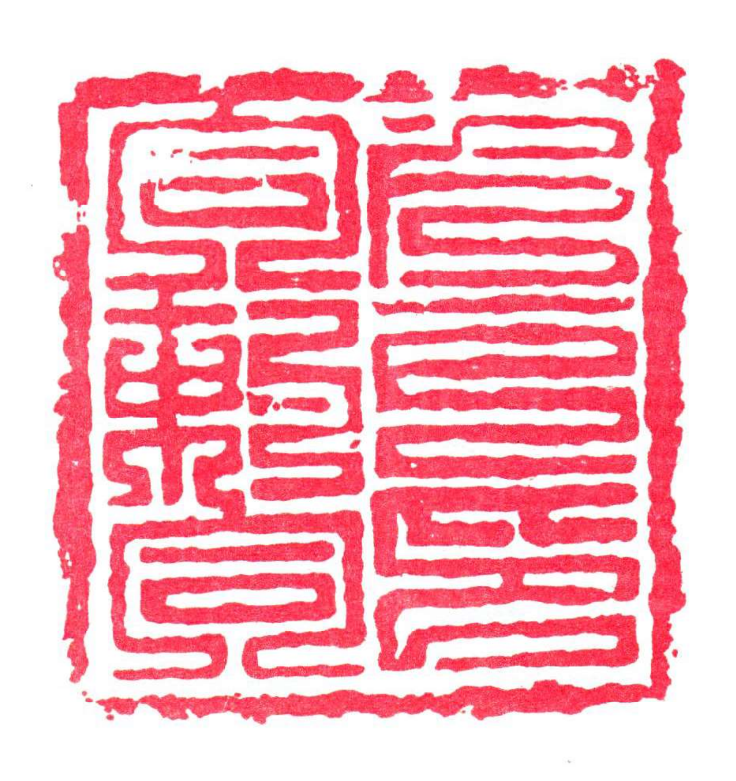
277　**上京路萬户印**

1979年6月出土于黑龍江省寧安縣。6.8×6.8厘米。藏寧安縣文管所。



278　上京路萬户王字号印

1975年5月出土于黑龍江省賓縣。6.2×6.2厘米。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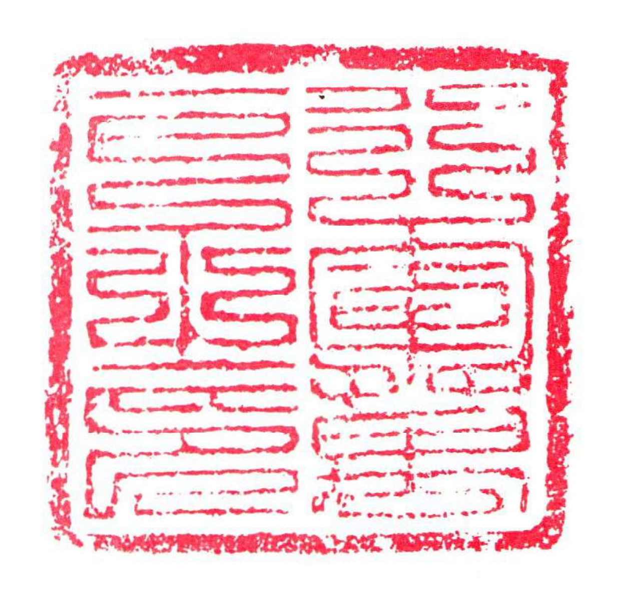
279　合刺合万户印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出土于遼寧省錦縣。6.9×6.6厘米。原藏錦縣李守春。見《東北古印鉤沈》。



280　**行軍萬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5.4厘米。藏旅順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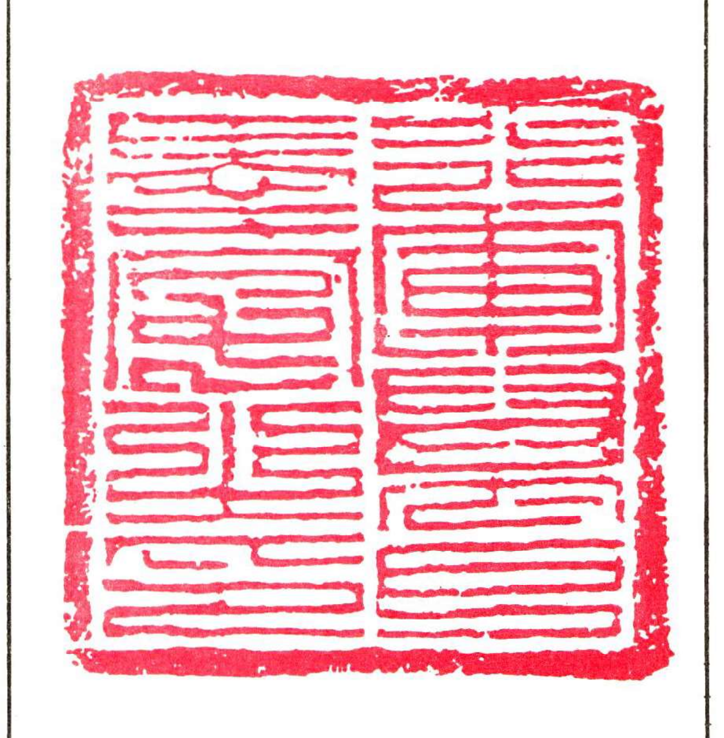
281　**行軍萬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5.5厘米。原藏盧江劉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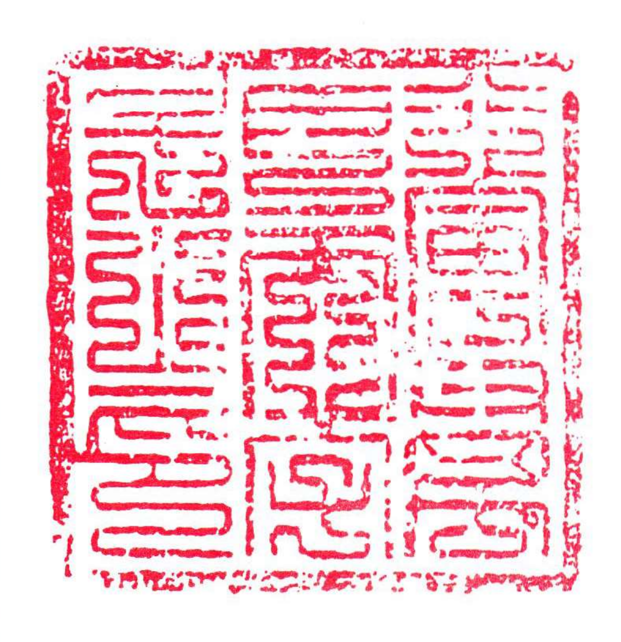
282　**行軍萬户丁字子印**

1955年徵集品。5.5×5.5厘米。藏河南省博物館。按:“子印”爲“之印”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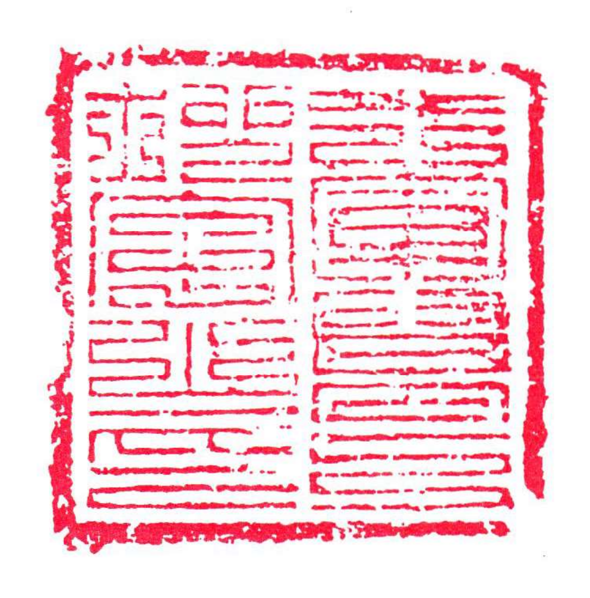
283　**行軍萬户愛字之印**

1981年7月出土于河北省鹽山縣。6.5×6.5厘米。側刻“行軍萬户愛字之印”。紐端刻“上”字。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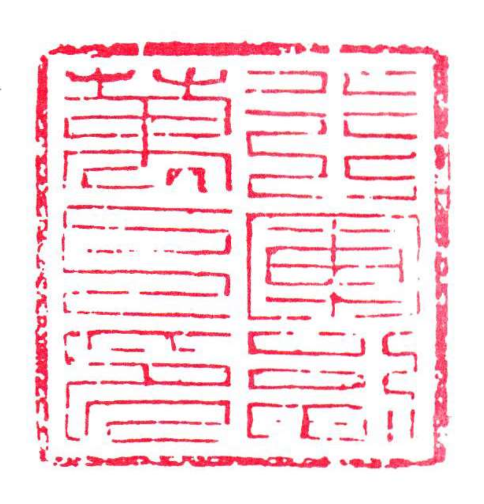
284　**行軍萬户天字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6.6厘米。藏河南省文物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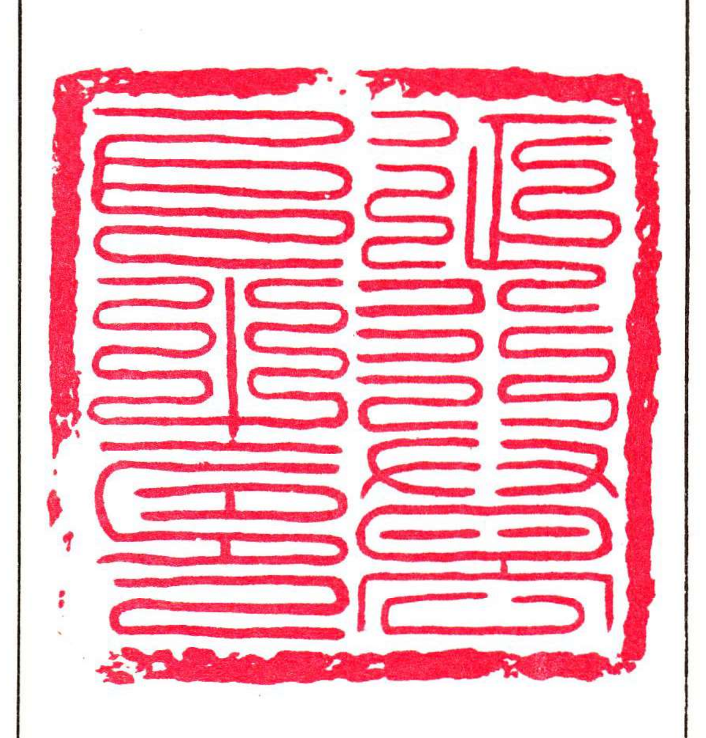
285　**行軍萬户地字之印**

1960年2月出土于河南省岳城。6.4×6.4厘米。藏河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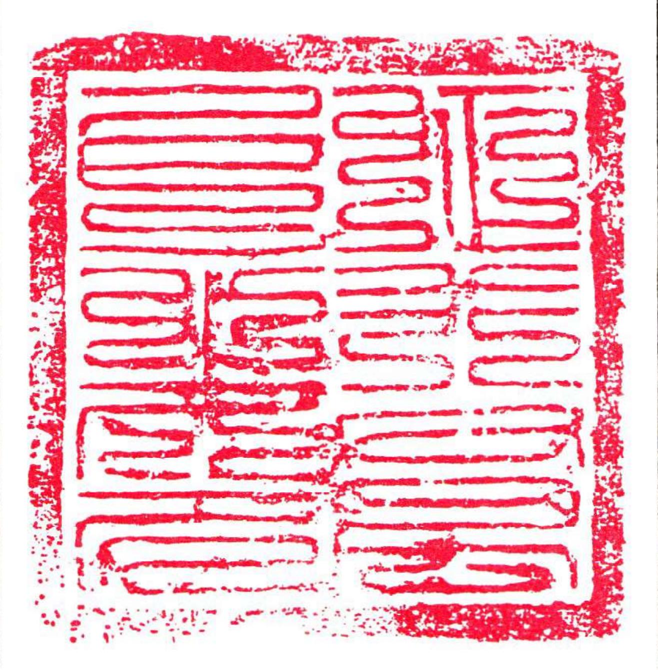
286　**行軍副萬户印**

1952年于河南省開封徵集。6.3×6.3厘米。背刻“行軍副萬户印”。藏河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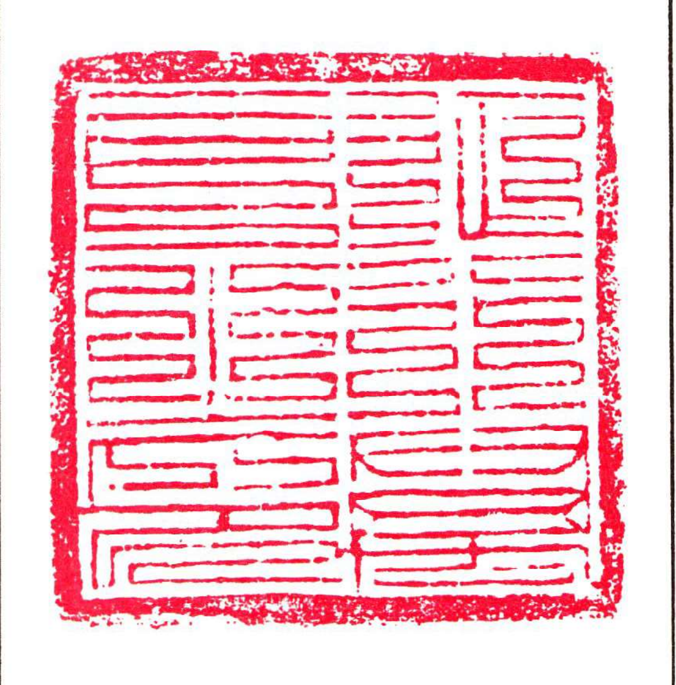
287　**征行萬户之印**

民國間出土于黑龍江省珠河縣。6.5×6.5厘米。原藏延壽陳大猷。見《東北古印鈎沈》。



288　**征行萬户之印**

1975年12月出土于黑龍江省方正縣。6.5×6.5厘米。藏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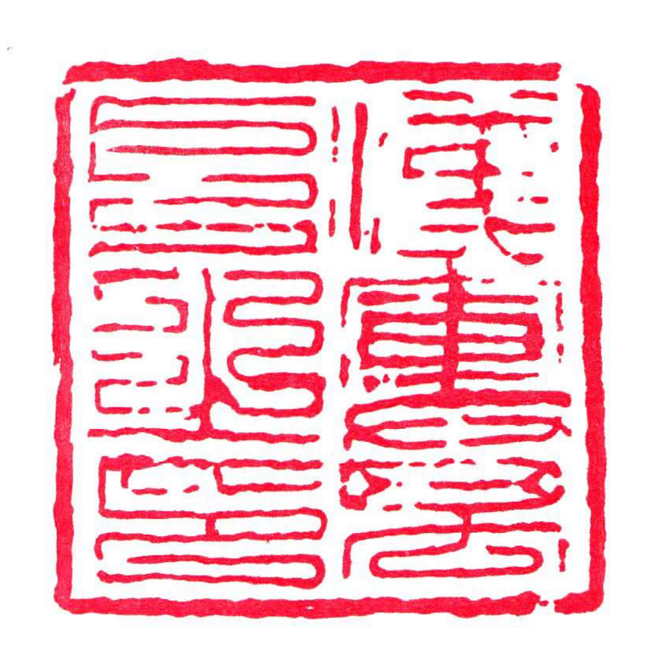
289　**征行萬户之印**

1972年4月出土于黑龍江省阿城縣。6.2×6.2厘米。側刻"征行萬户印"。藏阿城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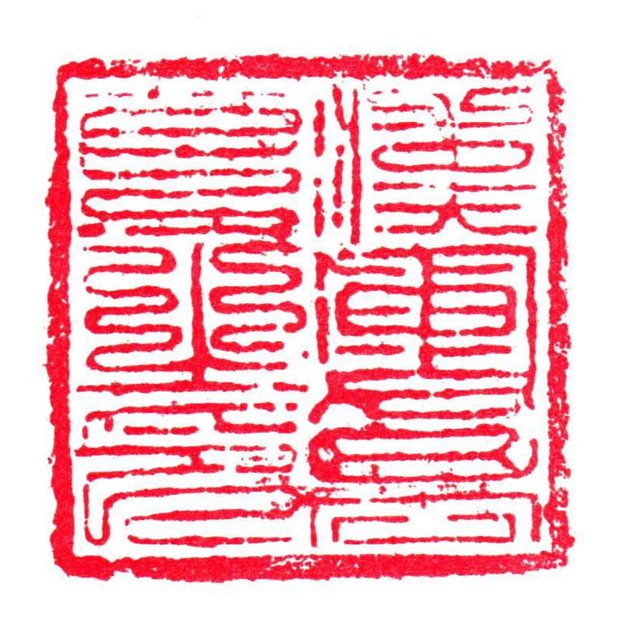
290　**征行萬户之印**

1978年冬出土于河南省襄城縣。6×6厘米。藏襄城縣文化部門。



291　**漢軍萬户之印**

民國間出土于吉林省額穆縣。5.9×5.9厘米。背刻"漢軍萬户之印"。見《東北古印鈎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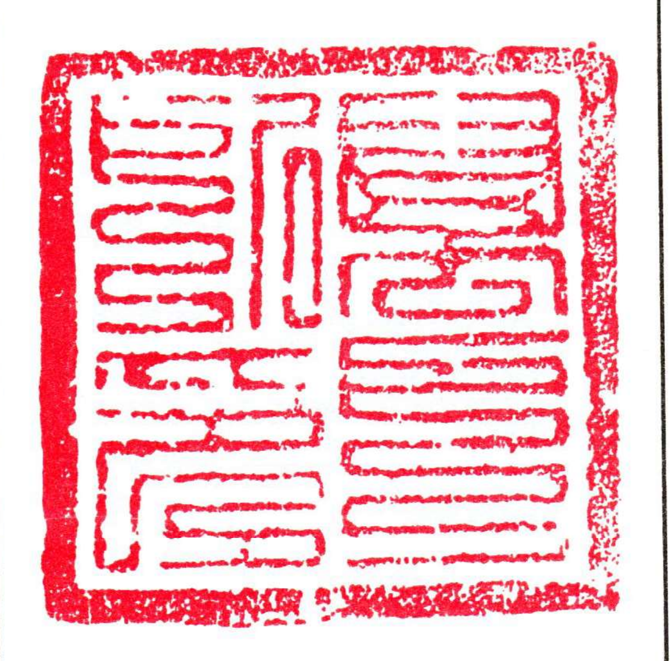
292　**漢軍萬户之印**

1959年6月出土于黑龍江省阿城縣。5.6×5.6厘米。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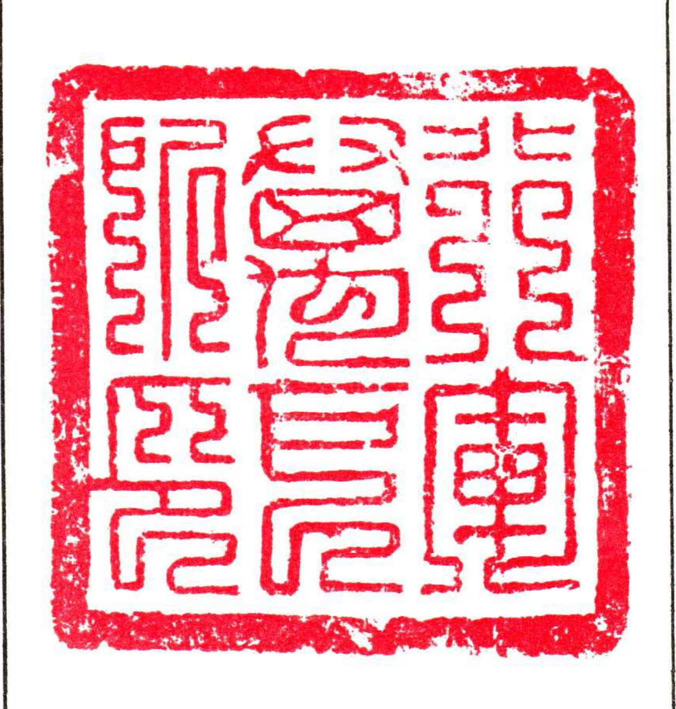
293　**萬户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4×5.3厘米。藏吉林大學。



294　**萬户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2×6.2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295　**行軍萬户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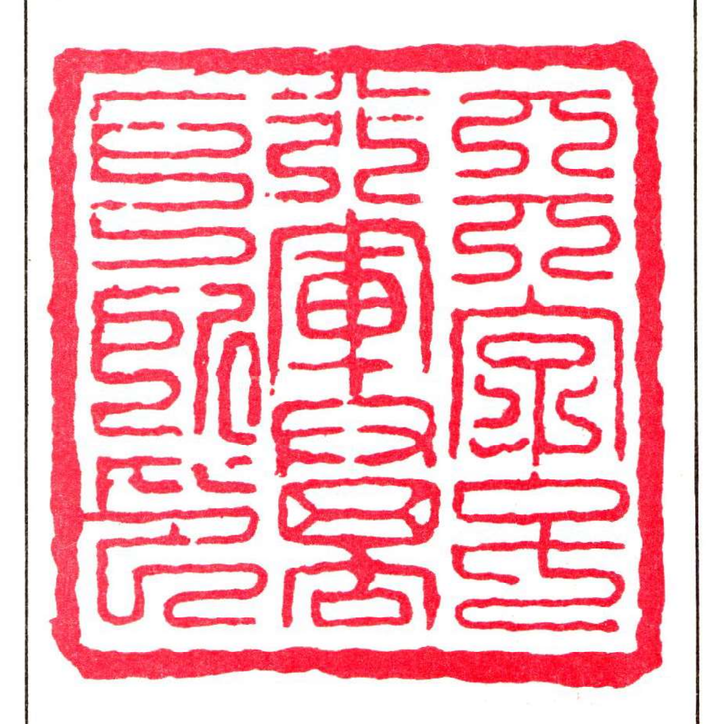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2×6.2厘米。側刻"行軍萬户所印"、"廿八日造"。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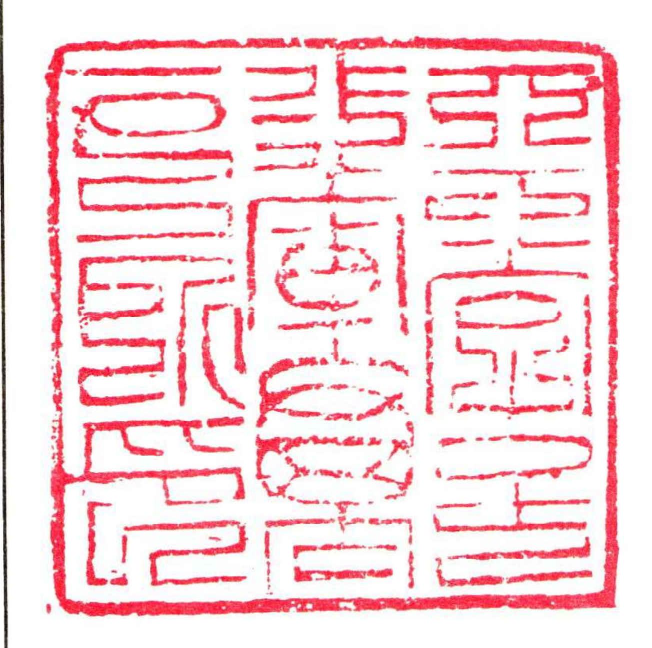
296　**天字号行軍萬户所印**

近年遼寧省朝陽地區出土。6.6×6.5厘米。藏朝陽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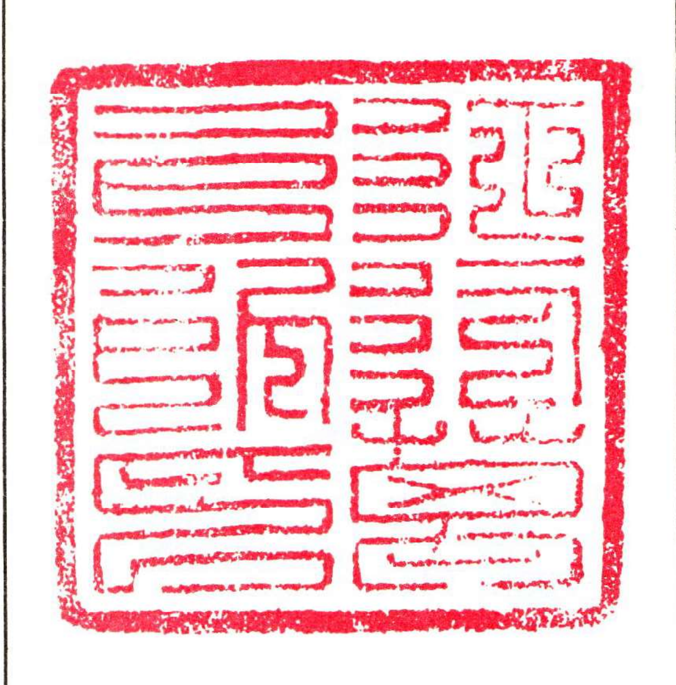
297　**天字号行軍萬户所印**

民國年間出土。出土地點不詳。6.8×6.5厘米。原藏湯玉麟處。見《東北古印鉤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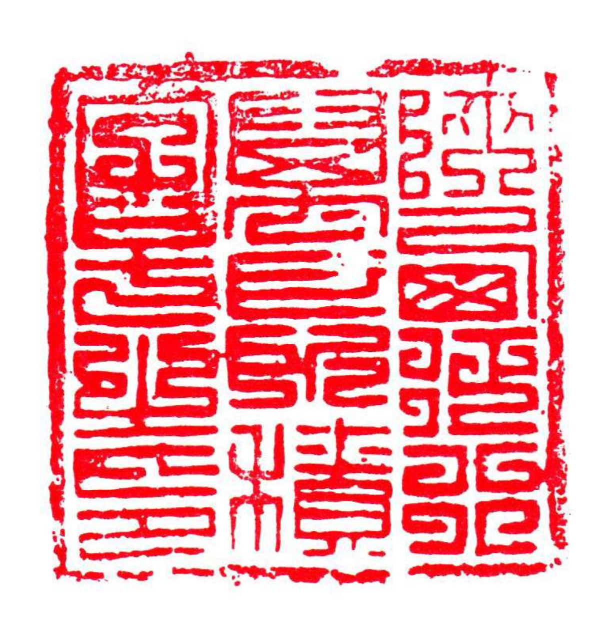
298　**天字号行軍萬户所印**

1972年出土于黑龍江省阿城縣。6.2×6.2厘米。背刻"萬户印"。藏阿城縣文管所。



299　**征行萬户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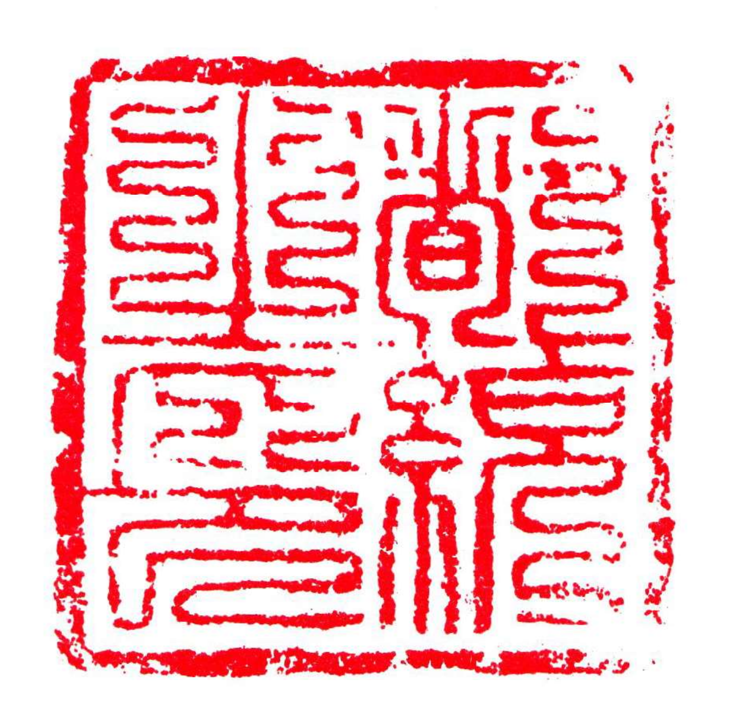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2×6.2厘米。原藏廬江劉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補遺》。



300　**陝西征行萬户所積字号之印**

1988年出土于陝西省洛川縣。5.5×5.5厘米。側刻"征行萬户積字号印"。藏洛川縣文化部門。

卷九　都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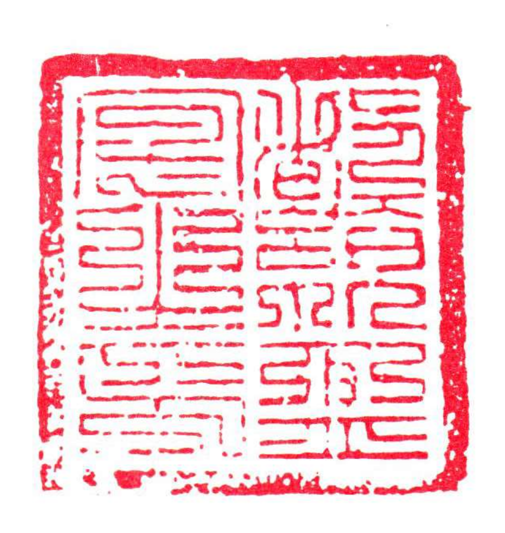
301　**都統之印**

1965年2月出土于河北省唐縣。6.7×6.7厘米。背刻“貞祐三年”、“軍帥所造”。側刻“都統”。紐端刻“上”字。藏河北省博物館。



302　**上京路都統塞字号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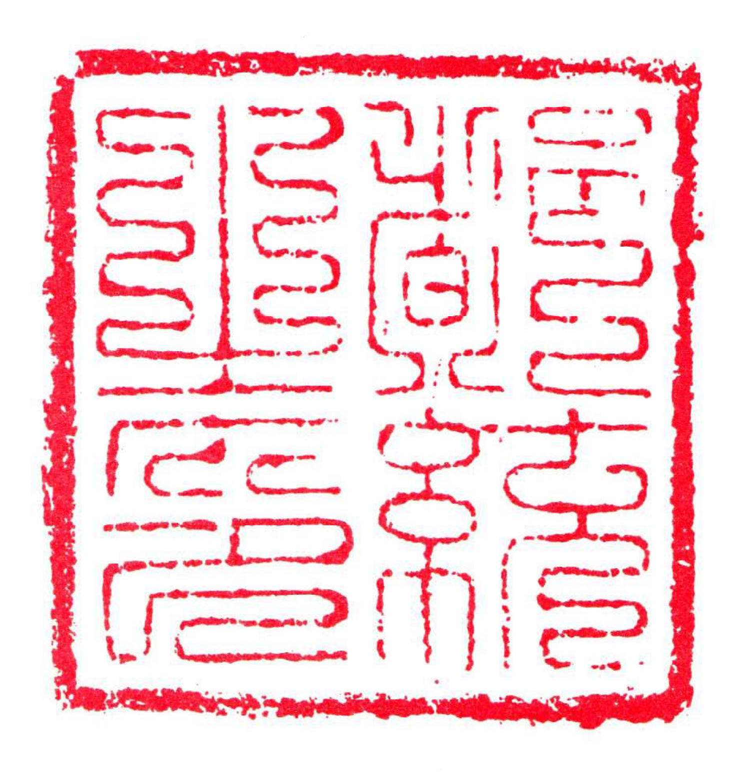
1964年1月發現于黑龍江省鶴崗市。7×7厘米。背刻“上京行部造”、“都統塞字印”。側刻“貞祐□年”。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303　**都統盈字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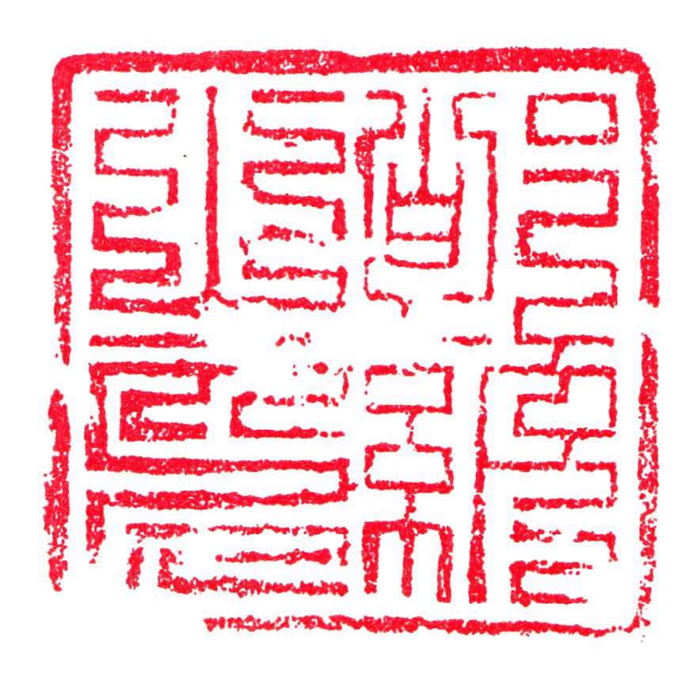
1969年冬出于河南省寶豐縣。6.5×6.5厘米。背刻“興定二年七月”、“林州行部造”。紐端刻“上”字。藏寶豐縣文化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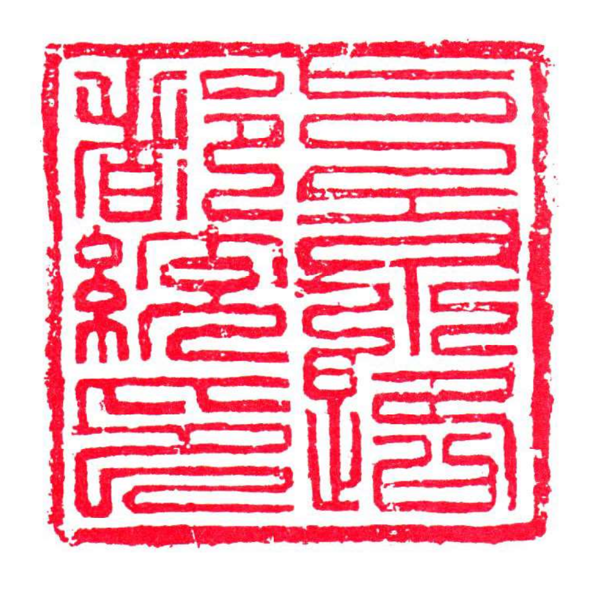
304　　**都統之印**

1982年7月出土于山東省微山縣。7×7厘米。藏微山縣文化館。



305　　**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2×6.5厘米。背刻"興定二年行禮部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306　**上京路都統印**

1977年8月發現于黑龍江省牡丹江市。7.2×7.2厘米。背刻“興定三年四月日”。側刻“上京都統印”。藏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307　**義軍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3×5.3厘米。側刻“興定三年”。背刻“上”字。原藏嘉興張氏。見《集古官印考證》、《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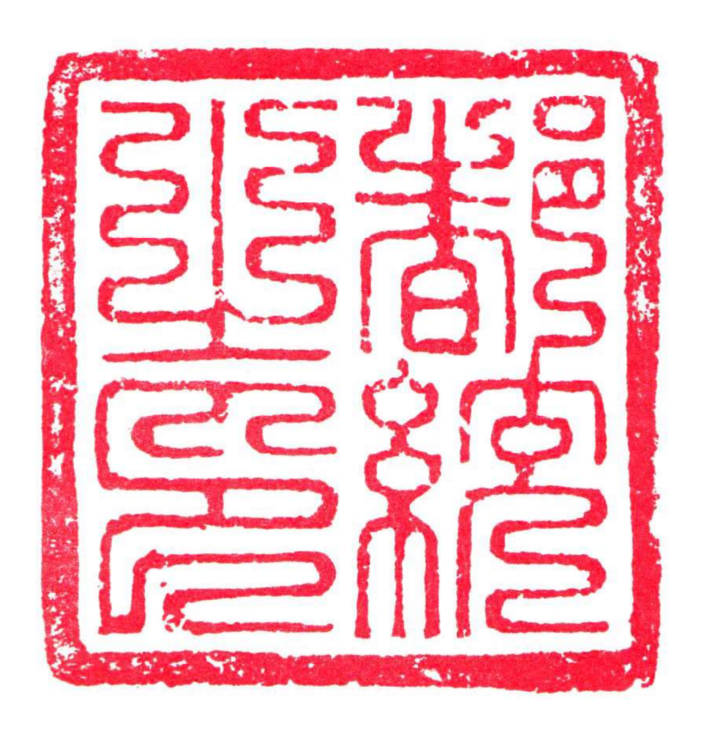
308　**成字都統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8×6.7厘米。背刻“正大四年十一月行宮禮部造”。原藏山左嚴氏。見《集古官印考證》、《隋唐以來官印集存附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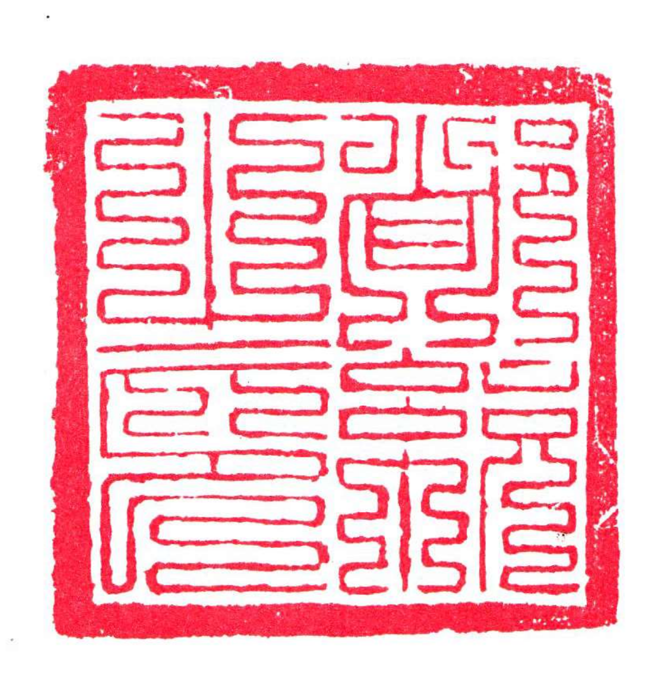
309　**都統之印**

1983年3月出土于陝西省安康縣。6.2×6.2厘米。背刻“正大六年十月日”、“行在部造”。側刻“都統之印”。紐端刻“上”字。藏安康地區文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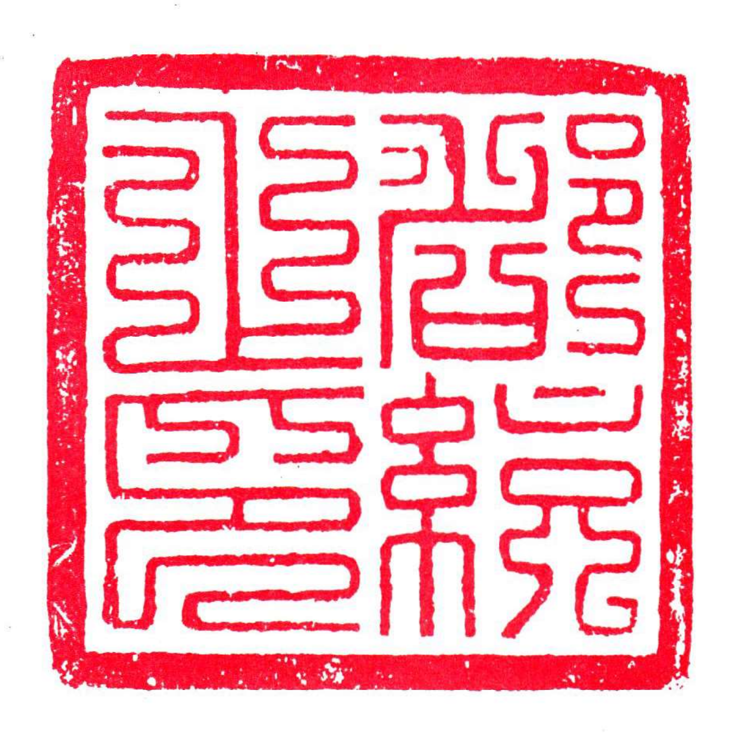
310　**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8×6.6厘米。背刻“天興元年五月造”。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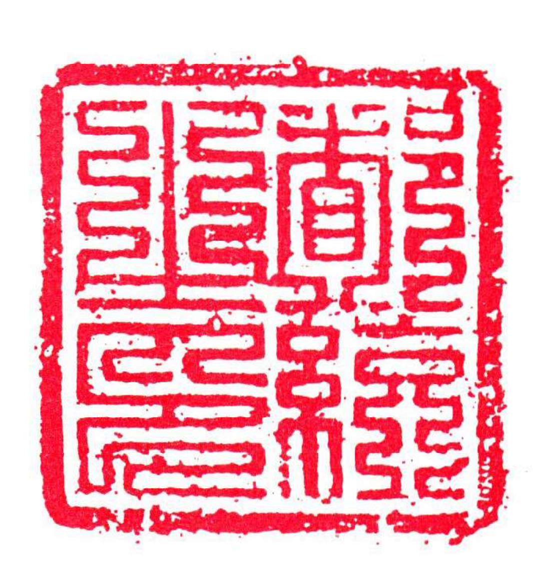
311　**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8×6.9厘米。背刻“天興元年”、“行部造”。紐端刻“上”字。原藏諸城劉氏。見《集古官印考證》、《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312　　**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8×6.9厘米。背刻“天興元年”、“行部造”。紐端刻“上”字。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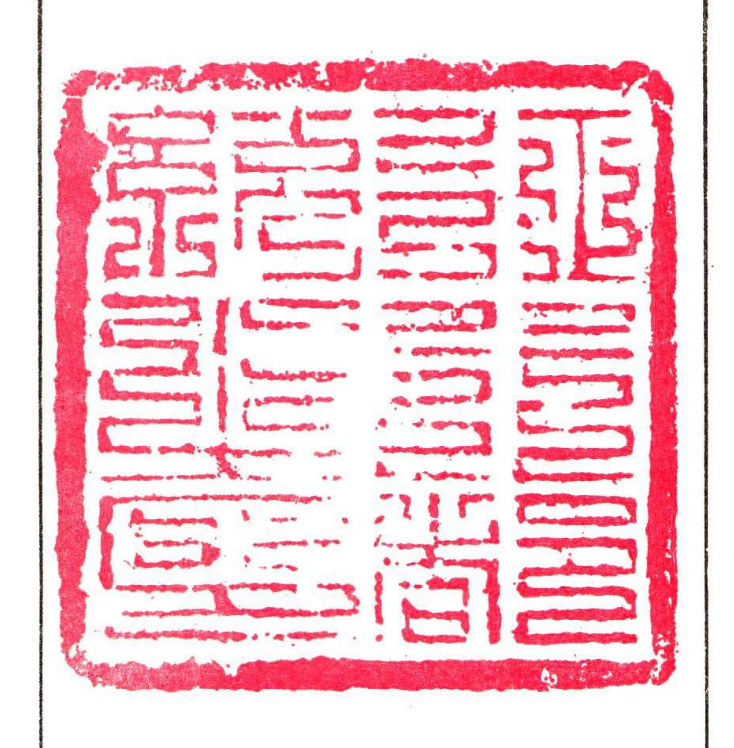
313　　都統之印

1975年8月出土于遼寧省昌圖縣。7×7厘米。背刻“禮部造”。側刻“都統之印”、“天興二年閏七月”。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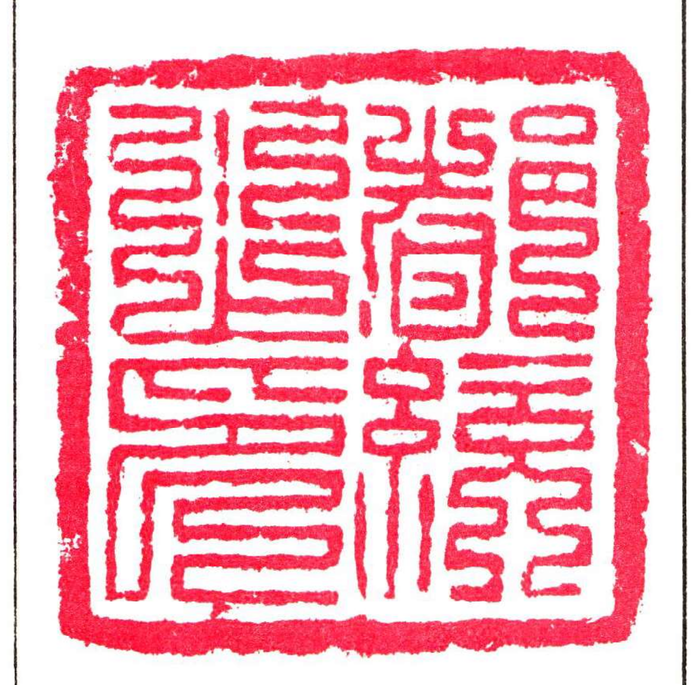
314　　**都統之印**

1981年10月出土于河南省孟津縣。6.3×6.3厘米。背刻“天興二年”、“總部造”。側刻“都統印”。紐端刻“上”字。藏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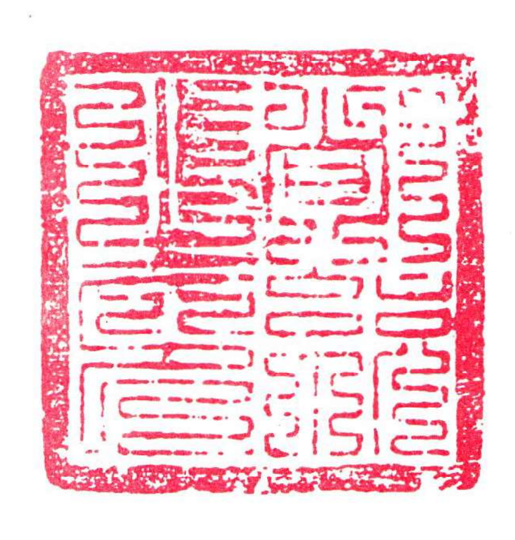
315　　**征行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7×6.7厘米。背刻“壬午年四月日行部造”。側刻“征行都統之印”。藏吉林省博物館。



316　　**都統之印**

1983年12月于陝西省岐山縣徵集。6.4×6.4厘米。側刻已泐。藏岐山縣周原文管所。



317　　**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1×6.1厘米。藏河南省文物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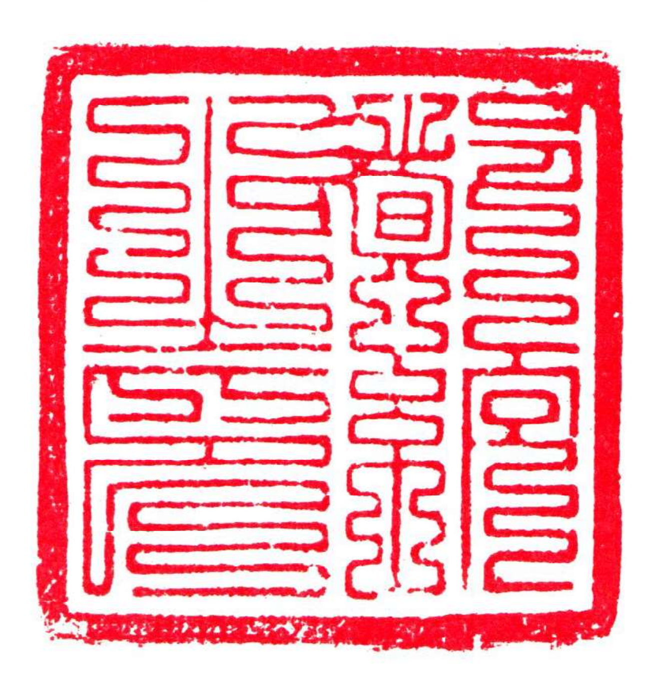
318　　**都統之印**

1981年7月出土于山西省石樓縣。7.1×7.1厘米。紐端刻“上”字。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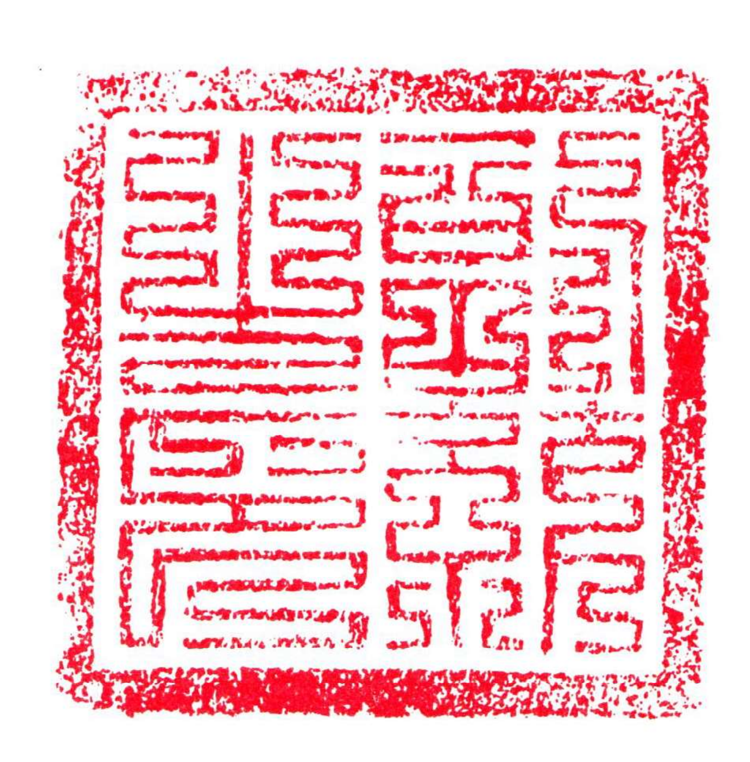
319　　**都統之印**

1976年出土于河南省延津縣。6.7×6.7厘米。藏河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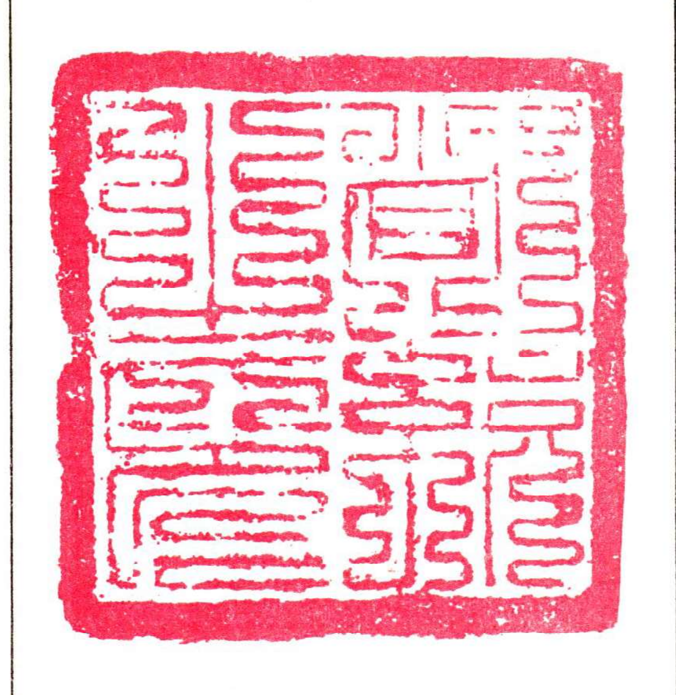
320　都統之印

近年出土于西安市.6.1×6.1厘米。印背右角刻“上”字。藏陝西省博物館。



321　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1×6.1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322　都統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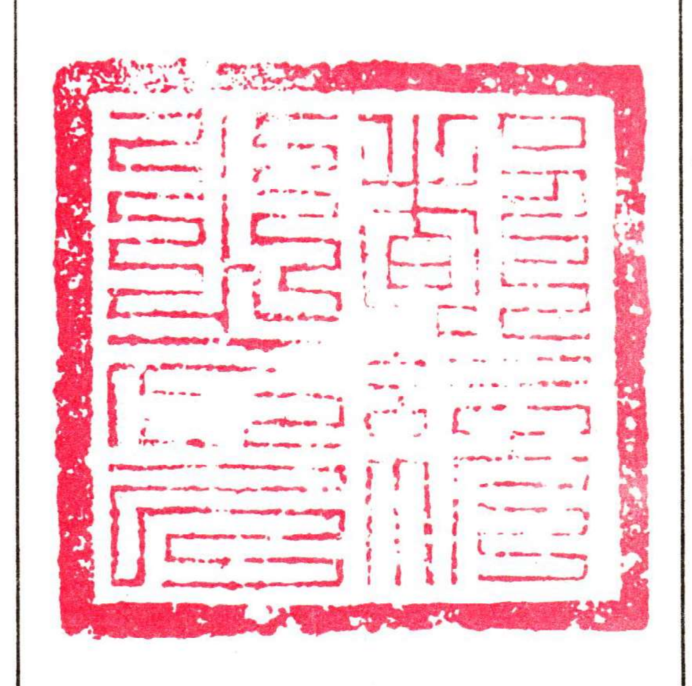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2×6.2厘米。見《金石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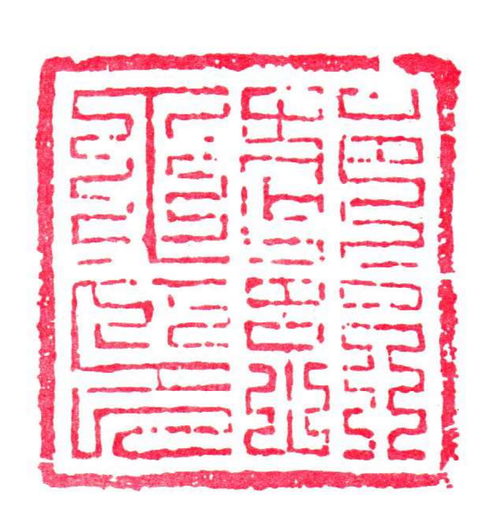
323　都統之印

1976年出土于河南省延津縣。6.7×6.7厘米。藏河南省博物館。



324　都統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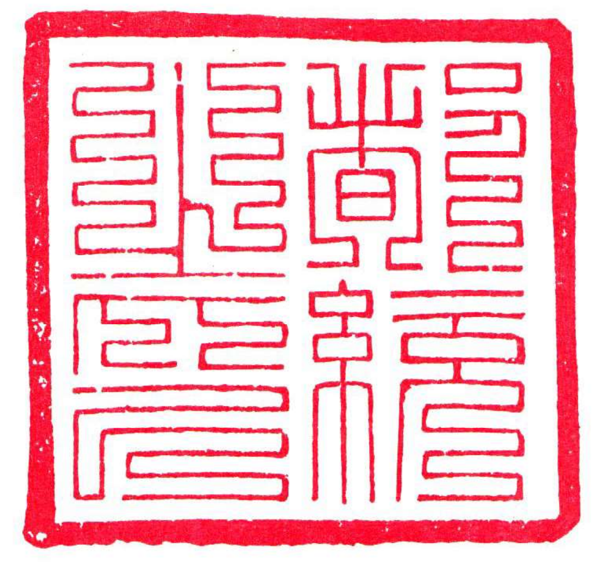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1×6.4厘米。見《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



325　都統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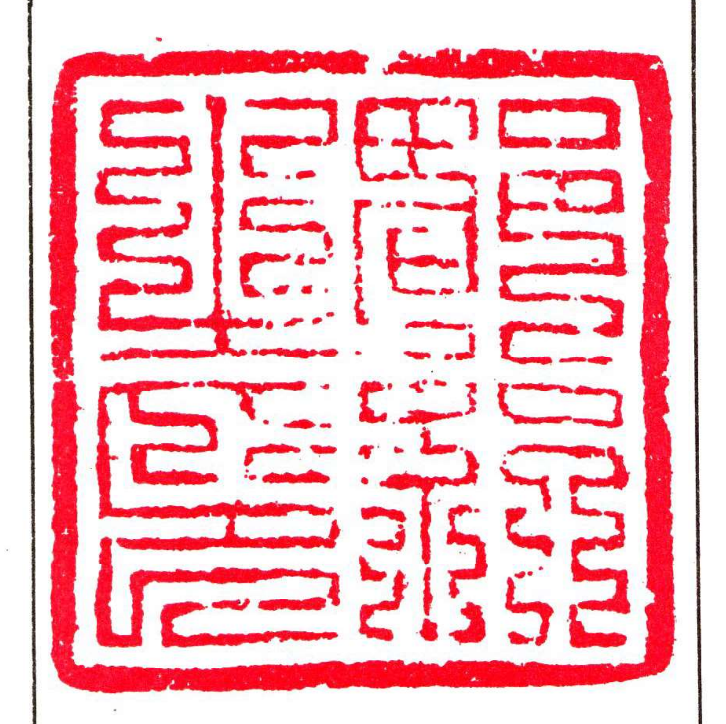
近年出土于陝西省武功縣。6.6×6.6厘米。藏武功縣文化館。





326　**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7×5.9厘米。見《金石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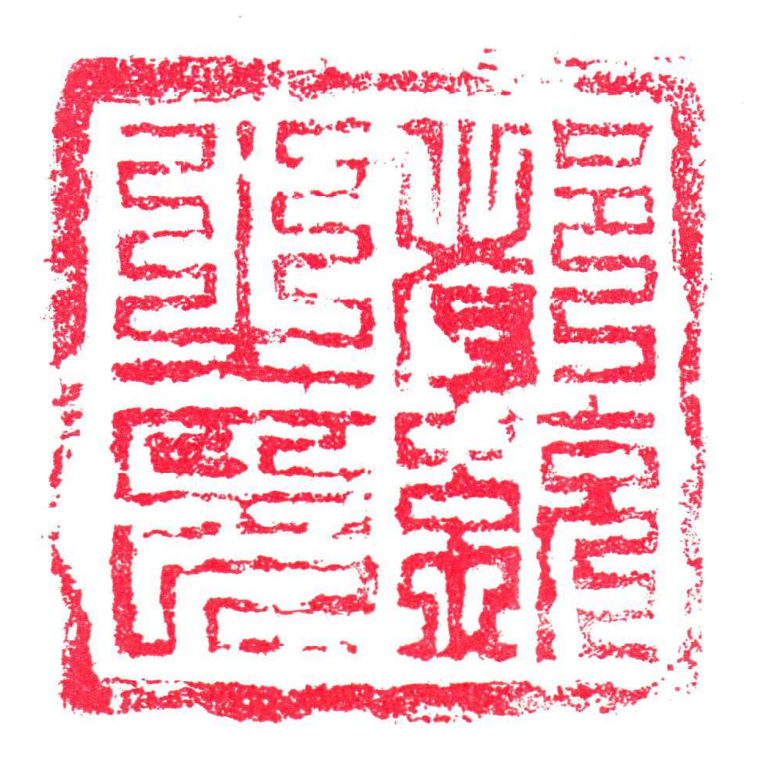
327　**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9×6.7厘米。見《意園古今官印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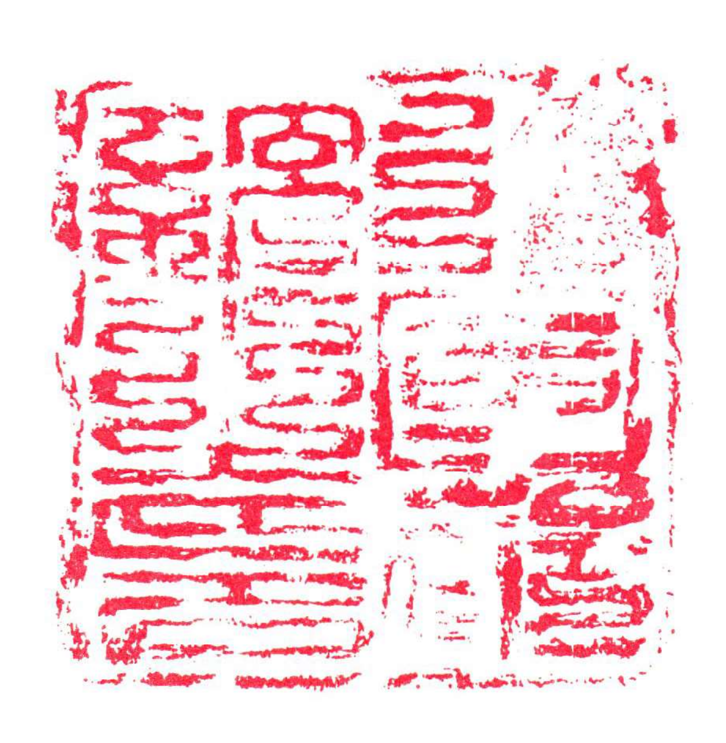
328　**都統之印**

1983年3月出土于陝西省安康縣。6.8×6.7厘米。藏安康地區文管會。



329　**都統之印**

1985年夏出土于山西省河曲縣。7×7厘米。藏河曲縣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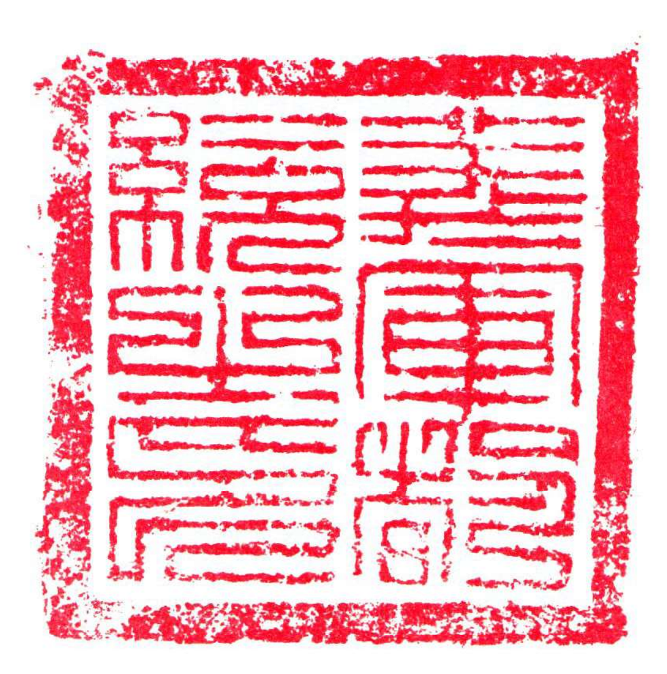
330　**行軍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6.6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331　　征行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7×6.7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332　　義軍都統之印

近年于陝西省鳳翔縣徵集．6.2×6.2厘米．背刻"東行部造"、"正大二年三月日"．側刻"義軍都統之印"．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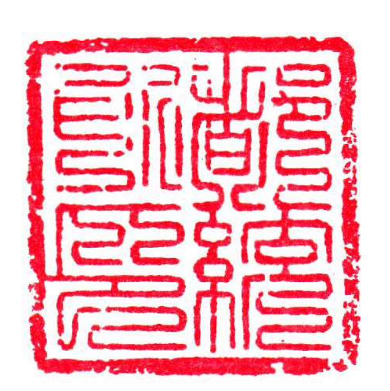
333　　義軍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6厘米。藏吉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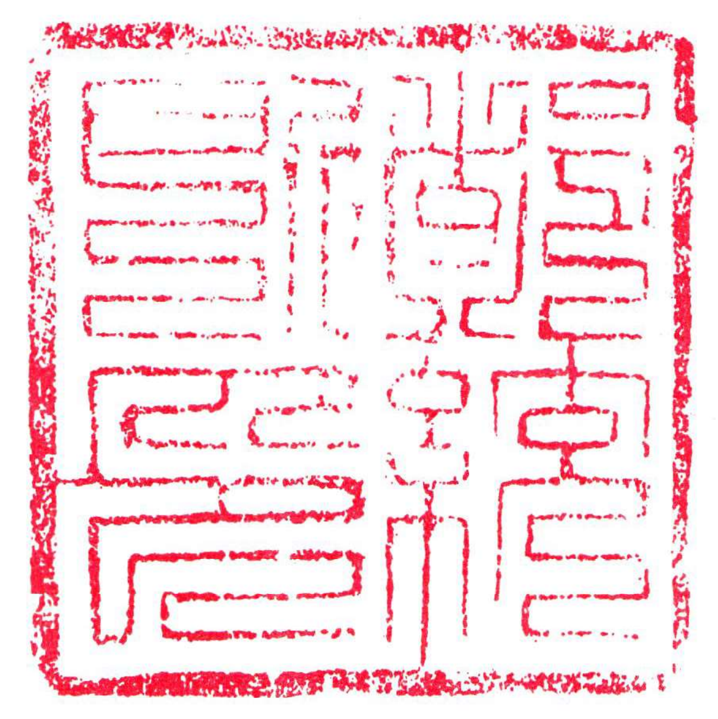
334　　義軍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2×6.2厘米。背刻"大乣統"。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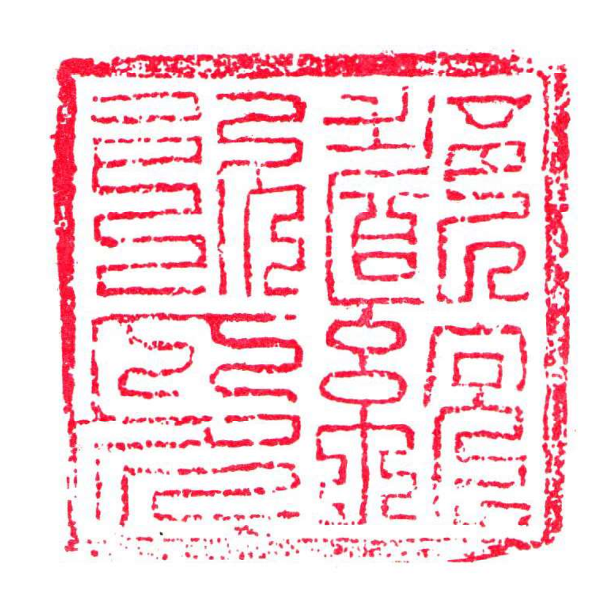
335　　都統所印

1970年出土于河北省欒縣。7.1×7.1厘米。背刻"貞祐元年十二月"、"禮部造"。側刻"都統所印□非"。藏河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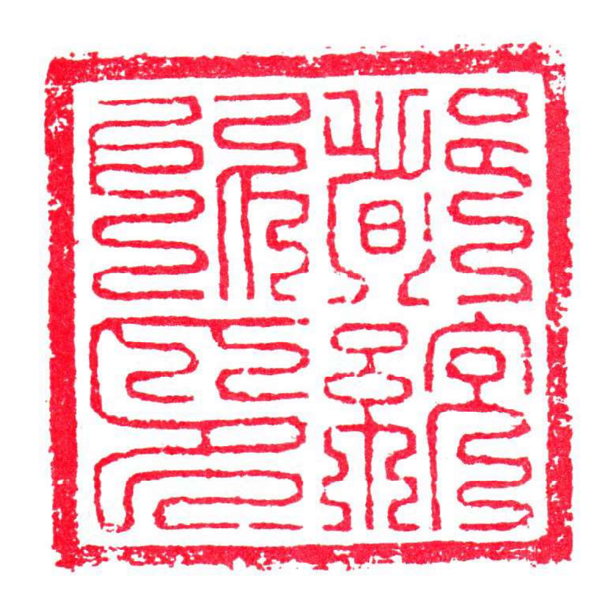
336　　都統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7厘米。背刻“貞祐四年”、“軍帥所造”。原藏大西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337　　都統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7厘米。背刻“貞祐五年正月”、“行六部造”。側刻“都統所印”。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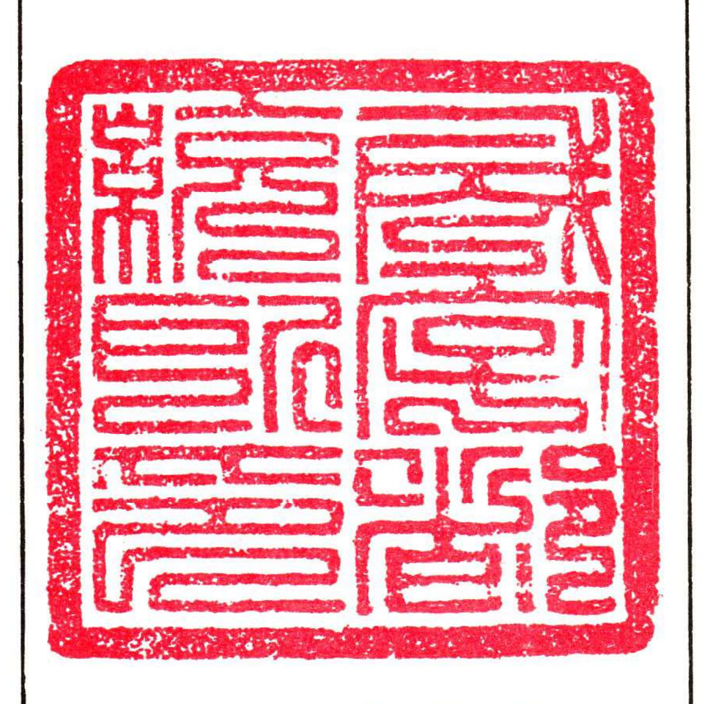
338　　**都統所印**

1974年5月出土于黑龍江省伊春市。6.9×6.9厘米。側刻“貞祐六年七月造”、“都統所印”。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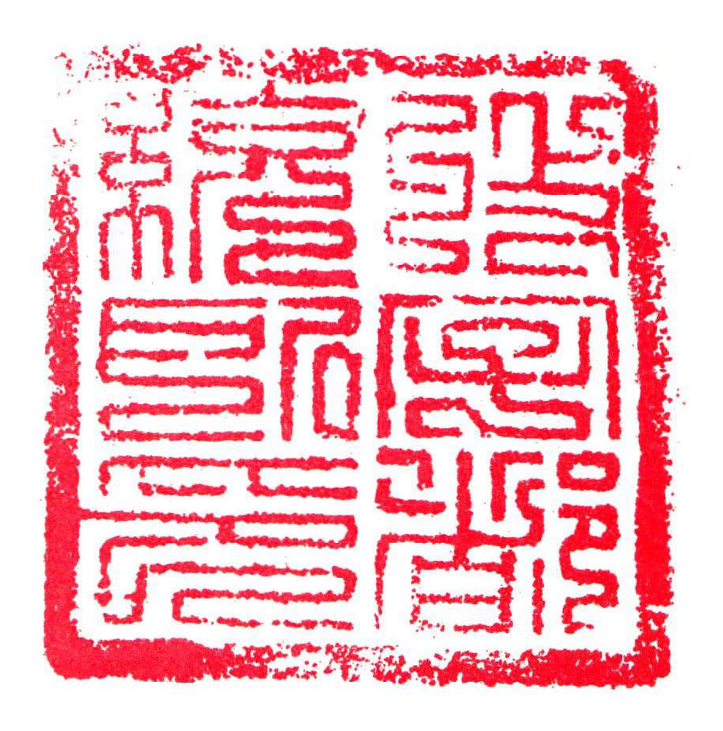
339　　**都統所聽字印**

1965年出土于河南省南陽市。7.1×7.1厘米。背刻“興定元年九月”、“□□禮部造”。側刻“都統所聽字印”。藏河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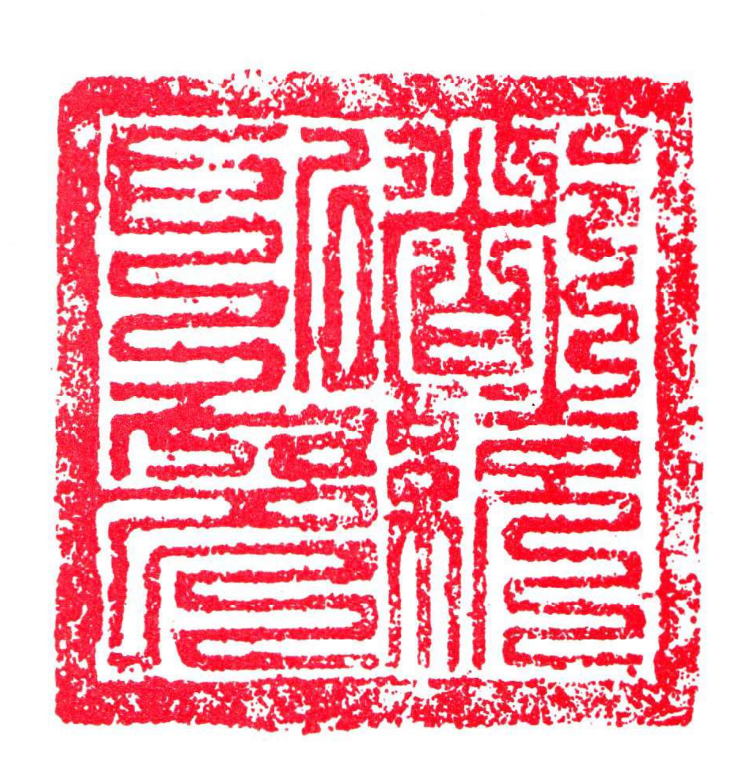
340　　**成字都統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8×6.8厘米。背刻“正大四年十一月”、“行宮禮部造”。紐端刻“上”字。見《金石索》、《意園古今官印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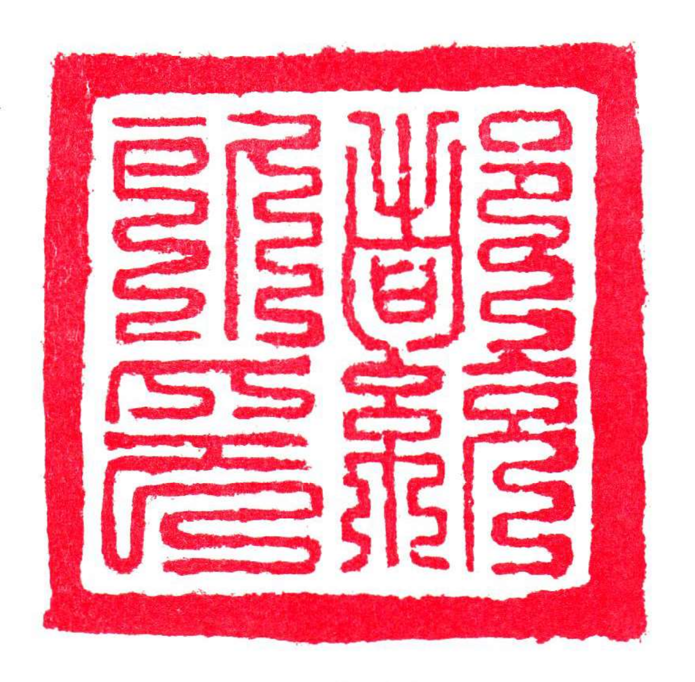
341　收字都統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6.6厘米。背刻“正大四年十一月”、“行宮禮部造”。側刻“收字都統所印”。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藏旅順博物館。



342　都統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6.9厘米。背刻“開興元年三月”、“行宮禮部造”。原藏大西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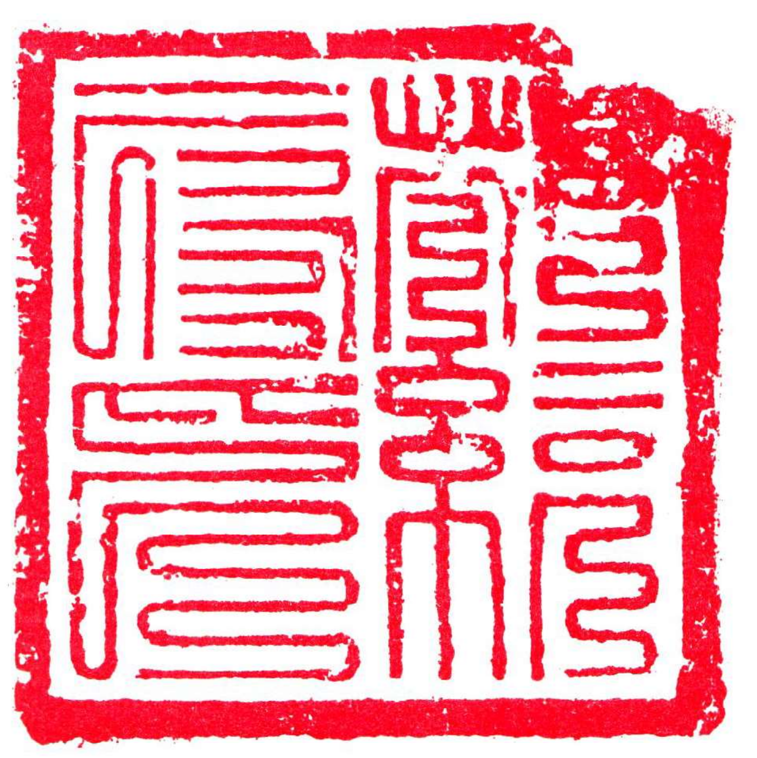
343　都統所印

1982年出土于河南省寶豐縣。6.2×6.2厘米。背刻“恒山公府天興元年造”、“都統所印”。紐端刻“上”字。藏寶豐縣文化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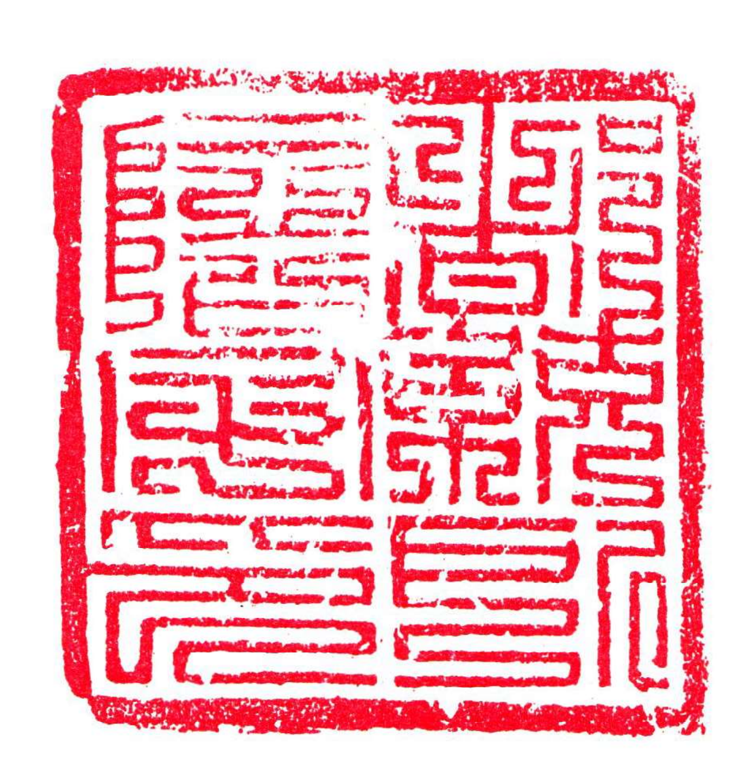
344　都統所印

1988年于河南省新蔡縣徵集。6.6×6.6厘米。側刻“天興二年二月日”、“潁州總帥造”、“都統印”。藏新蔡縣文物普查辦公室。



345　**都統府印**

近年于遼寧省朝陽縣徵集。7.5×7.5厘米。背刻"□□二年五月"、"都統所印"。藏朝陽市博物館。



346　**都統所陪字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6.9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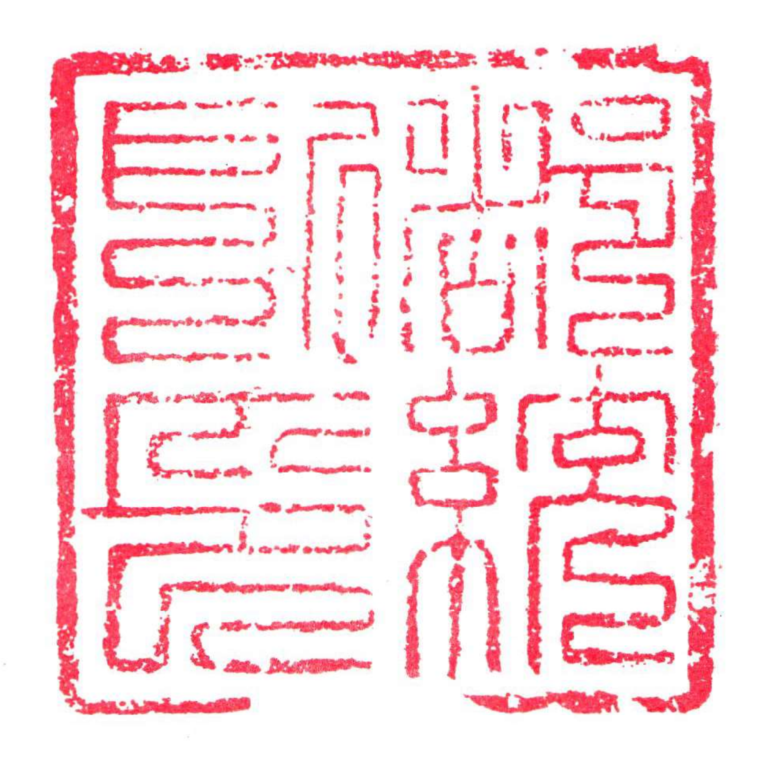
347　　都統所印

1970年冬出土于遼寧省莊河縣。7.3×7.3厘米。側刻"都統所印"。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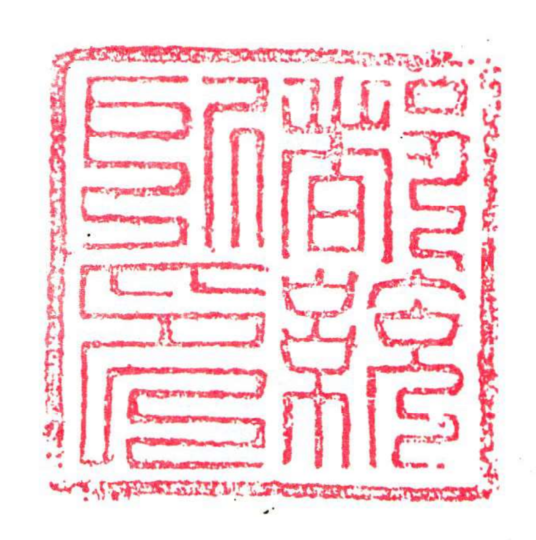
348　　都統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7厘米。見《集古印譜》。



349　　都統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7厘米。見《意園古今官印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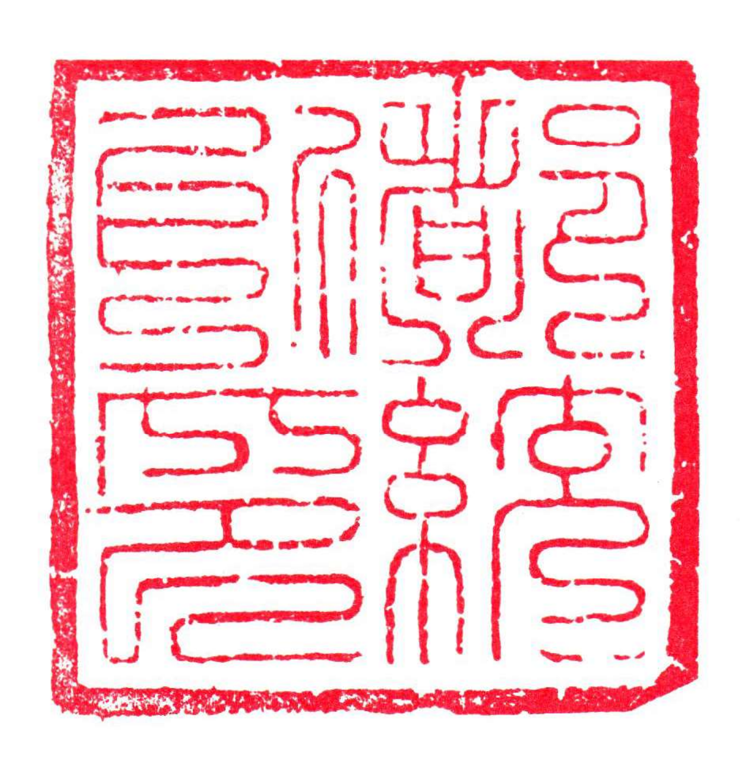
350　　都統所印

近年內蒙古自治區凉城縣出土。6.4×6.4厘米。背刻"都統所印"。藏處不詳。



351 都統所印

1961年出土于吉林省集安縣。6.8×6.8厘米。背刻已泐。藏集安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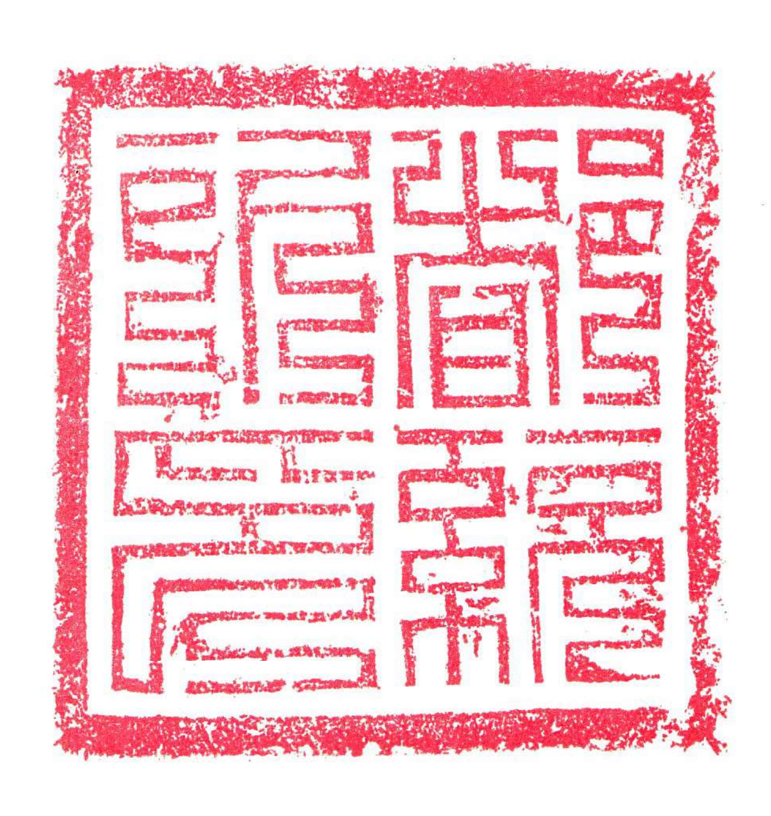
352 都統所印

1978年出土于吉林省白城市。7×7厘米。藏黑龍江省依蘭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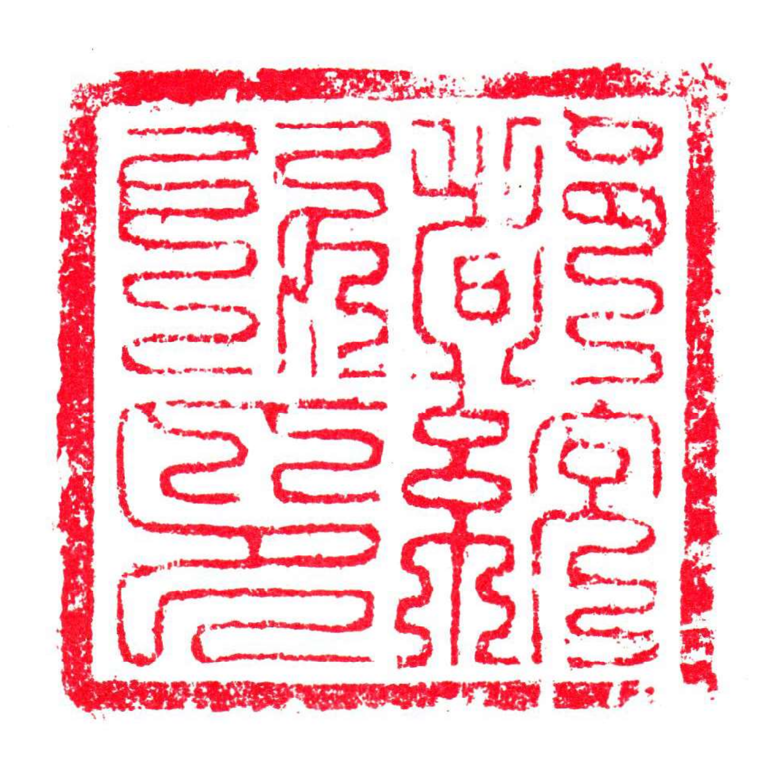
353　　都統所印

近年遼寧省凌源縣出土。7.4×7.4厘米。藏凌源縣博物館。



354　　都統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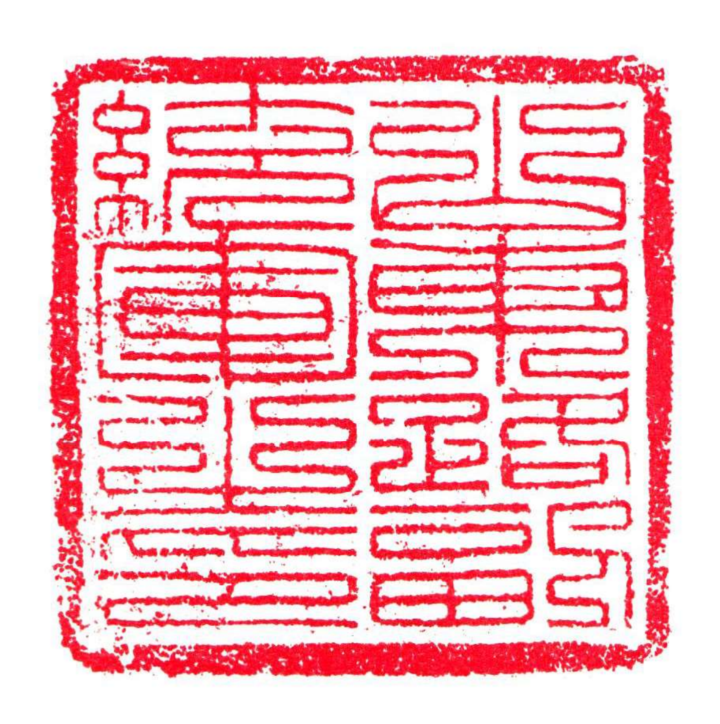
近年遼寧省岫岩縣出土。7×7厘米。藏丹東市文化部門。



355　　都統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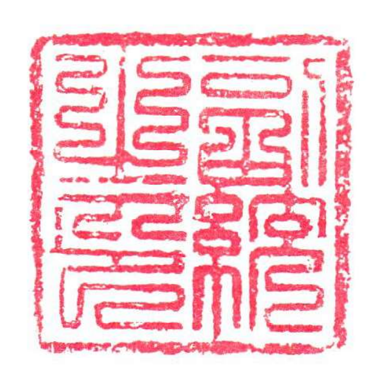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3×7厘米。

藏吉林省博物館。



356　**山東路副統軍之印**

1970年秋出土于河北省懷來縣。6.7×6.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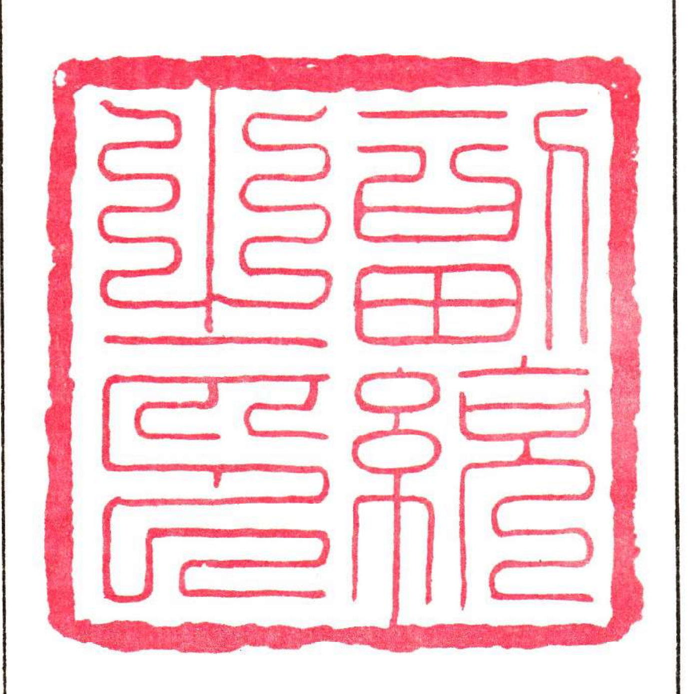


357　副統之印

1978年秋出土于安徽省鳳臺縣。背刻“貞祐元年十二月”、“禮部造”。側刻“副統之印□立”。紐端刻“上”字。藏淮南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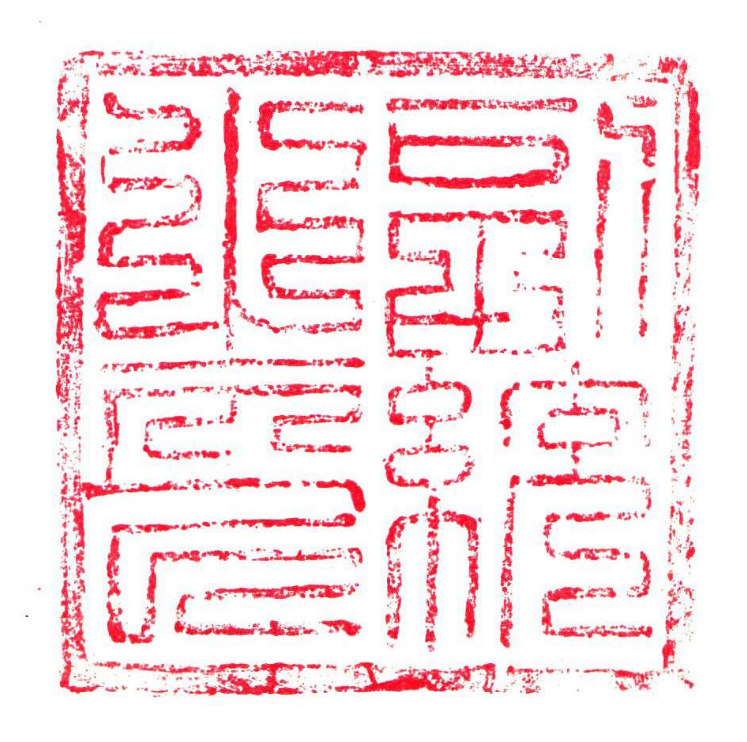
358　副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3×6.3厘米。背刻“貞祐二年正月□□平州造”。見《滿洲金石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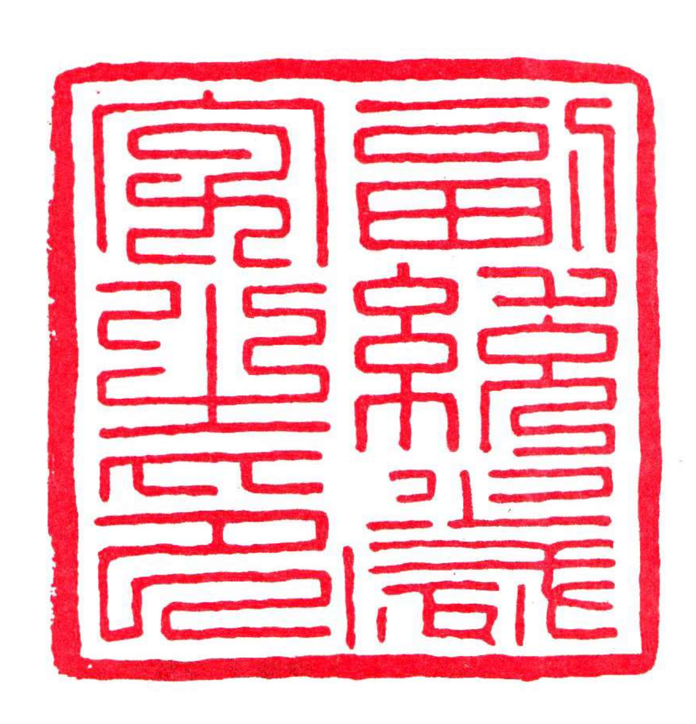
359　副統之印

民國間出土于遼西。6.4×6.4厘米。背刻“貞祐二年八月”、“真定帥府造”。原藏錦西王樸全。見《東北古印鉤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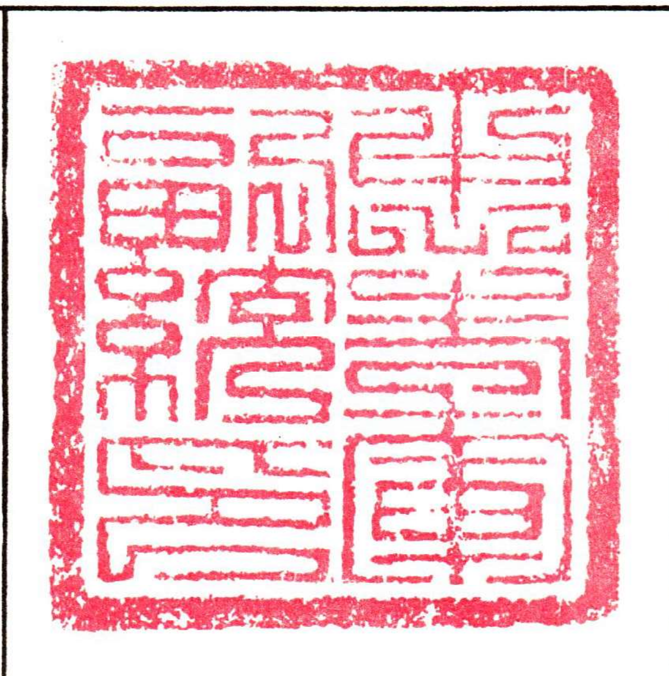
360　副統之印

1977年出土于河北省承德縣。6.8×6.8厘米。側刻"副統之印"、"貞祐 二年九月□□日造"。藏承德縣文管所。



361　副統歲字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5厘米。背刻"貞祐三年五月行宫禮部造"。側刻"副統歲字之印"。見《滿洲金石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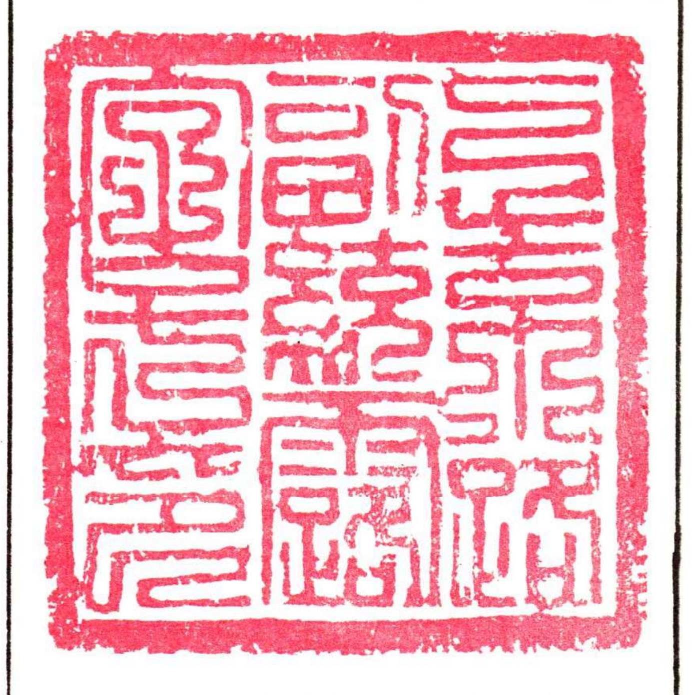
362　忠孝軍副統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7厘米。背刻“貞祐三年十一月日”、“山東東路行部造”。側刻“忠孝軍副統印”。原藏海寧許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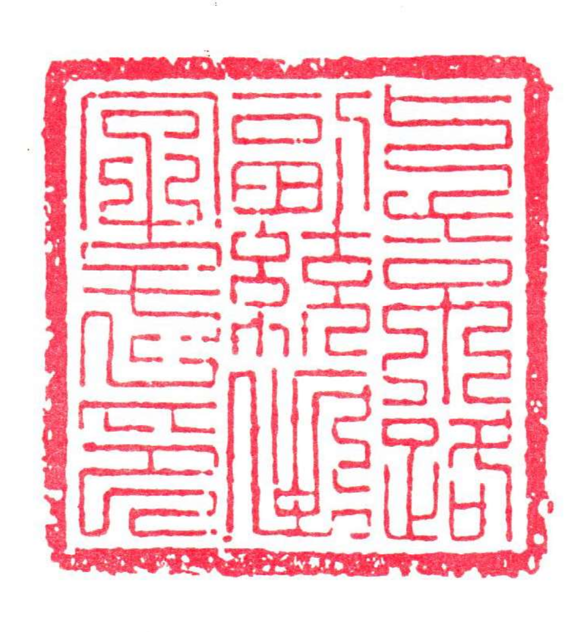
363　忠孝軍副統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厘米。背刻“貞祐三年十一月”、“京口路行部造”。見《古璽印概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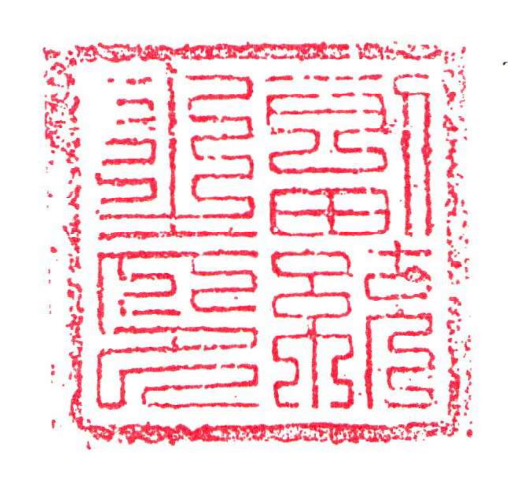
364　上京路副統露字号印

1977年11月出土于黑龍江省鷄東縣。6.5×6.5厘米。背刻“上京行部造”、“副統露字号”。側刻“貞祐四年正月”。藏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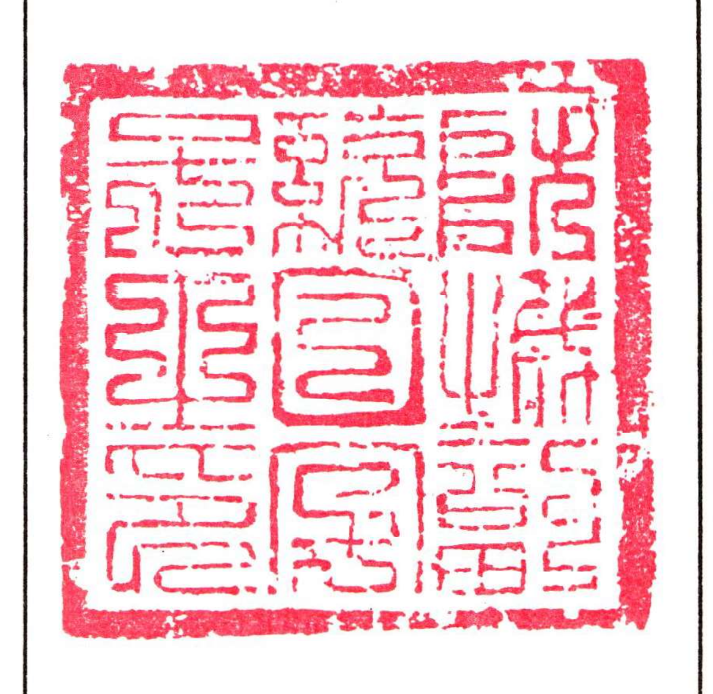
365　上京路副統出字号印

1980年7月出土于吉林省榆樹縣。6.5×6.5厘米。背刻“貞祐四年二月日”、“上京行六部造”。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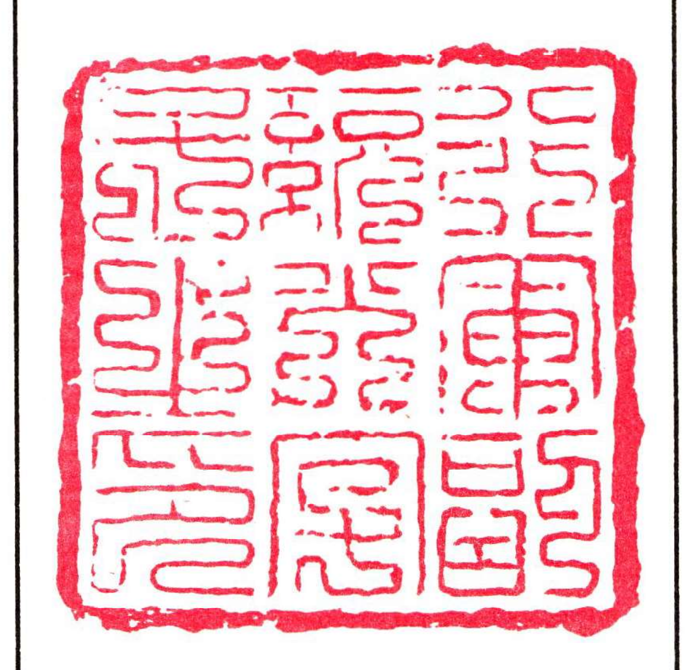
366　副統之印

近年内蒙古凉城縣出土。6.1×6.1厘米。背刻"河東北運司造"、"貞祐四年四月日"。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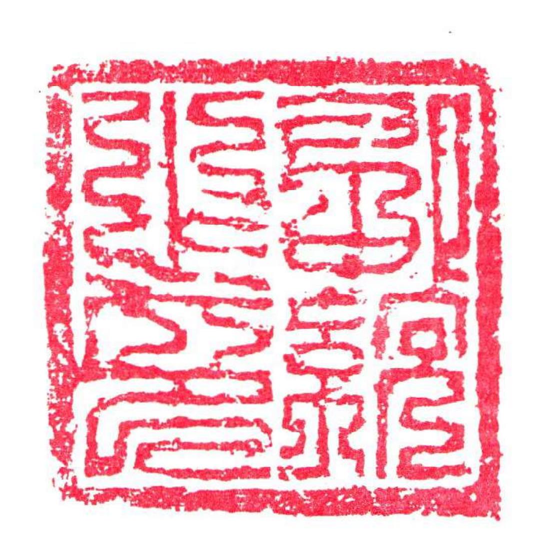
367　防城副統日字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1×6.4厘米。背刻"貞祐五年四月一日造"。側刻"防城副統日字号印"。藏上海博物館。



368　行軍副統光字号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2×6.3厘米。背刻"貞祐五年四月日造"。原藏錦縣王樸全。見《東北古印鉤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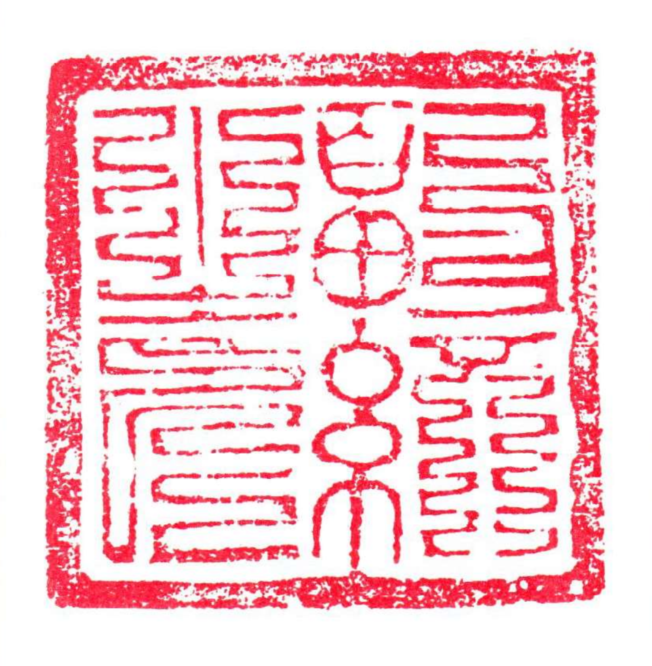
369　副統之印

1975年2月出土于黑龍江省湯源縣。6.5×6.5厘米。側刻"貞祐五年八月"、"副統之印"。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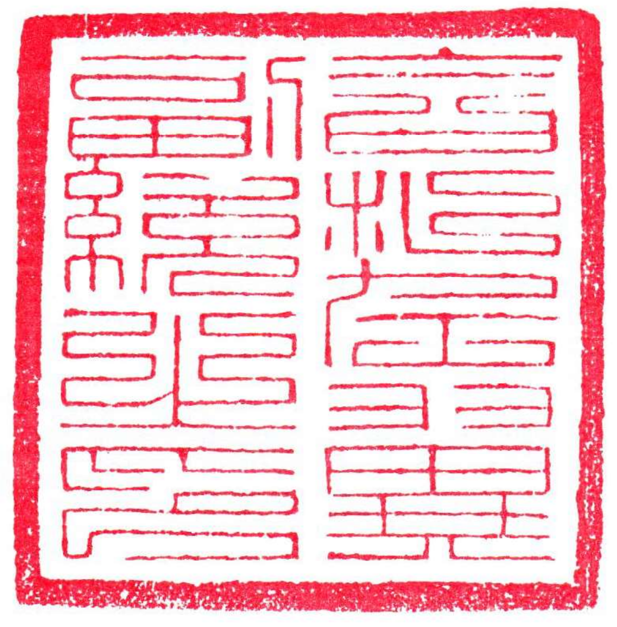
370　　**副統之印**

1970年3月出土于河北省易縣。6×6厘米。背刻“貞祐五年中都路經略□司造”。紐端刻“上”字。紐端上側刻一“率”字。藏河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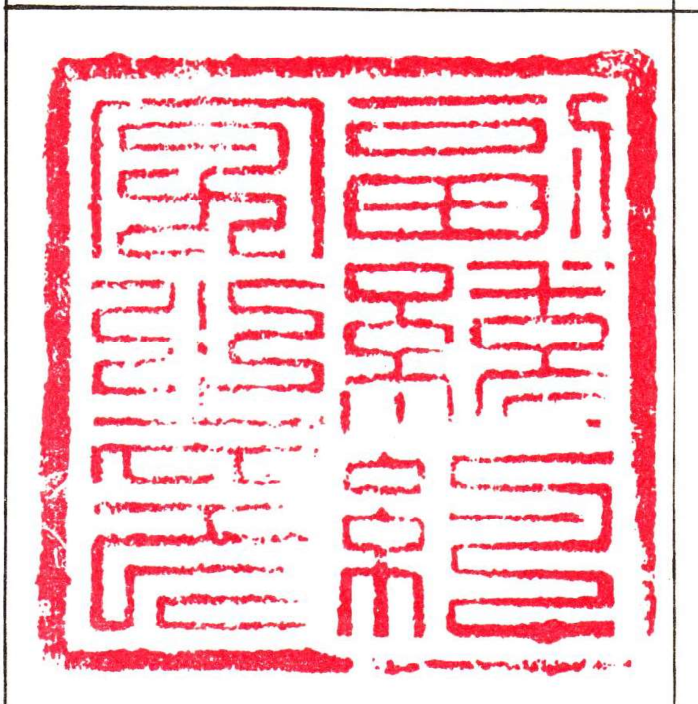
371　　**副統之印**

1970年7月于哈爾濱市徵集。6×6厘米。印背刻“副統”、“貞祐五年造”。紐端刻“上”字。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372　　**合札左翼副統之印**

清代河南省郾縣出土。6.4×6.3厘米。背刻“興定四年十月日東平行部造”。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附録》。



373　　**副統約字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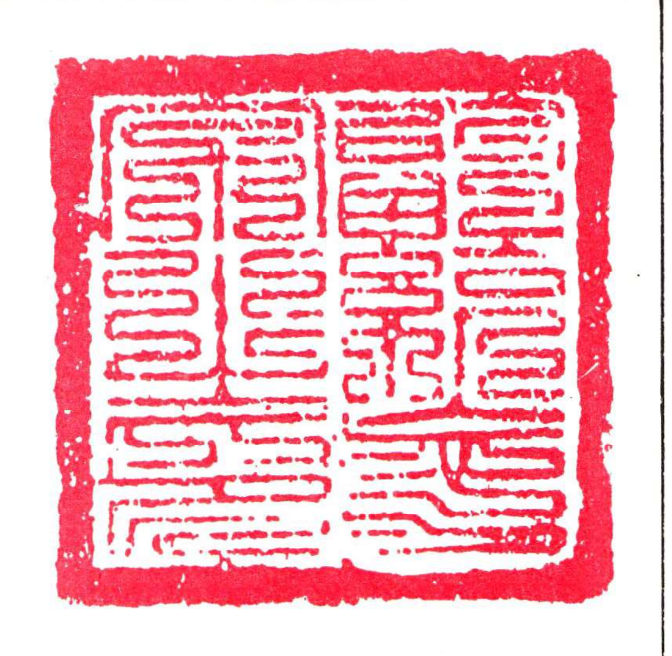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5厘米。背刻“元光二年正月”、“行宫禮部造”。紐端刻“上”字。見《金石索》、《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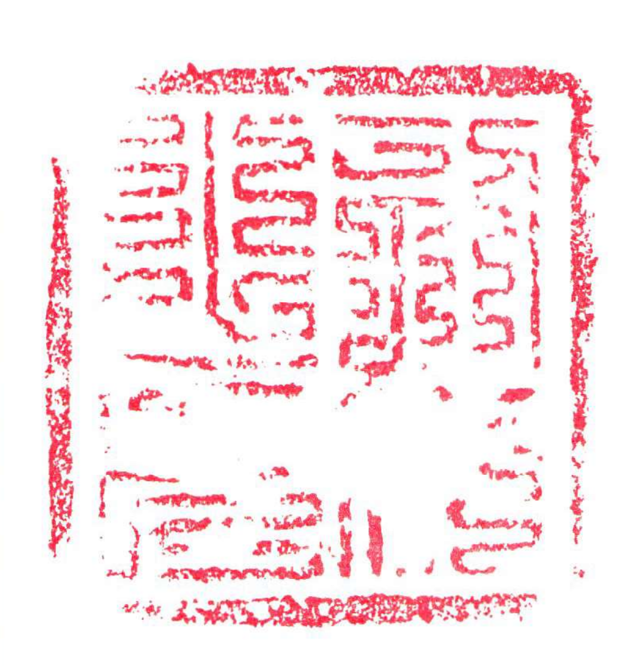
374　　**宣字副統之印**

1983年3月出土于陝西省安康縣。6.4×6.4厘米。背刻“正大四年九月”、“行宮禮部造”。側刻“宣字副統之印”。紐端刻“上”字。藏安康地區文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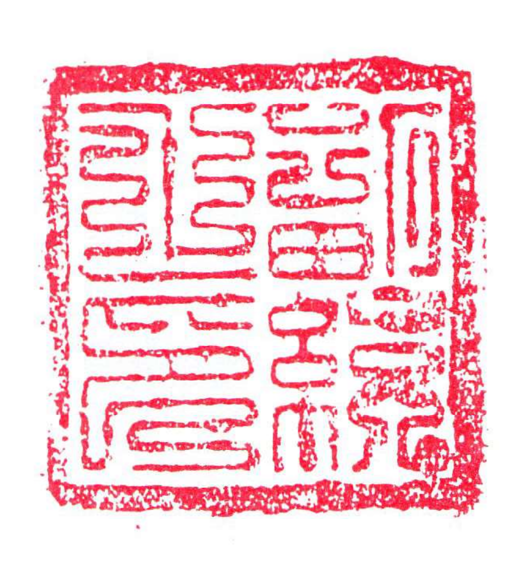
375　　**副統忘字之印**

近年河南省淇縣出土。6.1×6.1厘米。背刻“正大五年四月”、“恒山公府造”。紐端刻“上”字。藏淇縣文化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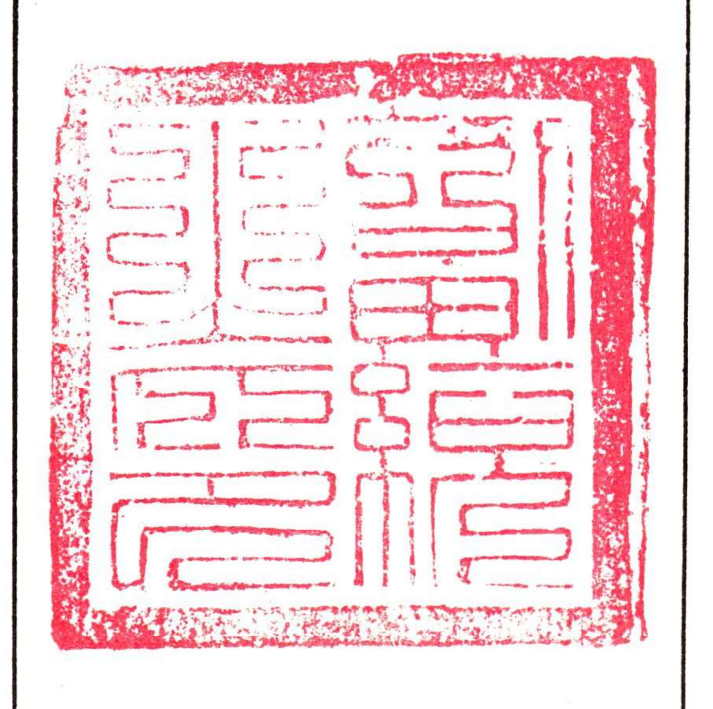
376　　**副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厘米。背刻“恒山公府”、“開興元年四月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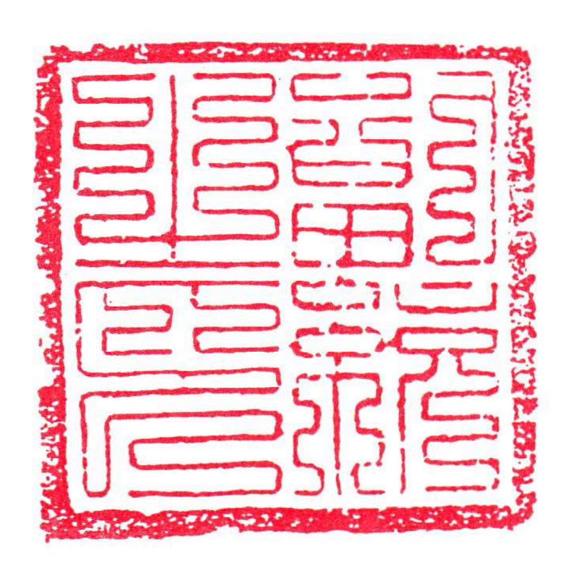
377　　**副統之印**

1952年于河南開封徵集。6.5×6.5厘米。背刻“開興元年造”。藏河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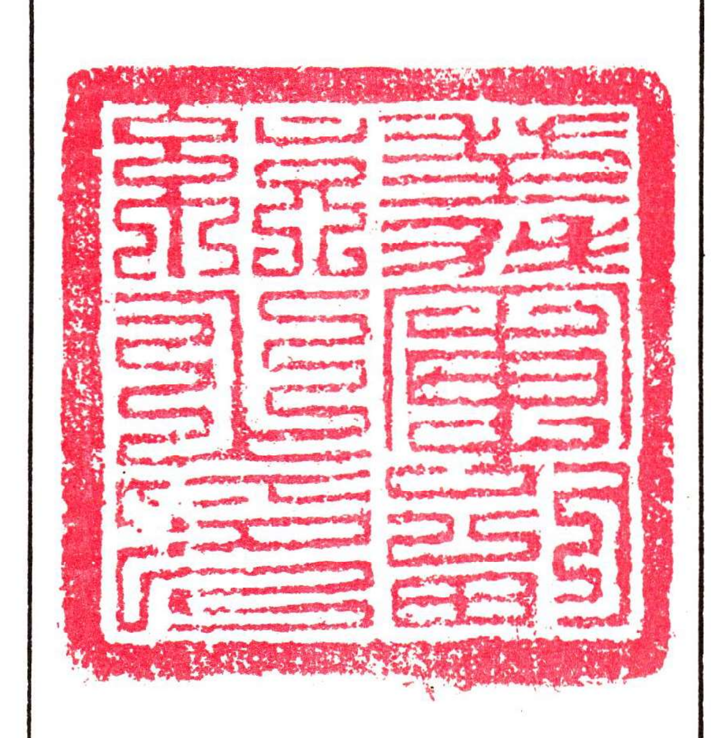
378　副統之印

1975年春出土于安徽省阜陽縣.6.5×6.3厘米。背刻“天興元年十一月日行六部造副統印”。藏阜陽地區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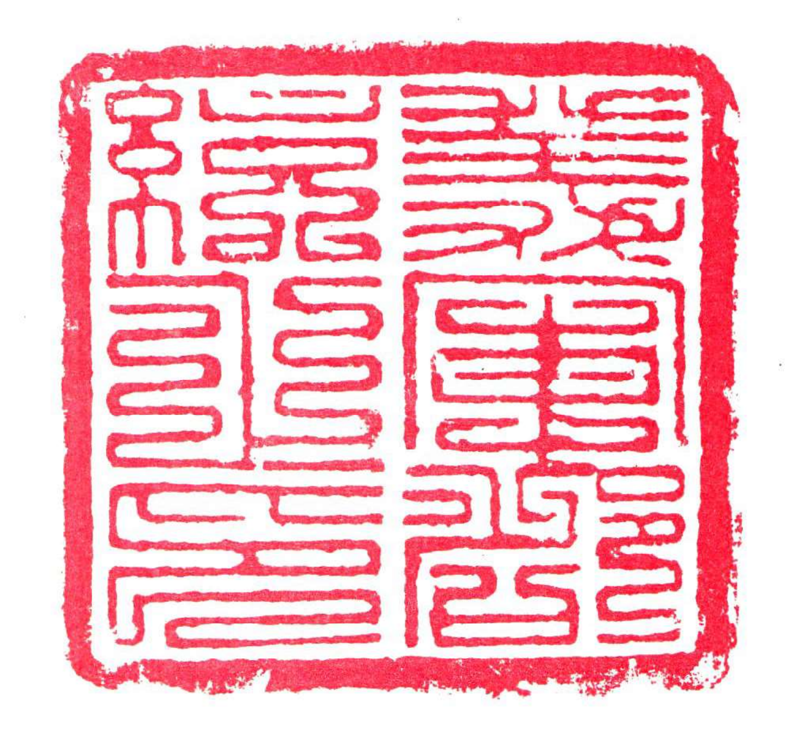
379　副統之印

1980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洛陽.6×6厘米。背刻“天興元年”、“總部造”。側刻“副統印”。紐端刻“上”字。藏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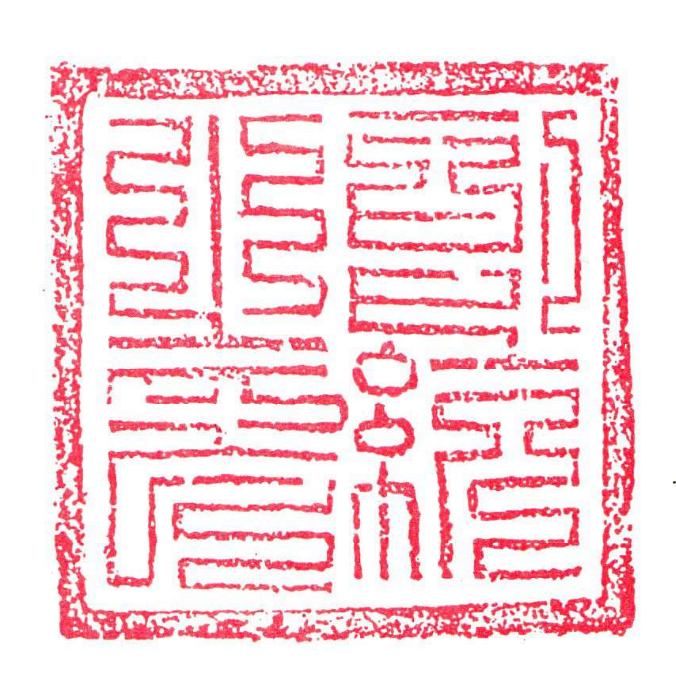
380　義軍副統之印

1971年出土于西安市.6.6×6.6厘米。背刻“天興元年”、“行部造”。紐端刻“上”字。藏陝西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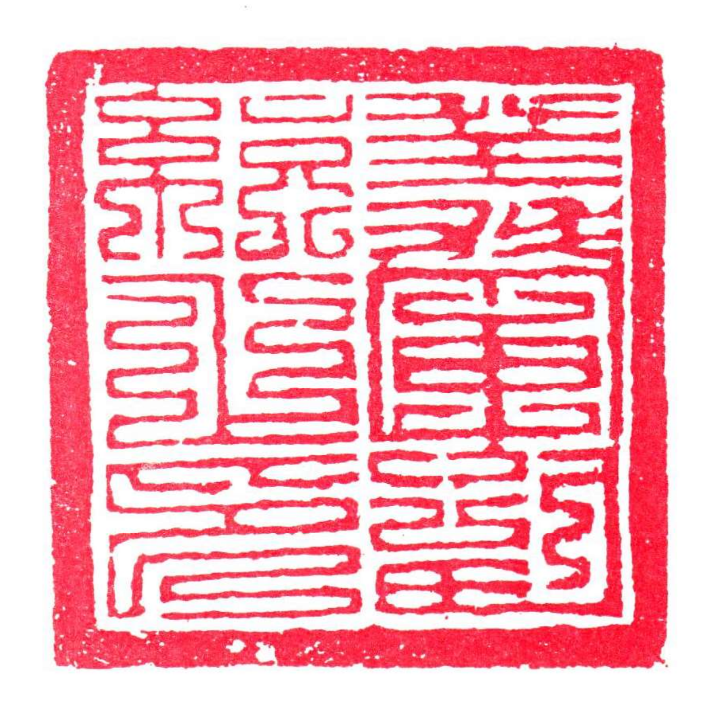
381　**義軍都統之印**

1972年于河南省密縣徵集。背刻“天興元年”、“行部造”。側刻“義軍都統之印”。紐端刻“上”字。藏密縣文化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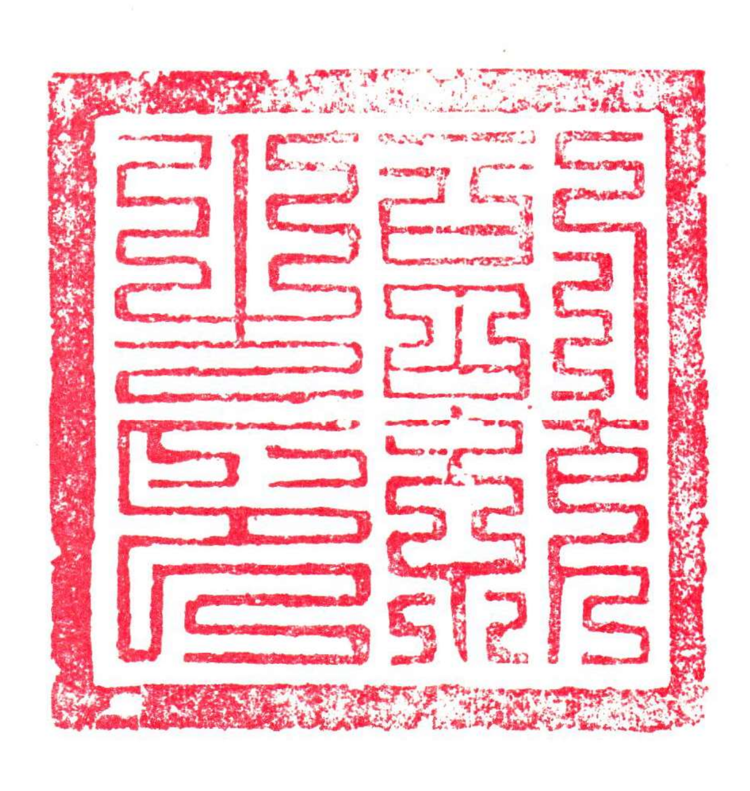
382　**副統之印**

近年出土于河南省郾城縣。6.3×6.3厘米。背刻“天興二年正月日造”。側刻“副統之印”。藏河南省文物工作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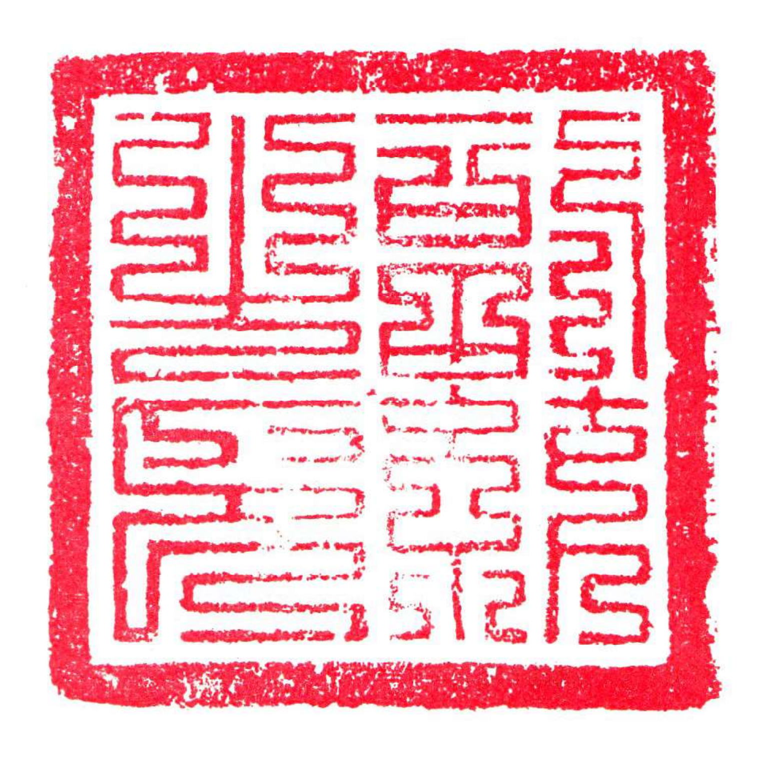
383　**義軍副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5厘米。背刻"天興二年"、"行部造"。側刻"義軍副統之印"。藏上海博物館。



384　**副統之印**

1977年出土于黑龍江省湯源縣。7×7厘米。藏依蘭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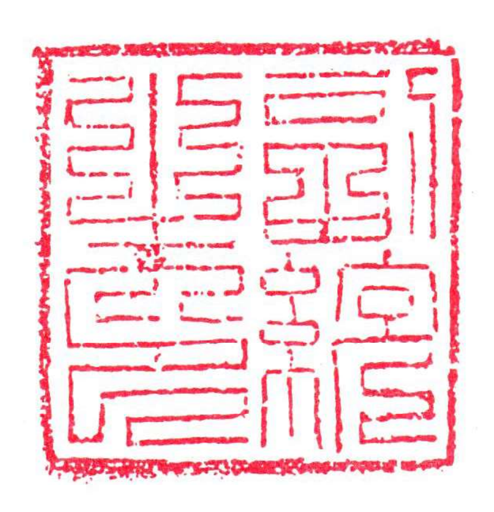
385　副統之印

遼寧省鳳城縣出土。出土時間不詳。7×7厘米。藏旅順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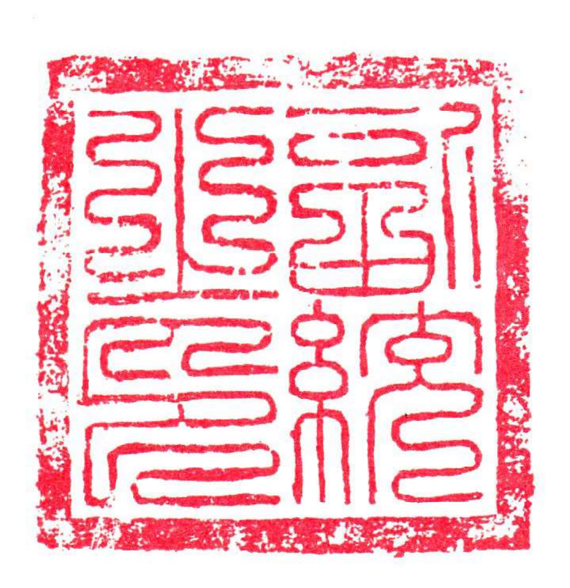
386　副統之印

1953年于河北省保定徵集。6×5.7厘米。藏河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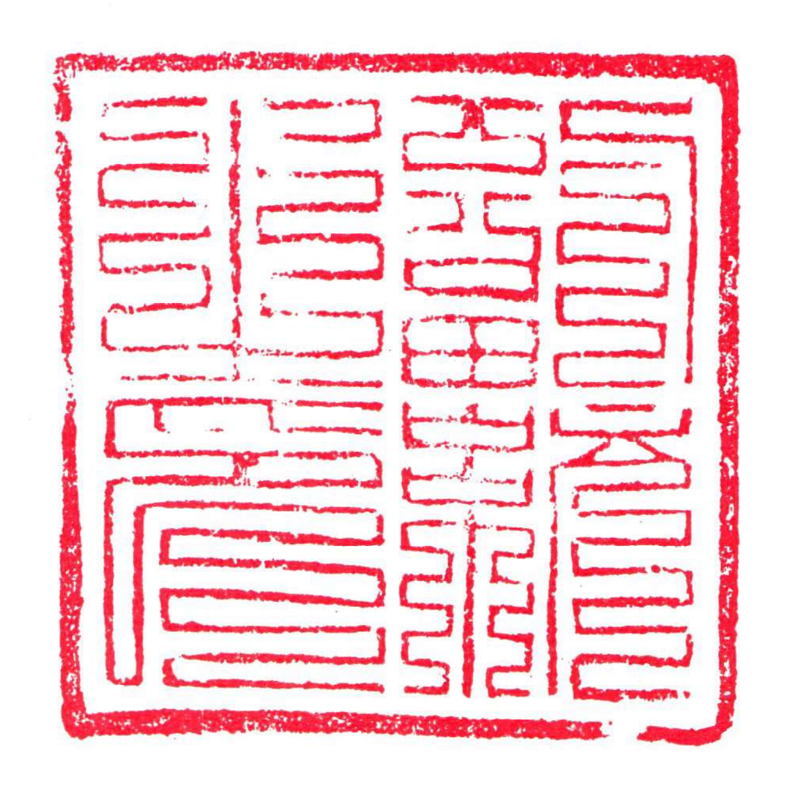
387　　副統之印

1977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區喀喇沁旗。6.4×6.4厘米。藏赤峰市博物館。



388　　副統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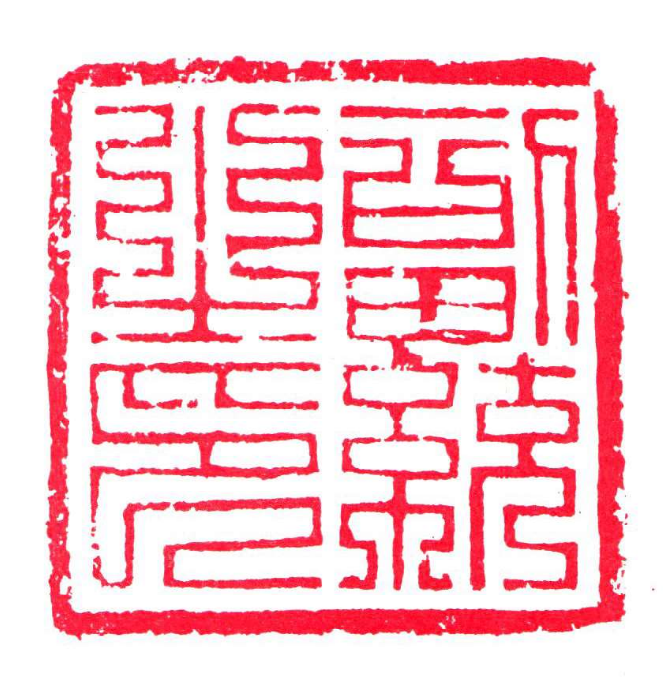
1976年8月出土于黑龍江省方正縣。7×7厘米。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389　副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3×7.3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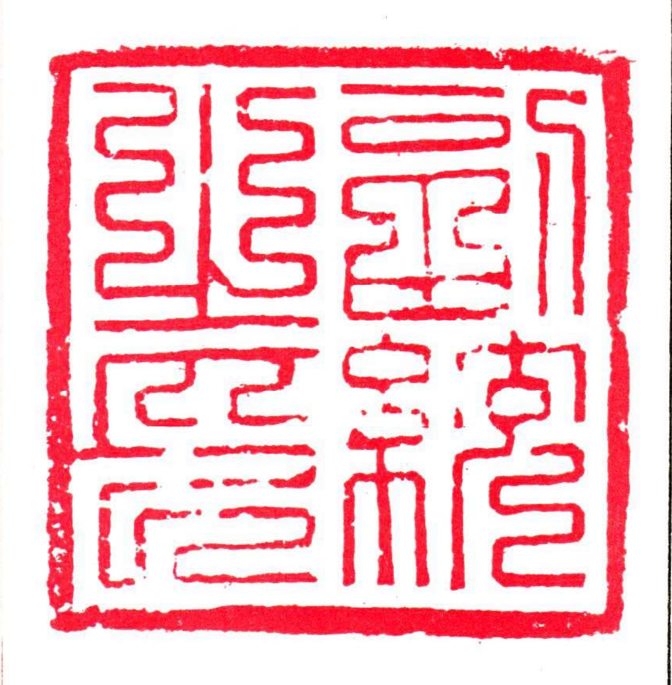
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390　副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2×6.2厘米。

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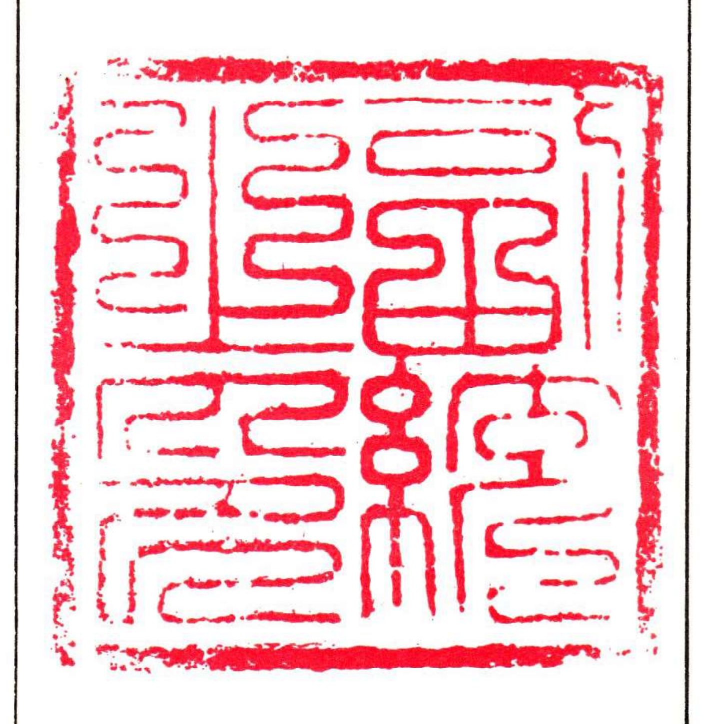
391　**副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3×6.3厘米。藏吉林大學。



392　**副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6×5.6厘米。見《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



393　**副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7×6.7厘米。藏吉林省博物館。



394　副統之印

河北省平泉縣出土。出土時間不詳。6.3×6.8厘米。藏平泉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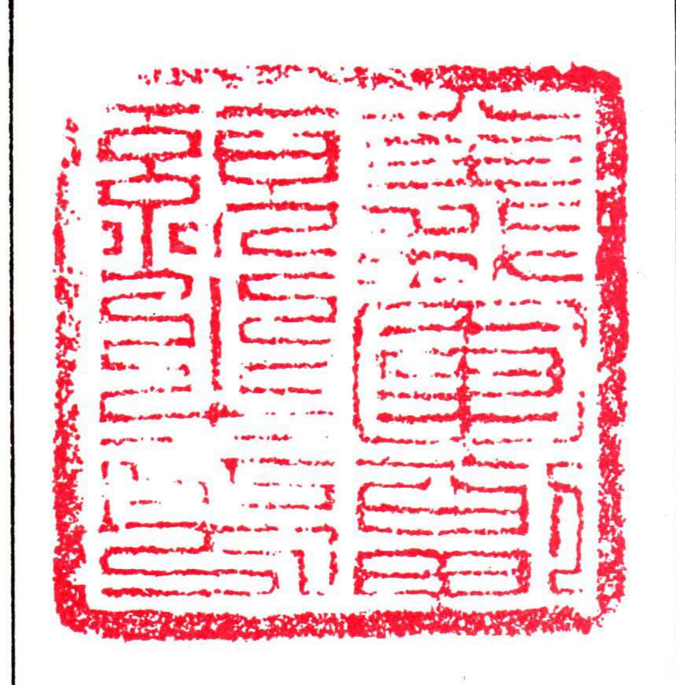
395　副統約字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5厘米。見《集古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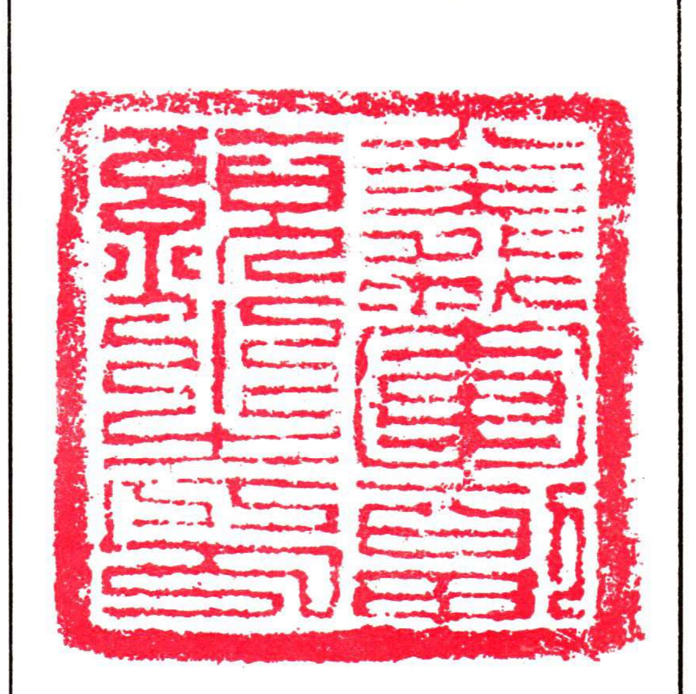
396　**副統約字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1×5.9厘米。見《意園古今官印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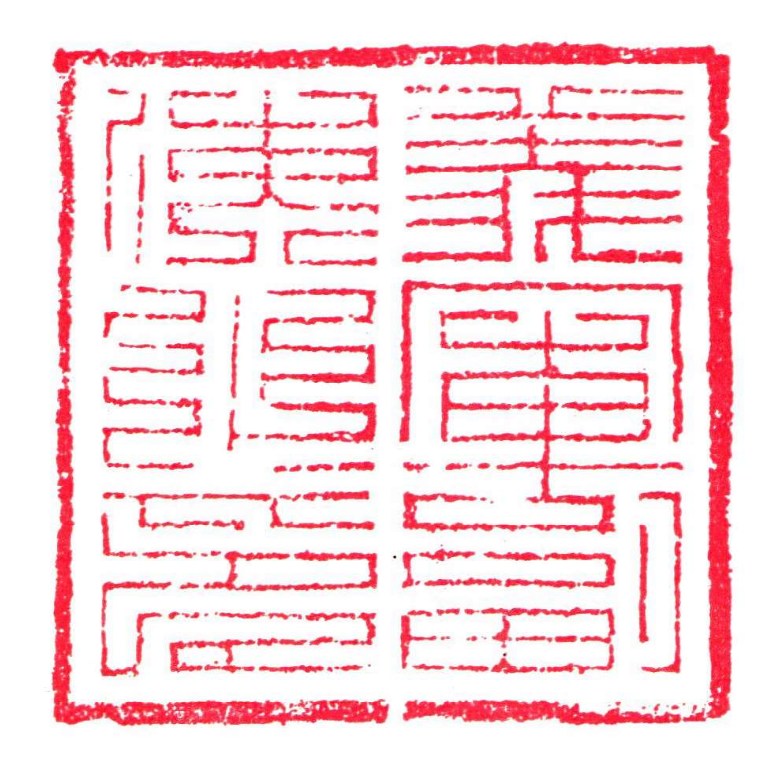
397　**義軍副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1×6.1厘米。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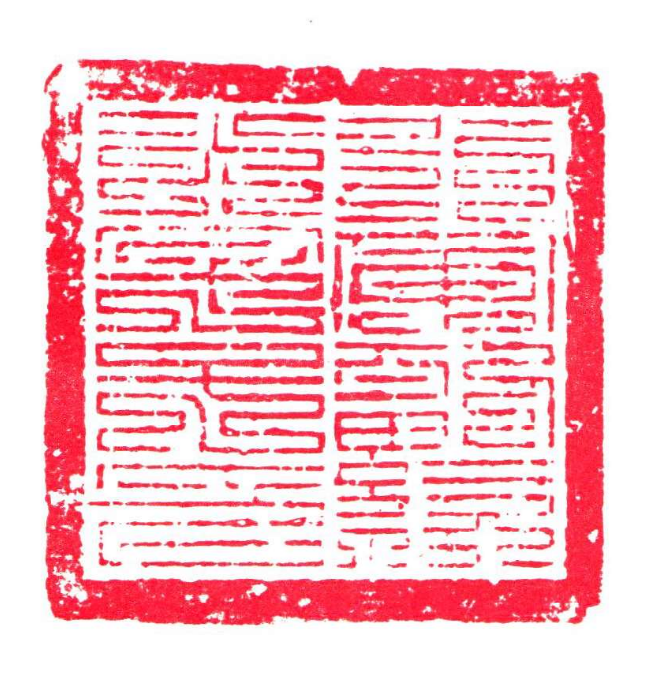
398　**義軍副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厘米。側刻“義軍副統印”。鈕端刻“上”字。藏旅順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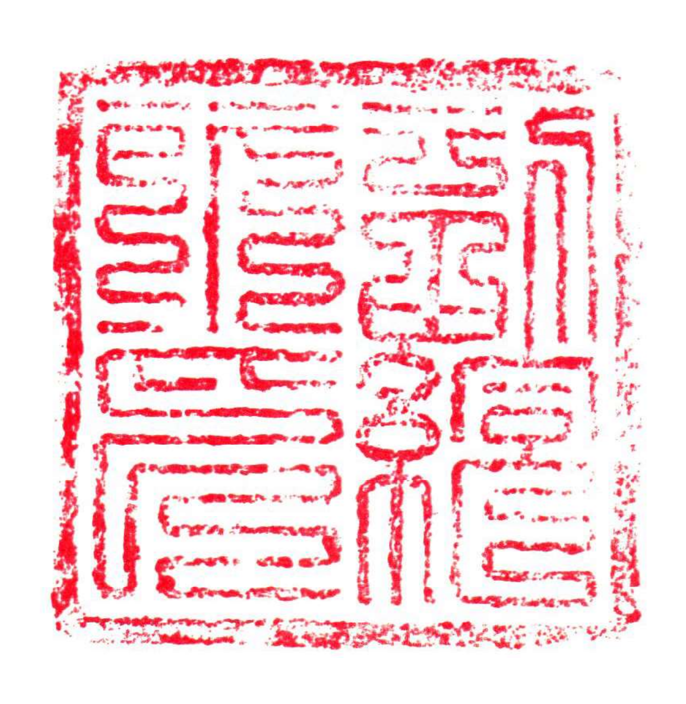
399　義軍副使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3×7.3厘米。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400　行軍副統光字号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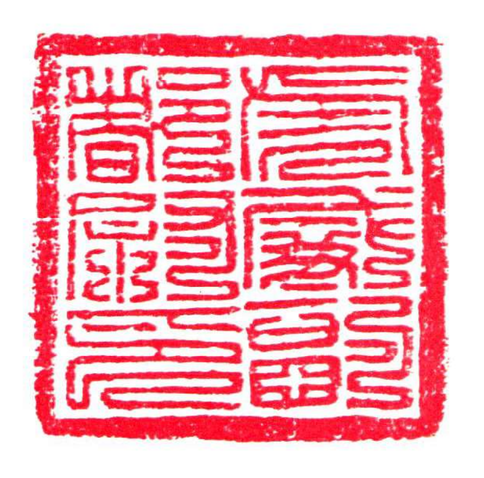
近年于山西省昔陽縣徵集。6×6厘米。藏昔陽縣文管所。



401　　副統之印

1982年3月出土于河北省承德縣。背刻“副統印谷字號”。紐端刻“上”字。藏承德縣文管所。

卷十一　都尉邊將彈壓總押總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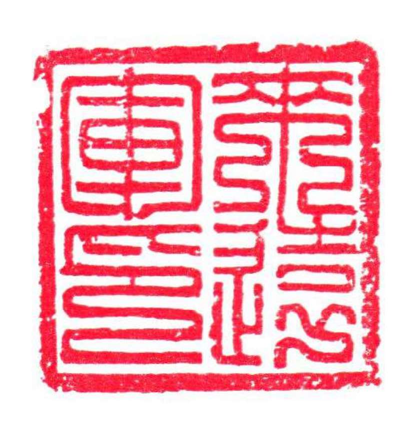
402　**虎威副都尉印**

1978年出土于山東省蒼山縣。7.3×7.3厘米。側刻“壬辰年正月丑”。紐端刻“上”字。藏蒼山縣文化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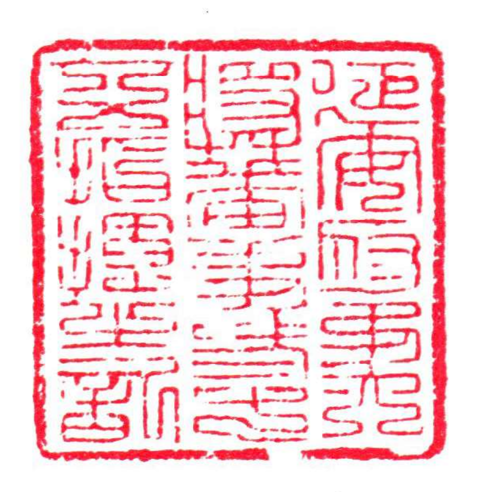
403　**安平都尉之印**

1984年5月出土于河北省任城縣。6.7×6.7厘米。藏任城縣文化部門。



404　來遠軍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3×6.35厘米。藏遼寧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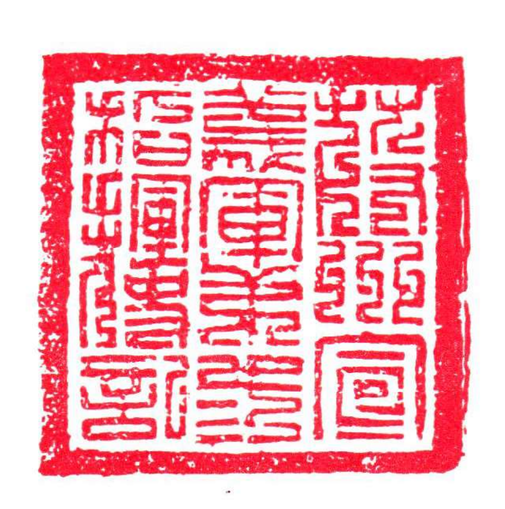
405　延安府第六將蕃第二十五指揮之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4×4.4厘米。背刻“大定八年少府監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406　第十將第六十指揮之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5×4.5厘米。背刻“定十三年六月禮部造”。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407　葭州宣義軍第三指揮使記

1979年出土于陜西省神木縣。4.5×4.5厘米。背刻“興定六年六月”、“行宫禮部造”。側刻“葭州宣義軍”、“第三指揮使”、“印”。藏處不詳。



408　熙秦第十將漢弓箭第八十二指揮記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7×4.7厘米。背刻"大定十二年"。側刻"熙秦第十將漢弓箭第八十二指揮記"。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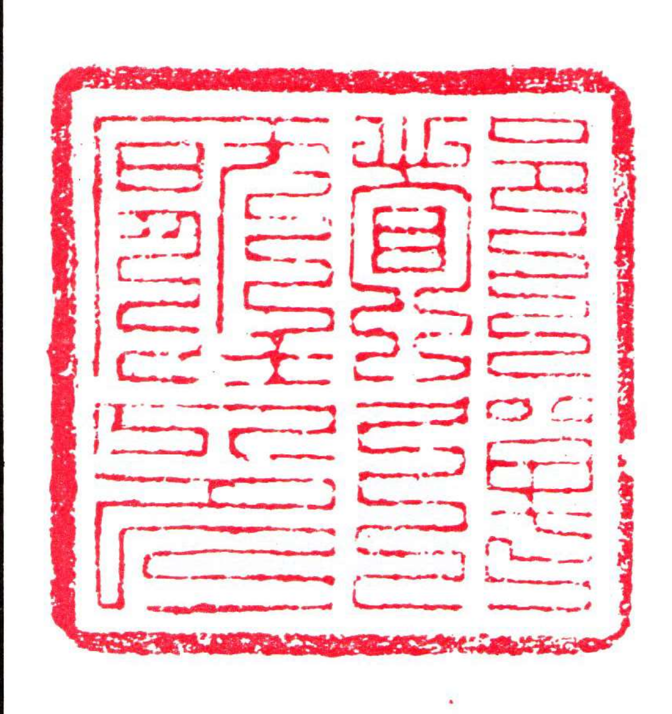
409　開邊寨第六將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2×5.2厘米。背刻"正大五年四月"、"行宫禮部造"。側刻"開邊寨第六將之印"。藏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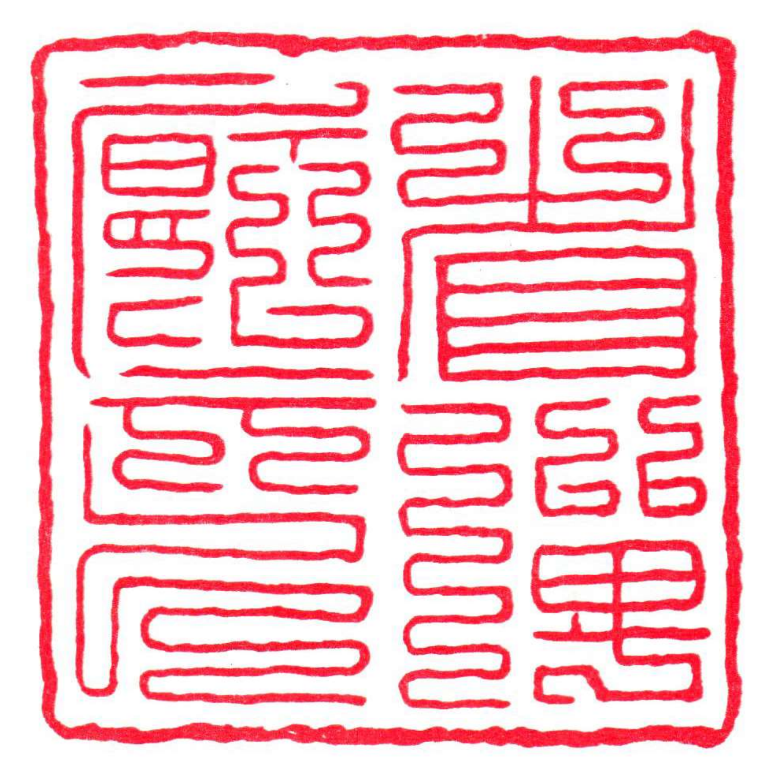
410　都彈壓印

1972年出土于吉林省扶餘縣。6.6×6.6厘米。藏扶餘縣展覽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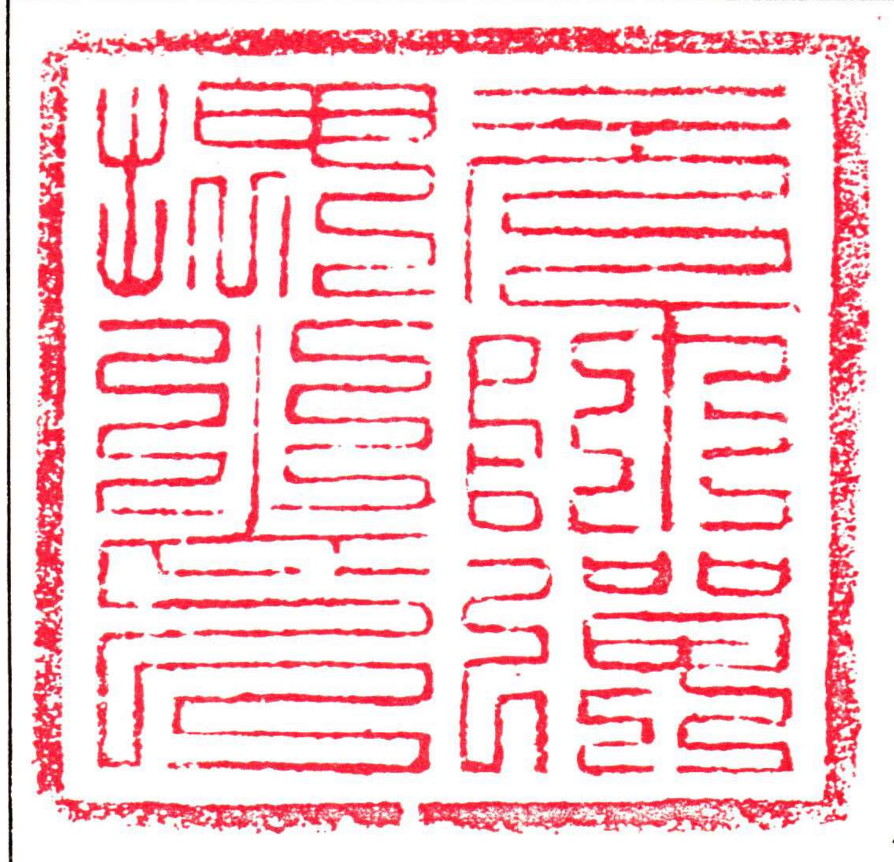
411　都彈壓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3×6.3厘米。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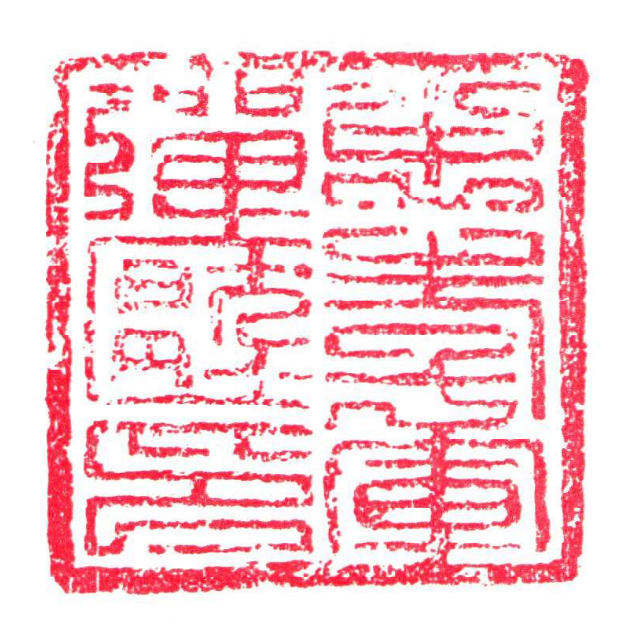
412　**省彈壓印**

民國間出土于黑龍江省寧安縣。7.5×7.5厘米。原藏寧安伊雙海(晏波)。見《東北古印鉤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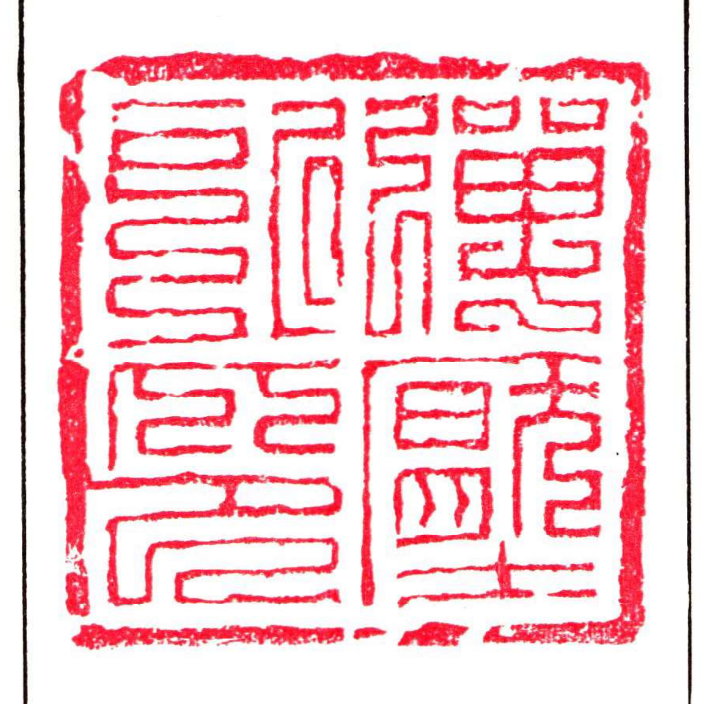
413　**元帥彈押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8.5×8.4厘米。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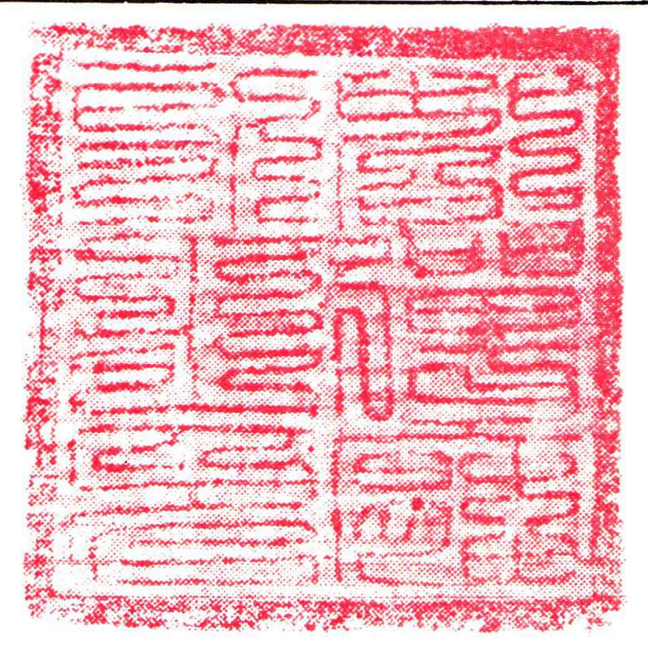
414　　忠孝軍彈壓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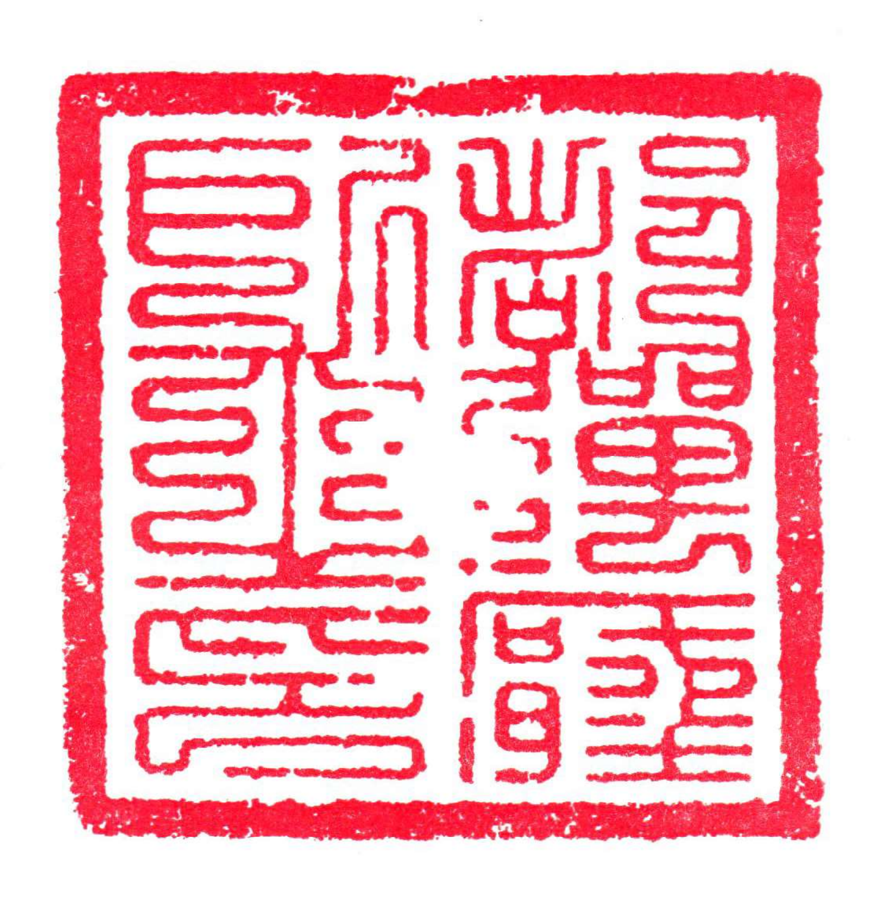
415　　彈壓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3×6.3厘米。原藏曲阜顔氏。見《金石索》、《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416　　都彈壓所之印

1962年8月出土于黑龍江省阿城縣。6.5×6.5厘米。側刻"貞祐五年四月"、"上京行六部"、"都彈壓所之印"。官印佚失。印様存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417　　都彈壓所之印

1975年出土于遼寧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8.1×8.1厘米。藏該縣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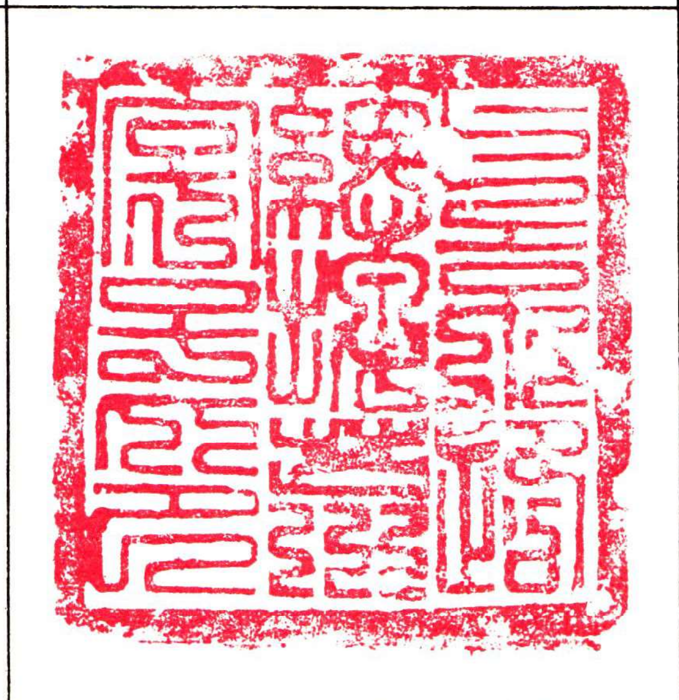
418　**行軍總押之印**

1982年4月出土于遼寧省復縣。6.6×6.4厘米。側刻“總押印”。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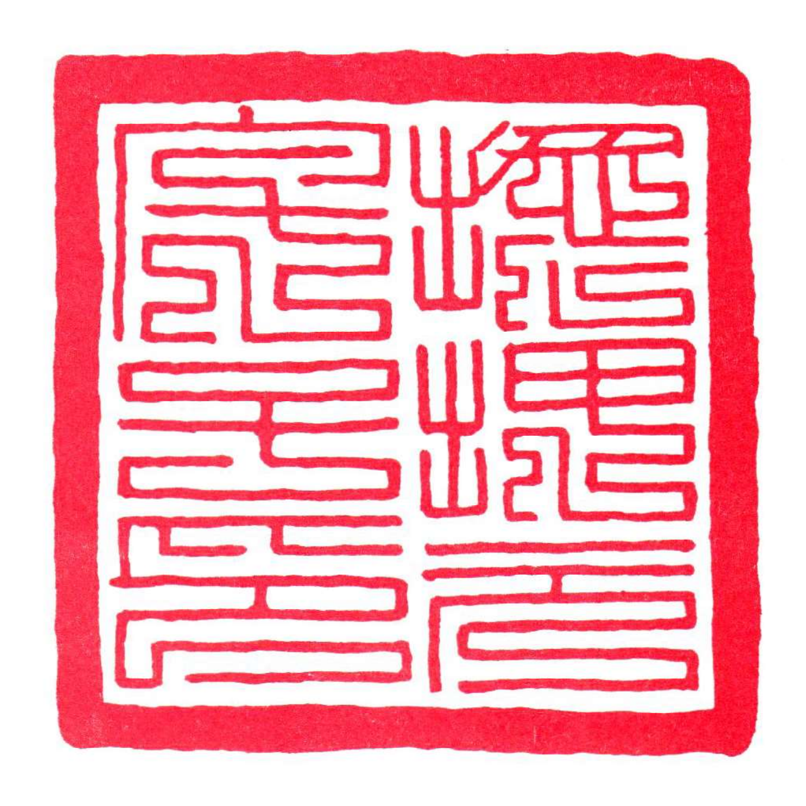
419　**行軍總押之印**

民國間出土于遼寧省丹東。6.7×6.4厘米。原藏丹東孔昭智。見《東北古印鈎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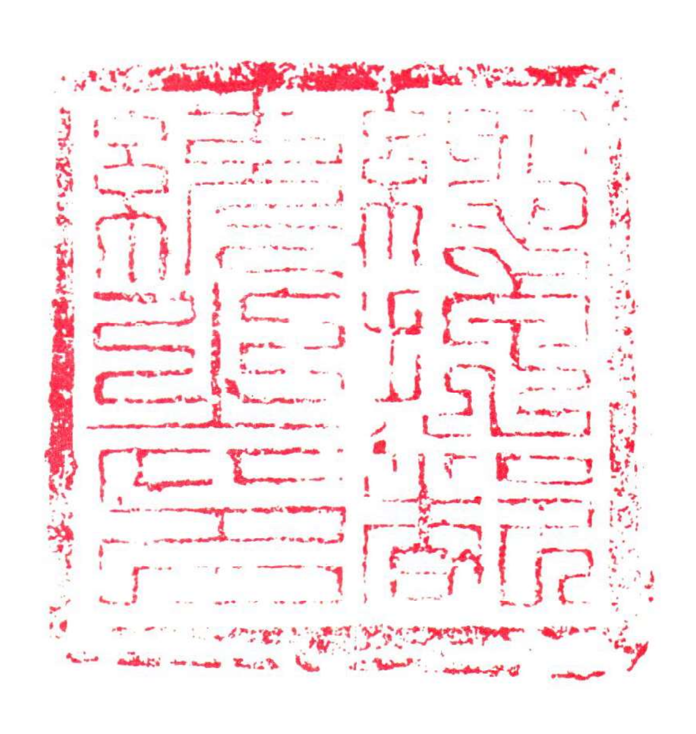
420　**上京路總押荒字号印**

1964年9月出土于黑龍江省阿城縣。6.2×6.2厘米。背刻“貞祐四年正月日”、“上京行六部造”。側刻“總押荒字”。藏阿城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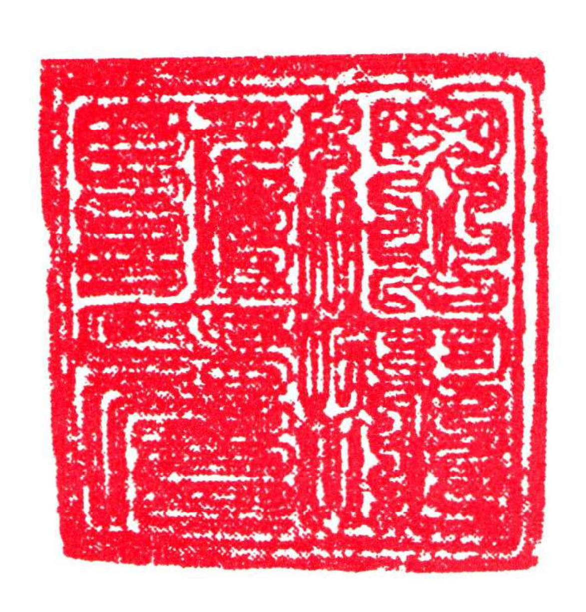
421　**總押元字号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5×7.5厘米。背刻“總押元字号印”。見《滿洲金石志》。



422　**總押都統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5厘米。原藏觀古閣。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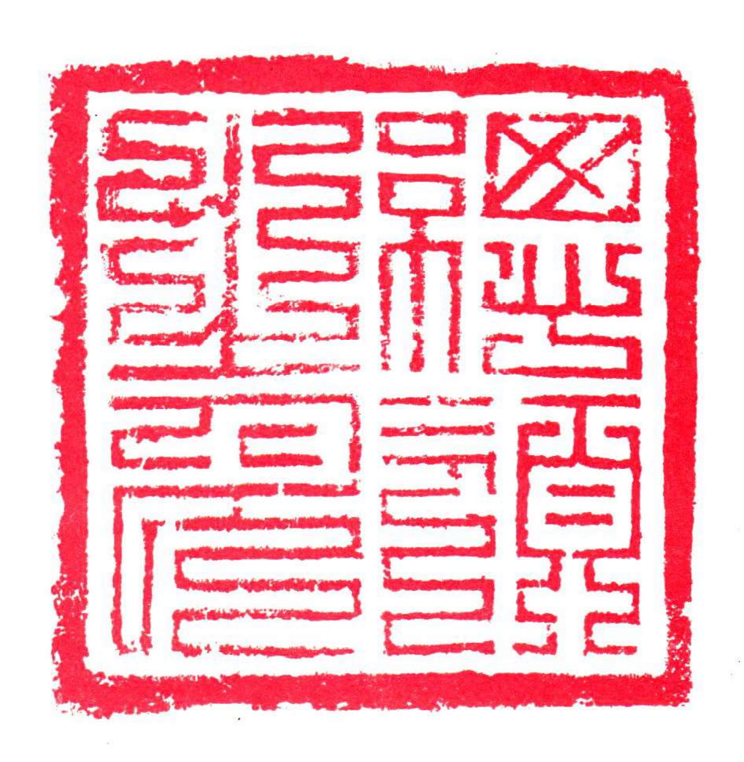
423　　總押所印

出土于蘇聯濱海省錫迭米河畔。印面尺寸不詳。見《濱海的遥遠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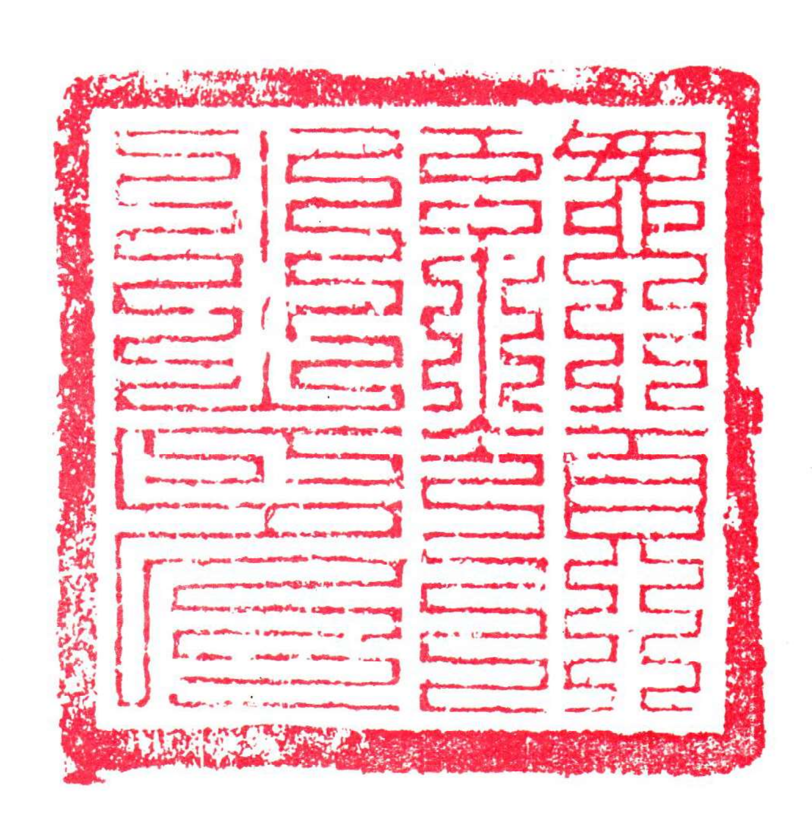
424　　總領之印

1981年11月出土于河南省孟津縣。背刻“天興二年”、“總部造”。紐端刻“上”字。藏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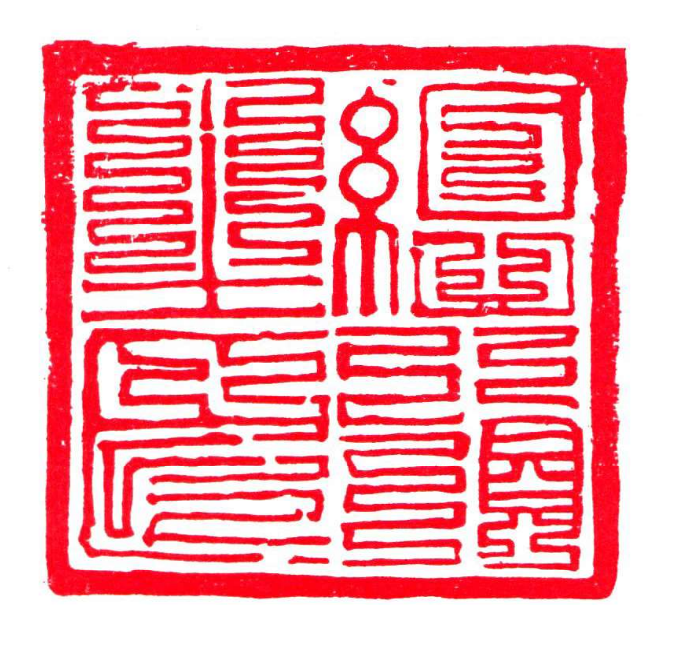
425　　總領之印

近年出土于河南省靈寶縣。6.8×6.8厘米。藏靈寶縣文管會。



426　　總領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5×7.5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427　**總領之印**

清宣統元年(1909年)出土于黑龍江省巴彦縣。10×10厘米。背刻“總領印”。原藏黑龍江省藏書樓。見民國修《呼蘭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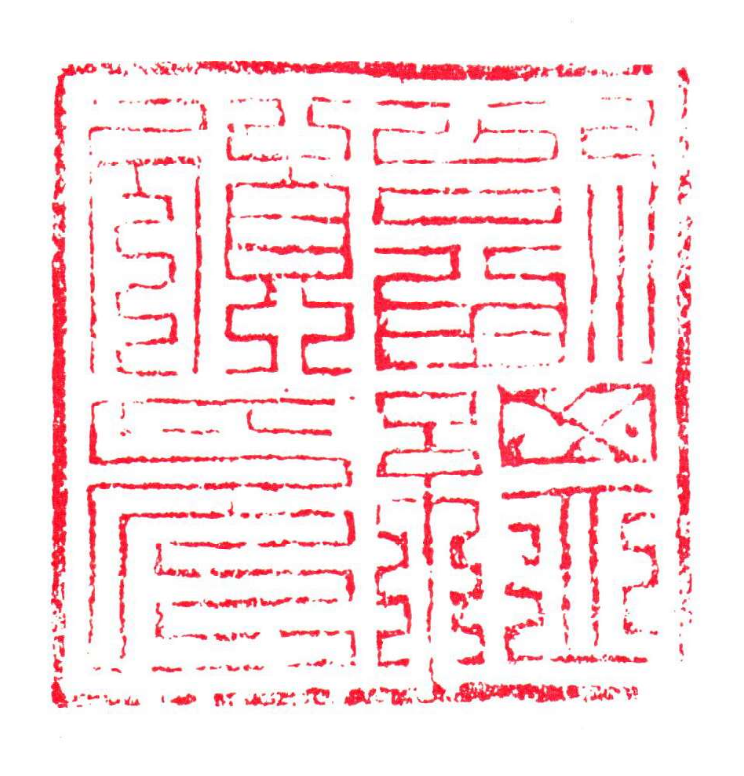
428　**都總領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5×7.5厘米。原藏嘉善程蘭川。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補遺》。



429　副總領印

1968年遼寧省博物館徵集。出土地點不詳。7×7厘米。藏遼寧省博物館。



430　副總領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9×6.9厘米。原藏廬江劉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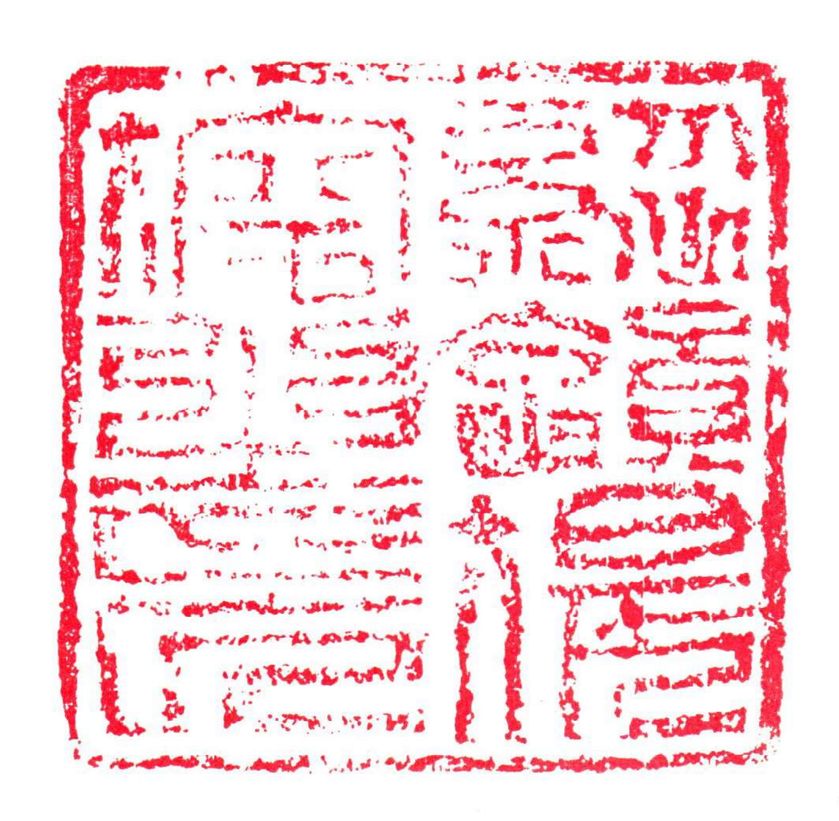
431　　總領之印

1983年4月出土于河南省内黄縣。7.5×7.5厘米。藏該縣文化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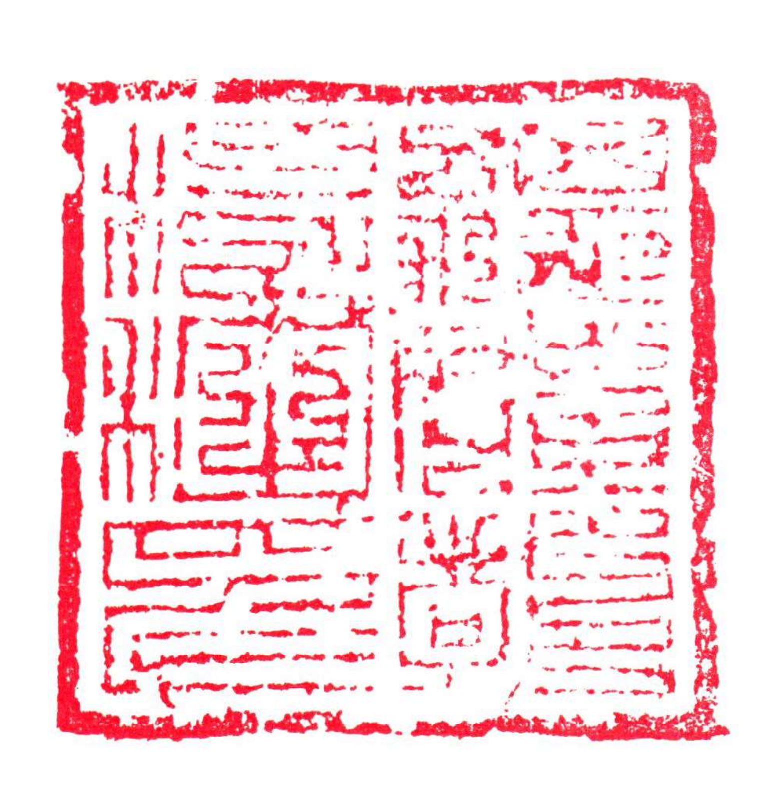
432　　總領軍馬之印

1980年6月出土于陝西省子長縣。7.5×7.5厘米。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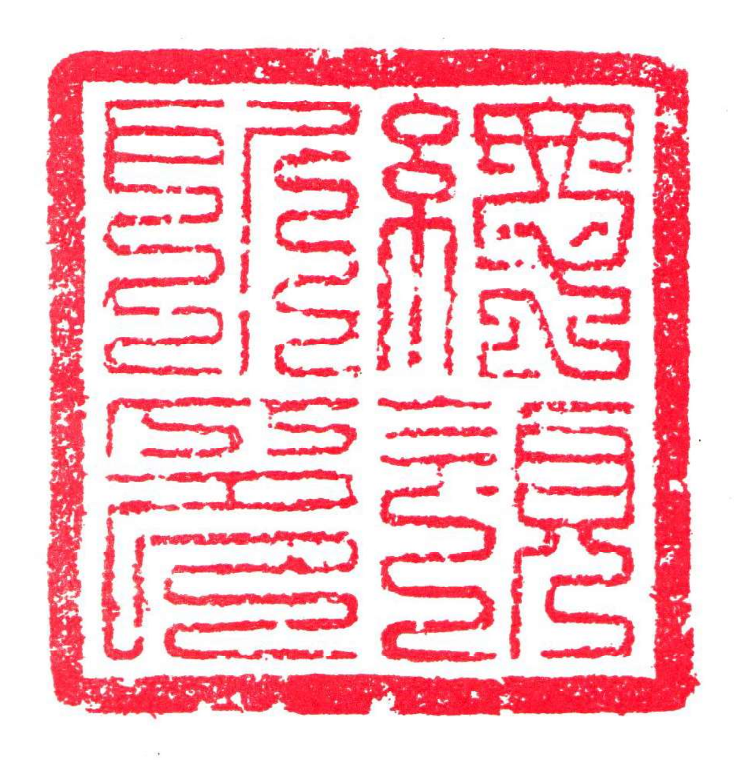
433　**總領提控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5×7.8厘米。原藏頤素齋。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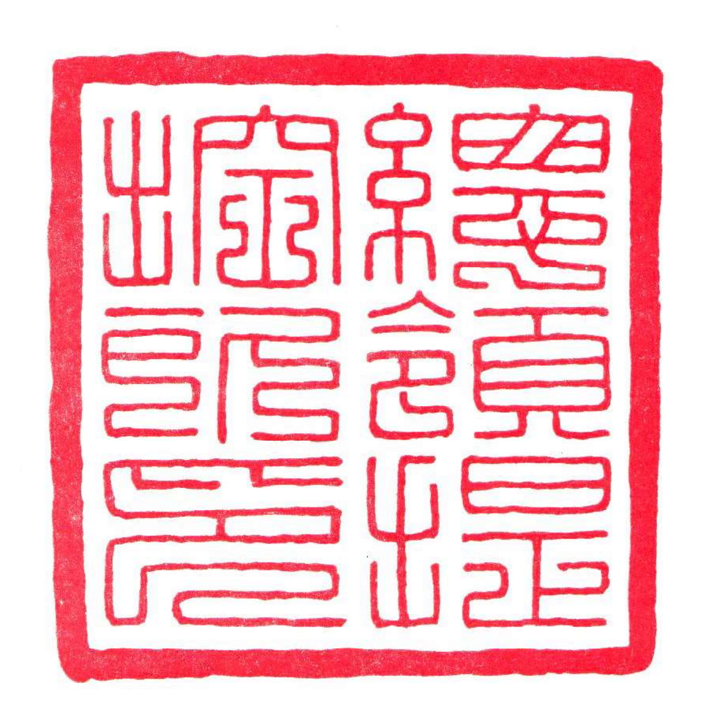
434　**總領都提控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7厘米。原藏頤素齋。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435　總領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1×6.9厘米。背刻"正大元年"。見《意園古今官印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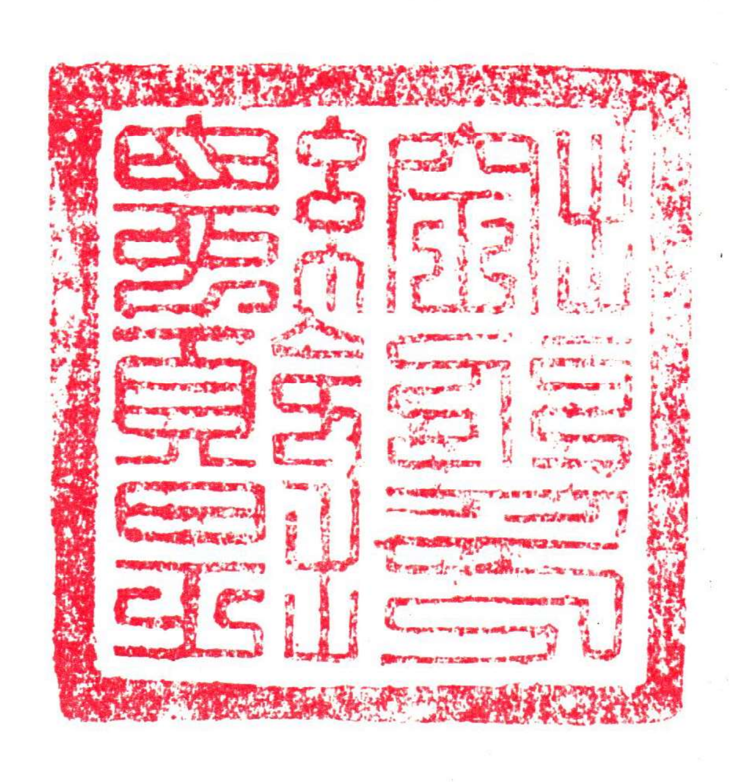
436　總領提控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5厘米。背刻"興定□年七月東京兵部造"。側刻"總領提控印"。見《滿洲金石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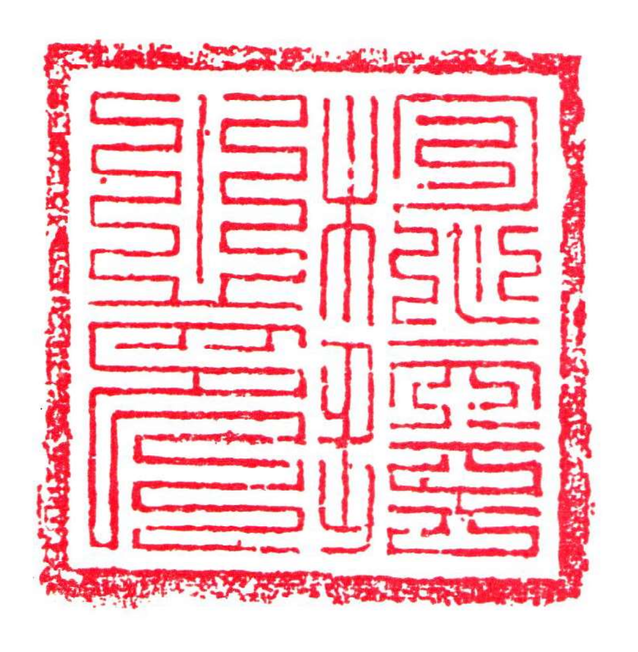
437　　總領提控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6.5厘米。背刻"興定七年七月日東京兵部造"、"總領提控所印"。原藏遼陽張曉漢(肅侯)。見《東北古印鈎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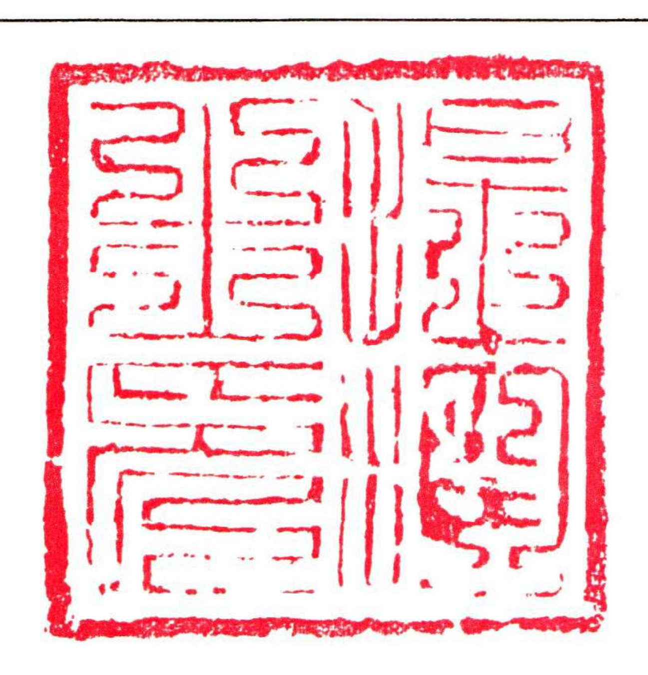
438　　總領提控所印

1980年6月發現于遼寧省本溪市。7×6.8厘米。背刻"興定七年月日"。側刻"總領提控所印"。紐端刻"上"字。藏本溪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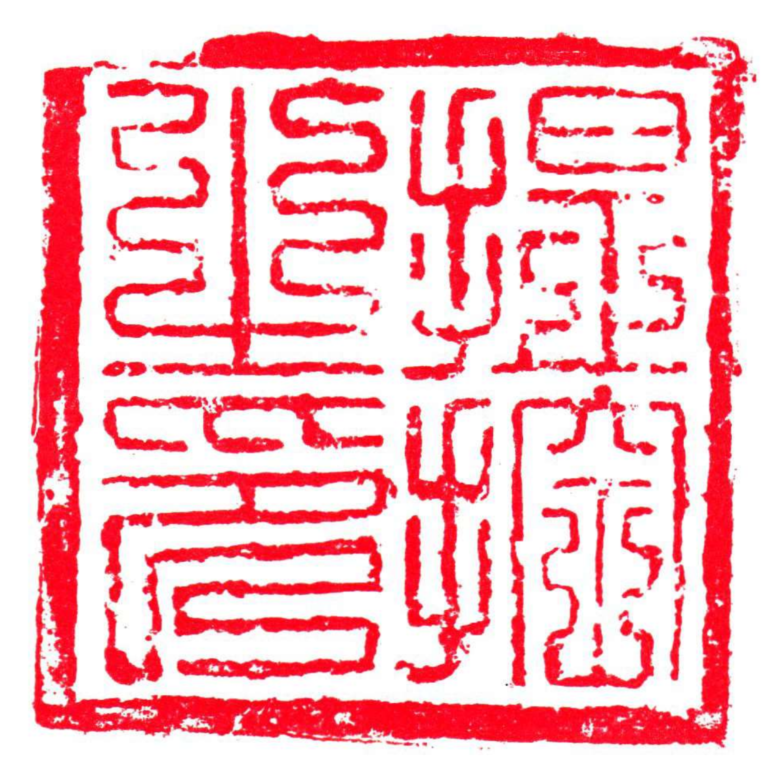
439　　**提控之印**

1980年秋出土于山西省石樓縣。9.6×9.6厘米。背刻“崇慶”，餘不清。紐端刻“上”字。藏處不詳。



440　　**提控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厘米。背刻“正大二年十月日”、“大名行部造”。原藏吴門袁氏。見《集古官印考證》、《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441　　提控之印

1974年12月出土于安徽省鳳臺縣。7.5×7.6厘米。側刻“提控之印”、“壬辰年四月日”、“餘字號”。藏阜陽地區博物館。



442　　提控之印

1978年冬出土于江蘇省灌雲縣。7.7×7.7厘米。側刻“丁亥年行尚書省造”、“提控之印”。藏淮陰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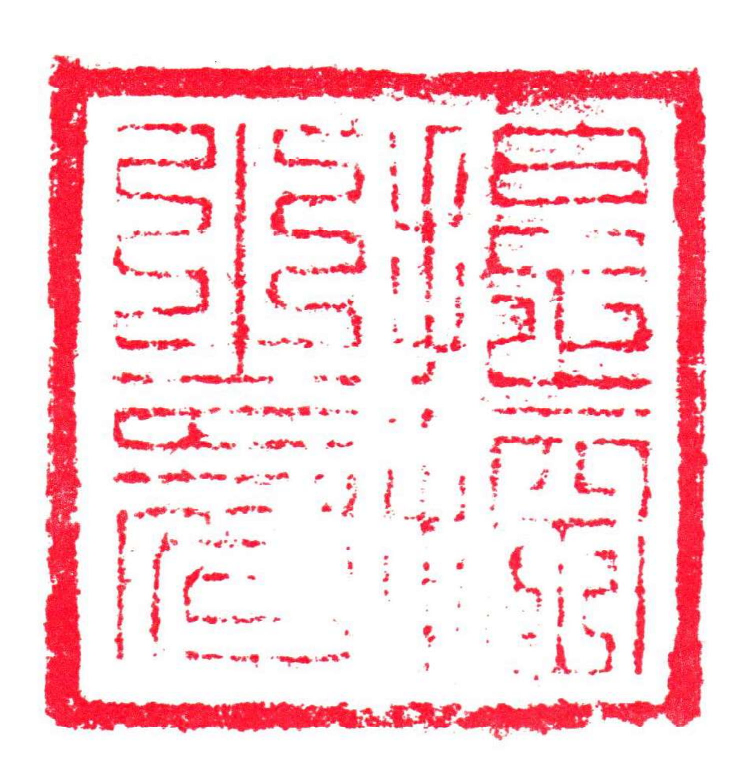
443　　提控之印

1965年出土于河北省滿城。7.7×7.7厘米。藏河北省博物館。



444　　提控之印

解放後安徽省阜陽地區出土。7×7厘米。藏阜陽地區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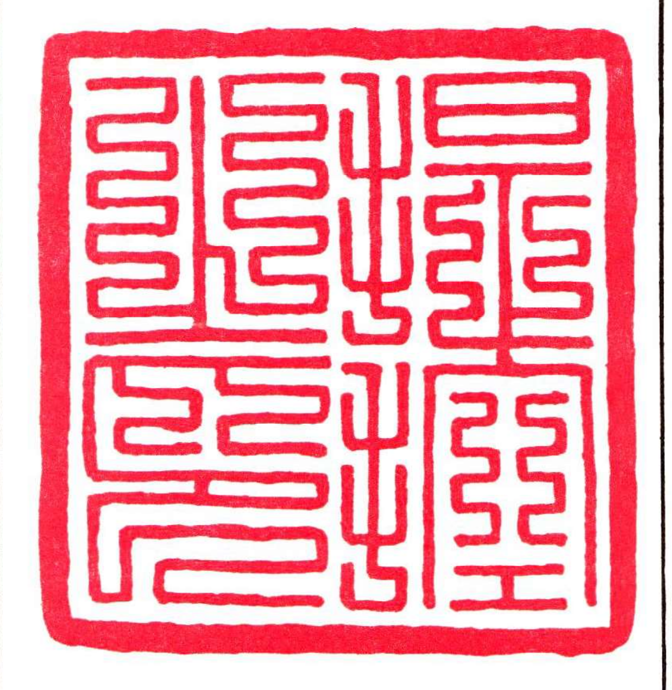
445　　提控之印

1976年出土于遼寧省建平縣。8×8厘米。印背右上方刻“上”字。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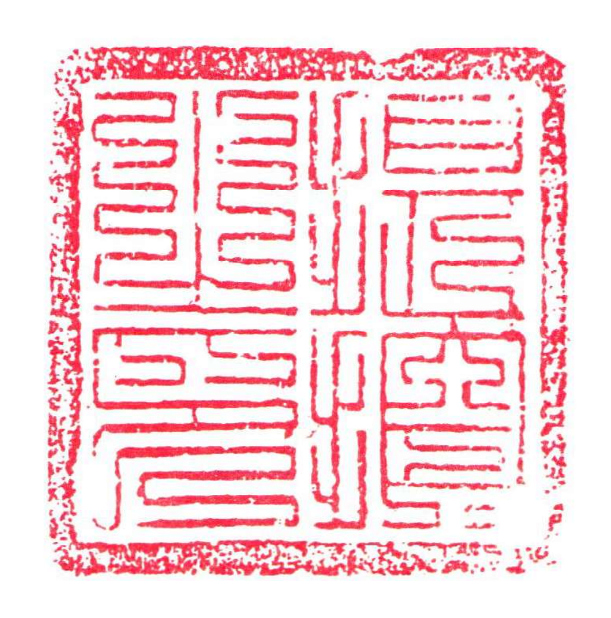
446　　提控之印

近年出土于河南省孟津縣。6.6×6.6厘米。藏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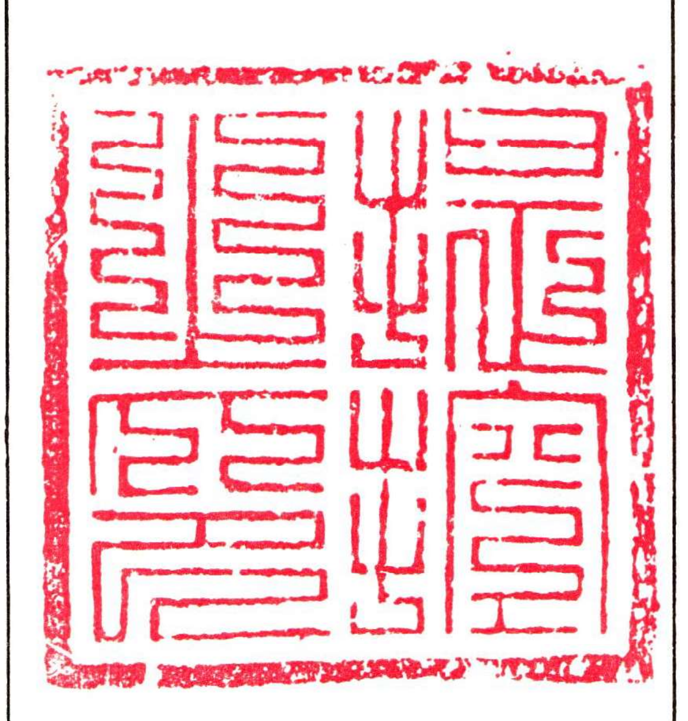
448　　**提控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5厘米。背刻“□□□□七月二十日陝西路行部造”。見《滿洲金石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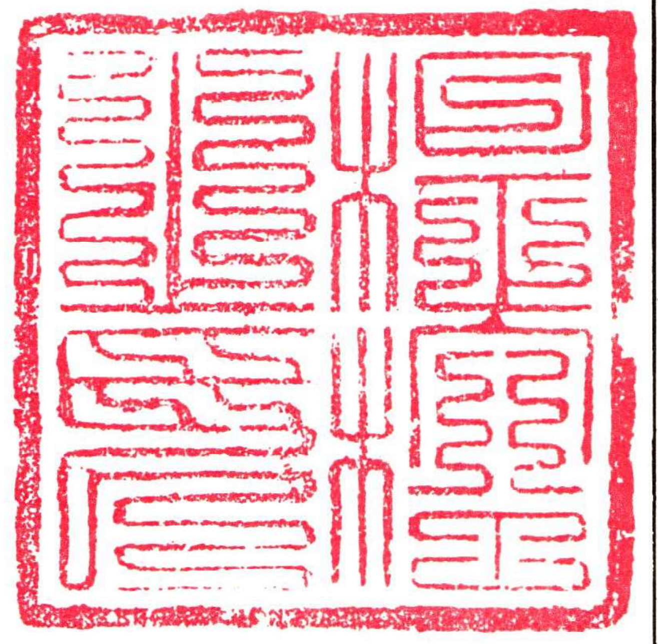
447　　**提控之印**

1950年徵集。7×7厘米。藏河南省博物館。



450　　**提控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5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449　　**提控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7×6.7厘米。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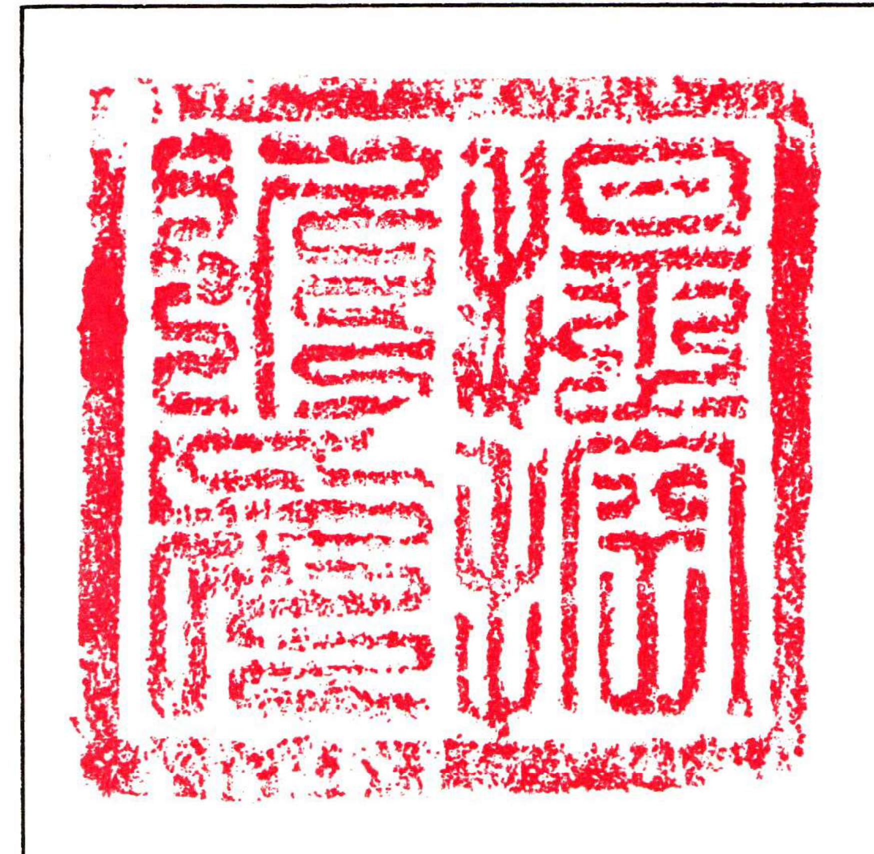
451　　提控之印

1980年6月出土于河北省承德縣。7×7厘米。紐端刻“上”字。藏承德縣文管所。



452　　提控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厘米。見《意園古今官印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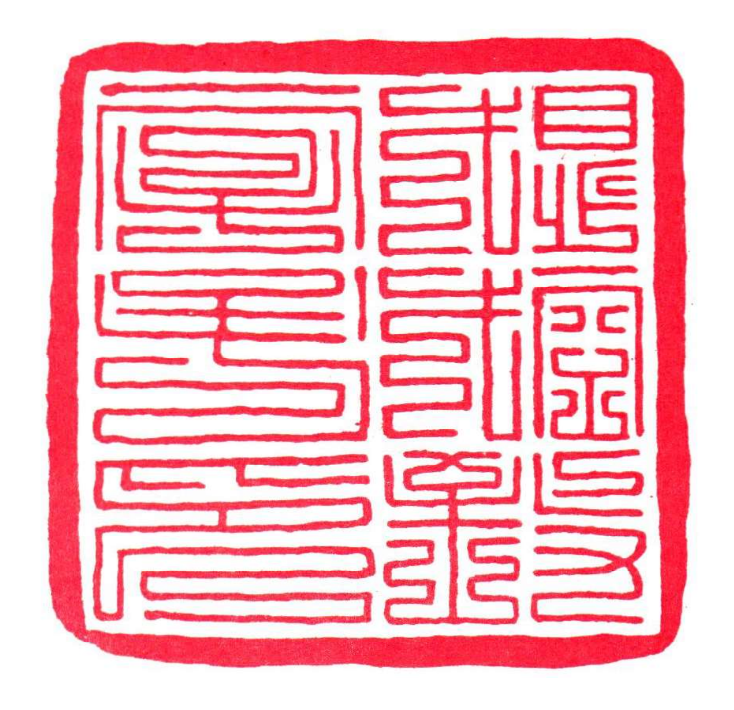
453　　提控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8×7.8厘米。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454　　提控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印面尺寸待查。藏遼寧省博物館。



455 **提控致字号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8×6.8厘米。見《滿洲金石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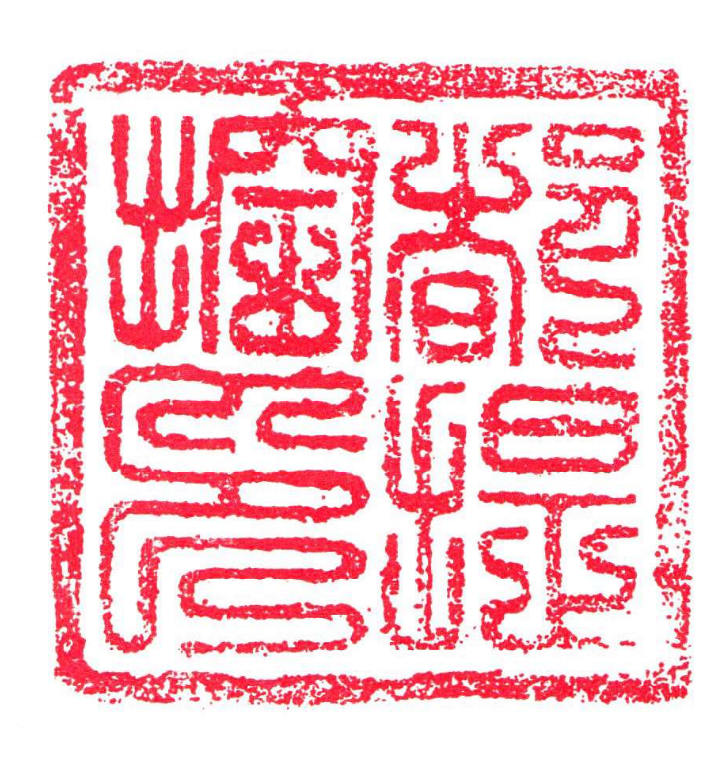
456 **都提控印**

近年吉林省德惠縣出土。7.3×7.3厘米。藏處不詳。



457　　都提控印

近年西安市出土。7.4×7.4厘米。藏陝西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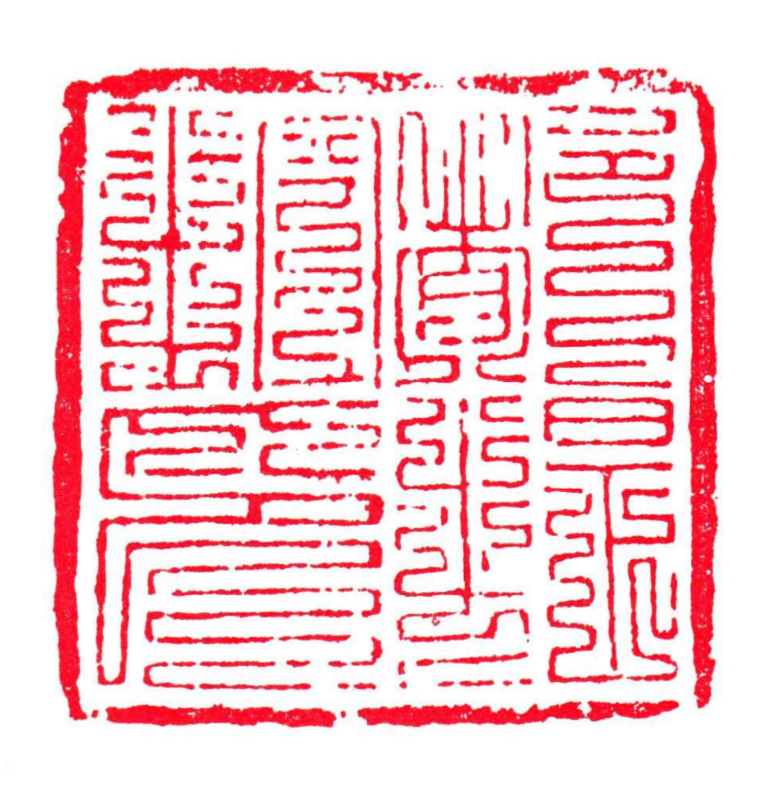
458　　都提控印

1973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區巴林右旗。7.3×7.3厘米。藏處不詳。



459　　都提控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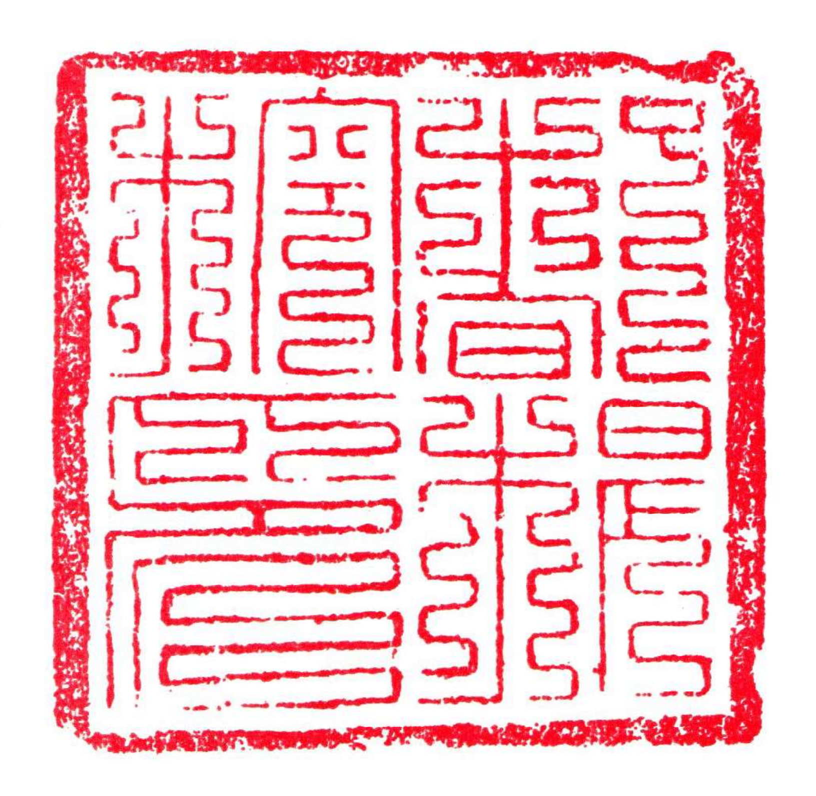
198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社旗縣。6.8×6.8厘米。藏社旗縣文化館。



460　　都提控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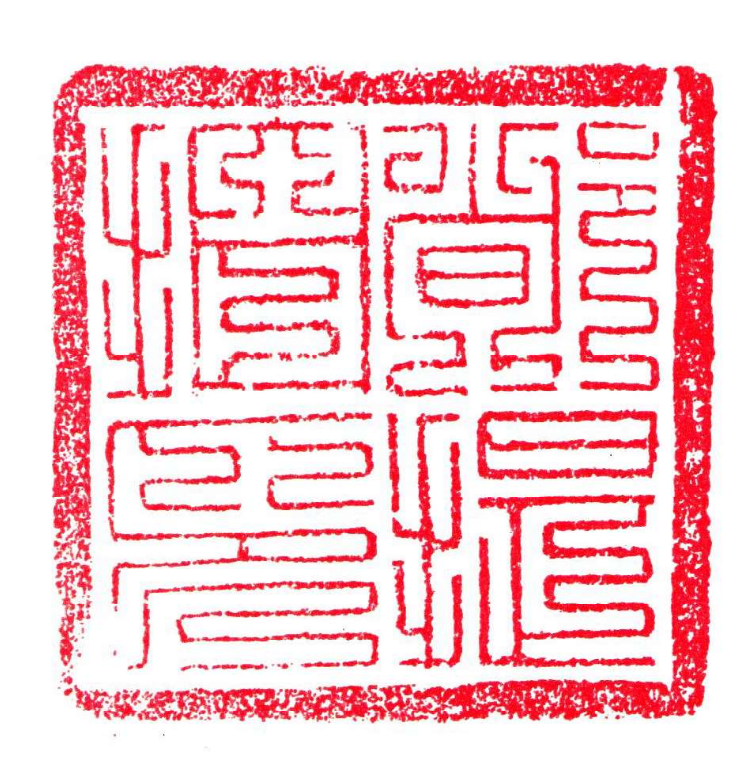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1×7.1厘米。原藏廬江劉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461　都提控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5×7.6厘米。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462　都提控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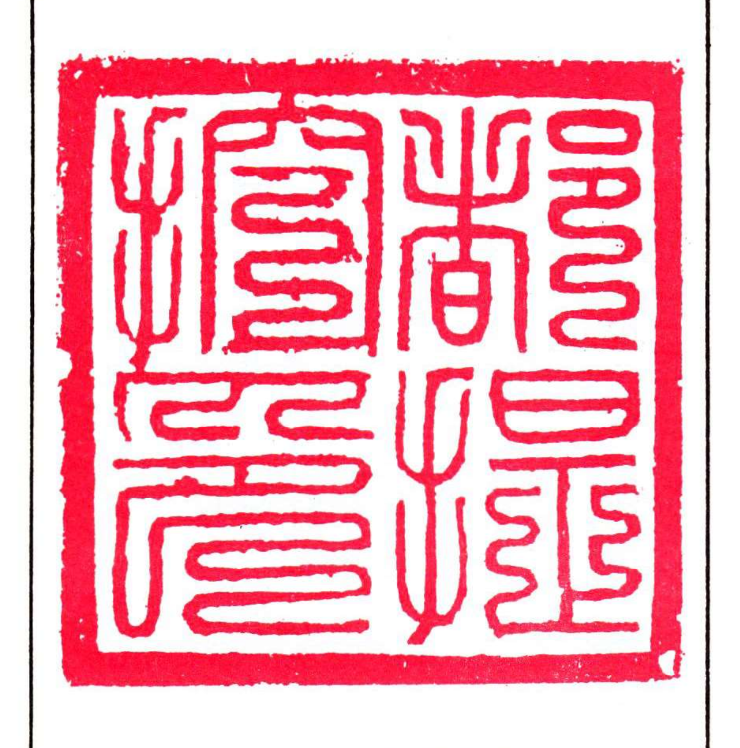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7厘米。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463　**都提控印**

解放後内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出土。

側刻"都提控印"。藏赤峰市博物館。



464　**都提控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6×6.6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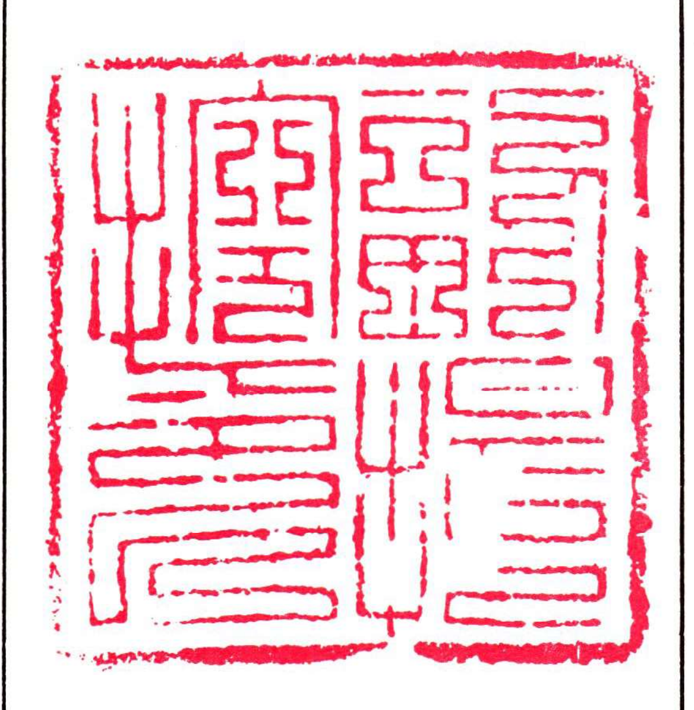
藏遼寧省博物館。



465　**副提控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3×6.3厘米。

原藏大西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466　**副提控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4×6.4厘米。

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467　副提控印

1970年出土于河南省南陽縣。6.9×6.9厘米。藏河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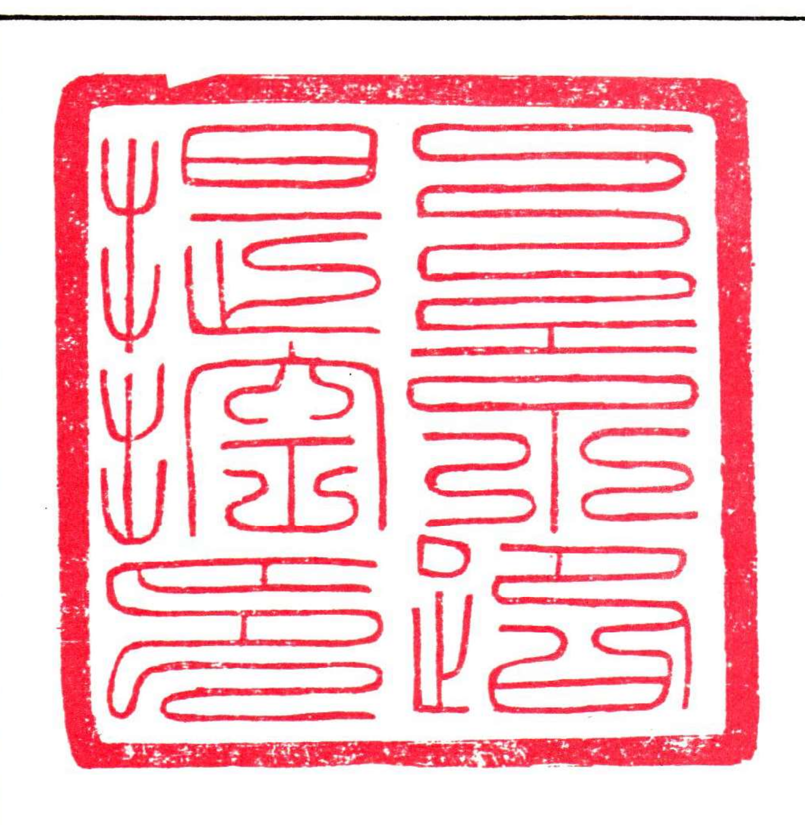
468　偪提控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5厘米。見《集古印譜》。按:“偪”字當爲“副”字之誤。



469　**副提控宙字印**

1956年出土于河北省巨鹿縣。7×7厘米。藏河北省博物館。



470　**上京路提控印**

1973年10月出土于黑龍江省賓縣。7.5×7.5厘米。背刻“大定七年四月十八日”。印樣藏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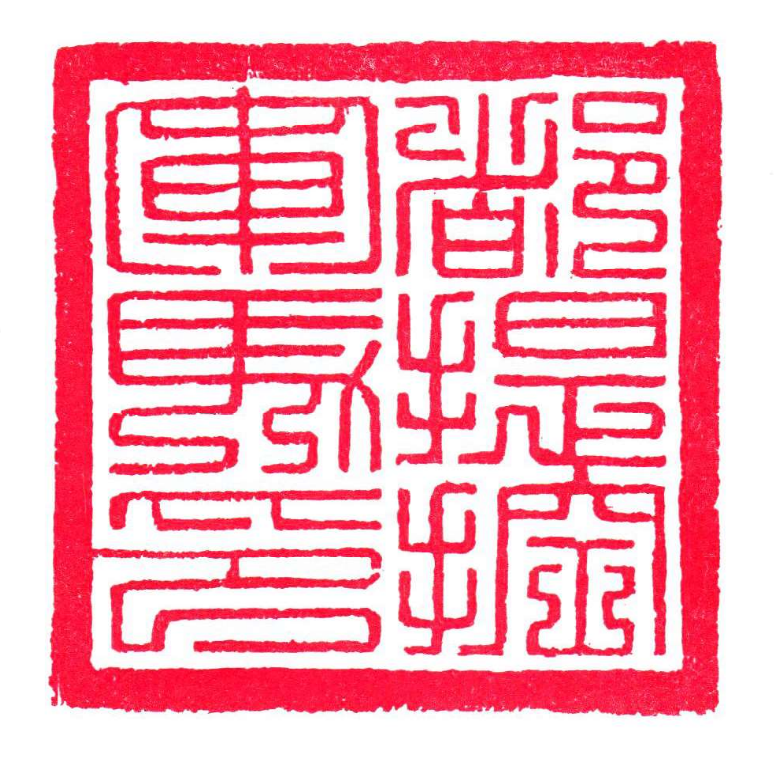
471　上京路軍馬提控木字号之印

民國間出土于黑龍江省寧安縣。7.3×7.2厘米。背刻"貞祐三年十二月"、"木字号之印"。原藏寧安縣農會。見《東北古印鉤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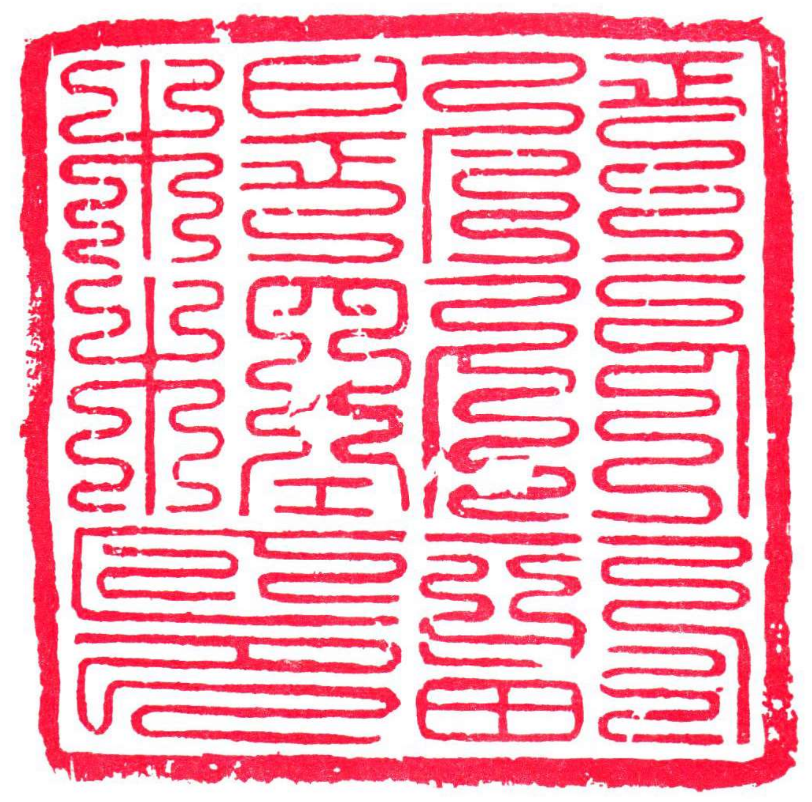
472　上京路軍馬提控盈字号之印

1970年7月出土于黑龍江省海林縣。7.2×7.2厘米。背刻"貞祐四年五月日"、"上京行六部造"。側刻"軍司提控盈字号印"。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473　　**都提控軍馬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2×7.2厘米。背刻"正大三年三月"、"行宮禮部造"。側刻"都提控軍馬印"。藏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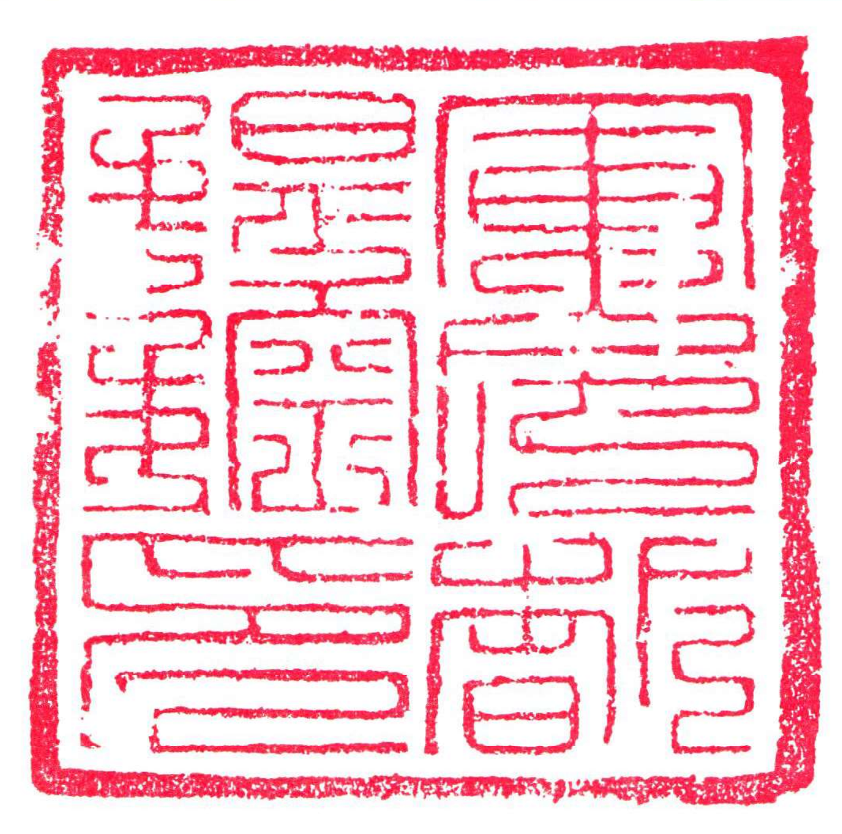
474　　**征行副提控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側刻"辛巳年八月日造"、"征行副提控印"。藏上海博物館。



475　兵馬都提控印

1968年遼寧省博物館徵集。出土地點不詳。8.4×8.4厘米。背刻"□巳年六月□七日"、"兵馬都提控印"。紐端刻"上"字。藏遼寧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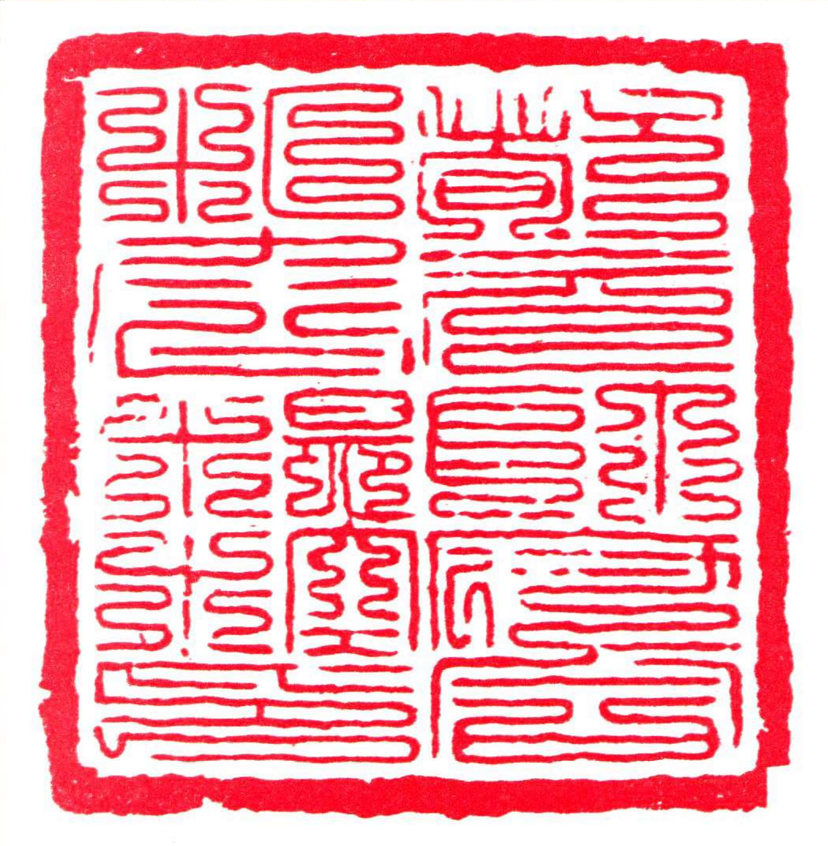
476　軍馬都提控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8×8.5厘米。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477　　元帥府合札都提控之印

解放後出土于遼寧省北票縣。9×9厘米。藏朝陽市博物館。



478　都元帥府合札右提控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8.4×8厘米。

原藏海寧張氏。見《東北古印鈎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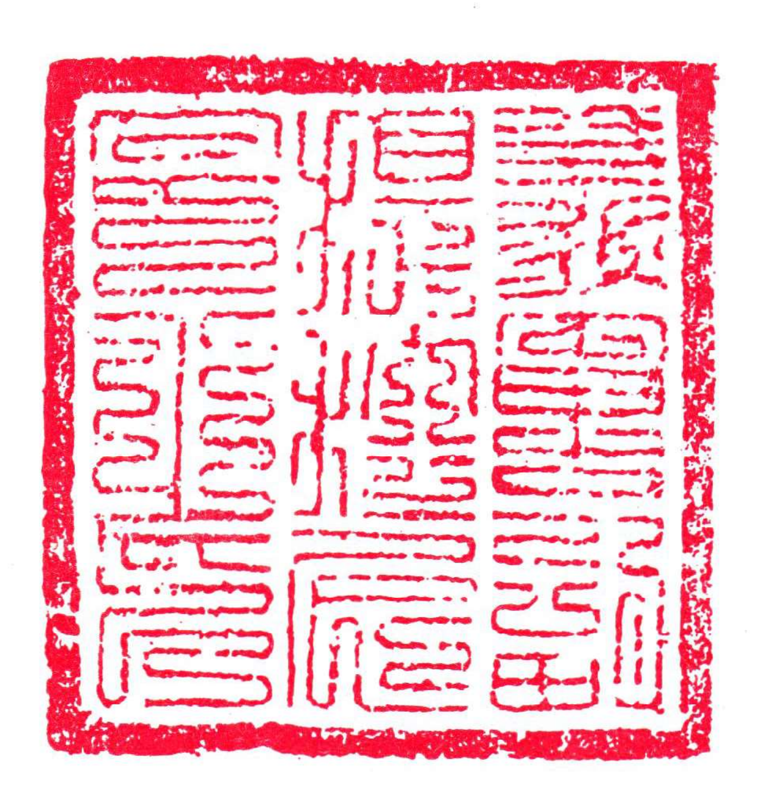


479　義軍提控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7×6.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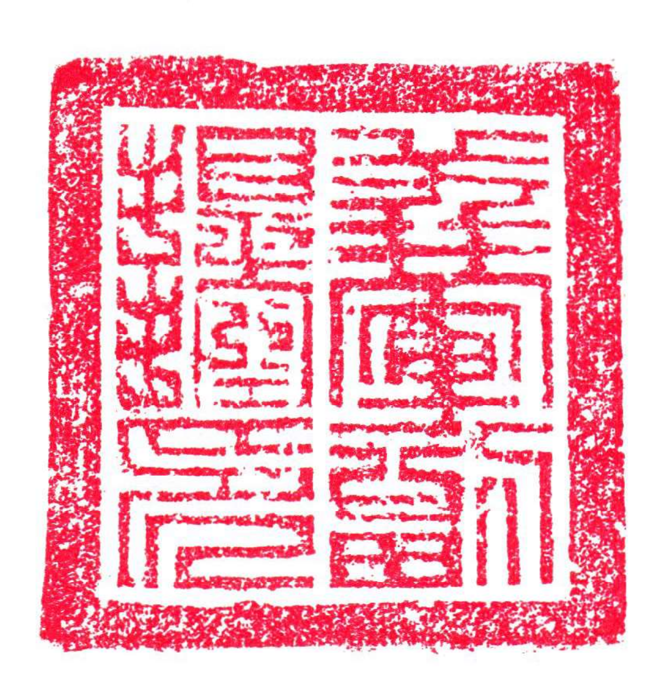
原藏益都孫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480　義軍副提控辰字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3×7.3厘米。見《集古印譜》。



481　義軍副提控印

1971年出土于西安市。6.2×6.2厘米。側刻“義副提控”、“正九正月日造”。背右角刻“上”字。藏陝西省博物館。



482　　左司提控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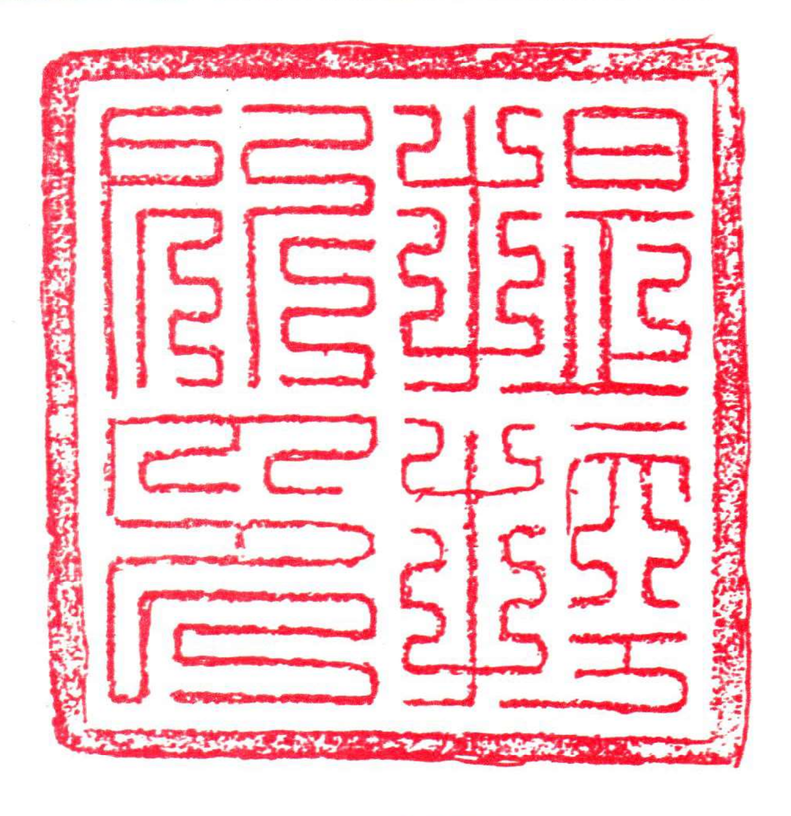
1953年于河北省保定徵集。8.5×8.5厘米。藏河北省博物館。



483　　提控□□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4×5.2厘米。印文中有二字不識。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提控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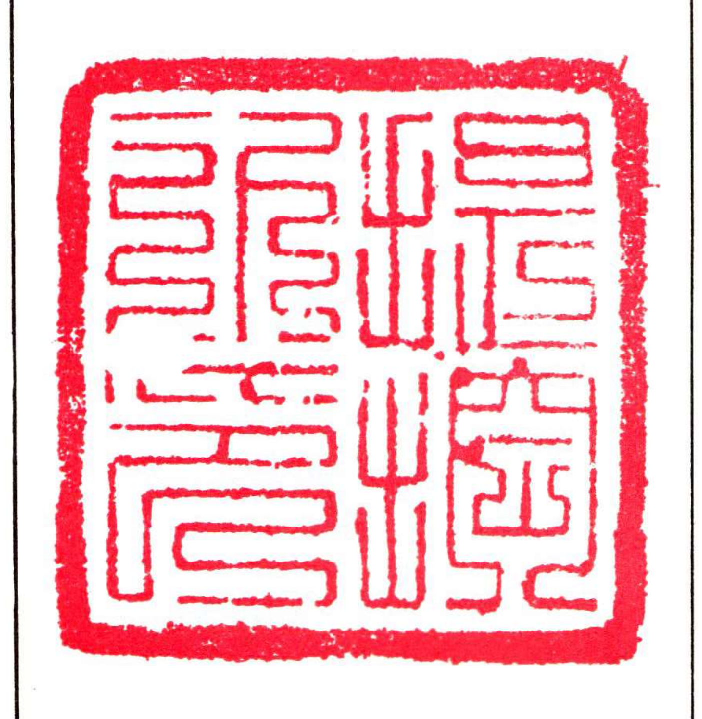
484　提控所印

近年遼寧省朝陽市出土。7.5×7.5厘米。藏朝陽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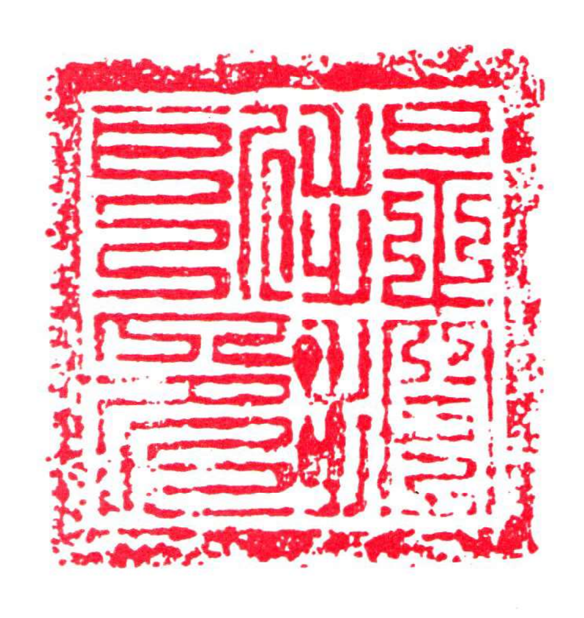
485　招撫使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8×8厘米。藏旅順博物館。



486　　**提控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4×6.3厘米。紐端刻"上"字。藏旅順博物館。



487　　**提控所印**

1957年于河南省開封徵集。7.2×7.2厘米。藏河南省博物館。



488　　**提控所印**

1954年于河南省某地徵集。7.3×7.3厘米。藏河南省博物館。



489　　**提控所印**

1982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社旗縣。7.3×7厘米。紐端刻"上"字。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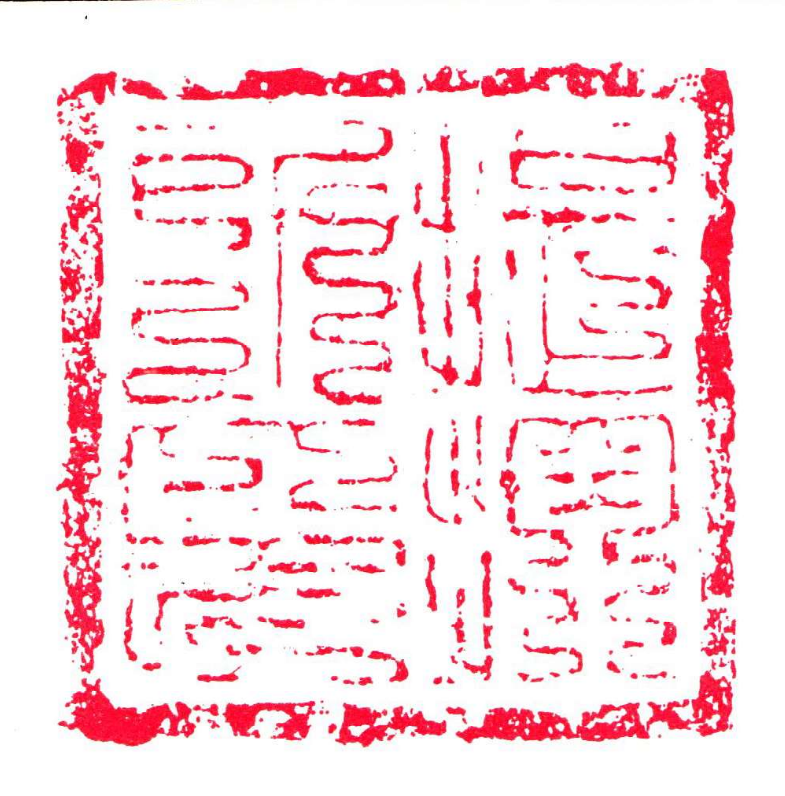
490　提控所印

1979年出土于遼寧省寬甸縣。6.5×6.5厘米。紐端刻“上”字。藏處不詳。



491　提控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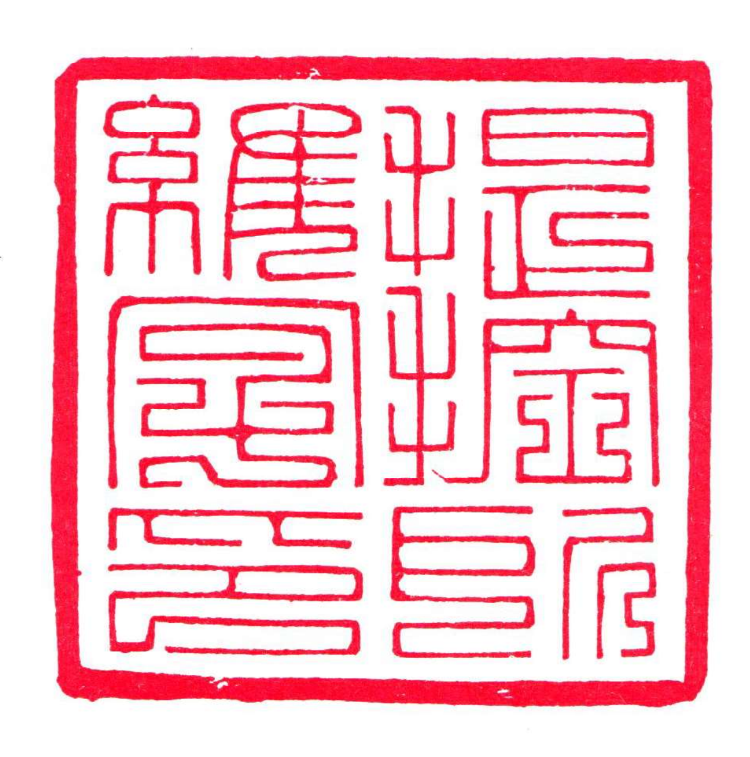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2×6厘米。背刻“天興元年六月日”、“中□□□□造”。紐端刻“上”字。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492　提控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2×7.2厘米。

原藏頤素齋。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493　提控所維字印

清代河南省洛陽出土。7×7厘米。見

《金石索》、《集古官印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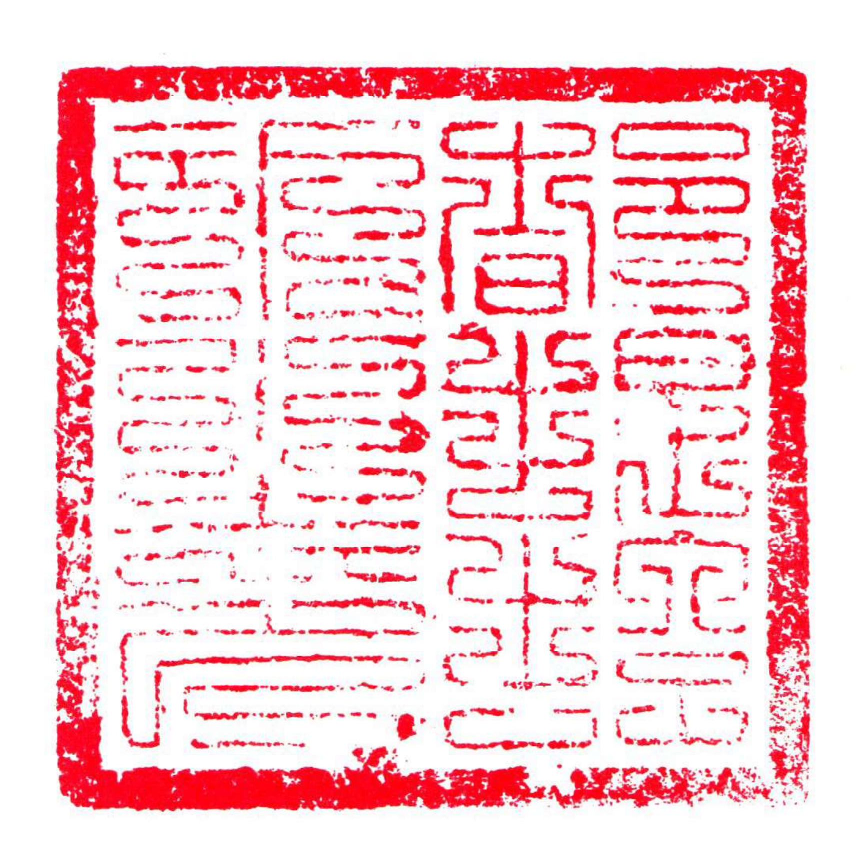
494　　提控所歸字印

近年出土于河南省淇縣。6.6×6.4厘米。背刻"正大五年四月恒山公府造"。側刻"提控所歸字印"。藏淇縣文化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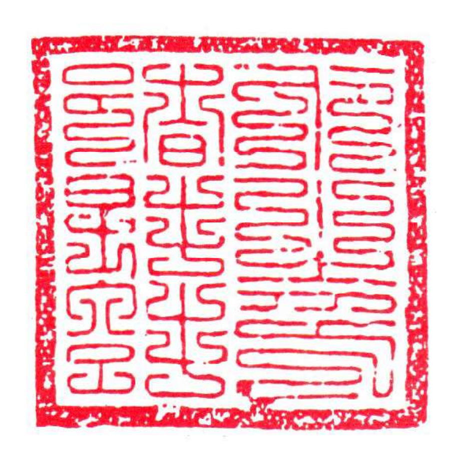
495　　提控所户字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7×7厘米。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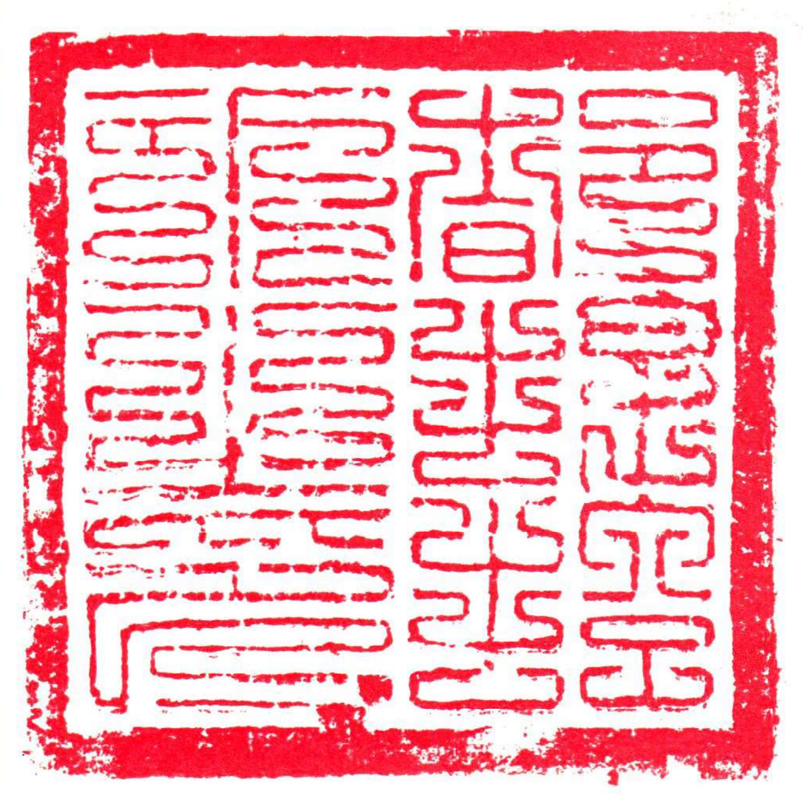
496　　都提控所之印

1974年12月出土于安徽省鳳臺縣。8×8.1厘米。側刻"都提控所之印"、"壬辰年三月日"、"月字號"。藏阜陽地區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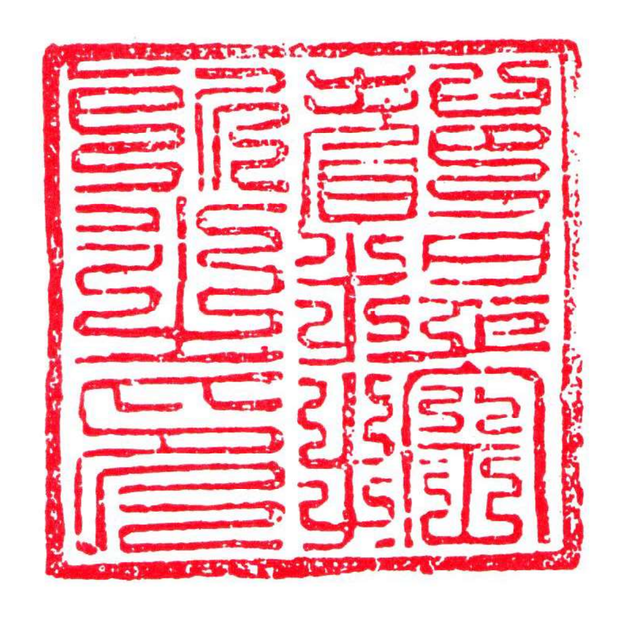
497　　都提控所之印

1974年12月出土于安徽省鳳臺縣。8×7.7厘米。側刻"都提控所之印"、"壬辰年四月日"、"霸字號"。藏阜陽地區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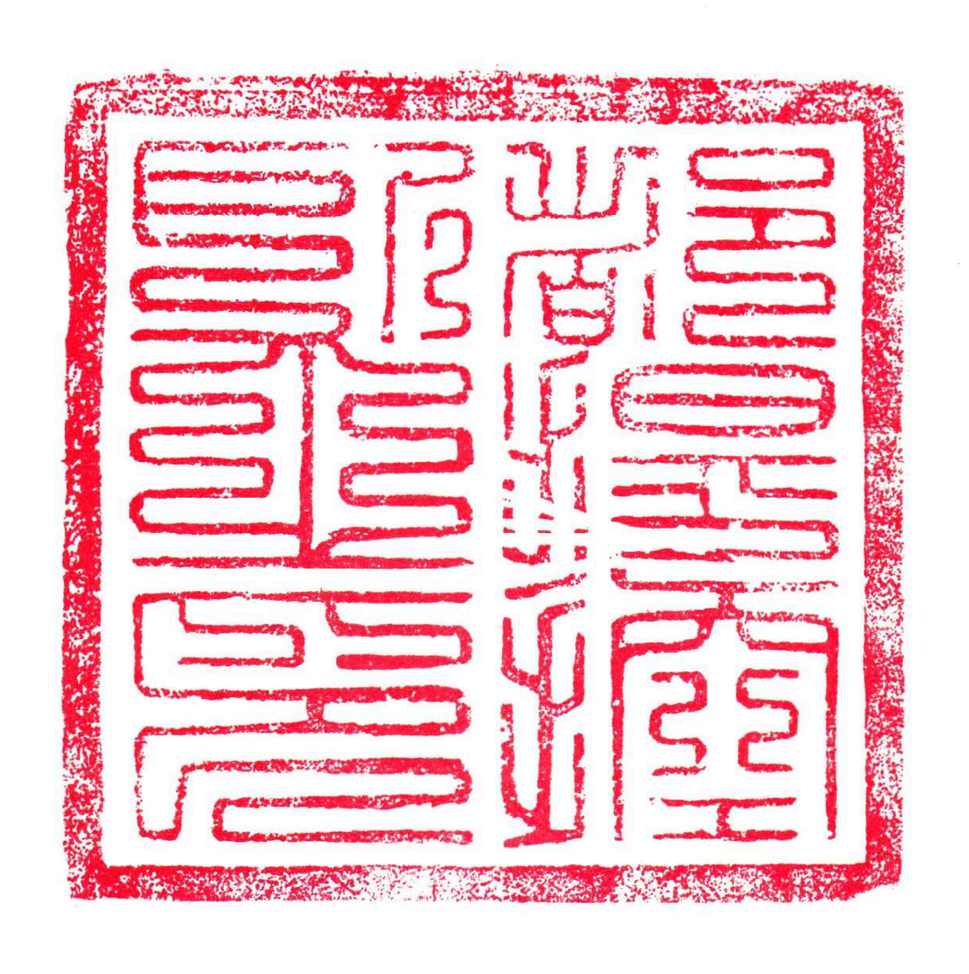
498　　都提控所之印

1974年12月出土于安徽省鳳臺縣。8×8.1厘米。側刻"都提控所之印"、"壬辰年三月日"、"荒字號"。藏阜陽地區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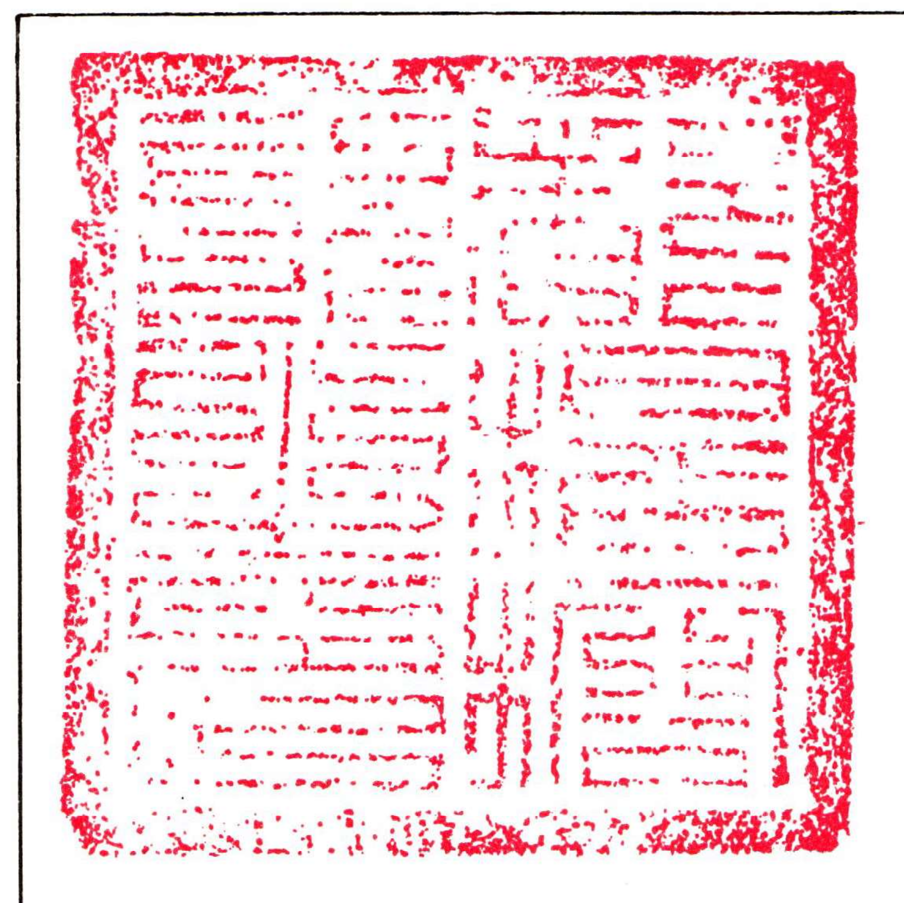
499　　都提控所之印

解放後内蒙古自治區喀喇沁旗出土。9.3×9.3厘米。藏赤峰市博物館。



500　　都提控所之印

1974年5月出土于黑龍江省蘭西縣。9×9厘米。背刻“光字號”、“都提控所印”。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501　　**都提控所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8.5×8.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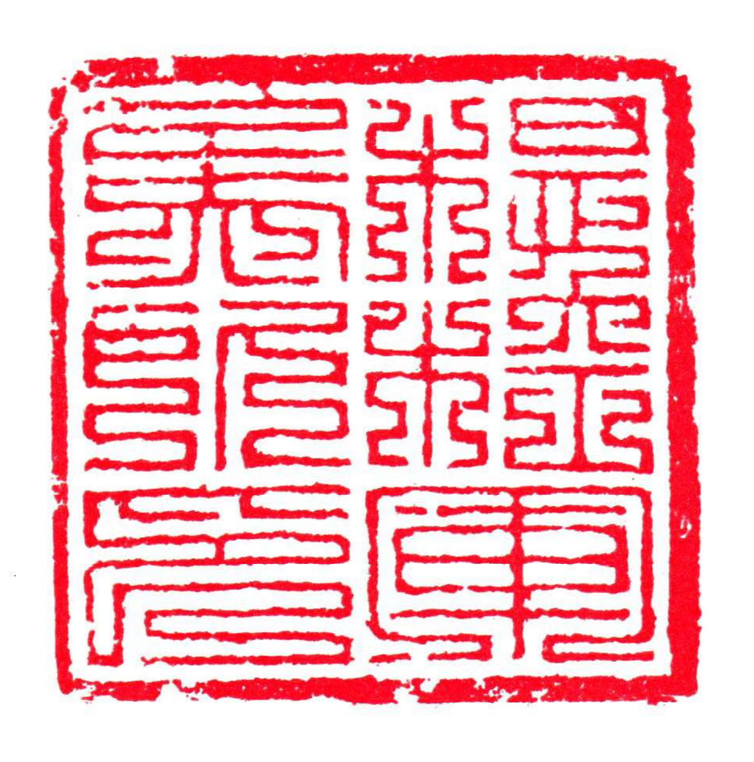
見《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



502　　**征行提控所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5×6.3厘米。

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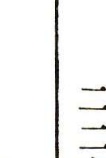
503　　提控軍馬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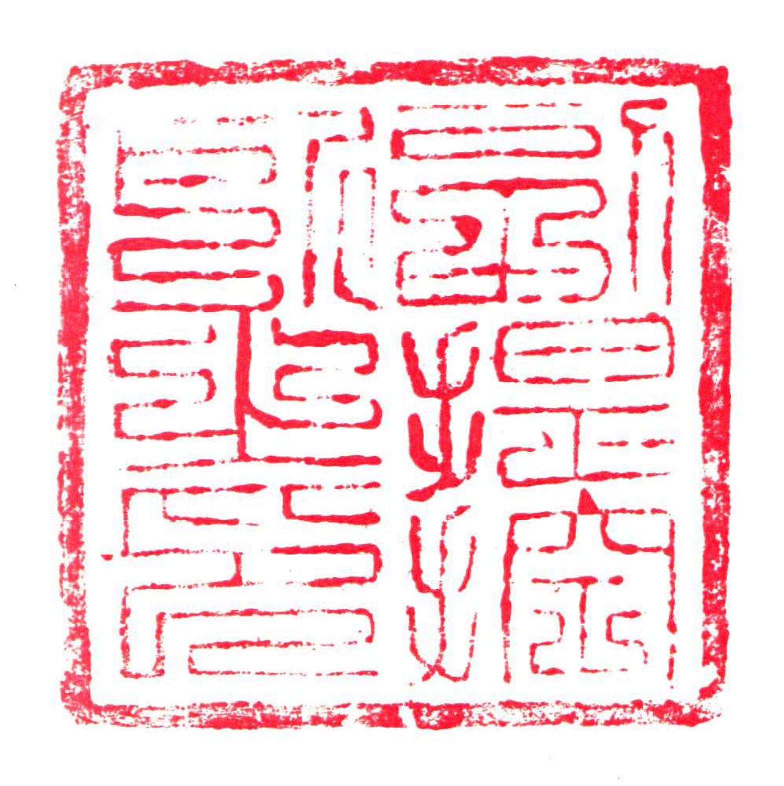
解放後出土于河北省平泉縣。6.95×6.95厘米。印背右上方刻一“上”字。藏平泉縣文管所。



504　　都提控所之印

1975年出土于河北省豐寧縣。9.1×8.8厘米。背刻“都提控印”。紐端刻“上”字。藏豐寧縣文化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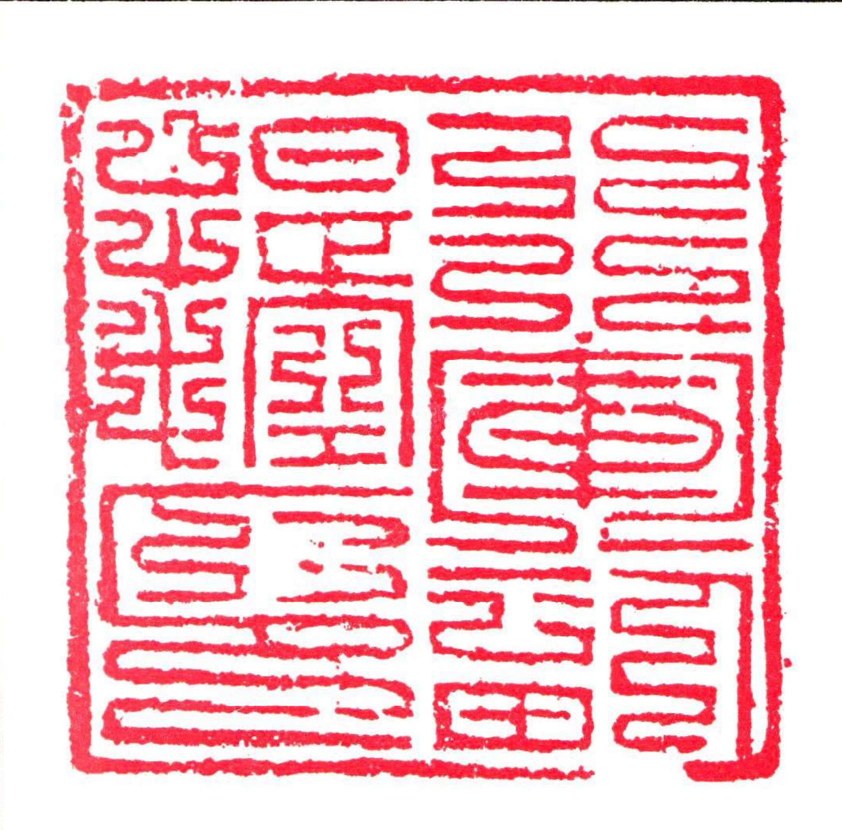




505　　副提控所之印

1975年11月出土于河北省承德縣。

側刻“副提控所之印”。藏承德縣文保所。



506　　行軍副提控印

1972年出土于遼寧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7.5×7.5厘米。藏該縣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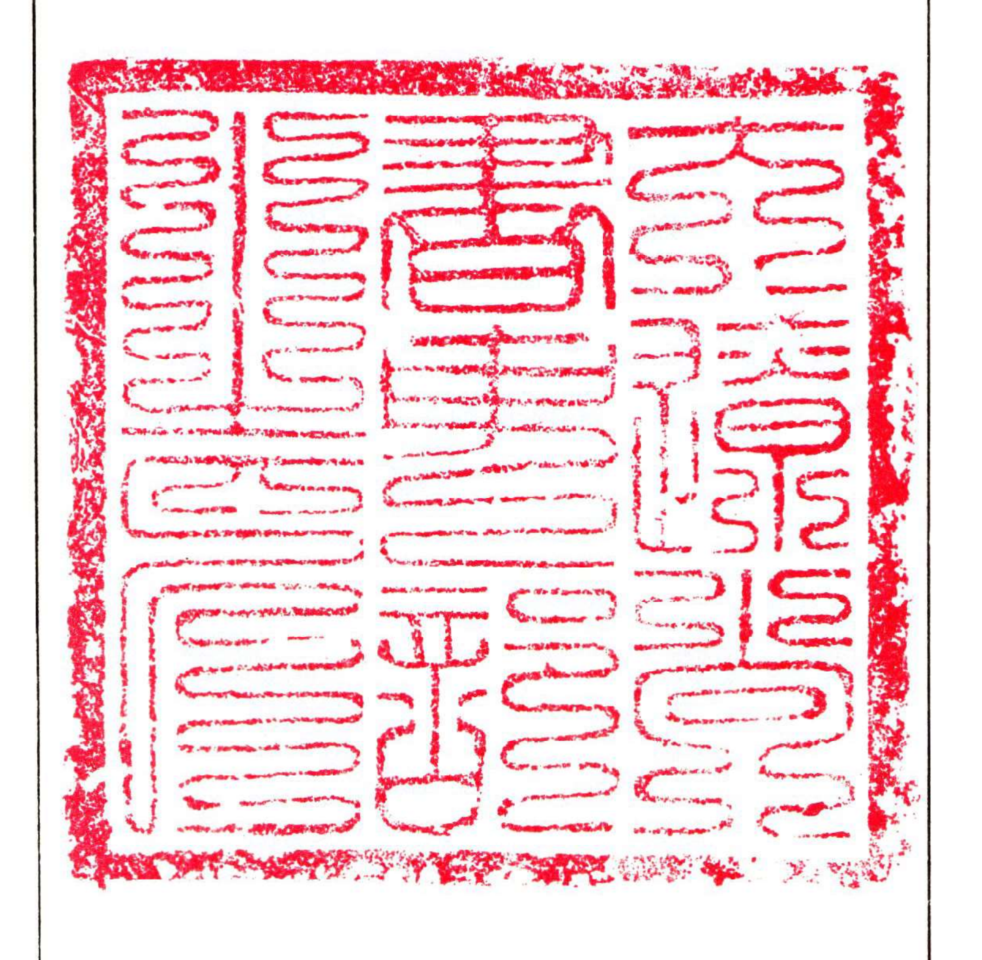




507　義軍同提舉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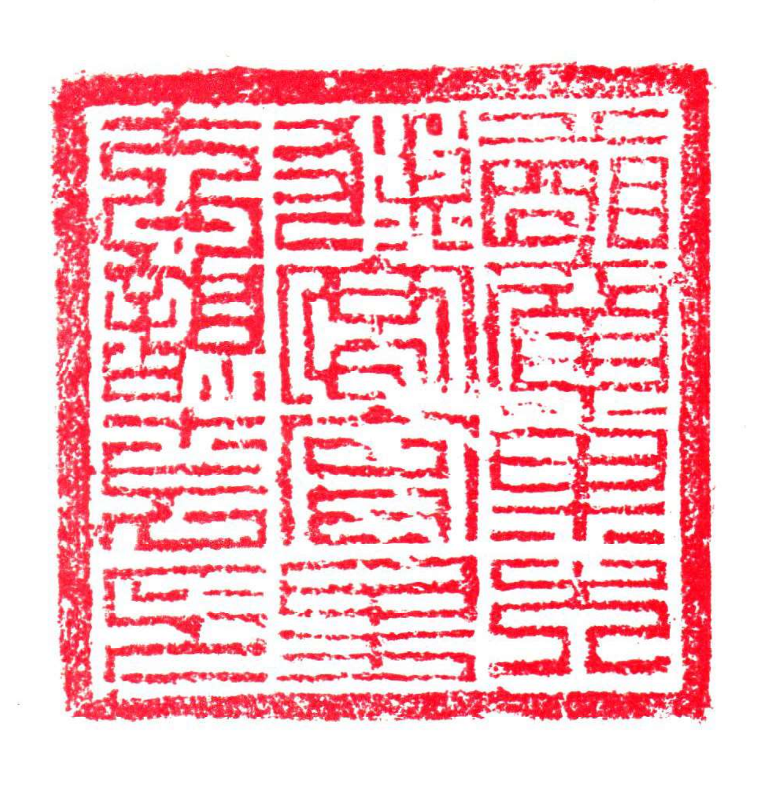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4.7×4.8厘米。原藏益都孫氏。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補遺》。

卷十四　耶律留哥蒲鮮萬奴劉永昌張致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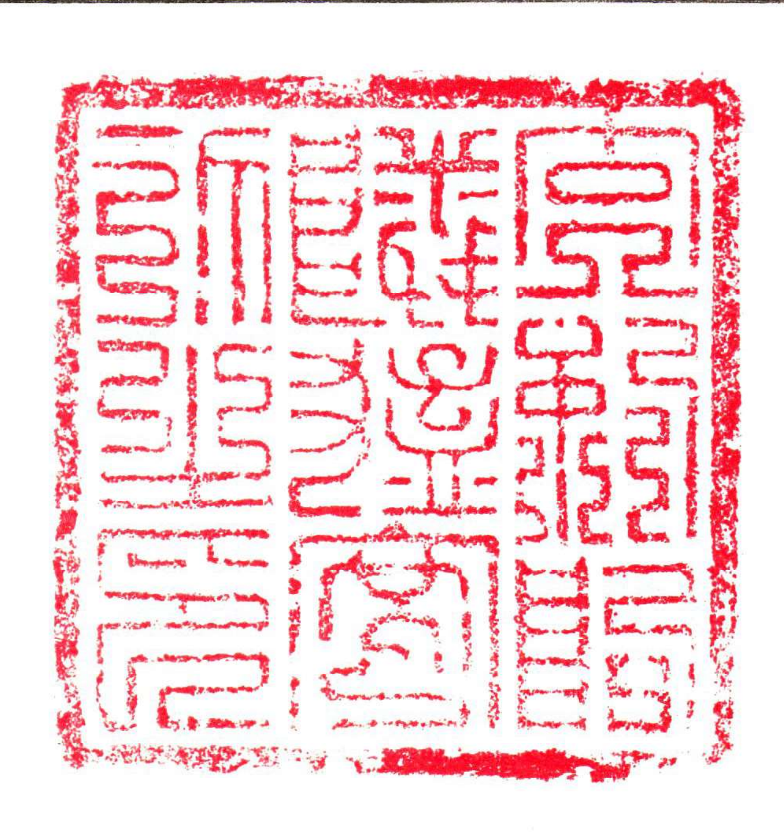
508　**大遼尚書吏部之印**

清宣統二年(1910年)出土于遼寧省丹東。8.9×8.9厘米。背刻“大遼尚書吏部印”、“天統三年四月日造”。原藏旅順博物館。今藏丹東市振安區文化局。



509　　萌奪果大猛安合里太謀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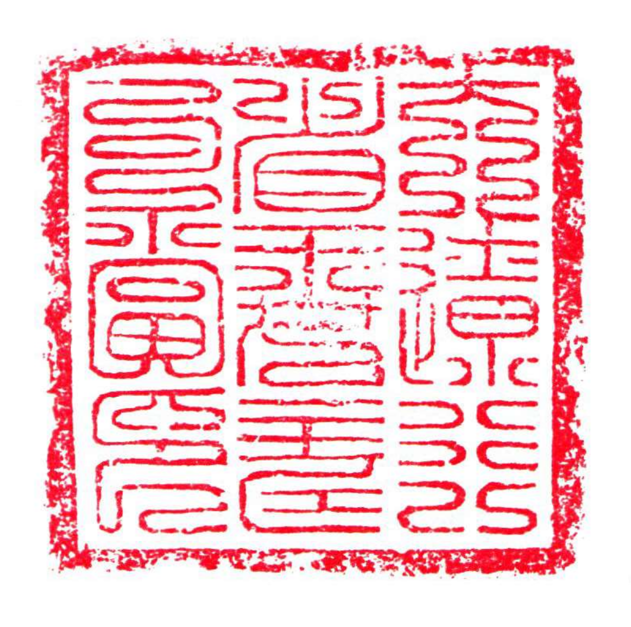
1973年5月于遼寧省寬甸縣徵集。6.8×6.8厘米。側刻“萌奪果猛安合里太毛克印”、“天統三年四月日造”。藏處不詳。



510　　克剌阿鄰猛安所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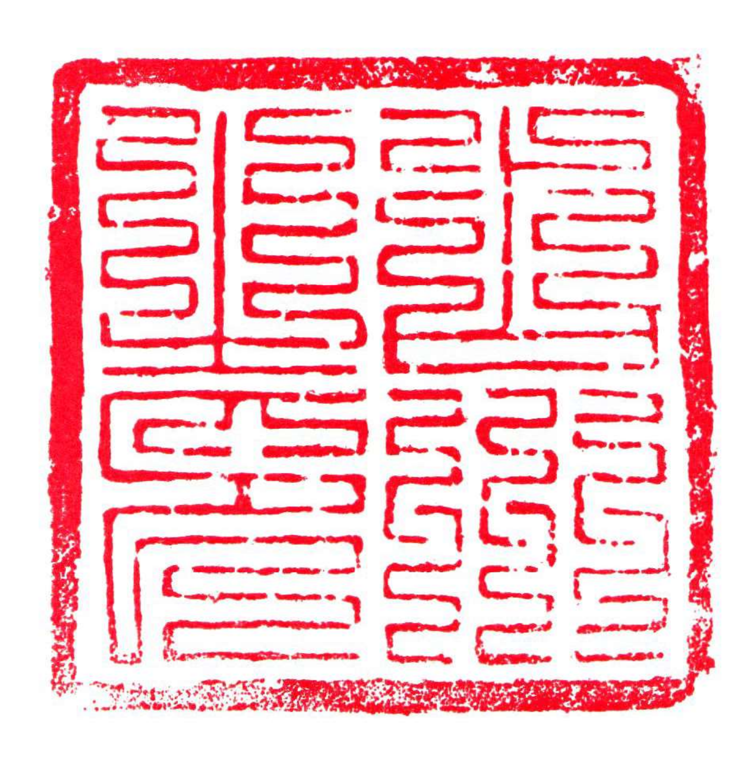
解放後遼寧省鳳城縣出土。7.4×7.4厘米。側刻“克剌阿鄰猛安所之印”、“天統三年四月日造”。藏處不詳。





511　　大遼行省委差句當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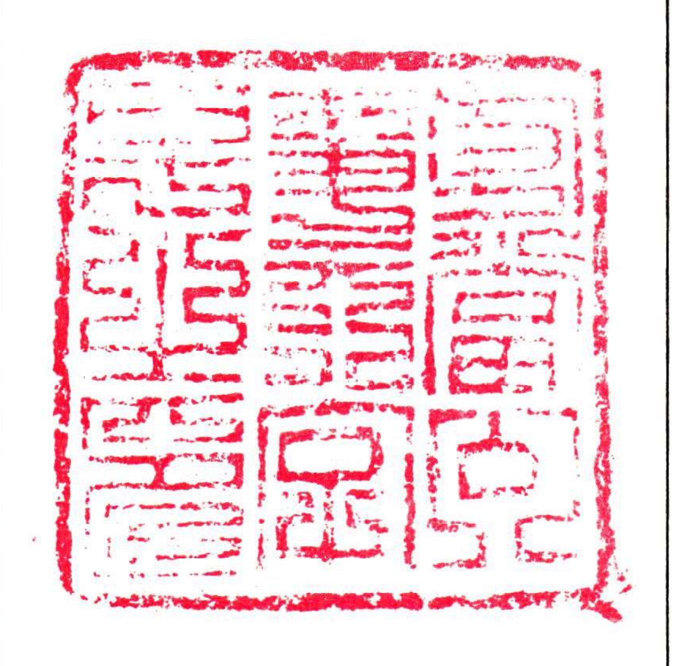
1984年出土于黑龍江省泰來縣。5.7×5.7厘米。背刻“委差□”。藏泰來縣圖書館。



512　　古州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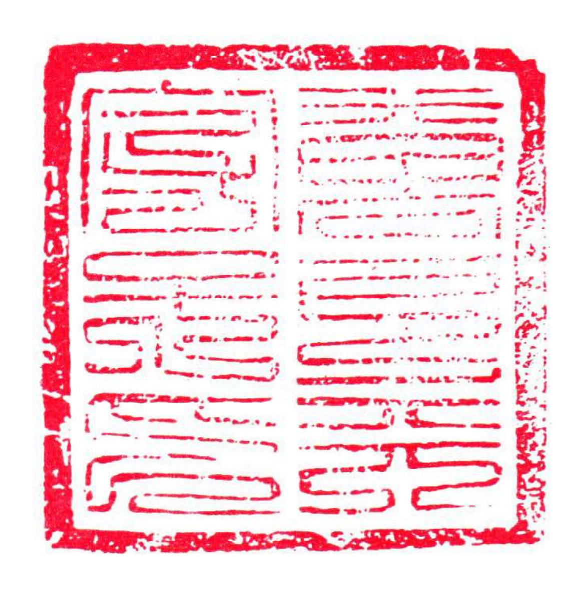
1984年7月出土于黑龍江省牡丹江市。7×7厘米。背刻“天泰二年二月廿五日”、“應辦所造”。側刻“古州之印”。紐端刻“上”字。藏牡丹江市文管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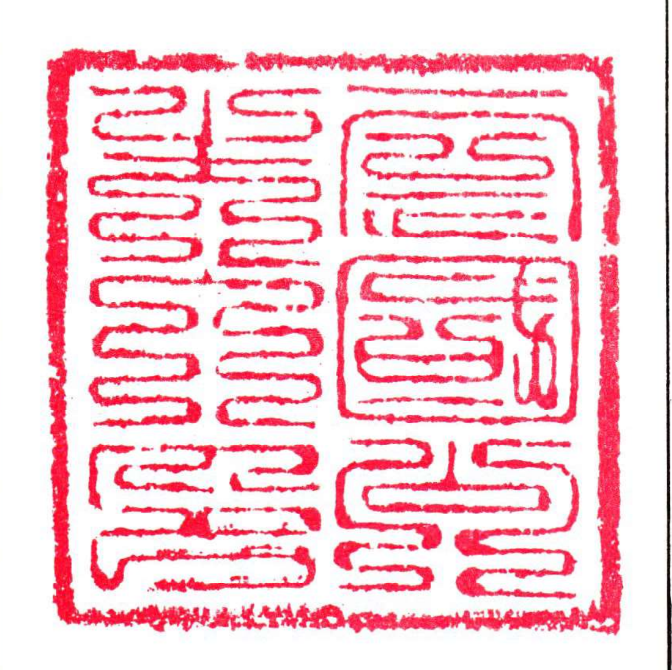
513　句當公事天字号之印

1976年出土于吉林省琿春縣。6×6厘米。背刻“天泰二年三月日”、“□□所造”。紐端刻“上”字。藏延邊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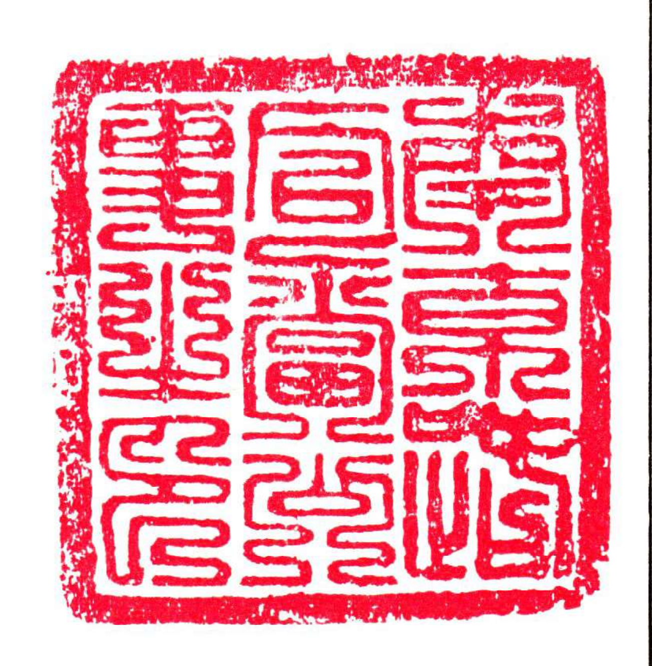
514　萬户天字号印

1975年5月出土于黑龍江省海林縣。7×7厘米。背刻“天泰二年六月日”、“北京行六部造”。側刻“萬户印”。藏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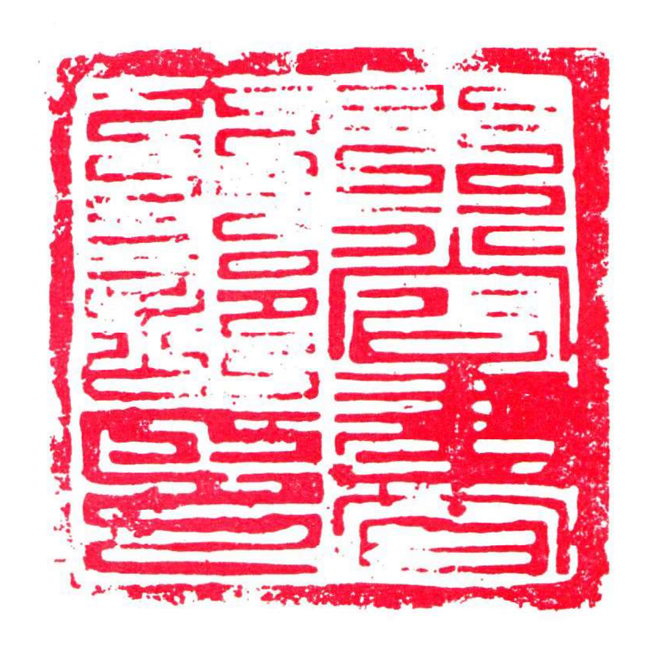
515　定國公夫人印

1988年3月出土于吉林省安圖縣。6.2×6.2厘米。背刻“天泰三年四月十八日”、“南京行部造”。側刻“定國公夫人印”。紐端刻“上”字。藏延邊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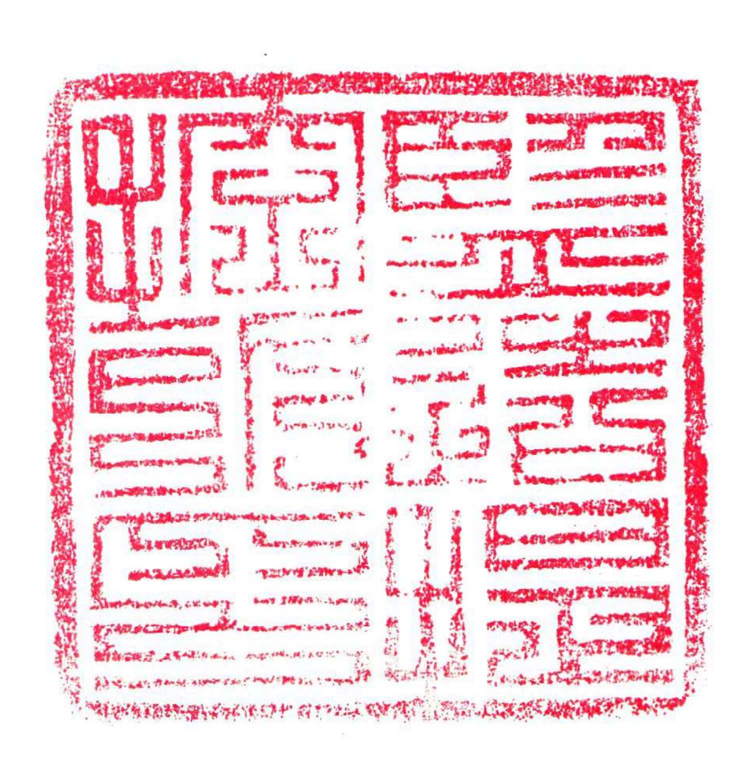
516　南京路句當公事之印

1958年出土于吉林省延吉。6×6厘米。背刻“天泰三年六月一日”、“南京行部造”。側刻“南京路句當公事印”。藏吉林省博物館。



517　行尚書文部印

1987年出土于吉林省鎮賚縣。7.5×7.5厘米。背刻“天泰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造”。藏鎮賚縣文化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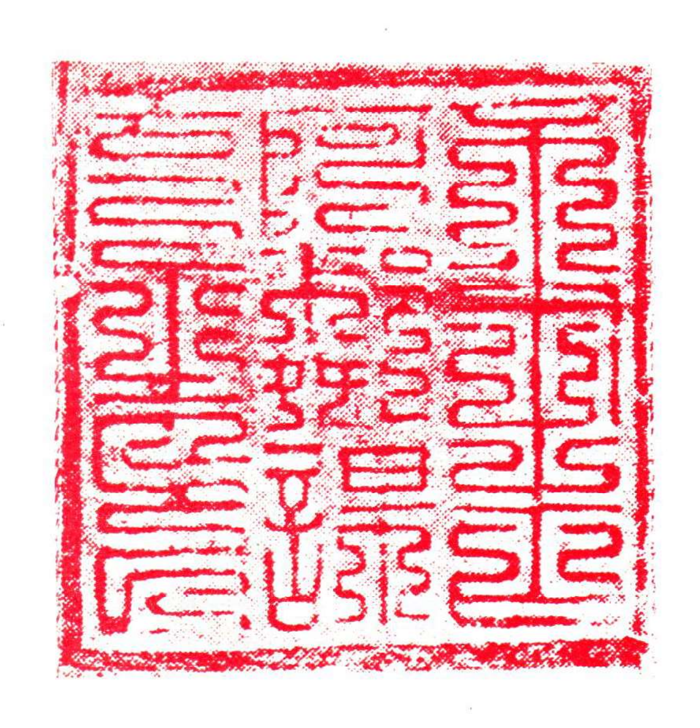
518　監造提控所印

1977年4月出土于黑龍江省依蘭縣。7×7厘米。背刻“天泰四年六月造”。側刻“監造提控所印”。藏依蘭縣文管所。



519　　兵馬安撫使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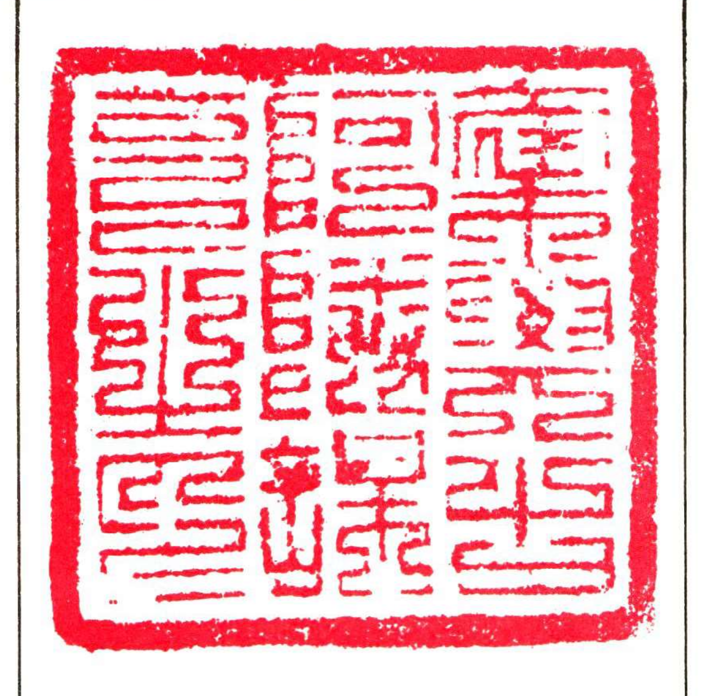
1962年于吉林省吉林市徵集。7.5×7.5厘米。背刻“南京行部”、“天泰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造”。側刻“兵馬安撫使印”。銅質鎏金。藏吉林省博物館。



520　　不訇古阿鄰謀克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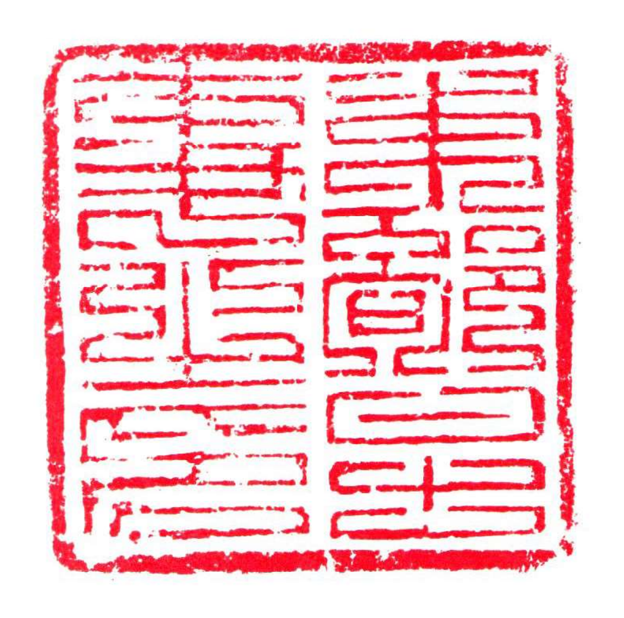
民國八年(1919年)出土于黑龍江省寧安縣。6.5×6.5厘米。背刻“天泰十八年”(一説應爲天泰六年)。見民國修《寧安縣志》。





521　奪與古阿鄰謀克之印

1970年出土于黑龍江省巴彦縣。6.5×6.5厘米。背刻"天泰七年十二月少府監造"。側刻"奪與古阿鄰謀克印"。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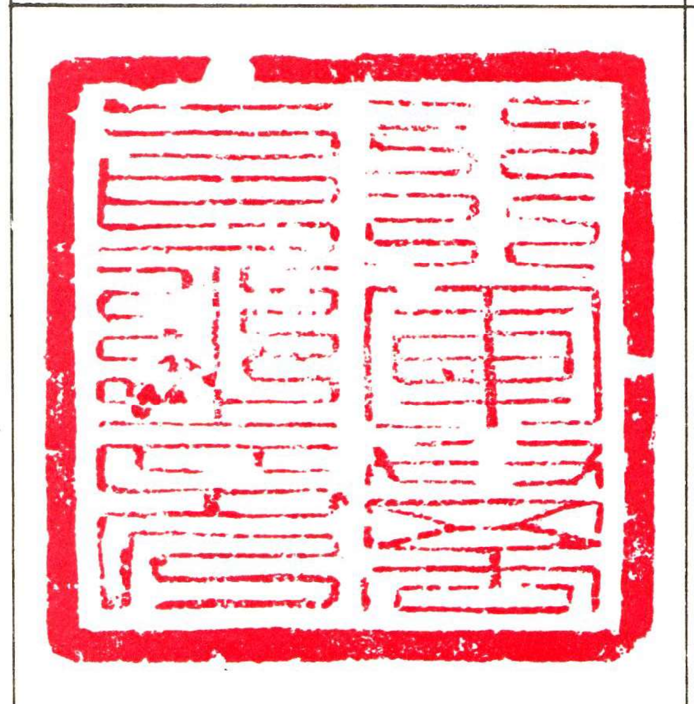
522　吏部主事之印

1975年6月發現于吉林省延吉。5.7×5.7厘米。背刻"天泰九年六月分少府監造"。側刻"吏部主事之印"。藏延邊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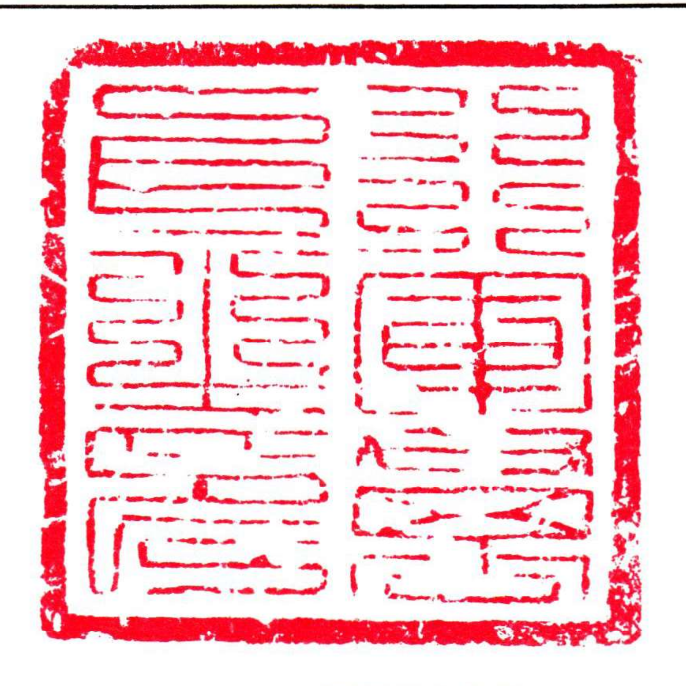
523　行軍萬户之印

1975年出土于吉林省琿春縣。6.5×6.5厘米。背刻"天泰九年七月分少府監造"。側刻"行軍萬户印"。藏延邊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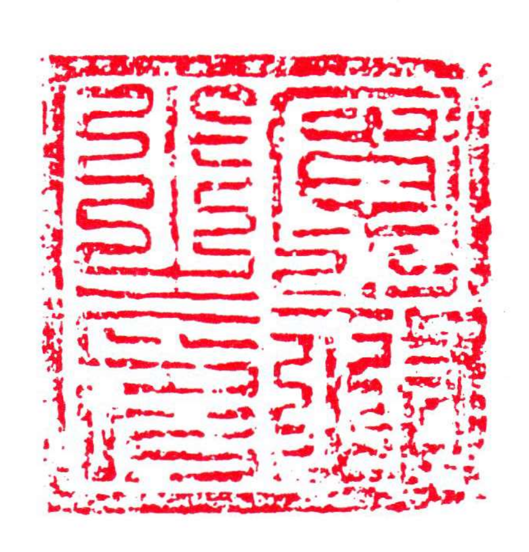
524　行軍萬户之印

1980年出土于吉林省琿春縣。6.5×6.5厘米。背刻"天泰九年七月分"、"少府監造"。側刻"行軍萬户印"。紐端刻"上"字。藏延邊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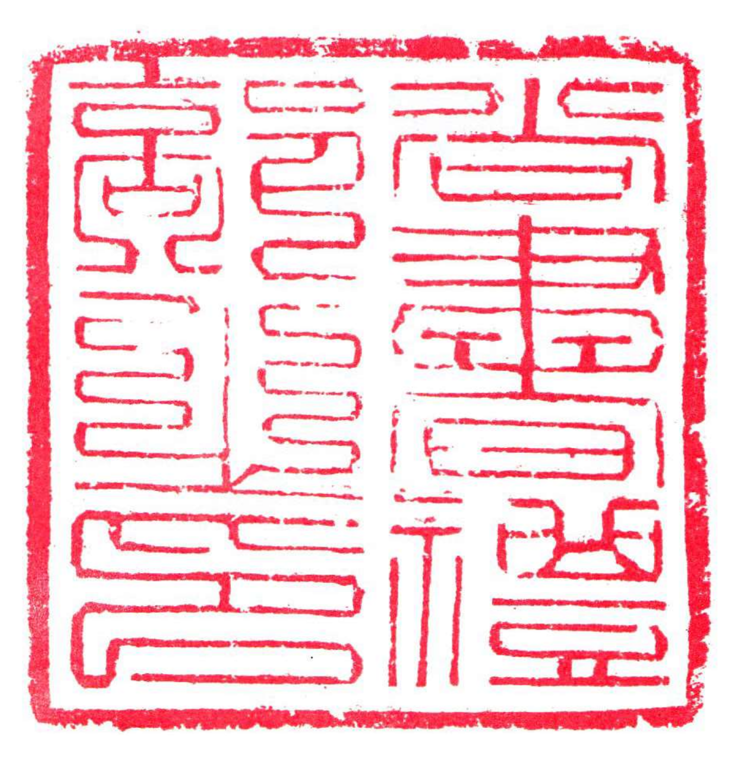
525　　行軍萬户之印

1981年4月出土于吉林省琿春縣。6.4×6.4厘米。背刻“天泰九年七月分”、“少府監造”。側刻“行軍萬户印”。藏延邊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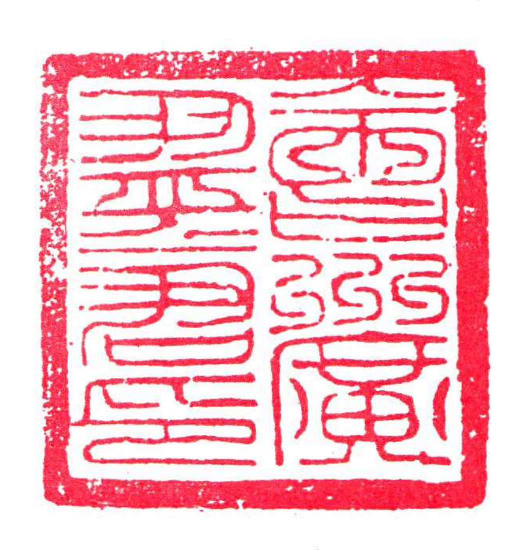
526　　軍政之印

1950年出土于吉林省柳河縣。7×6.9厘米。背刻“天泰十四年十月”。見《古璽印概論》。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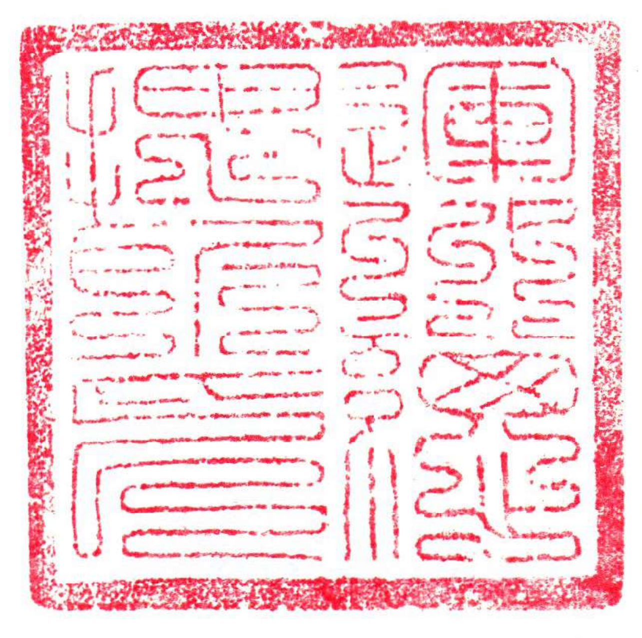
527　尚書禮部之印

1980年出土于吉林省琿春縣。7.5×7.5厘米。背刻“大同二年八月日”、“少府監造”，側刻“尚書禮部印”。紐端刻“上禮”。藏延邊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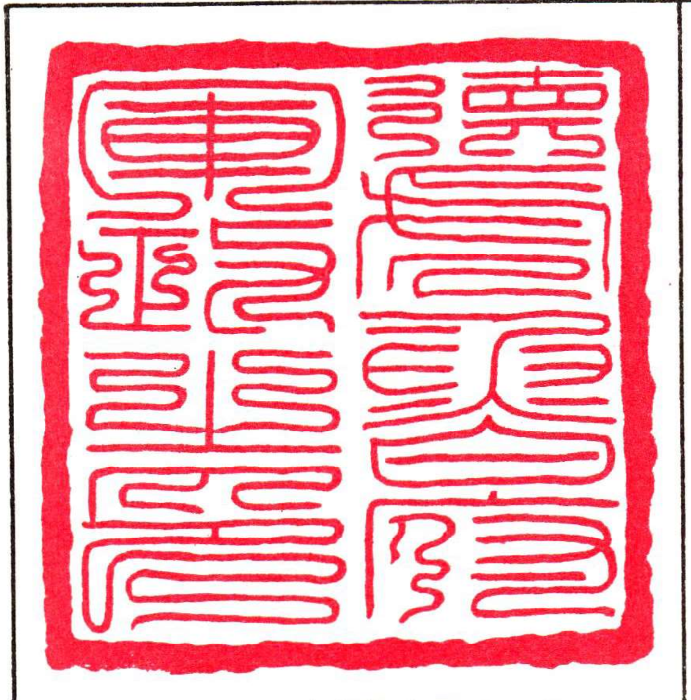
528　會州廣盈倉印

1977年5月出土于黑龍江省依蘭縣。背刻“大同四年九月日”、“禮部造”。側刻“會州廣盈倉”。藏依蘭縣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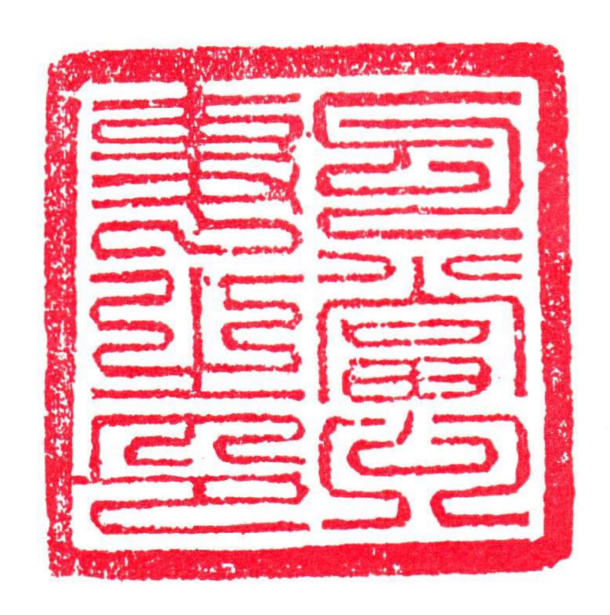
529　　運州總押所印

民國二十年(1931年)出土于黑龍江省東寧縣。6.2×6.5厘米。背刻"大同四年十月日禮部造"。見《藝林月刊》第五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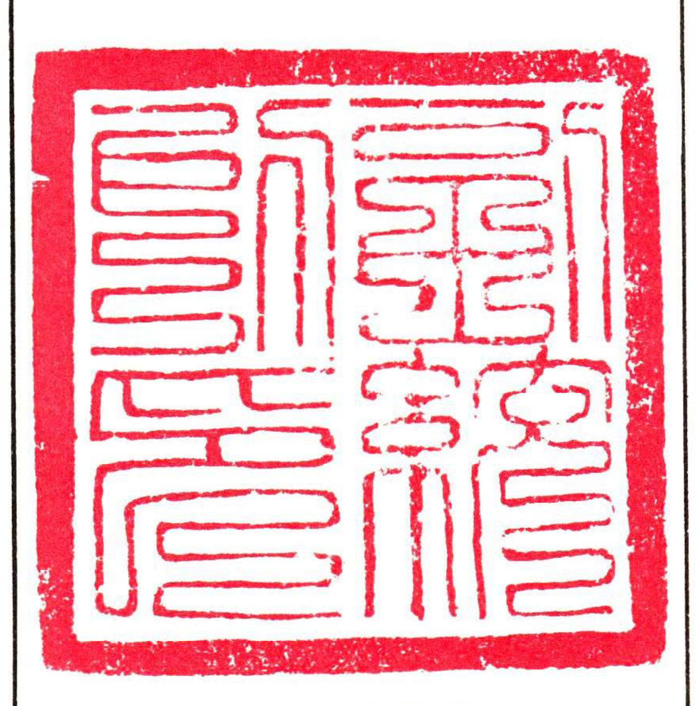
530　　德虎魯府軍政之印

民國十二年(1923年)出土于吉林省琿春縣。6.8×6.6厘米。背刻"大同六年禮部造"。原藏朱榕(望溪)。見《東北古印鉤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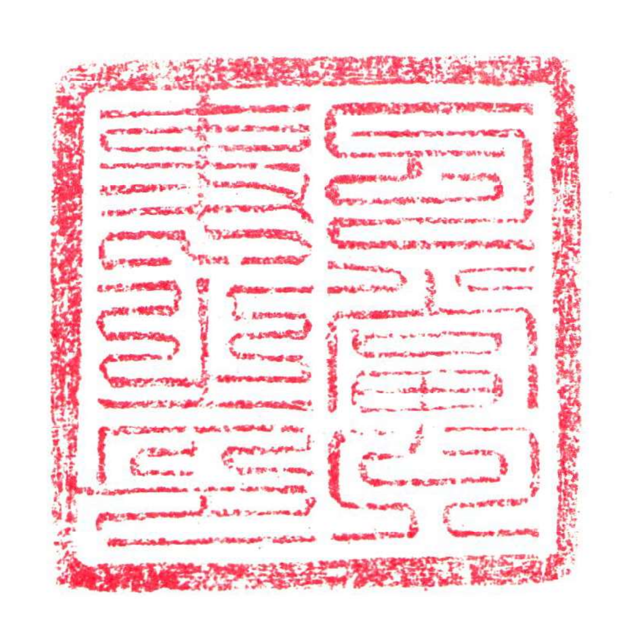
531　　句當公事之印

1975年9月出土于吉林省延吉。5.7×5.7厘米。背刻"大同七年七月禮部造"。藏延邊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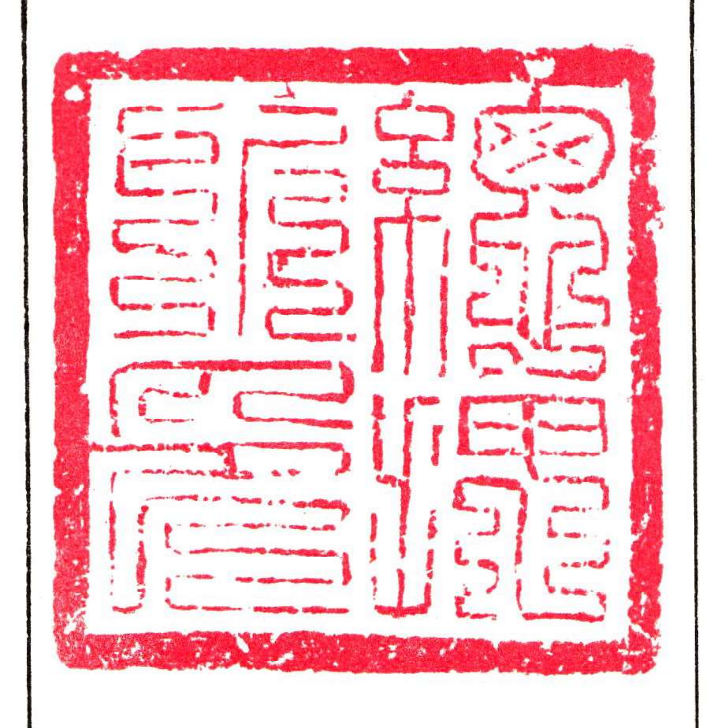
532　　副統所印

1980年8月出土于吉林省琿春縣。6.7×6.8厘米。背刻"大同八年四月日"。側刻"副統印"。紐端刻"上"字。藏延邊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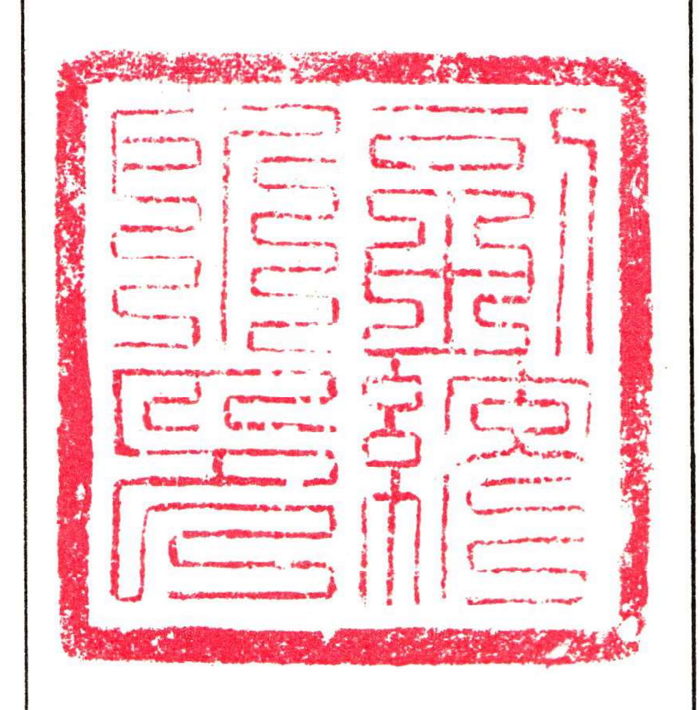
533　句當公事之印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7×5.7厘米。背刻“大同八年五月”、“禮部造”。側刻“句當公事”。藏吉林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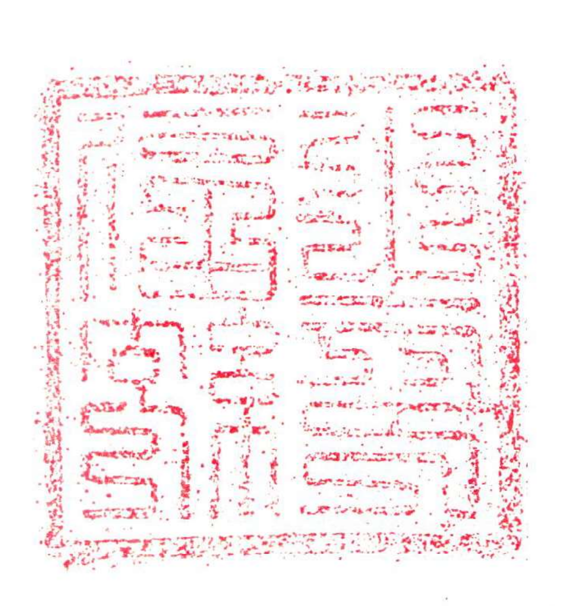
534　總押所印

1969年出土于吉林省延吉。6.5×6.5厘米。背刻“大同十年七月禮部造”。側刻“總押印”。藏延邊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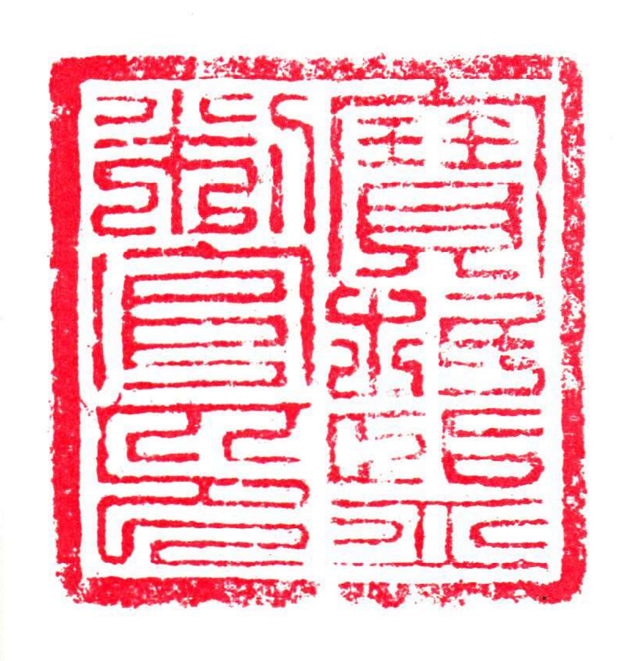
535　副統所印

1973年出土于吉林省敦化縣。6.5×6.4厘米。背刻“大同十年十月禮部造”。側刻“副統印”。藏延邊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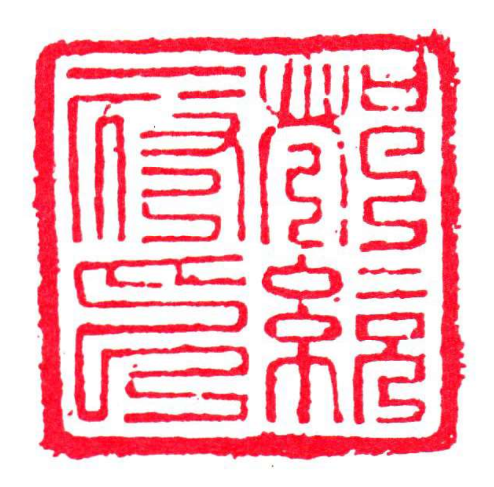
536　副統之印

1984年出土于黑龍江省巴彥縣。6.4×6.4厘米。背刻“猪兒年八月”、“日造”。側刻“副統之印”。紐端刻“上”字。藏巴彥縣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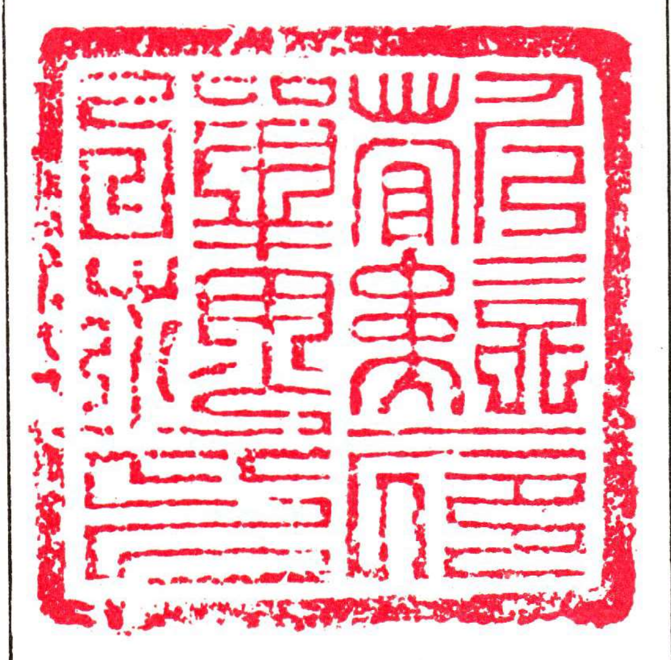
537　**寶坻監判官印**

1965年5月出土于河北省豐南縣。5.8×5.8厘米。背刻“天賜元年”、“禮部造”。側刻“寶坻監制印”。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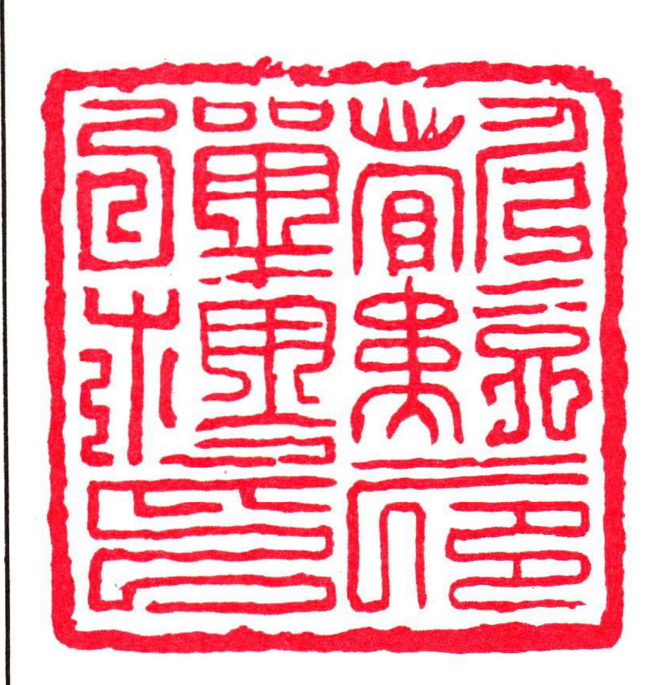
538　**都統府印**

1966年出土于河北省滿城。7.3×7.3厘米。背刻“天賜二年正月”、“都統所印”。紐端刻“上”字。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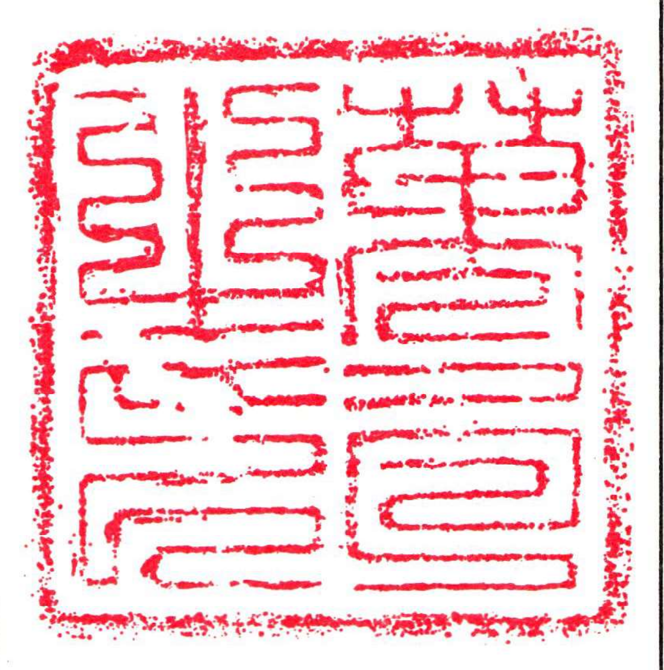
539　**都統府彈押印**

1976年出土于遼寧省朝陽縣。6.3×6.3厘米。背刻“天賜二年”、“彈押”。藏處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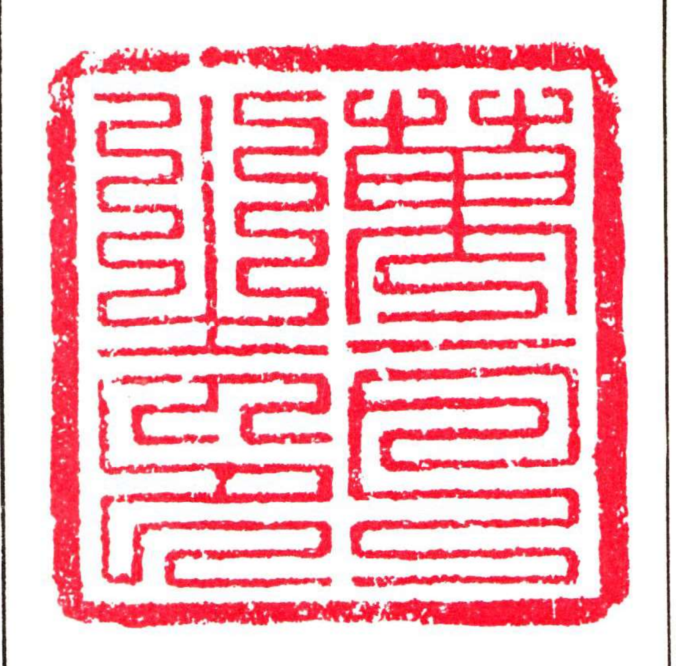
540　**都統府彈押印**

民國間出土于遼西。6.3×6.2厘米。背刻“天賜二年造”。原藏錦縣陳氏。見《東北古印鈎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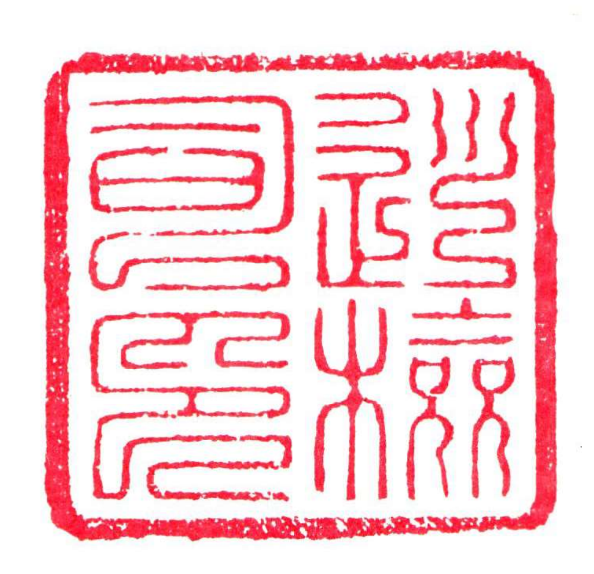
541　**萬户之印**

1974年春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區敖漢旗。6.5×6.5厘米。側刻“天賜二年五月”。藏敖漢旗博物館。



542　**萬户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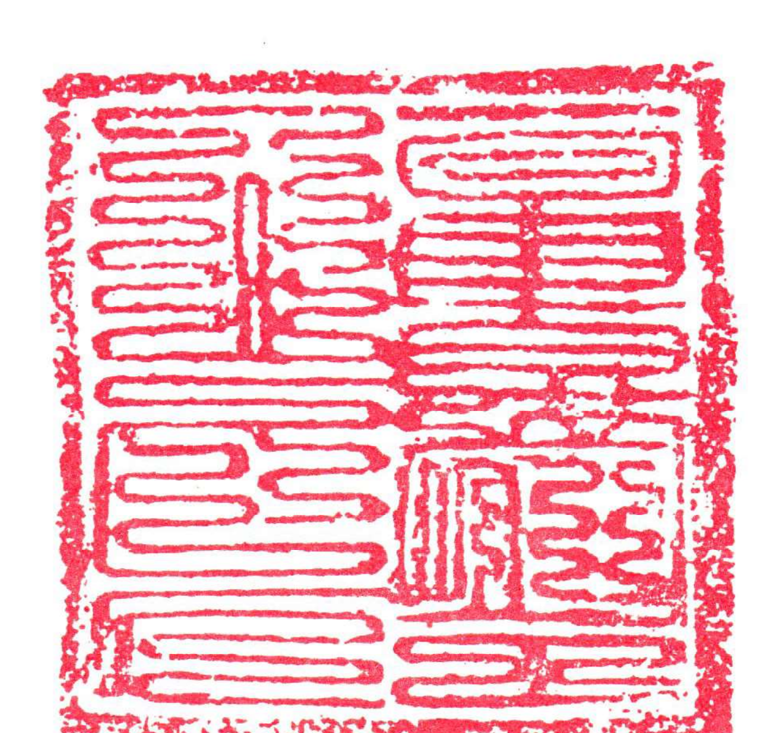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6.2×6.2厘米。背刻“禮部造”。側刻“龍興二年三月”、“萬户印”。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543　**巡檢司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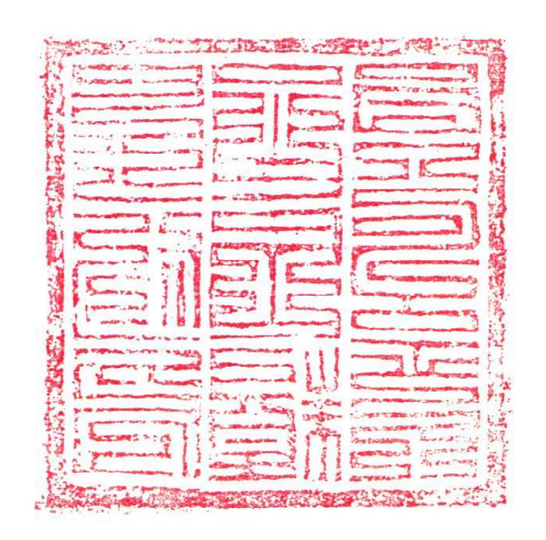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5.2×5.2厘米。側刻“龍興貳柒年月日”、“元帥府劄付潭州大團崖造”、“委差官樊”、“巡檢司印”。見《金石索》、《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卷十五　補遺



544　　□□之印

1975年出土于黑龍江省克東縣。7.3×7.3厘米。前二字不識，或認爲是契丹大字。藏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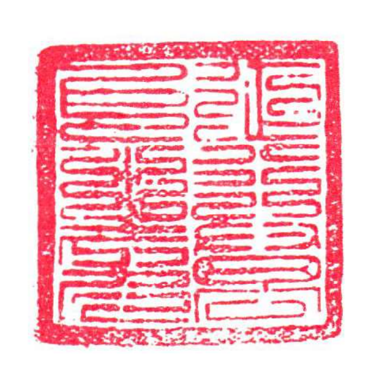
545　□□□□□□□所印

近年内蒙古自治區凉城縣出土。9.8×9.8厘米。印文九字，前七字不識。藏内蒙古自治區博物館。



546　宋建謀克之印

1978年12月出土于遼寧省本溪縣。6×6厘米。背刻“大定十年五月少府監造”。側刻“宋建謀克之印”、“系合右猛安下”。藏本溪縣博物館。



547　征行萬户之印

1978年出土于吉林省雙遼縣。6.2×6.2厘米。側刻“征行萬户印”。紐端刻“上”字。藏雙遼縣文化局。



548　都統所印

1987年4月26日出土于河南省濮陽縣紅星街。7×7厘米。背刻“天興元年二月”、“都統所印”。側刻“都統印”。紐端刻“上”字。藏濮陽市博物館。



549　都統所醴字印

1987年4月26日出土于河南省濮陽縣紅星街。7×7厘米。背刻“都統所醴字印”、“貞祐四年十一月”。紐端刻“上”字。藏濮陽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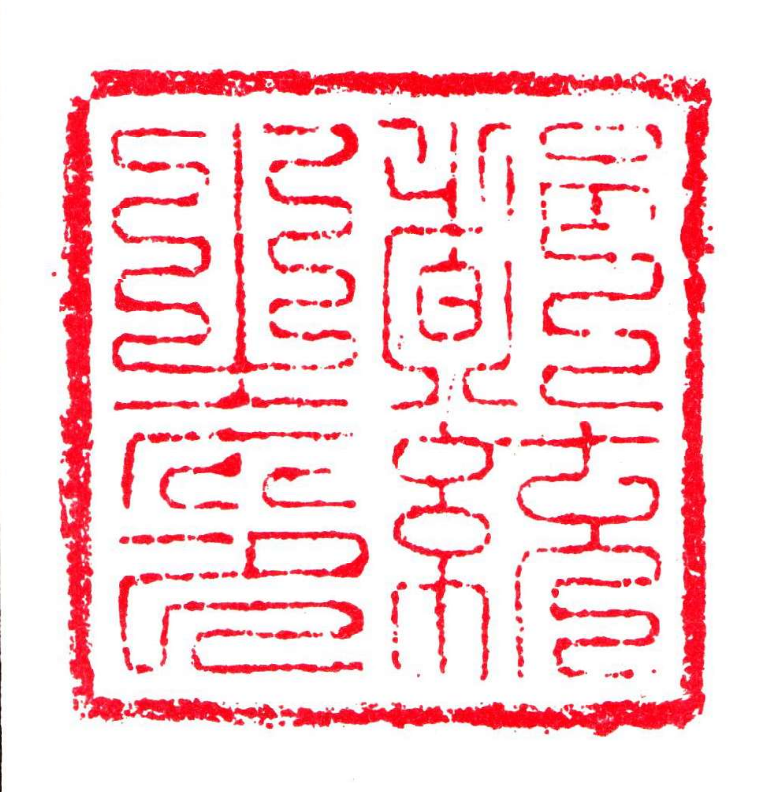
550　行元帥府經歷司印

1987年4月26日出土于河南省濮陽縣紅星街。7×7厘米。背刻“元帥府經歷司印”、“保垣州帥府造”。側刻“壬辰年十二月”。紐端刻“上”字。藏濮陽市博物館。



551　　都統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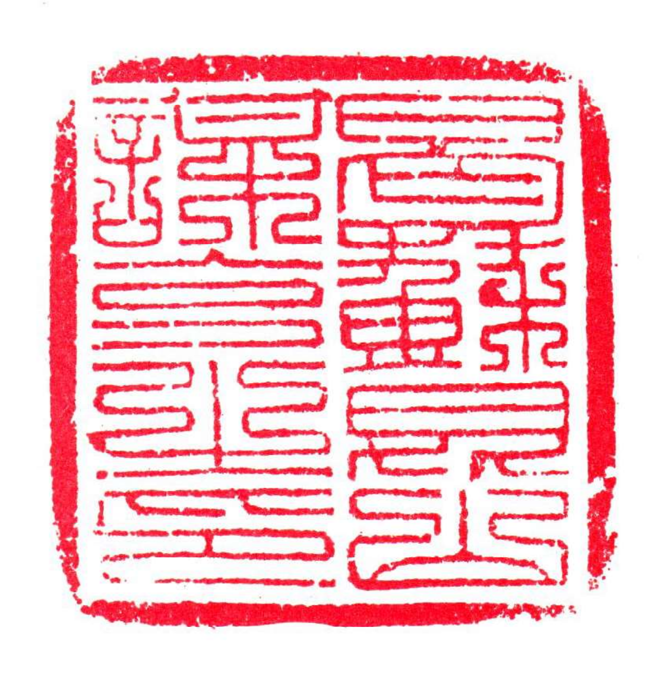
1988年春出土于山東省茌平縣韓集鄉。7×7厘米。背刻“軍前行六部造”、“□□四年十二月”。側刻“都統印”。紐端刻“上”字。藏茌平縣圖書館。



552　　都統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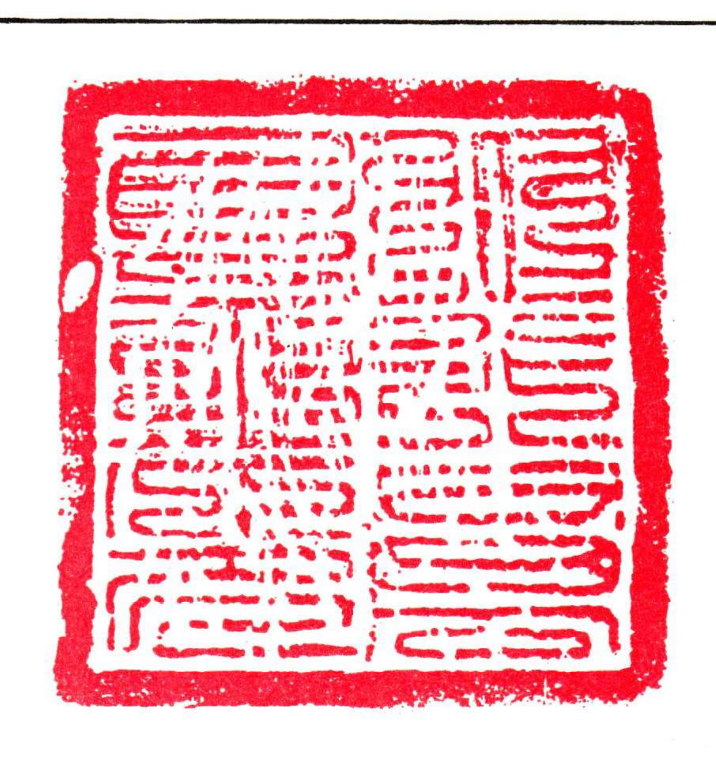
1982年7月出土于山東省微山縣昭陽鄉南莊。7×7厘米。藏微山縣文化館。





553　　曷蘇昆山謀克之印

1987年6月29日出土于黑龍江省北安市城郊鄉長青村。6.1×6.2厘米。背刻“大定十年七月”、“少府監造”。側刻“曷蘇昆山謀克之印”、“系蒲與猛安下”。藏北安市文化局。



554　　征行萬户之印

1987年5月出土于黑龍江省泰來縣江橋鎮康樂村。6.5×6.5厘米。側刻“征行萬户之印”。背左上角刻“上”字。藏泰來縣圖書館。



金代官印綜述

一　金代官印之學術價值

金石資料可以補史、證史，故歷來就爲治史者所重視。金代文獻貧乏，金石資料尤爲珍貴。金代官印除印文外，在印背、印側往往鑿刻有許多文字。這對于補證官修的《金史》和研究金史，提供了重要的資料。金代官印的學術價值，可以概括爲以下數端。

甲、補證《金史·地理志》

以金代官印來印證《金史·地理志》，可發現《地理志》有許多記載不確的地方。

蒲與路是金代最北部的地方行政區，相當于節度州。其治所在今黑龍江省克東縣。《金史·地理志》和《大金國志》均記作「蒲與路」。在蒲與路故城中，曾出土「蒲裕路印」。這是金代當時的官印。「裕」、「與」音同字異。官印的印文，要經過有關官府的審定，始允頒造。從印文得知，「蒲裕路」應是金代官方的標准寫法。「蒲與路」則是後世修史時的寫法。

在大定二十年滕村佛堂給碑上，鈐有「沇州之印」。據此可知，在大定二十年以前，曾有沇州的建置。然而《金史·地理志》和《大金國志》，均無沇州之名。此官印可補史之闕。

河北省定縣徵集有「涿州節度使之印」，印背刻有癸未年款。據此可知，涿州爲節度州。《金史·地理志》將涿州列爲刺史州，《大金國志》亦同。癸未年爲金宣宗元光二年（公元一二二三年），此印表明，金代後期涿州由原來的刺史州升爲節度州。

在河北省隆化縣出土有「興安西北等路元帥府印」。「興安」，似即今興安嶺。在遼金時代，現在的興安嶺稱作「金山」。

興安嶺是後出現的名字。此印無年款，應是金代後期官印。根據官印，似金代後期「金山」又有「興安」之稱。這可能是歷史上興安嶺名稱之初見，爲研究興安嶺名稱的起源和演變，提供了重要的綫索。

金代的猛安謀克，多以所在山川命名。考察這些山川的位置，可以了解猛安謀克的地理分佈。猛安謀克官印數量較多，近四十種，且多數出土地點明確。這對于研究金代的山川地理和猛安謀克的分佈，提供了新資料，可以補《金史·地理志》之闕。

乙、補證《金史·百官志》

金代後期，職官制度走向混亂，增設了許多新的官府。官印上的職官，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不見于《金史·百官志》。例如規措所、應辦所、總押、彈壓、提控、審計院、招撫司、税務司、軍資庫、御用後總領都提舉等等，均不見于《金史·百官志》。據此，可以補《金史·百官志》之闕。

官印上有的職官名稱，與《金史·百官志》的記載不完全一致。例如黑龍江省依蘭縣出土有「堂厨公使酒庫之印」，「堂厨公使酒庫」應即《金史·百官志》上的「堂食公使酒庫」，其職掌是「掌受給歲賜錢」。二者只有一字之差，即「堂食」作「堂厨」。官印印文要比史書記載更爲確鑿可信，可以糾正《金史·百官志》之微誤。

《金史·百官志》對有些官府記述甚簡，莫知其詳。例如只記載金初行臺省「品官皆下中臺一等」，有關金代後期的行省職官設置，却只字未提。官印却提供了有關行省職官設置的可信資料。遼寧省桓仁縣出土有「行尚書六部印」，據此可知行省亦設有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六部之長亦稱尚書。《隋唐以來官印集存》録有「行六部侍郎印」，則知行省六部設有侍郎，作爲尚書之佐貳。上海博物館藏有「嵐州分治行六部員外郎之印」，則知行省六部設有員外郎。尚書、侍郎、員外郎之存在，説明行省職官之設置，一依中臺六部。

又如據《金史·百官志》，尚書省設有左司、右司，各設郎中一員，「掌本司奏事」。即左司郎中「總察吏、户、禮三部受事

付事」；右司郎中「總察兵、刑、工三部受事付事」。金末，左、右司奏事有些變化。金哀宗天興年間（公元一二三二——一二三四年），見有左右司郎中，說明左右司合署奏事，這應是左三部與右三部合署的結果。黑龍江省寧安縣出土有「主奏司郎中印」，無年款，應是金代後期的官印。主奏司郎中，不見于《金史·百官志》。據此官印，主奏司應是尚書六部合署後，左右司郎中的改稱。這反映出，金代後期尚書六部奏事走向簡化，以適應當時軍事政治危急的需要。

丙、訂正年號之誤

中國古代一直存在以年號紀年。年號之存廢、改易，往往與政權的變動有關。因此，年號便成爲史學家所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金代後期，出現了以耶律留哥爲領導的契丹人起義鬥爭。《元史·太祖紀》稱：「（太祖）八年癸酉春，耶律留哥自立爲遼王，改元元統。」榮孟源《中國歷史紀年》、李崇智《中國歷代年號考》，均取此說。但是，在出土的耶律留哥官印中，印背年號鑿款皆作「天統」。官印上的鑿款要比史書的記載更爲可靠。由此可知，《元史》記載的「元統」，應是「天統」之誤。

金末，咸平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叛金自立，建立了東夏（初稱大真）政權。據史書記載，東夏建元「天泰」。在黑龍江省和吉林省的東部地區，出土了許多「天泰」款的官印，由此可知這一帶是東夏割據的勢力範圍。在上述地區，又出土了若干鑿有「大同」年款的官印。經研究，「大同」應是東夏「天泰」改元後，所使用的新年號。李崇智《中國歷代年號考》，已採納此說。

丁、訂正時間之誤

《金史·世宗紀》記載，大定二十一年（公元一一八一年）閏三月，以尚書右丞蒲察通爲平章政事。蒲察通的官印凡兩見。

一見于《意園古今官印勼》，印背鑿款作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一鈐于長清縣靈岩寺滌公開堂疏碑，碑末題「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宗國公蒲察」。此「宗國公蒲察」，即蒲察通。據官印可知，蒲察通升平章政事在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以前。較《金史》的記載要早兩個月，可正《金史·世宗紀》之微誤。

《金史》記載，劉永昌于貞祐二年（公元一二一四年）起事，建元「天賜」。同年，被金廷平定，事見《完顏佐傳》。榮孟源《中國歷史紀年》據此稱：「劉永昌，起事，尋亡。改元一。天賜，甲戌（一二一四）」。李崇智《中國歷代年號考》同此。現在所見到的劉永昌官印四種，一種鑿款天賜元年，其餘三種均鑿款天賜二年。這説明劉永昌的起義政權，至少存在了兩年（公元一二一四——一二一五年）。據此，可以訂正《中國歷史紀年》和《中國歷代年號考》之誤。

戊、補史實之闕

蒲鮮萬奴的東夏政權，按舊史觀點屬于僭僞，故《金史》和《元史》都没有爲其立傳，有關史實不清，爲治金、元史者所病。幸賴東夏官印出土甚多，根據印文及印背、印側鑿款，東夏的典章制度，可以窺知大概。例如有南京行部和北京行部頒造的官印，説明東夏仿効金廷，設置有行省和南、北二京。有「尚書禮部之印」、「吏部主事之印」，説明東夏朝廷設有尚書六部。有「古州之印」、「會州廣盈倉印」、「運州總押所印」，説明東夏在地方上也實行州縣制。有「不匐古阿鄰謀克之印」、「奪與古阿鄰謀克之印」，説明東夏也存在猛安謀克組織。凡此種種，都表明東夏的典章制度，一依金制。通過官印的地理分佈，還可以確定東夏政權的勢力範圍。這就使人們對東夏割據政權的歷史概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金代官印的學術價值是多方面的，上述只是撮其大概而已。通過官印印文和印背、印側的鑿款，可以了解金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的情况。官印屬于文物，是當時歷史的直接記録，要比文獻的記載更爲真實可靠。金代官印的學術價值，近年來愈來愈被歷史學家們所重視，不斷地應用官印來補充文獻的不足，訂正其錯誤。隨着歷史研究的不斷深入，金代官印的學術價

值，會越來越變得重要起來。

二　金代官印的使用與製造

金代官印的使用與製造，在其初期、中期和後期有些不同。這不僅表現在官印的形制上有些差別，而且在頒造官印的機構上也有很大的變化。這種差別和變化，是由于不同時期的政治形勢所致。官印的種種變化，反映了金朝由建立走向强大，又轉爲衰落的歷史過程。

甲、金代初期的官印

金朝使用官印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女真人建國以前。當時，女真人處于遼朝的統治之下。遼朝爲了羈縻女真人，曾任命完顏部酋長爲生女真節度使，并賜以官印，作爲行使職權的憑證。據《金史·世紀》，景祖烏古廼被任命爲生女真節度使，「遼主將刻印與之」。當時，生女真人不願意接受遼朝的統治，烏古廼不敢接受官印，使部人揚言說：「主公若受印繫籍，部人必殺之。」但是，由于遼朝强烈的要求，施以種種的壓力，烏古廼最後還是接受了遼朝賜予的官印，擔任了生女真節度使。在世祖劾里鉢擔任生女真節度使時，桓赧、散達作亂。爲了防止意外，世祖囑其弟穆宗盈歌說：「今日之事，若勝利則已，萬一有不勝，吾必無生。汝今介馬遥觀，勿予戰事。若我死，汝無收吾骨，勿顧戀親戚，亟馳馬奔告汝兄頗刺淑，于遼繫籍受印，乞師以報此仇。」根據上述記載，說明自景祖烏古廼以後，完顏部酋長一直受遼印爲生女真節度使。這時的女真人尚無文字，遼朝所賜予的生女真節度使官印，應是契丹文或漢文。

在女真滅遼的過程中，曾繳獲了一批官印。其中包括有遼帝的傳國璽、「元帥燕國王之印」、「通天萬歲之寶」、「受天明

命惟德乃昌之寶」以及嗣聖寶、御封寶等等，一共有二十餘種之多。金軍攻陷北宋都城汴京時，掠去大宋寶印二十九種，其中有皇帝殿寶十四（一說十五）。在征遼伐宋的戰争中，金軍前後掠去遼、宋璽印四十餘種，見于記載的多是皇帝、皇后、皇子、皇妃的璽印。至于其他文武百官之印，被掠去者尚不知有多少。中國古代有個傳統，前代的璽印往往被視爲受天明命的吉祥之物，多被後世所沿用。因此，金軍從遼、宋繳獲的官印，在金初繼續被使用了一段時間。這是金朝建立以後，最早使用的一批官印。當時，金廷忙于戰争，無暇顧及頒造官印之事。因此，就出現了雜用遼、宋舊官印的現象。

金太宗即位以後，始鑄造官印。《金史·百官志》稱：「天會六年，始詔給諸司，其前所帶印記無問有無新給，悉上送官，敢匿者國有常憲」。這是以新鑄造的官印來取代遼、宋舊印。遼太宗時代頒造的官印，至今没有發現，説明當時頒造的官印數量很少。在金太宗時代，没有完全實現廢止遼、宋舊印的目的，因而在正隆元年（公元一一五六年）海陵改革官制時，再次提出廢止遼、宋舊印。《金史·百官志》載：「至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舊名及階品大小不一，有用遼、宋舊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禮部更造焉」。此後，金代的官印開始定制，走向統一化。現在我們所見到的金代官印，正隆以前者絶少見，大多數是正隆以後的官印。

金代初期，即正隆（公元一一五六—一一六一年）以前的官印，目前只見到兩種。其一是吉林大學收藏的「阿里合謀克印」，印背鑿「天眷七年三月少府監造」。據《金史》，天眷四年（公元一一四一年）正月，改元皇統，天眷七年實際是皇統四年（公元一一四四年）。此印既由少府監頒造，豈有不知改元之理？究其原因，或此印是某偏遠地區官府假借少府監名義造印，或此印爲僞造。其二是《意園古今官印勼》收録的「永興軍節度使之印」，印背鑿「皇統二年總管府造」。永興軍屬京兆府路（今陝西省南部地區），治長安（今西安）。史載京兆府置于皇統二年（公元一一四二年）。「永興軍節度使之印」，是京兆總管府建立不久所頒造的官印。當時，金都在上京（今黑龍江省阿城市），永興軍距上京遥遠，故由京兆總管府鑄此「永興軍節度使之印」。由此二印得知，金初的少府監和地方上的總管府，都可以頒造官印。

乙、金代中期的官印

宋朝頒造官印的官府是少府監。金承宋制，最初也是由少府監掌管官印的頒造。據《金史·百官志》，少府監下屬有文思院，「掌造内外局分印合」。金章宗明昌七年（公元一一九六年），省入祗應司。在金熙宗時代，官印多由少府監頒造，金太宗時代亦當如此。

自海陵正隆元年（公元一一五六年）起，百官之印悉由「禮部更造」。《金史》雖然有這樣的記載，但是實際的情形并非完全如此。從現存的官印看，海陵時代的官印，大多數仍由少府監頒造，少數由尚書禮部頒造。這説明在海陵時代，尚書禮部和少府監都可以頒造官印，而以少府監爲主。少府監本是皇帝的内府，「掌邦國百工營造事」，故在官印背款上，亦作「内少府」。

金世宗大定初年，依然保持海陵時代的舊制，尚書禮部和少府監同時造印。自大定十年（公元一一七〇年）以後，官印似通由尚書禮部頒造。此事不見于史書記載，而是在分析研究現存大定年款官印以後，所得到的結論。現在所見到的大定年款官印二十五種，其中由内少府監造者十五種，分别是大定三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頒造。至今没有見到大定十年以後由少府監頒造的官印，説明自大定十年以後，少府監停止了官印的頒造。

海陵和世宗時代的官印，多爲朝廷官印、州縣官印和猛安謀克官印。其他諸如軍官印、句當公事印、委差官印，數量很少。海陵和世宗時代，是金朝經濟走向繁榮，政治趨于穩定的歷史時期。因此，在職官設置上是朝官多，地方官少，軍官少。反映到官印的頒造上，也是如此。猛安謀克官印的頒造，與戰争没有多少直接關係。猛安、謀克既是女真人的軍事組織，又是地方政權機構。猛安相當于州，謀克相當于縣。猛安謀克制度在海陵、世宗時代迅速發展，在世宗時達到了頂峰。據《金史·兵志》的記載，在大定二十四年（公元一一八四年），全國共有猛安二百零二、謀克一千八百七十八。猛安謀克官印的大量頒造，是女真猛安謀克制度大發展的必然結果。

海陵、世宗時代的官印，鑄造比較精致講究，是金代官印中質量最好的作品。印的外觀平整光滑，很少見到氣孔和毛刺。印文

篆寫乾浄利落，印文的佈局也比較規矩整齊。在印的背面，一般都鑿刻有年款和造印機構的名稱。在印的側面，多刻有楷書的印文。在紐端刻有指示倒正的「上」字。印面的尺寸與其品階相一致，合於職官制度的標準。正隆、大定年款的官印，是金代最有代表性的官印。從這個時期官印的形制，可以看出金代官印的風格和特點，是研究金代官印的典型材料。

丙、金代後期的官印

金代後期，外有蒙古人的侵擾威脅，内有各族人民的反抗鬥争，政治秩序處于混亂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官印的頒造也出現了混亂的局面。除尚書禮部以外，許多中央和地方的官府，都可以頒造官印。其結果是粗制濫造的現象十分普遍。金代後期的官印是質量最差的官印。

在金章宗和衛紹王時代，百官之印仍是尚書禮部頒造。金宣宗貞祐二年（公元一二一四年）五月，爲避蒙古的軍鋒而遷都南京（今開封）。當時，名義上的首都仍是中都（今北京），南京只是臨時性避難的場所，因而被當時人稱作「行宫」。由于這種緣故，尚書禮部也隨之被稱作「行宫禮部」。因此，在貞祐二年五月以後頒造的官印，多鑿刻有「行宫禮部造」的字款。羅福頤將官印上的「行宫禮部」解釋爲行六部，這是一種誤解，應當予以糾正。

現在所見到的行宫禮部造的官印有二十餘種，其年款有貞祐、興定、元光、正大、開興、天興等。貞祐、興定、元光是金宣宗的年號，正大、開興、天興是金哀宗的年號。據此可知，在金宣宗、金哀宗時代，行宫禮部（尚書禮部）仍是頒造官印的主要機構。除行宫禮部以外，在京城和地方許多官府都可以頒造官印。從官印上的字款得知，其中有些造印的官府不見于《金史·百官志》。這是制度混亂、政出多門的一種表現。

（一）行部、行六部造印

行部是行六部的簡稱，行六部是行尚書省的別稱，行尚書省又可簡稱爲行省。行省最初是一種臨時性機構，事畢即罷。後來演變爲常設的官府。元、明時代的行省，即源于此。在金代後期，行部、行六部頒造的官印很多，在

數量上僅次于行宫禮部頒造的官印。

從官印的鑿款看，頒造官印的行部、行六部很多。常見的有「上京行部」（或作「上京行六部」）、「山東東路行部」、「東平行部」、「林州行部」、「懷州行部」、「單州行部」、「陝西路行部」、「大名行部」、「河中行部」、「南京行部」、「嵐州行部」等十一處行部。行部頒造的官印，種類繁多，計有都統印、副統印、萬户印、提控印、句當公事印、省差印。其中既有軍官印，又有文官印，而以軍官印居多，反映出行部的權力十分廣泛。

（二）路府州造印　金代後期，路、府、州各級地方官府，都可以頒造官印。從官印鑿款上看到的這類地方官府，計有「陝西西路」、「總管府」、「恒山公府」、「□路轉運司」、「咸平應辦所」等。

「路」是金代地方上最高的一級行政區，相當于現在的省。路治所在的首府，稱作「總管府」，以與散府相區別。「路」的長官，通常是由「總管府」的長官兼任。「恒山公府」是九公之一的恒山公武仙的公府。在金宣宗南遷以後，黄河以北淪陷爲蒙古人的活動地區。當時，淪陷地區的一些地主豪紳便招集民衆，借以自衛。爲了動員這些地主武裝共同抗擊蒙古人的南下，金廷遂封其中勢力較大的九個地主豪紳爲九公。他們各有封疆，各行其事，設州立縣，任命官吏。其中以恒山公武仙勢力最大，故而可以頒造官印。

「轉運司」本是「掌賦税錢穀、倉庫出納、權衡度量」的財政機構。在金代後期多戰争的情况下，各種軍需都離不開「轉運司」，因此，它具有很大的權力。據《金史》記載，貞祐三年（公元一二一五年）七月，金宣宗「詔尚書省，行六部太多，其令各路運司兼之」。「轉運司」可以兼行六部的職權，已不限于賦税管理，故而可以頒造官印。

「應辦所」不見于《金史·百官志》，當是金代後期新出現的官府。「咸平應辦所」屬于地方官府，其職不詳，或是臨時性機構。

（三）軍事機構造印　在金代後期，戰争頻繁，軍事機構權重。因此，大大小小的軍事機構，都可以頒造官印。據官印鑿款，所見造印的軍事機構有：「中都路經略使司」、「中京總帥府」、「真定帥府」、「軍帥府」、「東京兵部」、「山東行兵

部」、「本路軍司」等。

「經略使司」即經略司，本是宋官，不見于《金史·百官志》。貞祐二年（公元一二一四年）四月，金宣宗派朝廷大臣到河北各地，爲諸路宣撫使，安集遺黎，事見《金史·宣宗紀》。貞祐四年（公元一二一六年）六月，「罷河北諸路宣撫司，更置經略司」。據此，知經略司是由宣撫司改置。中都路經略司，亦當置于此時。經略司是准軍事機構，權力很大。其所頒造的官印，既有都統、萬户等軍官印，又有「靈丘縣印」等地方官府印，即是證明。

「中京總帥府」，是指設在中京（今洛陽）的元帥府而言。中京原稱河南府，興定元年（公元一二一七年）升爲中京。「中京總帥府」屬于地方上設置的元帥府。「真定帥府」是指設在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的地方元帥府，真定府是河北西路的治地，屬于總管府。據《金史》記載，金代末年地方上設置的元帥府很多，在其他地區也有設置。地方上的元帥府權力也很大，故而可以頒造官印。

「本路軍司」應是指某地統軍司而言。金初，設有西南、西北、烏古敵烈、婆速路、咸州路、曷蘇館路、大名等統軍司。天德二年（公元一一五〇年），罷大名統軍司，置山西、河南、陝西三路統軍司，其後又置東北路統軍司、西北路統軍司。統軍司掌管一方軍政，擁有很大的權力，故可以頒造官印。

金代後期，行省設有兵部。「東京兵部」、「山東行兵部」，都是指行省的兵部而言。當時，不僅行省可以造印，行省的兵部也可以造印，説明造印制度之混亂。

（四）規措所和總部造印

規措所造印見有四種，即「都元帥府之印」、「興中總管都元帥府印」、「合札左監軍印」、「涿州節度使印」。這些官印的鑿款皆爲干支紀年，分别爲「甲申年」、「乙酉年」、「癸未年」頒造。這些干支年在金代均出現過兩次，第一次出現于金世宗大定初年，第二次出現于金宣宗末年和金哀宗初年。大定年間，造印制度很嚴，印形也比較講究。上述干支紀年的官印比較粗糙，應是金代後期的官印。「規措所」不見于《金史·百官志》，應是金代後期新置的官府。「規措所」可以頒造「都元帥府之印」，説明規措所地位很高，是朝廷中重要官府。

「總部」造的官印，見有五種，均屬軍官印。頒造的時間均在金哀宗天興年間（公元一二三二—一二三四年），都出土于洛陽附近的孟津縣。金代後期，洛陽稱中京金昌府，此「總部」應是設在中京金昌府的重要軍事機構，很有可能是中京總帥府的別稱。

三、金代官印的形制特點

史稱，金代的官制「大率皆循遼、宋之舊」。金代的官印也是如此。就金代官印的形制來看，在許多方面都與宋代的官印相同或相似。

甲、質料

金代官印（包括帝后、太子璽印）的質料，有金、玉、銀、銅之別。質料的區別，是由官印級別的高低所決定的。它反映了官印持有者地位的尊卑和權力的大小，這是封建等級制度的一種表現。

史稱，帝后璽印用金、用玉，稱作「寶玉」。皇后、太子之璽印，皆用金。不過也有例外者，例如皇帝的「禮信之寶」初用銅，後改用銀。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親王、尚書令之印，均是金印。一字王、諸郡王和正一品、從一品官印，采用金鍍銀印（銀印鍍金）。正二品、從二品官印，采用金鍍銅印（銅印鍍金）。三品以下的官印，均用銅印。

皇帝、皇后、太子之寶，至今尚未發現。現在所見到的官印，絕大多數都是銅印。只有三種是金鍍銅印：其一是舒蘭縣出土的「中書門下之印」，其二是完顏婁室的「詵王之印」，其三是天泰五年南京行部造的「兵馬安撫使印」。正隆元年（公元一一五六年），行三省之制，中書、門下、尚書的長官均爲正一品，按制度應用金印。此「中書門下之印」用鎏金銅印，與制度不

合。「詵王之印」屬于一字王印，按制度應是金鍍銀印，實物與史書記載不合。「兵馬安撫使印」是東夏官印，東夏的制度一依金制，兵馬安撫使爲從一品，應是金鍍銀印，實物亦與史書記載不合。「詵王之印」是妻室死後追封之印，東夏是地方割據政權。「詵王之印」和「兵馬安撫使印」用料不依制度，可以歸結于特殊的原因。然而「中書門下之印」用料不依制度，很難找出特殊的原因。這只能說明諸王和品官用印質料，不是很嚴格的。

乙、紐式

在六朝以前，官印是佩帶在身上，既表明其身分的高低，又便于隨時使用。因此，六朝以前的官印，形體很小，一般都是方二、三厘米左右。只有皇帝的璽印，形體比較大。爲了便于佩帶，官印的背部有穿孔的紐。戰國印紐作弧形，如瓦似橋，故又稱作瓦紐或橋紐。秦、漢時代，又出現了龜紐、蛇紐、駝紐，用以表示品官的不同等級，同時也使官印外形具有藝術的美感。隋、唐時代，由于中央集權制的加强，官印形體逐漸增大。這時的官印不是佩帶在身上，而是置于官署中，由專人掌管。隨着官印形體的增大，印紐演變爲粗大的長方板狀紐，便于把握。唐代有的官印仍作橋狀，尚保留有漢魏遺風。到了五代、北宋時期，印紐多改作長方板狀，只有極個別例外。宋代官印紐端多刻有「上」字，以指示印文的倒正。金代官印的紐式，與宋印相同，普通官印皆作長方板狀紐，只有皇帝和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的官印例外。在紐端多刻有「上」字，個別官印的「上」字不在紐端，而刻在印背的左上角或右上角。金代後期頒造的官印，多不刻「上」字，這是粗製濫造的結果。紐端有無「上」字，是識別金代官印早晚的重要標誌之一。

有的官印紐下有二層臺，這類官印數量不多，只見有四種，即承德縣出土的「元帥府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元帥府印」，舒蘭縣出土的「中書門下之印」，保定徵集的「元帥左都監印」。印背有二層臺，官印的厚度即薄一些。阜新縣出土的遼「啟聖軍節度使之印」，印背具有二層臺，說明紐下有二層臺的官印，在遼代即已出現。金代具有二層臺的官印，保留有遼代

的遺風，應是金初的官印。

據《金史》記載，皇帝、太子、親王以及三師、三公的璽印，與一般的官印不同。除質料不同、大小有異以外，在紐式上也有區別：皇帝璽印用龍紐，太子之寶用龜紐，親王、三師、三公、尚書令的官印，均用駝紐。皇帝、太子的璽印，沒有見到實物。傳世的「誅王之印」，是完顏婁室的官印，目睹者稱是駝紐，與史書記載相合。金哀宗天興元年（公元一二三二年），紅襖軍將領國安用投降金廷。《金史·國用安傳》稱：金廷「以安用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帥、京東山東等路行尚書省事、特封兗王……改名用安，賜金鍍銀印，駝紐金印。」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都元帥均是從一品，故賜金鍍銀印；兗王儀比親王，屬正一品，故賜駝紐金印。

丙、書體

由于時代的不同，官印印文的書體在不斷的變化。戰國官印採用六國古文，秦漢用小篆和隸書，隋唐以後用九疊篆。宋、金官印，均用九疊篆作爲入印的主要書體。九疊篆的採用，與印面的增大有直接的關係。印面尺寸小，適合于用白文即陰文篆刻。但是，印面尺寸增大以後，如果仍用白文刻印，粗壯的筆劃就會顯得笨拙、死板。改用朱文即陽文刻字，可以改變這種狀態。朱文筆劃雖然纖細，然而可以反復重疊四、五次或八、九次以上。這就是九疊篆在隋唐以後作爲入印文體的主要原因。此外，用九疊篆入印，還有其他許多好處。一是筆劃彎彎曲曲，使人難以識別和模仿，可以防止官印的僞造；二是重疊曲折的筆劃，增加了官印的神秘性，可以在精神上强化對人民群衆的統治。由于九疊篆不易識別，爲防止用印時將印文顛倒，故而在紐端或印背刻上楷書體的「上」字，以指示用印的上下方向。

九疊篆的書體很難掌握，因此，需要有專門的人員從事印文的篆寫。宋朝的少府監設有篆書官二人，金朝亦應如此。皇帝的璽印，往往選擇有名的書法家篆寫印文。據《金史·左光慶傳》，左氏「善篆隸」，曾爲金世宗篆寫過「大金受命萬世之寶」。由

此可知，皇帝的璽印除用九疊篆以外，還採用隸書入印。

大定和大定以前的官印，印文的篆寫流暢秀麗，純熟自然，應是出于名家之手。金代後期的官印，印文死板拙劣，當是普通的書吏所爲。這是官印粗製濫造的表現，也是現在區分金代官印時代早晚的重要依據之一。

丁、章法

印文是官印的內容，印文如何排列佈局，則是官印的形式。印文的排列佈局既要遵循漢字的書寫規則，又要整齊大方，給人以美感，這是官印成文的章法。

在唐代以前，印文的字數不太固定，有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等不同的官印，八字以上的官印則很少見。二字印文，或左右排列，或上下排列，無固定的格式。三字、四字、五字的官印，一般均作左右兩行排列。六字以上者，通常作左中右三行。戰國、秦漢時代的二字印、四字印，常見將印面劃爲日字格、田字格，一字占有一格，稱作「界格印」。劃分界格的目的，是爲了使印文大小劃一，整齊有序。但是，「界格印」有些死板僵硬，缺乏藝術的美感。因此，西漢中期以後，「界格印」便消失了。

沒有界格的官印，特別是印文爲奇數的官印，在印文佈局上便產生了一些困難，印文常出現大小不一的現象，以及印面上出現或大或小的間隙。爲了消除上述弊病，就需要印文成爲偶數。于是，在奇數印文之後，常常綴以「印」字或其他文字。

戰國時代的官印，一般只列職官名稱，個別的綴以「鉨」字，這是「璽」字的古寫。秦漢魏晉南北朝的官印，職官名後綴以「印」、「之印」、「印章」的現像漸多，這是爲了區別將軍印和一般官吏用印。當時，一般官吏用印和私印，只綴以「印」和「之印」，只有將軍印才綴以「章」或「印章」。

隋唐以後，文官、武將用印漸趨一致，文武百官之印多綴以「印」或「朱記」，這已成爲當時官印之定制。宋代官印多以奇

數成文，印文後多綴以「印」字，少數綴以「朱記」。金代官印綴以「朱記」者極爲罕見，奇數印文多綴以「印」字，如「蒲裕路印」、「哥扎宋哥屯謀克印」，偶數印文則綴以「之印」，如「胡里改路之印」、「拜因阿鄰謀克之印」。印文采用偶數，使印文排列整齊有序，印面飽滿，消除了印文大小不一和間隙過大的弊病。

金代官印的印文，多爲四字、六字、八字，個別的爲九字。四字、六字、八字者，在印面佈局上均作左右兩行，每行二字、三字、四字。官名爲二字者，通常都綴以「之印」二字，變成四字印文，如「都統之印」、「萬户之印」。金代不見二字官印。九字官印則作三行，每行三字，縱横都是三行三字，印面整齊劃一。「太師國王都行省之印」，即此情形。十二字、十五字的官印，印文亦排列成左中右三行，每行四字或五字。「嵐州分治行六部員外郎之印」和「延安府第六將蕃第二十五指揮之記」，即是如此。印文没有排列成四行者，亦未見有十五字以上者。

戊、字款

五代時，開始在官印的背面鑿刻文字。到了宋代，這種風氣大盛，印背上的文字漸多。金代的官印一依宋制，大多數印背都鑿刻有文字。通常是印背右側刻年、月，日（實際上只有具體的年、月，日字前幾乎都是空白），表明造印的時間。在印背的左側，刻造印的機構名稱，如少府監、内少府監、禮部、尚書禮部、行宫禮部以及其他造印機構的名稱。在官印的側面，多刻上官印的名稱或編號。有些謀克印，常常在印側刻上「係某某猛安下」的字款，表明其上下隸屬關係。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形。在印側刻造印的時間和造印的機構者有之，在印背刻官印名稱或編號者亦有之。均屬特例，不多見。

在官印的背面和側面鑿刻文字，同製造、頒發、使用官印有關。煉銅鑄印，是一件很麻煩的工作，不可能鑄一種官印，即開爐冶煉一次，應當是一批一批的鑄造。在鑄出毛坯以後，還要經過修整加工，磨掉鑄造時留下的毛刺，修整印文的溝槽，使之平整光滑，清晰可見。九疊篆的印文不便于識别，在印背上鑿刻上有關文字，有利于官印的加工、頒發和使用，防止將官印弄混、搞錯。

官印是權力的象徵，有了官印，可以頒發法令、文告，可以任命官吏，可以呈遞公文。因此，官印的製造、頒發、啟用，都要有嚴格的制度，防止僞造和盗用。官印上的各種字款，既是爲了製造、使用官印的方便，亦與官印的管理有關。

金代中期的官印，即正隆、大定年間的官印，印背、印側的字款最爲齊全完整，其中以猛安謀克官印最有代表性。到了金代後期，特别是金代末年，印背、印側的字款逐漸減少，有些官印竟連一條字款也不見了。這反映出當時匆匆造印，急待頒發使用，一切制度從簡，已無規章可言。這是金朝走向没落衰亡的一種反映。

金代官印印背、印側的字款，是用尖鋭的工具一筆一劃地鑿刻上去，故又有「鑿字」之稱。在金屬上面鑿字，不同于在木石上刻字，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因此，在鑿刻文字時，盡量減少文字的筆劃，于是就出現了許多簡筆字。常見的有「礼」、「号」、「马」、「监」等等。這些簡筆字對于了解金代的書寫習慣，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值得研究文字學的專家們重視。

己、編號

金代官印中，有相當一部份官印具有編號，這是金代官印的一個特點。官印的編號有兩個不同的系列：一個系列是以五行（金、木、水、火、土）爲編號，另一個系列是以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爲編號。以後者爲多見。

官印的編號，通常是採用兩種不同的方式進行。其一是將編號納入印文中，成爲印文的組成部分。例如「成字都統之印」、「上京路萬户王字號印」、「西京差委金字號印」、「上京路軍馬提控木字號之印」。印文中的「成字」、「王字」屬千字文編號；「金字」、「木字」屬五行編號。其二是編號不入印文，而是鑿刻在印背或印側。如黑龍江省蘭西縣出土的「都提控所之印」，印背刻「光字號」；安徽省鳳臺縣出土的「都提控所印」，在印側刻「霸字號」。「光字」、「霸字」都屬于千字文編號。但是，這種情形并不多見。

《金史·百官志》稱：「泰和八年閏四月，敕殿前都點檢司，依總管府例鑄印，以「金」、「木」、「水」、「火」、「土」五字爲號，如本司差人則給之。」據此，則官印編號似始于地方上的總管府，後來擴及朝廷。地方總管府從何時起給官印編號，史書中不見記載。估計很可能是從泰和（公元一二〇一——一二〇八年）初年開始的，因爲目前所見到有編號的官印，在時間上没有早于泰和的。按五行編號的官印，目前只見到七種。其中金字號兩種，木字號兩種，火字號兩種，土字號一種。這七種官印頒造的時間，分别是貞祐三年（公元一二一五年）和大安元年（公元一二〇九年），説明以五行爲編號的官印，主要盛行于衛紹王大安至金宣宗貞祐年間。頒造官印的機構，有「□路運司」和「禮部」，可知以五行爲編號的官印，不限于總管府和殿前都點檢司，轉運司和禮部等許多官府造印，都採用了五行編號。

按五行編號的官印，所見數量不多。大量的官印是按千字文的順序編號，這類官印有四十餘種。其中時間最早的是泰和八年（公元一二〇八年）十月禮部頒造的「省差順字號印」。這説明在實行五行編號的同時，即已出現了千字文編號的官印，在年款上有泰和、大安、崇慶、至寧、貞祐、興定、元光、正大、壬辰（天興元年）。據此可知，按千字文編號的官印，盛行于衛紹王、宣宗和哀宗時代。

在有編號的官印中，有都統印、副統印、萬户印、萬户所印、提控印、提控所印、句當公事印、差委官印，其中以軍官印和軍事官府印居多。在衛紹王時代，蒙古開始南下。貞祐初，蒙古的侵擾加劇，金宣宗被迫遷都南京。在蒙古南下的同時，國内又出現了紅襖軍起義、耶律留哥起義以及蒲鮮萬奴的叛變活動。整個金朝處于内外交困之中。金廷爲了維持其統治，大量徵集兵源，擴大軍隊，增設軍事機構，軍官相應的增多。同一軍職（如都統、副統、萬户）和同一級軍事機構（如萬户所、提控所）的官印，數量相當之多。爲了便于官印的頒發和管理，只好將同類官印按順序編號，以示區别。以五行編號有個缺點，只限于金、木、水、火、土五字，官印數量增多以後，就無法進行編號了。採用千字文順序編號，就不存在這種問題了，因爲同一類的官印不會多到一千種。由于千字文編號可以滿足官印數量多的要求，因此，以千字文編號得到普遍推廣。現在所見到的官印，以五行編號者極少，以千字文編號者特多，就是這個緣故。

庚、印面尺寸

《金史·百官志》對官印的印面尺寸，有詳細的記載。印面尺寸的大小，反映了職官地位的高低和權力的大小。就一般來說，印面尺寸越大，職官的地位就越高，權力亦越大。反之亦然。但是，金代後期官印同金代中期官印相比，印面尺寸明顯的增大。因此，不能簡單的以印面尺寸的大小，來衡量職官地位的高低和權力的大小。爲了說明這一點，不妨用金代後期的官印同金代初期和中期的官印，做些比較。

「誂王之印」是金熙宗皇統元年（公元一一四一年）頒造的官印，印面爲6.9×7.4厘米。「太師國王都行省之印」印面爲13×13厘米，這是目前所見到的印面尺寸最大的官印。此印無年款，但從「行省」二字可知，這是金代後期的官印。印面上的「國王」，可能是金宣宗時代的澤王胡沙虎或金哀宗時代的鄭王崔立。他們都屬于一字王，與完顏婁室的誂王地位相等。然而後者的印面尺寸，與前者相差懸殊。

吉林省大安縣出土的「利涉縣印」，是海陵正隆二年（公元一一五七年）頒造，印面爲5.3×5.3厘米。《滿洲金石志》收録的「清寨縣印」，是金章宗泰和五年（公元一二〇五年）頒造，印面爲8×8厘米。同是七品官印，後者比前者大了許多。《意園古今官印勼》收録有「平章政事之印」，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公元一一八一年）造，印面爲6.3×6.4厘米。黑龍江省博物館收藏的「遼東轉運司印」，衛紹王大安元年（公元一二〇九年）造，印面爲6.7×6.7厘米。平章政事爲從一品，轉運使（司）爲正三品。後者比前者低三階，而印面尺寸却比前者大了許多。類似的例證，還可以舉出很多。

金代後期的官印，除猛安、謀克官印印面尺寸與前期、中期變化不大以外，其他官印的印面尺寸都明顯的增大。特別是金代末年的官印，如提控印、委差印，印面尺寸與其階品極不相稱。

金代後期印面尺寸的增大，是由于造印制度混亂的結果。當時，除行宮禮部（尚書禮部）造印外，還有許多朝廷的、地方的和

軍事的官府，都可以隨意頒造官印。它們各行其事，往往不依制度。爲了招兵買馬，往往濫賜官爵，濫發官印。《金史·李英傳》稱：「自兵興以來，亟用官爵爲賞」。在這種情况下，自然會出現小官用大印的不正常現象。

四、結語

印章向爲收藏家所重視，自宋代以來即不斷有人收藏著録。但是，舊收藏家以古爲貴，往往重視秦漢璽印，唐宋以後的印章，被視爲晚近之物，常常爲收藏家所輕。故而在傳世的印章中，私印較多，官印則少見。季錫疇《集古印譜序》稱：「秦漢六朝私印，世猶有存者。若唐宋官印，最爲希睹。蓋當官者歿，印即繳于朝銷之。今散落人間者，特千百種之一耳。」金代官印亦然。

金代官印之收藏著録，始于清季。清人編輯之金石録和印譜，如馮雲鵬、馮雲鵷《金石索》，瞿鏞《集古印譜》，吴雲《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都是以秦漢璽印爲主，間附金代官印若干。民國以後的印譜，如羅振玉《隋唐以來官印集存》、《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侯汝承《意園古今官印勼》，羅福頤《滿洲金石志》，金毓黻《東北古印鉤沈》，都收録了一批金代官印。至此，金代官印始引起人們的注意。解放前的收藏者多爲私人，官印常常聚而復散，失其下落。所編印譜中常見有重復的官印，即此緣故。

解放以後，官印之收藏由私人轉爲國家。各地博物館、文物管理所（站）、文物考古研究所，都收藏有官印。數量既多，保存亦善。且新出土之官印，隨時披露于報刊，學術界及時知曉，實有利于學術研究。

余自幼好古。及長，學歷史，習考古，以文物研究爲業。金代文獻缺乏，官修《金史》簡陋，素爲學者所病。金代官印印文及印背、印側字款較多，是補證《金史》之重要資料。最初搜集金代官印，即出于此種需要。前後凡十餘載，幸得文物考古界同仁相助，使分散各方的金代官印，陸續集中，達五百餘紐。這并非是金代官印的全部，尚有一部分傳世和出土的官印，不爲我知，未能訪求，以待將來。

友人建議，應編爲一集，以供學術界更多的人參考。初編分爲《印譜》、《印録》、《印考》三部分。爲了縮小篇幅，便于出版，現將《印録》的文字做了精減，分散于各印樣之下，供讀者方便。《印考》十餘萬言全部删去，别爲一編，另行出版。《印考》的部分章節，縮寫爲《金代官印綜述》，附于印譜之後，僅供讀者參考。或有不當，乞望海内指正，是以爲幸。

後記

金代官印出土雖多，但分散于全國各地，故收集相當困難。幸賴文物考古界同仁鼎力相助，始得以實現。吉林省博物館、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博物館、吉林大學、旅順博物館、朝陽市博物館、阜陽博物館、河北省博物館、河北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博物館以及其他地、縣博物館、文管所（站），都提供了許多印拓。這是著者深以爲謝的。

《金代官印集》在編著過程中，承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政烺教授、佟柱臣教授提供了許多建議。又承佟柱臣教授爲本書作序。文物出版社孫關根同志，對本書的内容安排和篇章結構，也提出了許多意見。著者表示衷心的感謝。





ISBN 7-5010-0521-4

K・205 定價:38元